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播火荆楚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长江出版社
CHANGJIANG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播火荆楚 /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21.6
ISBN 978-7-5492-7746-9

I. ①播… II. ①中… III. ①武汉—地方史—
通俗读物 IV. ①K296.3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109071 号

播火荆楚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责任编辑:李海振	
装帧设计:刘斯佳	
出版发行:长江出版社	
地 址: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 编:430010
网 址: http://www.cjpress.com.cn	
电 话: (027)82926557(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武汉新鸿业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787mm×1092mm	1/16
	19.25 印张
版 次:2021 年 6 月第 1 版	280 千字
	202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92-7746-9	
定 价: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编辑部

主 编 郑水平 田子渝

副主编 宋 健 李福珍 文道贵 张秋实 张 军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玲	王文全	王萍丽	刘桂芳	孙 勳
杜学勋	李 云	杨剑波	肖 俊	何利平
沈泉晓	张志宏	陈 磊	周 薇	钟贤超
姚开明	袁 琳	夏伟平	高万娥	程 敏
傅 俊	颜昌连	戴定凯		

《播火荆楚》

编写组

主 编 邓正兵

编写组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佳佳 王 钢 王 耀

王兵强 王俊茹 邓正兵

刘桂芳 刘佳欣 李 静

何利平 宋 健 张 均

陈梦烨 徐志刚 谢 忱

目 录

五四风云

- 002 六一惨案
- 007 折扇传讯
- 012 “三罢”促联合
- 018 剪发运动

红色火种

- 024 利群书社聚群英
- 029 陈独秀来汉讲学
- 032 真理之声：马克思主义在汉传播

群英建党

- 038 董必武：从同盟会员到共产党员
- 045 武昌秘会：中共武汉早期组织成立
- 050 楚天群星 殊途同归

江汉东流

- 058 一份刊物一把火
- 063 武汉代表出席中共一大
- 069 浚新小学中成立共存社



073	武汉中学里诞生青年团组织
078	黄土坡的岁月
赤旗怒涛	
084	工友聚集汉冶萍
089	工人识字班和妇女读书会
094	青春之光：从高师学潮到女师学潮
夜路明灯	
100	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
105	书生投身工运
他山之石	
112	包惠僧初识施洋
116	郑州之行
123	这一炮算是打响了
毛遂自荐	
130	黄土坡的约谈
136	项德隆安身刘家庙
139	立志终身搞工运
劳工神圣	
146	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
151	伸张正义
155	武汉工人俱乐部的发展

罢工潮起

- 160 小工罢工有底气
——粤汉铁路武株段工人罢工
- 165 人力车夫胜利了
——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大罢工

组织发展

- 170 汉阳铁厂成立工人俱乐部
- 177 武汉工团联合会到全省工团联合会
- 182 汉冶萍总工会成立

粤汉工潮

- 186 郭亮卧轨拦火车
- 192 围堵劳之常
- 195 对垒王世埏
- 198 扬子机器厂援助罢工

烟厂凯歌

- 202 女工罢工不得法
- 209 资本家出尔反尔
- 216 据理力争终维权

花厂反帝

- 222 英租界血案
- 228 英租界会审公所的判决



233	棉花工人坚持不屈终获胜
潮起江岸	
240	江岸密会
245	风云突变
249	凶相毕露
风雨前夜	
254	紧急会议
256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
260	转战江岸
二七惨案	
266	张厚生奸计频施
274	“头可断，工不可上的”
280	青山埋英烈
复工再战	
286	危急时乔装脱险
289	争论中忍痛复工
294	斗争没有停止
299	后 记



播火荆楚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五四风云



六一惨案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武汉新闻界积极关注国事，率先对此进行了报道。从5月1日至5日，《大汉报》先后刊登了《均势与瓜分》、《北京要闻》、《争向城头骂人》等文章，赞扬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并要求北京政府力争主权。5月4日，北京学生掀起反帝爱国运动后，《汉口新闻报》立即以“北京来电”的形式进行刊登，在武汉地区首先报道了五四运动的消息。此后，荆楚大地掀起了五四风暴。

5月6日，汉口各界联合致电北京国民外交协会，恳请政府当局令专使坚持，“万不可签字，致丧国权”。《大汉报》发表短评《中国可以不亡》，说明中国现实处境艰难，正值“国势危急之秋”，号召武汉人民积极行动，挽救民族危亡。武汉学界积极响应号召，5月10日，中华大学、武昌高等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拉开了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序幕

师范学校、武昌文华大学、启黄中学等 15 所学校代表举行茶话会，商讨联合行动，不久即成立了武汉学生联合会。

在武汉学联的指导下，5 月 18 日，武汉各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举行罢课游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他们穿过大街小巷，高呼口号“打倒卖国贼”、“誓雪国耻”、“提倡国货”，此起彼伏的呐喊声顿时响彻云霄。中午时分，集合到武昌阅马场的大、中学生已有 3000 多人，他们在广场上呼喊口号，接连不断地演说，声泪俱下，掀起了激动人心的热潮。

下午 1 时许，各校学生队伍依次有序前进，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大游行。学生们挥着旗子，喊着口号，并把传单和学联的《宣言》、《简章》等宣传品撒向街道两边的群众。沿途民众和游行学生的爱国热情交融在一起，不断发出欢呼声。许多人纷纷拿来茶水和水果慰问学生，但都被守纪律的学生婉言谢绝了。当游行队伍到达湖北督军署时，“还我河山，夺回青岛”、“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伸张民气”的口号声更加响亮，学生们的怒火也更加高涨，督军署大门口的警卫顿时剑拔弩张。

5 月 20 日上午，武昌文华大学、圣约瑟学校等 5 所教会学校的 1000 多名大、中学生又举行了示威游行，学生每人各执小旗，另执 3 面大旗，分别书“力救危亡”、“提倡国货”、“唤醒同胞”等字样，游行队伍还在督军署门前奏起了哀乐，以示“我国正处于卧薪尝胆之秋，急需闻鸡起舞”。

武汉学生的集会游行，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以督军王占元、省长何佩瑤为首的湖北军政当局大为震惊。王占元派出大批军警在交通要道沿途巡逻，企图阻止游行队伍。同时，他紧急传见了中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 20 多所大、中学校的校长，命令他们对学生严加管束，不得再生事端，不得妨碍治安，不许在街头演讲，不得罢课。他威胁各校校长“哪个学校敢罢课，就先去封哪个学校的大门”，还颁布临时戒严令，增派军警实行警戒。他还特别命令邮政、电报各局，凡外来关于青岛问题的电报、信件均为“煽惑品”，一律立即销毁；由武汉寄往京、津、沪等学界有关青岛问题的邮件、报章、书籍、印刷品等一律检查，不准发出。

与此同时，王占元不顾民族利益与民族感情，对日本驻汉机关头目极



尽巴结。他特地设宴招待日本驻汉正、副司令官，与之晤谈甚欢。对日本政府授予的一等勋位，也欣然接受。他还屡次下令，要求军警切实保护日侨，严禁妨害中日“亲善”的事件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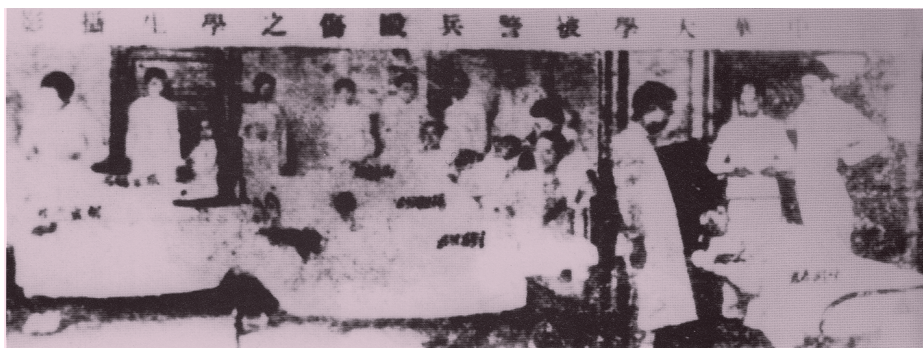
湖北当局的倒行逆施，并不能阻止学生的爱国热情。5月26日，武汉学联在汉口举行会议，欢迎北京、天津学联代表，听取了他们关于京津学生运动的情况介绍。会议决定上书王占元、何佩瑑，作最后的呈请。在学生的正当要求遭到王占元等人无理拒绝后，武汉学联即于31日举行会议，决定全市学校自6月1日起实行总同盟罢课，并发表了《武汉学生罢课宣言》，希图“伸张民气，为国后援，力争主权，殛卖国贼”，并提出争回青岛、惩办国贼、恢复学生自由等3项要求。

王占元闻讯后，再次传见各大、中学校校长，严令不许讲演，不许罢课，所有学校的教职员及学生一律不准外出，违者将严办不贷；甚至扬言，若有不听从者，就格杀勿论；同时，他还下令全市特别戒严，“通令军警查拿露天演讲，一经发现，无论是否学生一律拘捕，听候惩办”。当晚，荷枪实弹的士兵梭巡在武汉街头。

6月1日晨，武汉地区的各大、中学校近6000名学生实行总同盟罢课，计划在12时开始游行演讲。王占元早已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各校，市区主要街道也布满了巡警，气氛十分紧张。面对当局的封锁与围堵，学生们爱国热情依然高涨，他们不顾军警的阻拦，毅然冲出学校，走上街头，进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圣三一学校、湖北省立外国语专门学校、文华大学、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湖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等校的学生相继冲破军警防线，奔赴演讲地点。中华大学学生受阻于校门，即翻越围墙，冲出包围。

面对汹涌的爱国洪流，王占元气急败坏，命令军警镇压学生运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正在游行时，便遭到军警阻拦，学生陈开泰等人上前辩理，对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发出了一声声义正词严的质问：“当兵的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人。难道你们就忍心让自己的国土被日寇占领吗？难道你们忍心对付自己手无寸铁的同胞吗？”同时，1名苏姓同学咬破了自己的手指，用滴着的鲜血在撕开的衣襟上写下2行大字：“还我山东，

还我青岛！”在场的群众神情激动，无不潸然泪下。不料军警却以刺刀相向，当场刺伤学生 10 余人，陈开泰身受重伤，晕倒在地。军警的残酷镇压，使许多学生倒在血泊里，近百名学生被捕。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武昌“六一惨案”。



六一惨案中，被军警殴伤的武昌中华大学学生在治疗中

当晚，大雨倾盆，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依然高涨。“宁捐七尺躯，不做亡国奴！”许多学生冒雨夜卧长街，在军民两署前静坐示威，手举“爱国无罪”、“还我学友”、“缉拿凶犯”、“惩治国贼”等标语，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严惩凶手。武汉市民被学生的爱国热忱深深感动，不约而同地给学生们送来开水、姜汤、雨伞和衣物。

武汉学联迅即向省议会递交请愿书，抗议军警暴行，并通电全国揭露王占元镇压学生的罪行。各校校长也迅速召开特别会议，决定赴省署抗议，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撤除各校门前军警。此外，一些在汉外籍教师也被军警的暴行所激怒。在文华大学执教的 1 名外籍教师气愤地对军警说：“我们的学生爱你们的国家，你们不惟禁止，而且伤害，不料你们军警无知无识。”另 1 个外籍教师则对爱国学生大加赞扬：“中国学生如此血性，实与前德国学生无异，不出 20 年，中国其必强乎。”

6 月 3 日，武汉地区的学生再次走上街头，继续进行爱国宣传。中华大学的数 10 名学生到劝业场讲演时，遭到保安队的野蛮殴打，致使学生 4 人重伤，5 人轻伤，7 人被捕。中学部学生吴序宾惨遭毒手，流血不止，互



助社成员杨理恒手臂被扭断，其他数人也被殴至重伤。圣三一中学学生在阅马场演讲时，遭警察挥刀驱逐。湖南旅鄂中学学生逾墙而出时，被军警举枪击打，这就是“六三惨案”。至此，武汉成了“军警世界”。

学生的拳拳之心，激发了武汉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王占元的残暴恶行，引起了武汉广大民众的强烈愤慨。武昌律师公会副会长施洋紧急召开律师会议，提出援救学生案，呈请法庭提起公诉，要求惩办凶手。湖北省议会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了学生要求弹劾警察处长崔振魁的提案，以伸张正义。

《汉口新闻报》登载了省议员陈士英等 11 人关于军警伤害学生的质问书，要求政府将逮捕的学生全部释放，将受伤学生送到医院治疗。湖北旅沪同乡会更是要求罢免王占元，以抚慰人心。旅宁、旅京同乡会也纷纷致电，谴责王占元，声援武汉学生运动。随后，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积极地支援学生，武汉地区爱国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发展。

（王兵强）

折扇传讯

武汉五四运动中，武汉学生走在了运动的前列。时任武昌中华大学附中教务主任的恽代英积极发动和组织学生参加运动，并发动和联络商界人士支持学生运动，成为武汉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恽代英，原籍江苏省武进县，生于武昌，武昌中华大学文学系毕业。1915年参加新文化运动，在《东方杂志》、《新青年》上撰文，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封建文化。五四运动爆发后，恽代英立即响应。他拟出了题为《勿忘五月七日之事》的传单，和中华大学附中三班学生林育南等人一起赶印了600份，希望以北京政府1915年5月7日承认“二十一条”的国耻来激发武汉民众的爱国热情。1919年5月7日，中华大学举行运动会，到场学生有6000多人，传单在运动会上散发。传单中悲愤的呼唤，运动会上振聋发聩的呐喊，引起了莘莘学子的强烈共鸣。5月9日，传单被武汉《大汉报》刊登，随即传遍了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起到了鼓舞武汉民众参加爱国反帝运动的号角作用。

5月9日，武昌各校学生代表聚集于中华大学，商议声援北京学生事宜，决定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恽代英主持起草了4000多字的《武昌学生团宣言书》，以武昌学生团的名义向北京学界发电进行声援，并倡议武汉学界进一步联合起来以增强力量。为此，他选派



恽代英（1895—1931）五四运动时，为抵制日货，剃成爱国“光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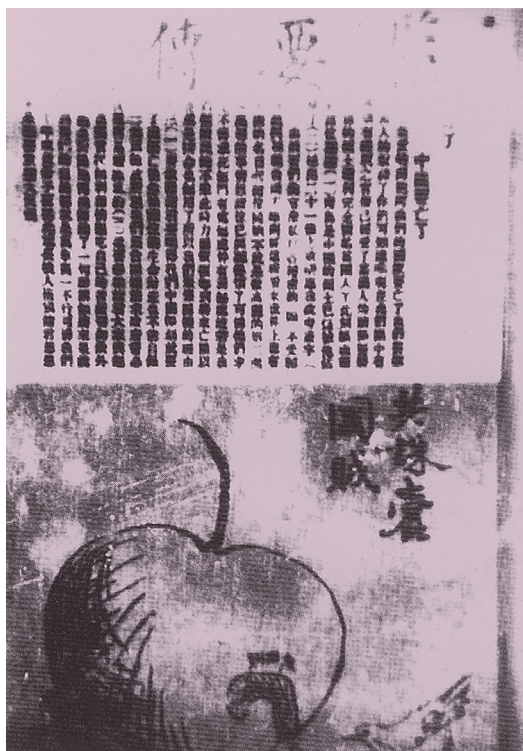
林育南等人分赴武汉各大、中学校进行联络。

恽代英的倡议很快得到了回应。5月17日，武汉学生联合会在中华大学成立，武汉地区26所学校的代表出席。恽代英与陈潭秋、林育南、李书渠、廖焕星、李求实等成为骨干人物。为“唤起国民爱国热忱，提倡国货坚持到底”，武汉学联发起创办《学生周刊》，恽代英亲自为这份周刊拟定了办刊宗旨。恽代英在发刊词上对广大学生给予了热切的期望，“望我学生，积极进行，提倡国货，众志成城”。为了把武汉地区反帝爱国运动推向高潮，武汉学联决定第2天举行反日示威游行。

在中华大学学生的游行队伍出发之前，为了鼓舞学生斗志，恽代英向全体学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你们决心去游行，演讲，发传单，唤醒民众，这是爱国行动！我们和恶势力斗争，就要准备被捕，坐牢，流血。但不管有多少困难，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场学生

深受感染，斗志昂扬，恽代英也兴奋异常，他坚信学生爱国运动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并起草传单《呜呼青岛》，分送各校广为散发。

然而，湖北督军王占元指挥军警对爱国学生残酷镇压，先后制造了六一惨案、六三惨案，使数10名学生受伤，无数学生被捕。残酷的现实触目惊心，同时也进一步唤醒了恽代英。恽代英深刻地认识到：学生运动只能造成声势，反帝爱国运动单靠学生是不够的，真正要达到爱国救国的目的，还必须把各阶层群众发动起



1919年5月6日，恽代英和林育南连夜起草传单

来，才能产生扎实的力量。

恽代英热切地希望为爱国运动寻找生力军，以补充新鲜血液，使爱国运动进一步蓬勃发展。恰在此时，北京、上海等地商人通过罢市支援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了武汉。他顿时眼前一亮，将视野转向了商界，不觉欣喜若狂：“既然北京、上海的商界都在支援学生，武汉的商界怎么会不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呢？”

为了争取商界罢市，恽代英积极奔走，他企盼商界人士能与学生紧密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以推动武汉地区爱国运动的发展。六三惨案的当天，恽代英特地从武昌到汉口拜访了在武汉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大商人刘子敬和马刚候，向他们介绍了武汉地区学生的爱国运动，诚恳地希望商界人士能够予以支持，声援爱国学生。

不久，恽代英再次来到汉口，在汉口各团体联合举行的会议上慷慨陈词：“青年学生为国家流血，这血决不能白流。罢课、罢工是学生和工人的斗争手段，希望商界同仁继起罢市，恪尽国民职责，国能得救，则代英等人以及青年学生，虽伤亡流血，亦所甘愿。”期待商界商民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主动进行罢市，并指出罢市“可以争回青岛，可以挽回主权，可以惩办卖国贼，可以取消密约，可以救被捕学生，可以不为亡国奴，可以提高人格”。恽代英热情洋溢的发言，使商人代表郑慧吾、刘子敬、马刚候等人深受感染，他们纷纷表示愿意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在这次联合会上，恽代英结识了闻名江城的大律师施洋。施洋为恽代英无私的爱国情怀所折服，对受伤学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两人虽是初次见面，但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恽代英与施洋的结交，使学界和商界来往更加密切。从此，武汉学界、商界开始酝酿相互支援的行动。

随后，恽代英与林育南、任启珊、施洋等人在汉口华商跑马场，召开了有工人、商人、农民、学生参加的万人国民大会，呼吁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爱国运动，立即罢工、罢市，并安排互助社社员深入武汉各个商店，逐一地进行动员。

争取到了商界人士的支持，对于武汉地区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而言，



不啻是一次胜利，但恽代英没有为这小小的成功所陶醉。为了使商界人士深刻地认识到罢市的重要性，他彻夜不眠地草拟文件、宣言，拟就了《为什么要罢市》、《罢市的目的和方法》等传单，准备以武汉学联的名义组织学生向各个商店进行散发，从基层去发动罢市。

听说商人在酝酿罢市，王占元先是大吃一惊，继而下令全市戒严。霎时间，军警出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街市要道上都武装森严，武汉三镇再次笼罩在恐怖阴影之下。恽代英、林育南、汤济川等人并没有气馁，他们到街上查看罢市情况，却只见几家商店关门罢市，大多数店铺还在照常营业，情况很不理想。

在此发动商人罢市的紧急时刻，怎样才能把写好的传单散发给商界呢？照旧印发传单易为军警所知，不仅于事无补，反有生命之危。恽代英不断思索着办法，遂前往致中学校，找黄负生商量。黄负生出生于湖北武昌，祖籍安徽休宁，曾在武昌中华大学教书。那时恽代英正在中华大学读书，二人虽是师生，却无话不谈，如同密友，又都积极倡导爱国运动，同是战友，彼此往来频繁，过从甚密。

黄负生对武汉爱国运动的发展也极为担忧，为了安抚恽代英炽热如火又躁动不安的心，他让恽代英在椅子上坐下来，端给他一杯凉水，微笑着，关爱有加地说：“不急，不急，先喘口气，喝口水。”他匍匐在桌上写文章，边写边挥舞着扇子，对恽代英说：“现在正是大热天，写文章也要摇扇子，不然大汗淋漓，汗珠会像磅礴暴雨般冲刷纸上的墨字。”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恽代英如醍醐灌顶，顿时喜上眉梢，连声说道：“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咱们去买些白纸折扇，然后把传单内容写在扇面上送人，通过纸扇传书的方式，躲过军警耳目，不是个很好的通知方法吗？”黄负生合掌拍了一下，说：“我也是这样想的，这样我们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达到宣传的目的了”。

恽代英与黄负生立刻到街上，买了几十把白纸扇，又找了几个人，将恽代英拟好的稿子《为什么要罢市》和《罢市的目的和方法》抄写在扇面上，并有“定于本月某日起为了救国，全市商店罢市，此扇请速传观”之语，

装在纸盒里，沿街散发。军警看到，也不以为意，纸扇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在商民中迅速地传递着。接到通知的店家，因爱国心所驱使，陆续关门罢市。

汉口各商会率先罢市，仅一两天，连王占元统治极严的武昌，各商铺也都接连罢市了。“救国救民，同胞同心”、“为国雪耻，牺牲私利”、“愿为爱国死，不作亡国奴”、“保中国领土，禁敌国货物”、“除卖国奸贼，挽救爱国学生”、“国事如此，无心营业”等标语一时流行开来。此外，武昌商会还发表了《商民罢市之宣言》，公开函告军民两署，要求政府恢复学生自由及电请北京政府拒绝在和会上签字、惩办行凶军警、严办卖国贼，并表示如果相关条件得不到圆满答复，将继续罢市。

面对商人罢市，王占元极其恐慌。几次行凶制造惨案已使他在湖北地区臭名昭著，他害怕武力镇压会引起更大的民愤，一旦再次燃起民众心中的怒火，很可能会烧毁他自己。经过权衡考量后，王占元最终被迫让步，基本同意了武昌商会的要求，商人罢市取得了胜利。

恽代英急中生智，通过折扇传讯，推动了商人罢市的成功。这一巧妙的方式，既凸显了恽代英的智慧，也在武汉留下了一段佳话。王占元做梦也没有想到，虽然他对商人罢市早已严加防范，最终促使他失败的竟是几十把不起眼的扇子！

（王兵强 陈梦烨）



“三罢”促联合

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城市中的各阶层民众联合行动，一起进行反帝爱国运动，是五四运动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武汉五四运动爆发后，先进知识分子和爱国学生一方面组织罢课，另一方面积极发动和组织商人罢市、工人罢工，使运动不断扩大和深化，也促进了武汉民众的大联合。

1919年5月17日，武汉五四运动初期，武汉学生联合会就宣告成立，并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北督军王占元制造六一惨案、六三惨案后，多次传见各校校长，命令他们对学生严加管束，不得再生事端，否则“格杀勿论”。同时，派出大批军警将各校大门围堵，并在主要街道进行巡逻，“首尾相衔，不绝于途，交通几为之断”。王占元不惜采用极端恐怖手段

对学生进行恫吓，妄图以此压服学生。

但是，武汉学生不向暴力屈服。他们毫不畏惧，继续坚持斗争，在街头呼喊口号，散发传单，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6月6日，肖楚女为鼓舞学生斗志，毅然发表与日本人开办的《湖广新报》断绝一切关系的声明，并在《大汉报》上发表许多文章猛烈抨击王占元的军阀统治，宁可丢掉工作，也要斗争到底。武汉学联公布《武汉学生罢课宣言》，向全国人民宣布罢课的理由及严正立场。同时，他们开始提倡国货，号



肖楚女（1891—1927）

召商人罢市。武汉学联代表环集商会进行演说，要求惩办凶手、停办日货、全镇罢市，劝慰商界积极罢市。博文学校学生 30 余人在街市上调查国货，并编印《国货调查录》手册，向商铺送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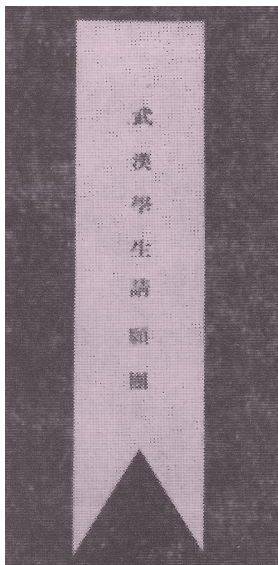
学生爱国运动的火焰不仅没有熄灭，反而越来越旺，刺激着王占元的每一根神经，使他寝食不安。他视学生爱国运动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为此，他搜肠刮肚，终于想出了釜底抽薪的毒计，勒令各校提前放暑假，限学生 3 天内全部离校，并让省长何佩瑒假慈悲地对学生进行抚慰，妄图以此来瓦解离散学生运动。恽代英、林育南、施洋等人经过反复商议后，决定将计就计，让部分忧思国难的鄂籍学生通过放假返乡，在家乡地区进一步宣传爱国运动，将反帝爱国风潮引入广大而沉寂的武汉周边地区，并勉励他们“同心努力，洗耻救亡”，再接再厉，切勿松懈。

从武汉提前放暑假回到家乡的大、中学校学生，不断地在家乡进行爱国演讲宣传。爱国运动迅速发展到了湖北省内各地。黄冈、安陆、黄陂、沙市、宜昌、武穴、阳新、襄樊、蒲圻等地的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并相继罢课。

回到黄冈的学生相互联络，“或三人或五人在各市镇分途演讲”，痛陈日本强夺青岛之祸，力劝父老乡亲提倡国货。虽然天下暴雨，电闪雷鸣，但义愤填膺的群众依然高亢激昂，在雨中不断呐喊，人头攒动。回到安陆的学生每到一镇，都要先到该镇军队驻地进行演说，“详述山东外交之失败”，希望能激起军人的爱国情绪，以壮大爱国运动的力量。回到蒲圻的学生在当地进行爱国宣传，还组织学生游行示威，他们在散发的传单上写道：“勿凉尔血，作三岛国之奴隶；勿馁尔气，作五分钟之热



五四时期的“救国雪耻”爱国纪念章



五四运动中，武汉学生请愿团标记



情。头可断，腰可斩，而良心不可死；天可老，地可荒，而祖国不可忘。”回到宜昌的学生纷纷上街撒传单和演讲，传单词浅情切，呼唤人心，使无数民众热泪纵横。学生运动深入乡里，使武汉的爱国星火在整个荆楚大地遍地燃烧，极大地壮大了爱国运动的声势与影响。

学生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爱国热忱，深深地感染了武汉商界人士。当学生在街市上游行演讲时，“各商民莫不现一种喜悦之表示，又莫不含有痛恨日人欺侮之怒气”。他们见学生们举动文明，讲演流畅，“既无叫嚣之气，尤多感化之功”，无不热烈欢迎，主动用茶果酬劳游行的学生队伍。同时，通过恽代英、施洋等人的不断引导与协商，武汉商人群体逐步开展了罢市，以响应爱国学生运动。

6月10日，汉口数十家商店首先罢市，门口大书“国耻痛心，休业救国”。次日，汉口英法租界、二码头、华景街、前后花楼、后城各闹市区也相继罢市，表示“不惩国贼，暂不开市”。随后，武昌全城罢市，曹祥泰、中华书局、志城眼镜公司等都积极参与行动，投入到爱国斗争中。在罢市的同时，武汉还掀起了推广国货、抵制日货的风潮。富商刘旭堂在汉口黄陂街组织国货陈列所，专门经营国货，各地闻之纷纷效仿，逐渐成为江城的一道风尚。

对于商界罢市，湖北当局十分紧张，王占元多次派人进行威逼利诱，逐户劝说开市。恰在此时，武汉的报纸刊登了北京政府批准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辞职的消息，武汉市民顿时欢呼雀跃，部分商人也认为爱国运动取得了圆满成功。但恽代英没有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依旧保持着冷静与清醒，他认为曹汝霖等人的免职只是暂时的，是政府“徐图登用”的过渡，应该一如既往地罢市，否则功亏一篑。

不久，汉口总商会收到了上海总商会要求开市的通知。是开市还是继续罢市？商界人士正在踌躇徘徊，争论不已。以汉口总商会会长为代表的上层人物秉承王占元的旨意，曾出面阻止商人罢市，此时正急忙印发传单，要求各商店“一律照常营业”。

恽代英见状，心急如焚，为了使广大商人认清当前形势，将斗争进行到底，他以武汉学联名义起草了3000余字的宣言书，请求商界人士继续支

援学生爱国运动，得到了汉口大多数爱国商人的同情与支持，他们对汉口总商会的“开市要求”不屑一顾，仍然响应爱国学生的号召，一如既往地坚持罢市。

武昌商会受到鼓舞，要求商民以爱国为己任，务必一致行动，更加积极地进行罢市，以“尽国民一份天职”，并于6月12日发表《敬告汉口商界同胞书》，希望汉口商界坚持罢市，切勿“自相残杀”。

在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同时，武汉工人阶级也鸣起了罢工的汽笛，积极响应爱国运动。当学生爱国运动兴起时，他们和广大市民一道，对游行、示威、讲演的学生给予支持。当学生提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时，武汉造币厂工人发起组织提倡国货协进会，号召提倡国货，并连夜集会洗马场，决定禁止代售日货，“使日货毁于无形”。汉阳铁厂职员组织十人团进行爱国宣传，抵制日货，并在厂内成立国货贩卖部。贫民大工场织机部的工人组织国货贩卖团，提倡国货，将该厂80多种产品每日派人挑往街市出售。汉口各大工厂的工人代表200余人召开会议，作出了不用日货、不帮日人做工、不用日本银行货币等三项决议，并将决议内容印成传单，发给各工厂工人，号召一致行动。

工人们有组织地参与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很快发展为广泛的罢工斗争。5月23日，日商楚兴公司缫丝厂女工首先罢工，“因青岛问题顿起义愤，刻已相约回省，不愿与其工作矣”。接着，汉阳日资企业泰安纱厂工人罢工，喊出了

“万众一心，罢工救国，共除国贼，以雪国耻”的口号，并坚决表示“不达目的，誓不开工”。汉口英租界平和、荣茂两花厂工人和汉阳镇土木工人纷纷响应。随后，武昌数百家成衣店几千



汉口总商会大楼



名工人、各铁匠店近百名铁匠工人，汉口的笔工、染工、漆工、竹工、铜匠也几乎同时罢工。

此外，武汉三镇其他部分工厂、行业及外国在华企业工人也都相继举行罢工。尤其是武汉各轮船公司的商轮、码头工人举行的同盟大罢工，大小商船工人同时宣布罢工，停止装运客货，使江城水上交通中断，“全然在杜绝状态”，影响巨大。与此同时，铁路、邮电各机关工人也在酝酿联合罢工。武汉各工厂工人还准备联合起来，筹划组织总同盟罢工。由于军阀的破坏，总同盟罢工没有实现，但是工人运动的不断发展，给武汉五四爱国运动注入了新的力量。

6月28日，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同日，湖北省长何佩瑢致电北京政府，声称已将督察长杜杰撤职，警务处长崔振魁记过。

武汉五四运动并没有结束。武汉学生、商人、工人进行的“三罢”斗争，得到了社会各阶层、各团体的群起响应与广泛支持，各种社会力量开始联合起来，逐渐汇成汹涌澎湃的巨浪。在促进地区联合和全国联合方面，武汉学界走在各界前列。此前，在全国爱国运动的推动下，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派中华大学潘德芬、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蒋之龙出席会议。随后又加派中华大学林育南、文化大学余尚坦参加全国学联合会的工作。林育南代表武汉学联合会向全国学联合会提出由恽代英撰写的意见书。意见书5000多字，全面表明了武汉学界对国家政治形势的看法和要求，以及对全国学联合会的建议和希望。7月中旬，这份文件刊登在颇有影响的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学生们的欢迎。武汉学生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是该地区先进知识分子打破地域界限，走向全国联合的第一步。

7月10日，武汉学联合会通告各团体，建议组织各界联合会，共谋国家大计。12日，湖北各团体在汉口华景街辅德学校召开第一筹备会议，出席的团体有武汉学联合会、汉口各团联合会、武昌律师工会、汉口商团筹备自治会等16家，代表30余人，会议决定联合会定名为湖北各界联合会。14日，

湖北各界联合会筹备处发电宣布，成立湖北各界联合会的原因是湖北农、工、商、学等各界见合约拒签，善后方针，急筹对付，遂发起筹备，与北京、天津、上海、湖南等地采取一致行动。

8月18日，湖北各界联合会在歆生路爱国公司成立，负责人为马刚候、施洋等人。这个组织本身是一个十分松散的团体，由于自身的弱点，加上军阀的阻挠和破坏，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但是，这个组织的成立，既是武汉五四运动走向深化的成果，也为以后武汉地区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和各阶级阶层的联合打下了基础。同时，这个组织也以实践证明，中国革命需要组织严密、代表最有前途阶级的利益并有科学理论作指导的政党来领导才能焕然一新。

（王兵强 王俊茹）



剪发运动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剪发令”，要求所有男性在 20 日内将发辫剪除净尽，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剪辫子风潮。后来，北京政府又颁布了《内务部提倡剪发之文告》，再次重申男子剪发的必要性与彻底性。至五四运动爆发前夕，男子剪掉辫子已是个人生活的常态，也成了辛亥革命最为直观的标志性成果。

受男子剪发运动的影响，少数女性也开始剪发。武汉作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男子剪发走在全国前列，女子剪发也很早有人向往和尝试。辛亥革命之后，湖北、湖南等省有学校女生组织了“女子剪发会”，少数胆大的女生勇敢剪发。王葆心编辑出版的《汉口竹枝词》反映了 1915 年前后汉口社会各方面情况，其中《妇女剪发》写道：“盘龙堕马或旋螺，削发曾闻只暹罗。个个男儿成佛子，女郎何惮作优婆。”表达了当时武汉女子对剪发的向往之情。

但是，相比于男子剪辫运动的蓬勃发展，女子剪发进展十分缓慢。北京政府提倡男性剪发、女性放足，但对女性剪发并不支持。1916 年 9 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针对女子学校颁布了“五条惩戒规则”，第 1 条就是“不准剪发，违者斥退”。社会上对女子剪发普遍抱有反对甚至敌视态度，认为女子剪发是“不男不女，不中不西”，甚至说女子“剪了发，放了足，将来没有人要”。向警予就任湖南淑浦女校期间，要求女生剪发，但是应者寥寥无几。湖北督军王占元则积极响应北京政府关于女子剪发的禁令。1917 年 12 月，王占元特地颁布条例，对女性的“自为风气”、“装饰服用任意自由”严加取缔，并规定女性不准剪发。因此，女子剪发虽然在辛亥革命以后有人提倡，也有人剪过，但只是昙花一现，尚未形成风潮。

五四运动前后，在民主与科学大旗影响之下，社会各界对女性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男女平等、女性解放成为当时思想界讨论和提倡的热门话题，女子剪发风潮在全国再次兴起。1919年12月到1920年5月，北京《晨报》先后刊登了《论妇女们应该剪发》、《我对于妇女剪发的意见》等文章，从男女平等和女子独立的观点出发，从卫生学及美学的角度谈了女子剪发的好处，公开支持女子剪发。

《晨报》的倡议在上海、天津等地很快得到回应。1920年1-5月间，上海《民国日报》就刊登了26篇关于剪发的评论。北京孔德学校以“女子欲求社会解放必从个人解放始”为号召，呼吁该校女生剪发。丁玲、王一知所在的湖南桃源女师、杨开慧就读的长沙湘福女中、秦德君所在的成都中等女子技术学校、刘和珍就读的南昌女子师范学校等女子学堂都相继出现了女学生剪发风潮。

五四运动以后，武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受到五四运动和新思潮的洗礼，也很快发起了剪发运动。

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创立于1906年，是一所专门培养女子教育师资的学校。五四运动以后，陈潭秋、黄负生、刘子通等接受过新思想的进步青年先后到湖北女师任教，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及妇女解放思想。他们选用《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上的文章作为教材，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培养革命人才。女师学生迅速觉悟起来，武汉最早的“妇女读书会”在该校成立，成为女师学生探讨有关妇女解放的阵地。徐全直、陈碧兰、王文宣、夏之栩、袁溥之、杨子烈、李文宜、樊秀林等学生成了女师的活跃分子，她们在学生中宣传放足，带头放胸，进而带头剪发，宣传和带头废除包办婚姻。

1921年5月的一天黄昏，樊秀林与寝室同学挤在梳洗室洗脸、梳辫。一般在此休息之时，大家相互请人梳头，次日早上便不必再梳。那日正在梳头时，1位女生拿着剪子剪刘海，剪完了放在桌上，樊秀林顺手拿来



徐全直（1903—1934）

剪指甲，并和替自己梳头的同学说：“我们若是能剪发，我也不天天烦你了。”同学说：“哪里能剪？若是可以剪，大家早剪了。”

同学的回答引发了女生们的回应：“有什么不能剪，无非你看我，我看你。我早想剪了，若有1位先剪，我决定做第2个。”其他3位女生纷纷附和。樊秀林见状，大声说道：“我可以做剪发第1人，但是你们必须想好，不能我剪了，你们又不剪了。”四位同学马上发誓：“必剪！”

樊秀林当机立断：“第1人有何难哉！这不是剪子吗？看我剪给你们看吧。”樊秀林顺手拿起剪子，使劲几下子就剪完了头发。其他四位女生见状，也依次剪了头发。

樊秀林等五位女生剪发后，觉得自己如同去了附骨之疽，好不痛快。五人跑到校园草地上，又走到自习室，让大家看剪发后的形象，并大声宣布：“我们有5个人剪发！”同学都快乐地大笑说：“剪得好！明天我们也要剪。”

在樊秀林等人到处展示剪发时，有人报告了校长王式玉和监学周老师。王式玉还是遵从封建礼教和道德的传统文人，思想顽固守旧。他来到现场以后，立即召集全体学生训话，严词责问樊秀林等人为什么剪了头发。樊秀林回答说：“头发是我自己的，自己不愿要它，就剪去了，也没有什么。”其他女生说梳辫子太耽误时间。王式玉无法反驳，于是下令五位同学必须在次日早上把发髻梳起来，若没有发髻，不许进教室学习。当时情况下，五位同学无力做更多的反抗。只好央求各位同学剪一绺绺头发，做成假发，绑在自己头发上。女师学生这次剪发，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女师学生渴望自由追求解放的脚步并没有停息。不久的一天晚上，袁溥之、陈比贞、王文宣、刘玉贞、李兰英、杨子烈六位女生集体行动，

开始了女师的又一次剪发。

那天晚上九点，她们下了晚自修课以后，相约走进盥洗室，关掉室内的电灯，在照进室内的朦胧月光的阴影里，摸索着拉开装梳子的小抽屉，取出早已预备好的剪刀，解开长发，一个个并排站立，每人手中拿着一把剪刀，齐声喊：“一、二、三，剪！”话音刚落，柔顺的发丝便已从锋利的剪刀上滑落。

看着手中柔软而细长的青丝，袁溥之等六位同学又惊又喜，心里怦怦直跳，彼此相互鼓励：“不怕！不怕！”不一会儿，熄灯铃响了，学监周老师来寝室点名，看到六名女生蓬松的短发，肥胖的脸顿时沉了下来。但随后，学监嘴角一撇，摇摇头，叹口气，无奈退了出去。

第2天一早，女师学生早操，全体师生来到了操场。袁溥之等6位同学的短发，吸引了全校师生的目光。同学们的目光中有鄙夷，但更多的是钦佩。校



袁溥之（1904—1994）

长王式玉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六位女生的短发上，全场寂静无声。终于，王校长讲话了：“昨天夜晚，袁溥之诸生，不告诉我就将头发剪短了，这是要不得的，这实在危险。倘若给官厅知道了，对本校是不利的。同时诸生的家长也将问责……目前的环境不允许诸生剪发……诸生平素都是品学兼优，念此次乃属初犯，学校并不处罚。只要诸生立刻把头发接上，仍然留头……希望诸生听话。”与上次训话声色俱厉不同，王校长这次讲话的声音平和而缓慢。显然，女师女生剪发的缺口已经打开，再也难以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缠足、束胸、蓄发，这是中国封建礼教强加在中国妇女身上的几大绳索和枷锁。湖北女师学生不断努力，不断进步。从放足，到放胸，再到剪发，一步步打碎这些束缚女性的物质绳索和精神枷锁。随后，湖北女师学生又



开始了废除包办婚姻运动。一波又一波的运动，让校长王式玉等守旧势力应接不暇。武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早期共产党员刘子通等人始终对女师学生给予热情的指导和支持，更是引起了王式玉等人的不满和愤恨。1922年初，王式玉以“煽动学潮”为名，宣布解聘刘子通。以此为导火索，湖北女师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学潮。湖北女师学潮和湖北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谢忱 王兵强）



播火荆楚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红色火种



利群书社聚群英

利群书社是五四时期武汉地区最大的进步社团，由恽代英创办，起初定名为“利群书局”，不久改为“利群书社”。它是当时长江中游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也是当时进步青年、学生和工人向往的处所，地址在武昌胡林翼路横街头 18 号（今横街）。

新文化运动后，武汉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思潮纷至沓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创办社团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探索救国救民之路。1917 年 10 月，恽代英和自己的挚友黄负生、梁绍文、冼震商议，在中华大学内创办了武汉地区的第一个道德实践团体——互助社，其宗旨是“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不久，林育南、刘仁静等同学陆续加入，年底便发



利群书社旧址

展到 5 组 19 人。互助社提倡“智仁勇”的道德标准，制定了“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的戒约八则。社员们经常开会和活动，自我反省、相互鼓励、锻炼体魄、陶冶精神。1918 年 5 月，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恽代英和互助社社员立即发动学生运动，举行抗议活动。因此，互助社很快成为武汉地区革命青年中影响最大、最负盛名的社团，也是全国最早的进步团体

之一。在它的影响下，武汉地区先后成立了许多同类性质的小团体，如日新社、黄社、辅仁社、仁社、健学会、诚社等。这些团体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对成员的发展影响也很大。

五四运动以后，各种社会思想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作为新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恽代英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也曾经受到无政府主义和新村主义的影响。1919年10月，恽代英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后来，恽代英在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王光祈、李大钊的启发下，受日本新村改良主义的影响，计划在互助社的基础上组织一个类似“新村”的团体，聚集有志青年，通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生活，实现用改良手段构建“伊甸园”式的“未来之梦”。这一设想得到林育南、李书渠、廖焕星、萧鸿举等人的赞同。

1920年1月22日，恽代英、林育南、廖焕星、肖鸿举等12人以利群书社的名义，在湖南衡阳《瑞风》、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成立宣言书《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文中明确提出利群书社的名称、营业时间、服务宗旨、股本来源、行销书刊、活动规划等内容。恽代英认为，利群书社是“营业的机关”，也是“文化运动的场所”。社员们则把书社当作是“修养社会的结晶体”和“社会服务的共同生活的雏形”。

1920年2月1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利群书社在鞭炮声中开张了。书社房子是1幢中式2层楼，楼下是书社，楼上是会址。利群书社以互助社为核心，吸收日新社、辅仁社、健学会等进步团体参加，实际上是武汉各进步团体组织的联合体。利群书社宗旨为“利群助人、服务群众”，以此试验“共同生活”。



《新青年》封面



每天一开门，书社成员就等着读者光临。第1天开张，卖了80文，第2天卖了40文，第3天只卖了20文。他们坚守着，没有泄气。第4天卖了500余文，第5天卖了2000余文。他们高兴极了。从此以后，每天都有几串钱的生意，形势逐渐稳定下来。

1920年4月，恽代英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委托，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他认为所编丛书“应为社会急切需要的书”。为此，他提出了一个研究书目，并将马克思及其学说、唯物史观、布尔什维克等列入研究书目。在恽代英的引导下，利群书社组织出售了大批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出售《新青年》、《湘江评论》、《星期评论》、《时事新报》、《少年中国》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以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入门》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恽代英还与书社同仁混过军警的耳目，秘密经销控诉时任湖北督军王占元为祸湖北的刊物《新湖北》。

武昌有个利群书社出售进步书刊的消息，像春风一样传遍了武汉三镇，吸引了各界青年。恰在这时，武汉大、中学校开学了，互助社回家的朋友也都回来了，横街头顿时热闹起来。青年学生、进步教师来了，店员、公务人员来了，书店的生意也更红火了。有些熟人还在看书之余坐在门口长凳上高谈阔论，书社呈现一派兴旺的景象。许多进步青年在利群书社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重大变化，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大律师施洋来了。他拱手对恽代英说：“恭喜恭喜！我要不是从报上看到消息，还真不知道你们办了这么大的好事呢！我愿义务担任贵店的法律顾问。”

《大汉报》记者肖楚女来了。他带着欣喜的目光看了书架上、书桌上的新书刊之后，来到柜台向恽代英说：“我看了你们的宣言，又看了你们的书店后，决定投到你麾下，做个马前卒。我愿和你们并肩战斗，披荆斩棘，宣传新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谌家矶驻防的陆军十六旅旅长冯玉祥将军也远道而来。他是为寻求新知识，闻讯来武昌买书的。他从书架上挑出了他需要的《黄

孚回忆录》等新书刊,又和恽代英、郑遵芳亲切地打招呼,讲了不少祝愿、称赞的话后,高高兴兴地走了。

利群书社还积极创办自己的刊物。1920年2月,利群书社出版了一个供内部读的小型油印刊物《我们的》,记载社员们开展的革命活动。这个刊物上曾发表很多反对国家主义派、反对无政府党、反对胡适的崇美思想(当时特别表现为崇拜杜威)、反对张东荪的实业救国论的通讯与短文。1920年10月,利群书社又创办铅印刊物《互助》,主要记录社员们试行共同生活的情况。1921年初,恽代英、黄负生、刘子通等创办《武汉星期评论》,由利群书社总代售。



《我们的》和《互助》

利群书社以半工半读的形式运行,恽代英抱着极大的热情来尝试这种“新村主义”生活方式。按照恽代英的提议,书社成员过着一种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的没有压迫剥削、自由平等的集体生活。他为社员们制定了严格的自修和服务制度,企望以这种方式来改造社会、磨炼自己。在利群书社内生活的人,要勤于业务——支部、送报、门市卖书报、业务通信、记账,照料日常生活——洒扫、采购食物和柴火、做饭、烧水、洗衣,学习讨论,小组开会批评与自我批评。每日批评的项目:今日是否做过利群助人的事,摆在面前的利群助人的事怎样进行;对于自私自利、腐化思想的抨击;对于戒急躁、戒愤怒的互励。每日必须在小组会结束后,才得就寝。



恽代英亲自指导书社成员自学，选定教材，规定每周课程。社员先读教材，而后相互讨论，互相发挥印证。恽代英教导社员要和蔼可亲，不许急躁生气。利群书社的生活是紧张而愉快的。

利群书社与国内有影响的杂志社建立了广泛联系。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回长沙，路过武汉，住在利群书社的楼上。在这里，毛泽东和恽代英会面，商谈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的问题。毛泽东返回长沙后，与易礼容、何叔衡等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利群书社与长沙文化书社联系甚为密切，在恽代英的安排下，利群书社不仅给文化书社供应了大量书报，还派林育英等前往长沙帮助兴办望麓园织布厂。利群书社还先后与上海新青年杂志社、新潮杂志社、少年中国杂志社等建立了密切联系，成为长江中游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和武汉先进知识分子相互交流、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可惜的是，利群书社只开办了1年多的时间。1921年6月7日，湖北督军王占元嫡系陆军第二师发生兵变，武昌城内“火光蔽天，弹声如雨”。利群书社在这次兵变中毁于战火，荡然无存。其实，在此之前，利群书社已经因为经济窘迫而陷入困境之中。这一严酷的现实教育了恽代英，使他逐渐认识到，只在精神世界中寻找救国的根本途径，终是一个梦想。只有走苏俄革命的道路，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团体，中国社会才能得到根本的改造。所以，1921年7月16日至21日，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夕，恽代英、林育南等召集利群书社成员及有关社团代表24人在黄冈浚新小学召开大会，成立共存社。共存社本质上已经与以阶级斗争为手段、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十分接近，是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政治组织。

1980年，新华书店的同志找到易礼容，说长沙文化书社是新华书店的始祖，请他写回忆文章。易礼容郑重地回答：“不对，利群书社才是真正的始祖。”

1985年，华中师范大学为纪念校友恽代英诞辰90周年，在校内重建利群书社。

（刘桂芳）

陈独秀来汉讲学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陈独秀来汉讲学，宣传马克思主义，是武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武汉知识分子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1920年2月，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五四运动重要领导人陈独秀应武昌文华大学的邀请到武汉，先后在武昌文华大学、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汉口堤下段保安会、小关帝庙、汉口青年会等处演说。这时的陈独秀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尝试着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

陈独秀即将抵达文华大学讲学的消息，使武汉各界大为兴奋。2月4日，陈独秀所乘的“大通号”轮抵达汉口时，天降大雪，武汉学生联合会、文华大学协进会的代表冒雪渡江前往汉口码头迎接，场面十分隆重。当晚，陈独秀下榻文华大学。

2月5日上午，文华大学协进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在文华大学召开千人大会，欢迎陈独秀的到来。陈独秀在黑板上写下“中国存亡与社会改革的关系”几个大字，慷慨地说：“中国的存亡决定于社会改造，而求之于根本之解决，又非从教育上着手不可。”演讲结束时，鼓乐声和掌声响成一片，经久不息。

当天下午，陈独秀继续在文华大学演讲，演讲的题目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与信仰》。陈独秀明确指出：要改



陈独秀（1879—1942）



造当今的社会，必须深入研究改造的方法，免蹈辛亥革命失败的覆辙。那么改造社会的方法是什么呢？他毫不掩饰提出三种方法：（1）打破阶级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2）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业的苦，有产业的安享；（3）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这田地的权利。关于信仰，陈独秀提出两点内容：（1）平等的信仰；（2）劳动的信仰。他明确指出：心理上总要有革命的方法与信仰，到了可以革命的时候，我们就非要与那些恶魔奋斗不可，希望有社会改造决心的人，要竭力互助，以身作则。在这篇演讲中，陈独秀蕴含着消灭私有制的思想，并把劳动的信仰与平等的信仰同等看待，这些实际上已包含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

2月6日上午，陈独秀出席文华大学毕业典礼，就《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发表讲演。陈独秀说：“学校教育多属于知识之教育，而情感之教育则不多，睹故求知识充满之致用，非情感教育之发达，其道末由。情感云者，即牺牲自己帮助他人之谓也，然则究以何者为标准乎？曰‘以宗教为知识教育之标准’，贵校系基督教徒所设立，耶稣基督惟其能牺牲自己一切，所以为世界之模范夫。西国之强健不仅系知识教育之发达，仰情感教育有以并进之耳。”陈独秀演说完毕，讲堂内掌声雷动。

2月7日上午，陈独秀应汉口青年会的邀请，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作了题为《新教育的精神》的演讲。听众除了青年学生外，还有各界人士，甚至有许多省议员。陈独秀明确指出教育有新旧之分。新旧之分的关键在于“方法新，精神新”。陈独秀主张应该从三个方面来衡量教育之新旧：（一）教育要趋重社会。教育与社会有密切的关系，知识的发展关系到社会的发展，知识的获得主要靠教育。（二）要注重启发的教育。启发教育应以学生为本位。教育必须使受教育者要有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学到有用的知识。（三）要讲究实际运用。他坚决反对教育追求形式，各省学校整齐划一，教育要对社会有用，学生所学的专业要与专业有关的行业对口。

演讲结束后，在与湖北政界、知识界座谈时，陈独秀从进化论的角度，

强调要实行强迫教育制度。他说：“其物有本末，事有缓急，吾国款图存立，此天演竞争之世，当以实行强迫教育制始。”他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出“国民识之多少影响于战斗力”的结论。

7日下午，陈独秀应汉口堤下段保安会之邀发表演讲，他希望武汉市民“能谋工商业发达”。会后，他又参加保安会举行的小型座谈会，主张武汉“实行自治”。晚间，在出席武昌学界举行的钱行晚宴上，陈独秀畅谈文字改革，主张中国文字实行“注音字母”。

陈独秀的演讲和谈话在武汉知识界、教育界和政界等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时事新报》、《国民新报》、《汉口新闻报》、《民国日报》等各大报纸竞相报道有关陈独秀的行踪，登载其演讲内容。《国民新报》的报道称，陈独秀的演讲为“卓识谠论，倾动人群”。他关于教育要方法新、科目新、精神新的“三新”思想深受学生欢迎。特别是他关于“社会改造应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的社会主义”、“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打破遗产制度，田地共有”等政治主张，给武汉各界以极大的震动。当时，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流行，恽代英等进步青年实验工读互助团运动进入高潮时期，陈独秀主张要用革命的方法去打破旧制度，正是医治空想社会主义致命病灶的药方。

湖北军阀“对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并令陈独秀离开武汉。7日晚，陈独秀愤而离汉赴京。

但是，陈独秀已在武汉留下了组织和思想的火种。陈独秀在汉讲学期间，结识了恽代英、包惠僧、郑凯卿等人，向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思想转变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恽代英、包惠僧、郑凯卿后来都成为武汉地区早期党组织的主要人物，包惠僧后来是武汉早期党组织的负责人，陈独秀还派他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出席中共一大，郑凯卿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工人党员。

（刘桂芳）



真理之声：马克思主义在汉传播

五四运动后，经过斗争和新探索的武汉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将新文化运动注入新的内容，推向新阶段。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武汉地区放射出璀璨的光芒，涌现出李汉俊、恽代英、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仁静、林育南等一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人物，翻译、出版了《阶级争斗》、《劳农政府与中国》、《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著述，是继北京、上海两个地区之后的第三个重要阵地。

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早期传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进步知识分子之间交流交往，砥砺前行。李汉俊是向武汉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1人。李汉俊是湖北潜江人，1915年7月留学日本，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李汉俊在日本时期正是日本社会动荡的大正时代，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兴起，马克思主义迅速得到传播，李汉俊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1918年底，李汉俊随着留学生掀起的回国热回到上海，居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路北。1919年春，董必武到上海为蔡济民伸冤，其间受旅沪湖北同乡组织的湖北善后公会委托，和张国恩一道主持会务，住霞飞路渔阳里路南的湖北善后公会机关内。经辛亥名士詹大悲介绍，董必武、张国恩认识了同乡李汉俊。因为同是湖北人，这四个人交往密切，几乎天天见面，热烈讨论救国救民的道路。李汉俊向他们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情况，推荐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中日进步杂志《新青年》、《黎明》、《改造》等。董必武的思想由此产生了质的飞跃，开始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他后来称李汉俊为“我的马克思主义导师”。

1919年夏，陈潭秋随武汉学生代表参观团抵达上海，经武昌高师同班同学、董必武的同乡倪季端介绍，结识了在上海的董必武。陈潭秋奉董必武为师，董必武为陈潭秋介绍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回汉后，两人继续学习交流马克思主义。刘仁静、林育南在北京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不但促成了恽代英思想的转变，还向互助社、利群书社的成员宣传马克思主义。恽代英翻译出《阶级争斗》这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后，也向利群书社社员讲授《阶级争斗》的内容和心得感悟，促进了社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传播。陈独秀在汉讲学期间，也向恽代英、包惠僧、郑凯卿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输入和创办进步报刊，广泛覆盖。武汉本地进步报刊有《大汉报》、《汉口新闻报》、《武汉星期评论》等。恽代英、黄负生等人创办的《武汉星期评论》成为继北京《每周评论》、上海《星期评论》、湖南《湘江评论》等刊物之后，又一个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它的发行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北等地区的传播。武汉早期党组织成立后，该刊便成为湖北地区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1921年6月20日，上海泰东图书局创办的《评论之评论》杂志刊发表该刊总编费觉天的推介文章，高度称赞《武汉星期评论》办刊方针大胆，革命精神激昂，作者年轻有为，文章令人感动。武汉地区的很多进步社团都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或代售外埠具有新思潮内容的报刊。恽代英创办的利群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新青年》、《湘江评论》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除此之外，中华大学书报经理部、汉口会文堂、进化书社、时中书社等都代售外埠进步报刊，品种有《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海《时新报》“学灯”副刊、《少年中国》、北京《晨报》、《共产党》等。这些报刊在宣传新文化的同时，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第三，邀请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讲学，扩大影响。1920年2月4日至7日，陈独秀应武昌文华大学（华师前身）的邀请到汉，先后在武昌文华大学、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大前身）等学校、汉口堤下段保安会、小关帝庙、汉口青年会等处演说。此时陈独秀已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尝试将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他指出：要改造当今社会，必须深入研究改造的方法，免蹈辛亥革命的覆辙。那么改造社会的方法是什么呢？他明确提出有三种方法：打破阶级制度、打破继承制度、打破遗产制度。陈独秀在武汉的讲演，是武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武汉知识分子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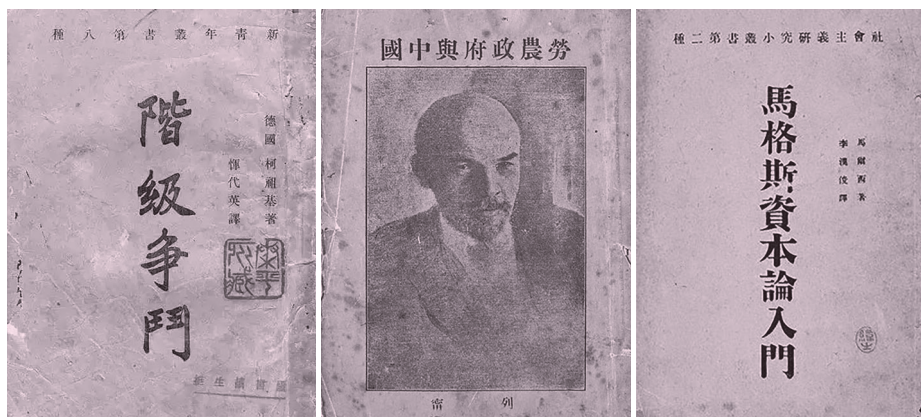
第四，创办新式教育，引导青年。1920年3月，董必武等人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并聘任陈潭秋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担任教师。董必武、陈潭秋一方面引导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新青年》、《湘江评论》、《共产党》、上海《星期评论》、《觉悟》等，一方面指导学生会主办《武汉中学周刊》，自编《政治问答》，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他们还倡议开设了社会主义课程，积极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陈潭秋经常教育学生说：“如果我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得十月革命，就等于聋子瞎子，找不到路。”1920年底，董必武还邀请李汉俊到校讲演社会主义。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武昌高师附属小学、启黄中学等校都是武汉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李汉俊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开设唯物史观课程。刘子通等在湖北女子师范学校大力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把封闭保守的学校改造成了追求时尚和进步，放足、放胸、剪发、追求婚恋自由的湖北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学校。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人十分重视平民教育，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农中去。董必武、陈潭秋以武汉中学为据点，在校外办起了劳工学校、武昌女子补习学校、识字班、平民学校，同时发动学生利用寒暑假回乡的机会，在农村同样办起了农民夜校或平民学校。1920年4月，恽代英、施洋等创办了平民教育社，以工农群众（包括女佣人）及其子弟为主要对象，开展纯义务性的教育活动，传授文化知识，宣传革命道理。

第五，出版经典著作，传播真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武汉地区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的数量之多、影响之大，位于全国前列，这也是武汉地区早期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大贡献。

第一本是1920年6月，张冥飞编写、由汉口新文化共进社刊印的《劳农政府与中国》。全书分为“俄国革命与劳农政府”“劳农政府的宪法”“劳

农政府的教育”等12个章节，此外还有附录，包括：列宁的手段与奋斗的精神、列宁的谈话等。此书对俄国革命及革命后的内政外交措施进行了全面的介绍，阐述了俄国革命与中国的关系。这是中国第一本全面系统地介绍苏俄情况的集大成的著作。此书的出版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中国人民从俄国革命中看到了新的希望。

第二本是1920年秋，恽代英翻译的《阶级斗争》。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召开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党纲宣言。为宣传党纲宣言，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领导人卡尔·考茨基以《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为名，对党纲宣言进行了解读。该著作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阶级斗争学说，曾得到恩格斯的肯定和支持。1920年秋，恽代英受陈独秀的委托翻译了该书，译名为《阶级斗争》。该书有小生产制的经过、劳动阶级、资产阶级、未来的共同生活、阶级斗争等5章。它运用唯物史观提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重点阐述了资本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指出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是经济活动，社会制度是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明确回答了社会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和社会制度问题，使人们清晰地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教育问题，根本是经济和政治制度问题。《阶级斗争》指出改造社会的根本之途，是用暴力革命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这就使空想成为科学。这本书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先进知识分子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曾经回忆说，有



五四运动前后，在武汉出版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书籍



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他心中，帮助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其中就包括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

第三本是1920年9月，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资本论》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引起了李汉俊的高度重视。之前，中国也有一些《资本论》解读方面的译本，但都不够通俗易懂。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党著名的左翼领导人马尔西撰写的《Shop Talks on Economics》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用通俗的语言和方法进行了阐释，日本远藤无水将其译成日文，李汉俊据此译成中文。全书54页，其中有劳动者将什么东西卖给资本家、商品底价值、利润是怎样得的、便宜的物价与多的利益、缩短劳动时间等8节。它一经问世立即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欢迎，北京、湖南、武汉等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把它作为学习的必读教材。

第四本是1921年6月，田诚撰写，在汉口印行出版的《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全书小32开本，共10页，5600余字。该书深刻地剖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既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俄国，而是“国际掠夺阶级的公共半殖民地”，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所能见到的第一次正确判断中国社会性质的文字。其主要内容批判了教育万能论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做指导，指出共产主义是科学的真理，是“解放人类的明星”，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造成“往田间和工厂去”的声浪，和一般工人与农民握手，“这是改造社会的唯一方法”，提出中国革命的战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第二步是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这本小册子第一次深刻剖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份政治宣言，代表了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水平。

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早期传播，推动了一大批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并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将其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斗争实践中，为创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奠定了基础。（刘桂芳）



播火荆楚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群英建党



董必武：从同盟会员到共产党员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董必武是年纪较大的代表，也是经历较为曲折、独特和贡献突出的代表，还是毕生不忘初心、矢志不渝，最后见证革命胜利并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代表。他早年中过秀才，后来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最后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他的转变历程，反映了在中国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也正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董必武成为武汉早期党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1886年，董必武出生于湖北黄安（今湖北省红安县）的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聪慧好学，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5岁开始在县城广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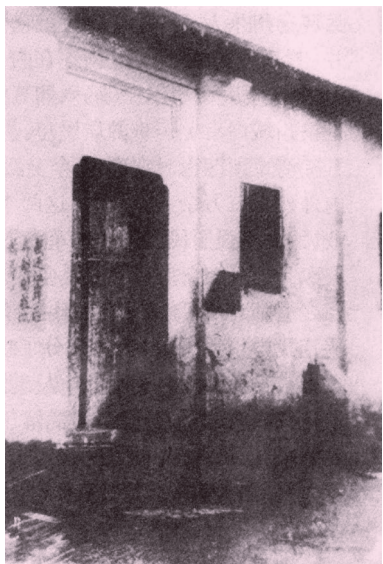
董必武（1886—1975）

庵私塾随父跟读，10岁又随父到麻城县张煜村私塾读书。他学习刻苦认真，除熟读四书五经外，还经常翻阅家中藏书，向同学和亲友借来《三国演义》等小说和历史著作阅读。1903年，董必武18岁，赴黄州府应试，考中秀才。同年8月，董必武到武昌参加乡试。年轻人初到省城，对周围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一天，董必武路过巡抚衙门，见门口悬挂着许多牌子，便上前一一查看。衙役见董必武土里土气，便诬他“窥探官衙”，不怀好心，当即冲了出来，将他打翻在地。从此，董必武恨死“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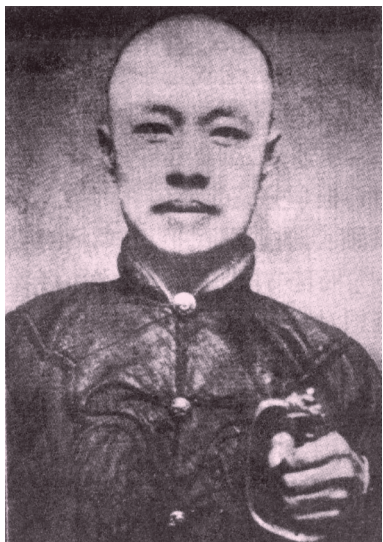
官人”。同年秋天，董必武参加湖北武普通中学堂口试考试，因他长得又黑又瘦，又穿着父亲的一件旧长衫，人显得老气，被考官认为“年岁太大”，未予录取。董必武这两次考试的经历，使他亲身感受到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官僚的反动腐朽，决心同“求取功名做官”的道路决裂，毅然弃考回乡。

1905年春，董必武再次到武昌，考入湖北省文普通中学堂，10月入学，学制5年。在等待入学期间，他租住在武昌司衙巷一间私人小屋。距司衙巷不远的美国教会圣公会附设的阅报室——日知会，就成了董必武寻求新知识每天必去的场所。当时，湖北革命党人刘静庵等人以日知会为据点，宣传革命思想。董必武在日知会结识了刘静庵，刘静庵向董必武推荐《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籍。通过大量的研读，董必武对清政府的腐败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逐渐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1910年10月，董必武以全校最优等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董必武本想继续攻读，但因家庭经济困难，只得应了黄州府中学堂校长邀请，回乡担任该校英文教员。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正在黄州府教书的董必武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无比激动，愤然割断头上的辫子，在起义的第四天就连夜赶赴武昌起义前线，先后在蒋翊武领导下的军务部和战时司令部工作，参加推翻清王朝，保卫临时革命军政府的激烈战斗。同年底，董必武和同乡张国恩等到武



日知会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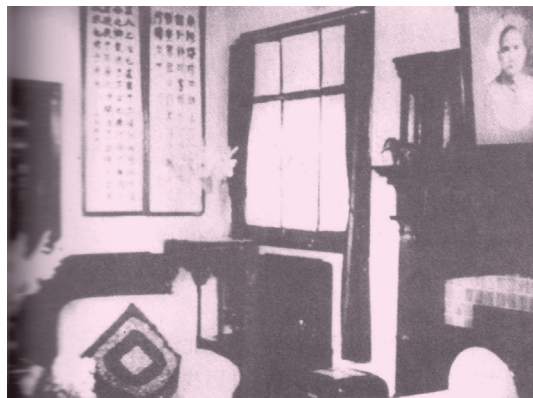


日知会领导人刘静庵



昌军政府理财部任秘书官。随即和张国恩一起加入同盟会，并参与重新组建同盟会湖北支部，被推为支部评议部评议员。不久，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失败了。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董必武积极参与詹大悲等人在湖北策划军队进行的反袁活动，功败垂成。1914年1月，董必武怀着忧国忧民和立志追求真理的愿望和张国恩一起东渡日本，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学习。当他听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即怀敬仰之心去拜见孙中山先生，并加入中华革命党，从此“成为中山先生的信徒”。

1917年，孙中山以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为名，发起护法战争，意图利用西南军阀的武力取得胜利。在孙中山的部署之下，老革命党人蔡济民被任命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董必武得到这一消息后，便赶赴鄂西投奔蔡济民，担任总司令部秘书，投入到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斗争中。然而护法军内部实际上矛盾重重，西南军阀虽然名义上响应护法，但真正意图在于借机争夺地盘。当时同蔡济民一起驻防在利川的方化南部，早就觊觎蔡济民部队这块肥肉。1919年1月27日夜，方化南将蔡济民残忍杀害。于是，同志们公推董必武去上海向孙中山申诉。3月中旬，董必武到达上海，在好友詹大悲的帮助下，见到孙中山，汇报了蔡济民的情况。但那时的孙中山早已因西南军阀和北洋军阀同流合污而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因此，孙中山除了表示口头上的谴责，并无其他办法。这让董必武顿感失望，之前的信仰受到了挑战。



孙中山上海故居会客室

此时的上海，正在进行着南北军阀的议和谈判，各省革命党人在此建立了各自的善后公会。湖北省善后公会成立后，公推董必武和张国恩主持会务。董必武对正在进行的南北议和并不感兴趣，而是一直在忧虑着新的革命前途问题。董

必武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从辛亥革命到护法战争，孙中山领导的斗争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中国革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各种新思想蓬勃发展，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运动等新思潮出现在中国思想界内，到底哪种才是救中国的真正选择呢？他在思考着，努力探求革命道路。

正当中国人民在黑暗中苦斗，先进分子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董必武到上海后，正当五四运动前夜，新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新的姿态在全国蓬勃发展，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上海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就在董必武困惑之际，他遇到了引导他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重要人物——李汉俊。这位后来被董必武亲切地称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的青年，1890年出生于湖北潜江，哥哥李书城是辛亥革命的元勋。12岁时，李汉俊在哥哥的朋友吴禄贞的资助下，前往日本留学。1915年7月李汉俊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在学期间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相交甚密，受其影响，李汉俊决定放弃自己最喜爱的数学，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从而成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李汉俊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先后在《新青年》、《星期评论》、《民国日报》等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译文或文章，推动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转变，董必武就是其中之一。

1918年末，李汉俊从日本毕业后来到上海，居住在上海法租界路北渔阳里，与董必武的好友及同乡詹大悲为邻，住所与湖北善后公会隔街相望。詹大悲很热心地为董必武介绍这个刚认识的同乡。之后，李汉俊几乎每天来到湖北善



李汉俊（1890—1927）



后公会与董必武、张国恩、詹大悲交谈，热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 and 苏俄的近况，并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在日本出版介绍新思潮的新书刊推荐给他们看。董必武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所有找得到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他们四人天天见面，共同学习，互相讨论，积极赞成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深入研究中俄两国革命道路的问题，反复探讨：“为什么俄国的革命能够取得胜利，而中国的革命却不断地失败？”这年夏天，董必武与张国恩、詹大悲等人经济上缺乏接济，生活异常清贫，为购买新书和维持生活，将蚊帐甚至身穿的布衫都典当了，有时仅剩下一条裤子和一件汗衫，只好把裤子每晚洗了次日再穿，长衫几人共用一件，谁外出由谁穿。但他们从不把这类生活上的事情放在心上。

在上海，董必武经历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深刻感受到群众运动的极大威力。他认识到，今后的世界将变成劳工的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将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 20 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董必武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考虑问题，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须像俄国那样实行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革命。他总结孙中山领导革命屡遭失败的原因在于：不依靠工农而总是依靠军阀“路子不对头”，“缺乏广大群众的基础”。董必武认为中国的革命“要打倒列强，要除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革命党人要“唤醒民众”起来参加革命。因此，董必武决心“从头来”，要接近民众，唤醒民众，打下革命的群众基础。他同李汉俊、詹大悲、张国恩商议，确定当前应当做两件事：一是办报纸以宣传人民，一是办学校以培养革命干部。

1919 年 8 月，董必武、张国恩返回武汉，拟办一个专为宣传革命思想的《江汉日报》，并积极筹集办报资金，但终因筹款无着落，计划夭折。接着董必武和张国恩、陈潭秋就着手筹办学校。他们联合几位进步教师，校址就选定在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涵三宫街南面小巷内的前清支郡师范甲丙堂旧址，开办经费全在创办人中募集。董必武因手中无积蓄，便将身上穿的一件皮袍子典当了，又写信向在山西当排长的表弟张醉华借了一点钱，凑足了他作为创办人捐赠的 20 元开办费。经过大家数月努力，1920 年 3 月，

私立武汉中学终于正式开学。第1学期学生2个班，共100多人。

武汉中学是为革命而办的，一开始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董必武团结所有进步教师，大胆创新，用革命的方法组织教学。收学生的报考费和学费低于其他学校，便于贫苦子弟入学；男女生同校同班；国文教学文言白话兼用，准许学生用白话文考试；班设班主任，辅导学生自习和课外阅读；引导学生注意国内外时事，研究社会问题；组织学生会参与学校的校务领导等。为了克服学校经费上的困难，董必武带头不支薪，其他教职员也都是低薪或不支薪。全校只用校工1人，由董必武的外甥张培鑫担任，既是文书，又是收发员、事务员。许多校务劳动，师生一齐动手。



私立武汉中学旧址

这些做法，开启湖北教育改革之先声。这所新型的学校吸引了鄂、豫、湘省各县的工农子弟和进步青年前来求学，培养出一批革命人才。

董必武担任国文教学，他除在课堂上注意对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教育外，还经常选用杂志上的白话文为教材，宣传新思想，并指导学生主办《武汉中学周刊》、编写《政治问答》读本，让学生交流读书心得，议论时事政治，发表反帝反封的文章。1920年8月，董必武、陈潭秋等建立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后，他们更有意识地宣传俄国革命，武汉中学成为武汉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

1920年8月，董必武等人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刘伯垂、包惠僧、张国恩等人的协助下，创建了湖北第一个也是全国第二个中共早期组织——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董必武与陈潭秋等又建立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团结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把他们引导到马克思主



义的轨道上来。董必武经常去讲课，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教育青年把学习理论与从事革命活动结合起来，要求青年学生经常到工人区去走访，了解工人的现状，支持工人的斗争。

为了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向工人群众通俗宣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董必武和武汉党组织成员还分别办起了妇女读书会、青年读书会、平民夜校、工人子弟学校和识字班等。董必武亲自到平民夜校给工人群众讲课，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发动他们起来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党组织成员和青年团员还通过学生的家长，在工人中进行串联发动，组织工会，逐步发展武汉的工人运动。

1921年7月，董必武、陈潭秋被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推举为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以后，董必武把自己的一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谢忱 刘佳欣）

武昌秘会：中共武汉早期组织成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全国有6个城市成立了早期共产党组织。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全国第2个成立的党组织，成立时间仅次于上海。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得益于武汉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在武汉的广泛传播和武汉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和帮助，也对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武汉是我国长江中游的一个工商业重镇，至1920年，武汉的产业工人已达30万人，位居全国第2，逐渐发展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自五四运动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武汉的广泛传播，武汉地区出现了一批以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为代表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五四运动中逐渐认识到要依靠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随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通过写信、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同各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进步团体负责人取得联系，积极推动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拥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良好革命基础的武汉，自然是他们重点关注的地区。

1920年8月，正在武汉中学忙碌学校事务的董必武收到了1封从上海邮来的信件。看到熟悉的字迹，董必武知道这是远在上海的挚友李汉俊的来信。李汉俊在信中提到，他与陈独秀等人已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希望董必武约请张国恩，在武汉筹建类似的组织。董必武收到信后很是高兴，在告知陈潭秋情况以后，复信李汉俊，表示赞成张国恩参加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工作，并承担武汉地区的建党任务。不久，李汉俊亲自来到武汉会见董必武和张国恩，商谈建立武汉早期党组织的问题。

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一件大事，必须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筹办，董必武首先想到了正在武汉中学教书的陈潭秋。1919年，董必武在上海跟着李汉俊学习马克思主义时，陈潭秋作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跟随武汉学生代表团到上海，经武昌高师的同学倪季端介绍认识了董必武。共同的革命追求，使他们决定返回武汉，通过创办报纸和中学来传播革命思想，两人因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当董必武找到陈潭秋商量建党事宜时，陈潭秋热烈地表示赞同。随后，他与张国恩、董必武一起积极准备着武汉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创建工作。

与此同时，陈独秀委派刘伯垂回到武汉，开展建党工作。刘伯垂是湖北武昌（今鄂州）人，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环境熏陶，熟识律法，清末前往日本留学，于明治大学攻读法科。在日留学期间，刘伯垂结识了孙中山和陈独秀等人，受其民主革命思想影响，深感清朝帝制腐败，如不革命，中国永无振兴之日，遂加入同盟会，投身到民主革命的浪潮之中。



刘伯垂（1887—1936）

辛亥革命后，刘伯垂回国，在湖北军政府担任秘书一职，任职不久便受调前往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担任参事，后因不满袁世凯称帝毅然辞职。1917年，刘伯垂前往广州，在广东军政府高等审判厅任厅长。刘伯垂为在广州宣传革命思想，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创办了《惟民周刊》。当时，广东军政府还处于军阀的控制之下，刘伯垂的革命抱负无法施展。1920年夏秋之际，他决定再次辞官回到武汉。1920年下半年，刘伯垂由广州回家途经上海时，拜会了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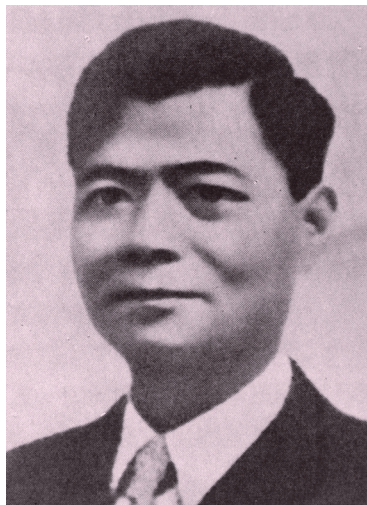
独秀。经过多次交谈，陈独秀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交给他一个重要的任务：回武汉与那里的共产主义者共同筹建湖北党组织。

刘伯垂回到武汉后，按照陈独秀的要求，首先和与陈独秀熟悉的新闻记者包惠僧联络。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毕业于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担任《汉口新闻报》、《大风报》等报记者，是张国恩的学生，也是陈潭秋的同乡。陈独秀到武汉讲学时，包惠僧作为新闻记者对陈独秀进行过采访，因其思想激进，工作干练，深得陈独秀的青睐。刘伯垂转交了陈独秀写给包惠僧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要求包惠僧参与武汉共产党组织的组建工作。包惠僧当即表示愿意参加武汉共产党组织的筹建工作，并根据陈独秀的意见，立即与郑凯卿联络。之后，刘伯垂又分别与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等人进行秘密联络，商讨建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不久，董必武联系到了同乡赵子健，董必武在创办武汉中学时，曾聘请赵子健任教，其思想激进，赞成马克思主义，因此愿意参加武汉早期党组织。武汉地区建党工作日臻成熟。

1920年8月，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7人，共聚在武昌抚院街（今民主路）97号董必武和张国恩的律师事务所，举行会议。会议由刘伯垂主持，共讨论和决定了4方面的问题。

会上，刘伯垂首先介绍了上海早期党组织的成立和组织情况，并将从上海带来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交给与会者传阅。此纲领是陈独秀和维经斯基共同起草的，第一次提出要以无产阶级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阶级。刘伯垂问大家对此纲领是否有修改意见，大家一致表示拥护。

根据上海的模式，会议研究了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规定每周召开一次会议，每



陈潭秋（1896—1943）



次会议要作读书报告或国内外时事报告，以便相互交流；同时要继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刘伯垂带来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俄国革命的小册子供大家学习，如《共产党宣言》、李汉俊译的《资本论浅说》、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及巴枯宁、克鲁包特金等人的著作，当时很多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了解得还不是太多，直到加入共产党之后才开始系统学习，刘伯垂带来的这些书籍便成为小组成员后来经常阅读的书目。

随后，大家开始推选党组织负责人。董必武无疑是武汉先进知识分子中的核心人物，在武汉建党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因其学校事务繁忙，不太适合走到台前组织活动，便提议包惠僧担任负责人。包惠僧作为新闻记者，时间自由，不受拘束，活动起来很是方便。经过讨论，大家最终推举包惠僧为武汉早期党组织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张国恩管理财务。

会议还讨论研究了党组织成立以后的工作。会议要求各位党员除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外，还要加强党在工人中的工作。会议决定，党组织为保密需要，以张国恩别名梅先的“梅”作暗号，对外称党组织为“梅先生”。刘伯垂拿出陈独秀给的200元活动经费，租用了武汉多公祠五号作为党组织的机关所在地，门口挂上了“刘芬律师事务所”（刘伯垂名芬）的牌子，以掩护党组织的秘密活动。武汉多公祠位于湖北省警察厅背后，党组织成员经常在此聚会交流，他们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活动着，但敌人却一直都没发现这个“红色目标”。

武汉早期党组织是国内成立的第二个早期党组织，一经成立即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极大关注。9月，经李汉俊介绍，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派助手马迈耶夫来汉，了解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创建情况。陈潭秋、包惠僧和董必武接待了他们。董必武等人不懂俄语，会议又是秘密进行的，不能请翻译，所幸他们都粗通英文，因此几个人便开始用英文进行交流。他们在交谈时，人手一本英文词典，遇到不懂的就去查。董必武向马迈耶夫介绍了武汉早期党组织的活动，马迈耶夫也谈到了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包惠僧后来回忆道：“他谈了很多关于十月革命以后的苏俄情况，鼓励我们学习理论，也鼓励我们努力工作，还谈到共产党的铁的纪律问题。”会后，

武汉党组织成员拟请马迈耶夫在武汉创办一所英文学校，来进行革命宣传活动。无奈这几位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在武汉实在是太惹眼了，而且补习外语在武汉又不是太流行，因此学校没有办成，不久马迈耶夫便离开了武汉。

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后，又先后吸收了失业工人赵子俊，进步教师刘子通、黄负生入党。在 1921 年党的一大召开之前，武汉早期党组织已有 10 名成员。

武汉早期党组织的成立，是武汉地区革命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长期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武汉先进知识分子终于迈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从此，在中国腹地江城武汉，燃起了照亮荆楚大地的革命火种，揭开了武汉和湖北地区革命的新篇章。

（刘佳欣 谢忱）



楚天群星 殊途同归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全国6个城市和旅日、旅法早期党组织共有58名共产党员。武汉党组织不仅党员人数较多，位居全国第3位，而且成员构成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包容性，体现了武汉城市历史发展的特点，对武汉以后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地位 and 作用影响甚大。

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刘伯垂、张国恩、刘子通，他们从旧民主主义革命中走过来，由同盟会会员转变为共产党员；第二类是在新式学校接受了近代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如陈潭秋、包惠僧、黄负生、赵子健；第三类是受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影响的工人，如郑凯卿、赵子俊。尽管三类人的早期经历和革命道路不尽相同，但他们最终却都不约而同地



包惠僧（1894—1979）

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怀抱，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在这些党员中，刘伯垂是湖北省第1个共产党员，郑凯卿是中国共产党第1个工人党员，包惠僧是武汉早期党组织负责人，董必武则是武汉早期党组织的灵魂人物。

包惠僧1917年从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任教于黄冈上巴河小学。因任教期间得罪当地豪绅被迫离校，开始了武汉的流浪生活。来到武汉，包惠僧生活困顿，贫病交加，几次到江边欲投水自尽。但是每次见到奔腾

的江水，生的渴望又战胜死亡的念头。后在旅馆遇到一个新闻记者，向他传授写新闻之道，他开始为自己寻找谋生之路。他向《大汉报》和《汉口新闻报》投稿，不久，他成为了2家报馆的外勤记者，开始了记者生涯。凭着记者收入，包惠僧报考了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一边采写新闻，一边学习法律。

1919年，包惠僧来到北京，到北京大学旁听中文系课程，同时兼任2家报纸外勤记者。五四运动爆发后，包惠僧回到武汉，积极报道和参加五四运动。这场运动给了包惠僧极大的触动，他决心要为中国革命贡献出一份力量。

包惠僧返回武汉后，仍然住在他曾住过的金家客栈。他虽和客栈老板素来不睦，但这却是附近价格最低的住所，他只能勉强住下。这天晚上，他又同老板吵了一架，本就心情烦闷，加之夏天蚊虫繁多，吵得他无法入睡，他索性抱着床单爬到山顶。包惠僧在山顶来回踱步，看着山下灯火阑珊的景色，回想起过往种种，突然发觉武汉这个城市原来不仅仅只有军阀控制下的腐败不堪，如有一个廉洁为民的好政府，这一定会是一个充满幸福感的。顿时，心中的惆怅一扫而空。

这时，天色已渐渐泛亮，包惠僧便向山下走去。路过龙王庙，忽而发现原本破败不堪的庙堂竟十分整洁，虚掩的庙门上还挂着1块“启明化学工业社”的招牌。他推门走进去，发现地上躺着2个正在睡觉的人，竟是他曾在政法学院的同窗好友阎八士和陈治安。原来他们毕业后没找到工作，便做起了卖粉笔的生意，由于没钱，只能在破庙住下。他们想邀请包惠僧一起做买卖。包惠僧稍显激动地说道：“我对于这个世界气闷极了，我真想找一个终南捷径，来一个一拳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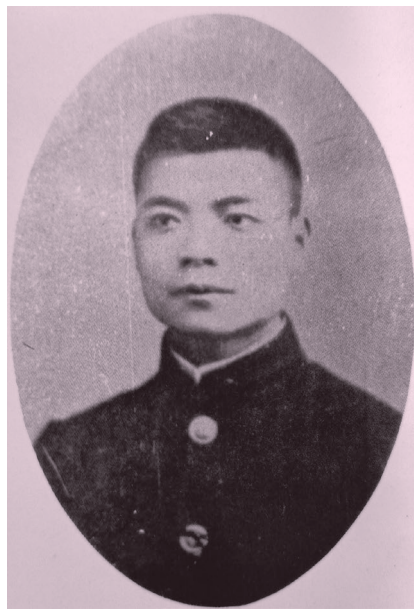


郑凯卿（1888—1966）



碎黄鹤楼，两足踢翻鹦鹉洲，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来把世界改变一下，越快越好！我没有像你们那样的耐心，像苦行僧似的，搞这样的行业。人生几何，到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一个清平世界啊！”阎八士问他：“你的终南捷径是什么呢？”包答道：“揭发社会黑暗！”阎又问：“你的武器呢？”包坚定地說道：“一支铁笔！”

转而入冬，武汉寒风刺骨。恰在这时，包惠僧的黄冈同乡陈潭秋也搬入了这间客栈。陈潭秋是湖北省黄冈县陈策楼人，家中兄弟姐妹 10 人，陈潭秋排行第七。陈潭秋的五哥陈树三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后被反动分子杀害。陈潭秋受五哥影响，具有强烈的民主革命精神，立志要推翻腐朽的社会，澄清混浊的世界。1916 年，陈潭秋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大学期间，思想的进步与专业的便利使其接触了众多的进步书籍，尤其是经常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开阔了他的眼界，更是加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潭秋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与恽代英等人一起，领导武汉的学生运动。陈潭秋还回到家乡，邀请林育南等人一起，发动穷苦群众，在农村掀起了爱



陈潭秋（1896—1943）

国斗争的热潮，将工农运动的火种播撒在荆楚大地。1919 年夏天，陈潭秋作为武汉的学生代表之一前往上海，参加学生运动的经验交流活动。在上海期间，陈潭秋结识了董必武，二人密切交流，对工农运动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过去革命工作不依靠工农群众的方向不对头，要从头来”，要“唤醒民众，接近群众”，将他们的力量组织起来。他们还从五四运动的经验教训中深切地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像俄国那样，实行‘阶级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们相约一起回到湖

北“办报纸、办学校、鼓吹革命、教育青年”。陈潭秋返回武汉后，和包惠僧住在同一家客栈，也成为了《大汉报》和《汉口新闻报》的1名新闻记者，并创办了湖北人民通讯社。1919年陈潭秋受董必武邀请，一同筹办武汉中学，在武汉中学中他们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同为记者的包惠僧和陈潭秋在客栈同吃同住，有时还帮助对方外出采访，写新闻稿。夜晚天气寒冷，二人便将报社赠送的报纸点燃，边取暖边聊天，探论时局变化，抒发各自心中的救国理想。但随着时间推移，包惠僧和陈潭秋所能报道的新闻越来越少，报馆受到军阀压迫，对他们的稿件全部不予以采用。迫于无奈，包惠僧只能前往北京，希望能够采访到一些有用的新闻。后听闻天津的学生在闹罢课，包惠僧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天津。1920年1月29日，在金汤桥畔，包惠僧采访到了天津学生运动的领袖周恩来。对于这次采访，包惠僧在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1920年2月，陈独秀来武汉讲学。包惠僧来到文华大学，采访陈独秀。在访谈中，陈独秀指导包惠僧如何读书，告诉他做人做事的道理，并要求他协助郑凯卿开展工人调查。此后，包惠僧和陈独秀联系频繁，深得陈独秀的信任和器重。有一次陈独秀曾对嘲骂湖北人的人说：“不见得，包惠僧、刘伯垂就是好人。”

在文华大学，包惠僧见到了文华大学校工郑凯卿。郑凯卿出生于湖北江夏，少时生活困苦，亲人相继离世后，被人力车夫陈万年所收养。他曾给财主家的少爷当书童，学了点古文和中医常识。他还当过伙计、卖过红薯、扯过茭白，后在武昌文华大学当了一名挑水工。一次，文华大学洋教师殴打挑水工，郑凯卿带领挑水工“罢洋人水”，最后洋教师被迫道歉。此事让郑凯卿声名鹊起。1920年2月4日，陈独秀抵达武汉后，住进了文华大学。郑凯卿因常在教师小厨房帮厨，被派往照料陈独秀的起居饮食。陈独秀与郑凯卿二人初次见面，便相谈甚欢。在得知他是“罢洋人水”的领头人时，陈独秀更是表示郑凯卿就是革命事业所需之人。郑凯卿原先对“改造社会”、“民主科学”、“自由平等”这些词语就不陌生，在听到陈独秀演讲中提及“劳工神圣”、“劳工革命”和“社会改革”后，浑身热血沸腾，感触颇多。之后，



陈独秀常常给郑凯卿介绍讲解《新青年》和《湘江评论》。在陈独秀的影响下，郑凯卿对于工人运动和革命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思想也有了新的转变，迅速成为一名革命者，开始参加工人运动，并深入工厂探查武汉工人的详细情况。同时，郑凯卿与包惠僧、陈潭秋等人成为至交好友。后来，包惠僧协助郑凯卿完成了武汉地区工人和工厂情况的调查，并邀请他参加了武汉早期党组织会议。

时间转眼来到夏季。一天，包惠僧从同学的口中听到了利群书社的名字，顿时提起了兴趣。他其实早有耳闻，但他一直以来都认为那只是一群失业青年为谋生路而开办的一家小书店，但今日听朋友一说好像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于是他决定前去拜访一下这间书社。包惠僧走到横街头的路口，一眼就看到了利群书社的门店，他走进书社一看，发现店内布置极为简单，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但大都是在店内看书，很少有人买书。包惠僧在店中来回参观了半个多小时，才从店的后面走出来2个青年，他向青年表达了他的采访意图，却被婉言谢绝了，这更是激发了包惠僧的好奇心。

包惠僧离开书社后便去访问了林育南、陈学渭和罗四维等人，他们都与利群书社有密切的联系，包惠僧心想也许可以从他们口中探知一二。但未曾想到，他们谈到利群书社时也是吞吞吐吐，不肯说出实情，包惠僧也仅仅得知利群书社是一个工读互助团。

利群书社其实是由恽代英等人创建的进步社团，书社的最初成员主要有恽代英、林育南、郑遵芳和廖焕星等12人，不久后，随着林育英、肖楚女等人的加入，规模不断壮大。利群书社最开始的办社宗旨的确是“利群助人，服务群众”，目的是实现“共同生活”的互助主义，为社会改造培养更多人才。

包惠僧经过多方了解，才知道利群书社的发起人是恽代英。但此时，恽代英的思想成分还比较复杂，虽然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是排在第一位的，但在他心中无政府主义仍占有一席之地。直到后来，恽代英成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一名编辑，受到李大钊的影响，又受到多方好友的提醒与帮助，才逐渐坚定了心中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所以，在此时的包惠僧眼中，恽代英

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利群书社也只是一个无政府主义派别，所以没有追随和发展。但随着书社的发展以及成员们的思想不断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利群书社逐渐演变为湖北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阵地，书社成员也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中共一大以后，恽代英等人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加入中国共产党，包惠僧才和恽代英等人联系起来。

1920年夏天，武汉骄阳似火。包惠僧改变社会现状的心情急切火热。恰在此时，包惠僧的一位名叫包彦臣的老乡回到了武汉。和包彦臣一起回汉的，还有陈独秀的“秘密使者”刘伯垂。刘伯垂在找到包惠僧后，立即表明来意，并将陈独秀的亲笔信交给他。包惠僧看过信后，不由得激动万分，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翻看着陈独秀的来信，因为他从内容中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其实，刘伯垂在找到包惠僧之前，就已经与董必武和张国恩取得了联系，商议创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事宜。张国恩1919年就曾与董必武一起在上海组织湖北善后会，他们从李汉俊那里接触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相关书籍，逐步由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年末，张国恩带着孙中山赠送的300元盘缠返回武汉，开办革命报刊和学校。1920年8月，也就是在包惠僧访问利群书社时，董必武和张国恩就已经接到了李汉俊从上海寄来的信。所以，他们对于刘伯垂的到来没有意外。

为尽快将建立早期党组织的各项事宜落实，董必武又先后找到了陈潭秋和郑凯卿。此时的陈潭秋正在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任教，与包惠僧是同乡，又同在客栈朝夕相处数月，但陈潭秋却并未将此事告知包惠僧。直到刘伯垂将情况告知大家以后，包惠僧和陈潭秋才有一种意料之外又意料之中的“恍然大悟”。不久后，董必武又找到了一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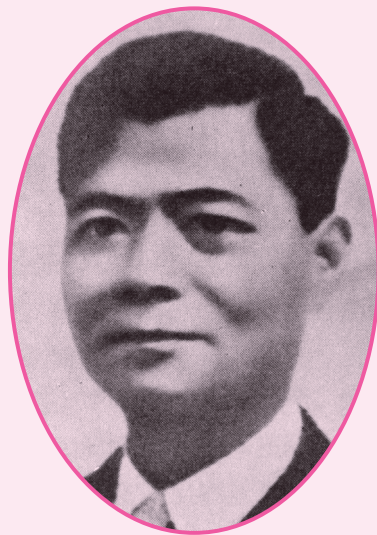
赵子健（1895—1950）



武汉中学任教的教员赵子健。赵子健是湖北黄安人，1920 年从湖北省第一师范毕业以后，就来到武汉中学任教，受董必武和各式新思潮的影响，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董必武邀请了赵子健参加了武汉早期党组织成立会议。

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 7 人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下，虽然出身和经历不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也不尽相同，但是由于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一起，秘密地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他们迅即开展革命活动。中共一大以后几年时间里，武汉党组织成员人数始终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1922 年初，武汉地区共产党员已有 20 多人。1922 年底，武汉地区共产党员已达 50 多人，而且党员的来源更广。武汉后来成为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中心和国民革命的中心，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李静）



播火荆楚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江
汉
东
流



一份刊物一把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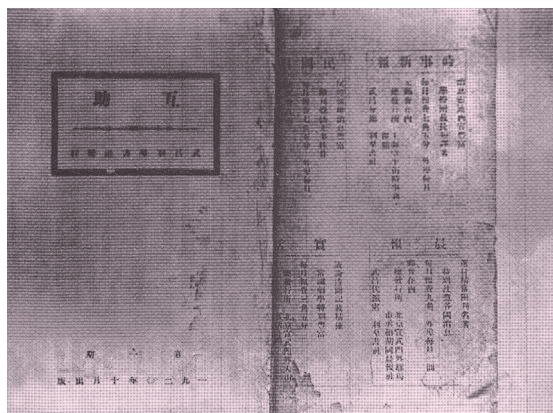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不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受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恽代英憧憬的未来社会便是“工读互助团”的模式。1920年10月，恽代英在利群书社的杂志《互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未来之梦》的文章，希望能够通过“共同生活的扩张”和在乡村地区发展教育、实业，从而由政治和经济等几个方面彻底压服资产阶级，使得全世界成为“社会主义的天国”。在他创办的利群书社中，大部分成员们也都存在这种思想。

当时，陈独秀正在和张东荪进行论战。陈独秀对恽代英这种社会主义空想非常不满。1920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给张东荪的回信，尖锐地批评道：“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的余地。试问福利耶以来的新村运动，像北京工读互助团及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

陈独秀是恽代英极为尊敬的师长和朋友，也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发起

人之一。他正是在创办工读互助团失败以后，才开始创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看到陈独秀对《未来之梦》的批评，联想到陈独秀思想和行动的转变历程，恽代英和利群书社的社员们内心深受震动。

与此同时，恽代英的好友刘仁静、沈泽民、林育英



《互助》刊物

等在读过《未来之梦》后，也纷纷写信批评他文章中的观点。刘仁静在信中明确而诚恳地对《未来之梦》的思想表达了不满，认为想要改造社会就应沿着俄国的道路进行社会革命。林育南则表示赞成用阶级斗争解决社会问题，他说：“我们的理想仿佛是对的，但审查社会情形和我们的力量，恐怕终究是个‘理想’，终究是个‘梦’呵！”

面对各方朋友的批评和提醒，恽代英陷入了沉思。他反复地问自己：这种想法是不是真的错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1920年12月21日，恽代英给刘仁静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没有好的环境，不能有良好的教育，我亦相信，所以我主张教育家必须同时是社会改造家。我们共同生活运动，主旨便在解决经济问题，改造环境”。

1921年1月，恽代英从黄冈老家回到武昌。一回来，他马上来到利群书社，与黄负生等成员们开会，商讨如何改进湖北的教育和社会。经过深入的讨论，会议决定创办一份刊物，进行思想宣传，提高思想觉悟。

会后不久，在汉口后花楼永庆里一号的致忠中学，一本全新的刊物——《武汉星期评论》诞生了。刊物的宗旨为改造社会、改造教育，反对尊孔读经，提倡革命，支持劳工运动和妇女解放，设有评论、名著、调查、文艺、随意录、通讯等专栏。刊物逢每个星期六出版，刚开始时以武昌利群书社作为发行处，后来逐渐由时中书社和长沙文化书社代销。



黄负生（1891—1922）画像

《武汉星期评论》的出版人员组成，最开始设有撰稿小组12人、编辑2名、会计1名、审查员2名，调查员不设定额，收发和兼校对人员1名。黄负生由于全家都居住在致忠中学，所以成为了刊物的第一任主编。之后，刘子通、李伯刚、陈潭秋等也先后担任主编。刊物经常撰稿人有陈潭秋、



黄负生、李汉俊、林育南、刘子通、肖楚女、刘昌群、杨子烈、李伯刚、冼百言、何定杰、张朗轩、钱介盘、夏之栩等人。

《武汉星期评论》一经创刊，即大胆报道和评论湖北及国内重大政治、社会、教育各种问题，宣传革命思想，抨击旧制度，揭露和批判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刊物主编黄负生说：“我们现在不谈别的，就只叫那般可怜虫，知道军阀、资本家的坏，是社会蠹贼。”刊物还常常发表反映社会底层生活实际状况的文章，如刊物发表了肖楚女的文章《资本制度底汉水流域》，让读者感动不已。



《武汉星期评论》

《武汉星期评论》注重支持和推动工人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22年5月，刊物刊发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专号，发表黄负生《军阀脚下自治》，陈潭秋《五一底略史》和林育南关于纪念五一劳动节、五四运动的文章，歌颂劳工运动，呼吁工人阶级要铭记挥洒了无数血和泪才换来的节日，并要继续不懈努力、奋斗到底。

《武汉星期评论》积极宣传、鼓励学生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1922年6月，刊物一次发行了3张“妇女运动号”，针对当时许多先进青年企图挣脱传统婚姻观念束缚、解除夫妻关系等现实问题发表文章以示引导。专

号上特地刊登了陈潭秋的《我对于女子参政运动的两个危惧》、李汉俊的《第三经济的妇女解放运动》和《第四阶级的妇女运动》这几篇文章，以此为基础来给青年讲述当前中国妇女遭受压迫的处境，说明了资产阶级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的根源和本质差异，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婚姻观。

《武汉星期评论》还针对社会上部分先进青年对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生活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发表文章，指引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进而改造世界。此外，对于当时社会上兴起的反基督教运动，《武汉星期评论》也曾发表文章，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揭露宗教活动的实质，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为了配合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宣传活动，《武汉星期评论》还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文章。主编黄负生曾在刊物上致信读者：“宁可为真理的牺牲者，不可为强力的征服者”，“教育前途，黑暗万丈，要想将来放一线的光，全仗有觉悟的青年共同努力”，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内核，坚定心中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武汉星期评论》不畏强权，敢于以激进的言辞抨击时弊，一经发行便在武汉乃至全国引起极大反响。1921年6月20日，上海泰东图书局创办的《评论之评论》杂志刊发该刊总编费觉天的推介文章，高度称赞《武汉星期评论》办刊方针大胆，革命精神激昂，作者年轻有为，文章令人感动。该文总结《武汉星期评论》的风格和特点是“不但一方面能够将学理主义输入一般人心底中，并且还能将普通人的生活状况输入到一般倡主义、研究学理的心中、目中”。该文感叹当时各类评论如《每周评论》、上海《星期评论》在遭受摧残而走向夭折之时，“却还有那如日初升、生气勃勃的《武汉星期评论》，岿然独存于中国之中、大江之旁”，甚至说《武汉星期评论》在精神上比《每周评论》“或者过之”，“真不能不叫人惊倒”。

《武汉星期评论》成为继北京《每周评论》、上海《星期评论》、湖南《湘江评论》等刊物之后，又一个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它的发行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北、武汉等地区的传播。武汉早期



党组织成立后，该刊便成为湖北地区早期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当时，湖南和湖北两省党组织关系十分密切，经常互派联系人交流工作经验，毛泽东就是当时的联系人之一。毛泽东说：“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给予了《湘江评论》蔡和森和《武汉星期评论》黄负生高度的评价。

为了刊物的运行和发展，《武汉星期评论》刊社的同仁们起早贪黑。黄负生担任首任主编期间，既要负责编辑工作，也要负责文章校对及最后定稿工作。后来出于工作原因，他举家搬至武昌黄土坡居住，但刊物每期校正和定稿工作都要到长江对岸的汉口印刷厂进行。那时，交通极为不便，黄负生每次都需乘坐轮船或小筏子过江，乘坐筏子方便快捷，顺流时可像轮船一样在江上快速航行。遇到筏子不能行驶的地方，黄负生便换乘摆渡大帆布民船，帆船乘风急行，在当地叫做“打枪”。一枪打至龙王庙，一枪打至下新河，一枪打至江汉关，沿着之字路线行驶，这样虽然不够便捷，却更加安全保险。黄负生每次到汉口印刷厂，一工作便是一天，常常工作至深夜11点，乘坐当天最后一班轮船过江回家。

一份刊物就是一把火。恽代英、黄负生、陈潭秋、刘子通等人以火热的激情、辛勤的劳动，通过《武汉星期评论》刊发一篇篇文章，在武汉和湖北地区民众中播撒救国救民、反帝反封建的科学社会主义火种，使武汉人民的内心燃起了一团团熊熊的革命烈火。

（李静）

武汉代表出席中共一大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近现代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革命中心，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并很快成为全国建党活动的中心，在筹备建党的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1921年6月，根据中国的实际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李达写信给在广东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征询意见以后，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达立即分别去信给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方党组织和旅日留学生中的党员，通知各地派出两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6月下旬，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收到李达来信通知以后，就派谁出席党的全国大会代表问题进行了认真的酝酿和讨论。当时，武汉党组织书记包惠僧已去广州，其他在汉党员中，董必武老成持重，阅历丰富，陈潭秋文思敏捷，言辞流利，因此大家一致推举董必武和陈潭秋代表武汉前往上海参加大会。

时值学校放暑假前夕，董必武和陈潭秋还在武汉中学担任教学工作。接到组织安排后，他们抓紧时间，将手头的教学任务完成。7月初，他们收拾行装，满怀希望，乘坐轮船顺流东下前往上海。到达上海，他们被安排住在湖北善后公会会馆。会馆离上海早期党组织成员——湖北老乡李汉俊的住所较近，十分方便彼此通信联系和准备参会相关事宜。7月下旬，董必武和陈潭秋与来自各地的代表们陆续到达上海法租界的私立博文女校（今太仓路127号），他们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在这



里秘密地开起了预备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公馆（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公馆）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3人，除了武汉的董必武和陈潭秋外，还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他们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



董必武



何叔衡



邓恩铭



陈潭秋



李汉俊



李达



陈公博



周佛海



张国焘



刘仁静



包惠僧



王尽美

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

会议期间，董必武和陈潭秋全身心投入大会各项议程。会议第一天，宣布了此次会议的议程，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当马林用英语讲话时，

陈潭秋凝神静听，并不时给坐在身边的董必武转译讲话内容。第二天，各地代表分别报告本地党组织成立和活动情况。董必武在与陈潭秋充分交换了意见以后，推举曾担任武汉党组织书记的包惠僧报告武汉早期党组织的筹备与



中共一大会议址

建设情况，以及武汉地区党团组织与活动情况。第三天以后，大会推举党的纲领、宣言、工作计划的起草人，董必武被推举参与起草制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文件初稿。

7月27至29日，参会代表针对党的纲领等问题集中探讨。会议采取民主形式，参会者可以随意发言，各抒己见。在会议讨论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纲党章以及发展组织等问题时，董必武和陈潭秋都积极而认真发表自己的意见。陈潭秋说：“我们党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全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领袖”，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在布尔什维克道路上前进”，要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党内思想斗争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健全、布尔什维克化的主要关键。陈潭秋每次的发言虽然都不长，但是十分中肯。

会议进展顺利，但当讨论到党的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时，代表们发生了意见分歧。李汉俊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主张党的组织原则为“团结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建立广泛的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刘仁静对此观点表示反对，他认为应该“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斗争的目标，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反对任何合法运动，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一般应拒绝其入党”。李达、陈公博赞同李汉俊的观点，包惠僧支持刘仁静的意见。大会多数代表则批评了两方面的错误意见。董必武和陈潭秋经过充分思考和准备，凭借他们长



期的革命经验，坚定地站在大会多数代表一方，使得党的基本纲领得以顺利确立。董必武和陈潭秋的发言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张国焘后来回忆参加中共一大的董必武“为人淳朴，蓄着八字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倔强风格”。

7月30日，由于法租界巡捕房的突袭搜查，会议被迫中断。当晚，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7月31日，代表们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嘉兴南湖是当地的旅游胜地，当日阴雨蒙蒙，给炎热的夏日带来了一丝清凉。上午10点左右，在湖上的游人都因雨离开后，董必武、陈潭秋和各位代表伴随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来到一条游船上，继续商讨大会未完成的事项。

上午，会议顺利通过了党纲和劳工运动计划。下午，讨论宣言时，又发生了一些小的争论。争论的重点是怎样对待孙中山。包惠僧认为孙中山代表资产阶级，和其他北洋军阀一样，甚至可能比其他北洋军阀更加危险，反对与孙中山联合。许多同志同意包惠僧的意见，出身同盟会的董必武却对孙中山有深厚的情感。他认为不能拿其他北洋军阀与孙中山相提并论，两者间没有可比性；孙中山领导革命的方式方法虽有不足，但是其从事革命的坚定意志应该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孙中山的思想观点也有很大的进步性；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存在共同的敌人——北洋军阀，所以应当与孙中山合作，共同革命。

陈潭秋反对包惠僧的意见，对董必武的看法表示赞同。他主张坚持与军阀政府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同时主张应将北京政府与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区别对待。陈潭秋明确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是一步登天的，恐怕是要经过一些曲折的道路。我们一面要坚定阶级立场与资产阶级斗争到底，另一面对反对阶级统治的人和事也要分一个青红皂白，分别对待。这样，我们的党才能得人心，才能站在正义的方面，才能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争取革命的多数。”陈潭秋的发言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这个思想虽然当时未被大会接受，但是中共三大以后就显示出了它的意义和价值。多年以后，包惠僧在一篇

回忆陈潭秋的文章中说：“他这样的意见，在今天说来，自然是明白易懂。但是在我们党创立时期，我们的同志都没有政治经验，我们只知道阶级斗争，只知道与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统治集团划清界限，没有理解到共产党可与资产阶级建立民主统一战线。所以烈士的见解，在当时可算是高人一筹。”



启航——中共一大会议（油画）

会议期间，董必武、陈潭秋还积极和各地代表联系，交换意见。陈潭秋认为：“会前会后的交谈与会议上的争执辩论，是同样重要的。相互间的交谈酝酿，比在会议上的争论，更为重要，更为深入。”有趣的是，最后一天这场争论双方的代表都是湖北人。会议没有就此作出结论，确定把宣言交给即将组成的中央局处理。由于不少代表从赞同包惠僧的意见转向赞同董必武和陈潭秋的意见，会议最后实际上折中地吸纳了双方的意见，一方面会议决议主张“对现有的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另一方面会议确定的方针又提出“一般的对孙文学说应有批评的、区别的对待，但他个别的实际上进步的行动应拥护，采取党外形式的合作”。

经过激烈的讨论和认真的审议，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任命陈独秀担任中央局总书记，李达和张国焘分别管理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大会开至晚上6点，



宣告圆满结束。至此，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党的一大之后，董必武和陈潭秋返回武汉。他们立即召集武汉党组织成员开会，向他们传达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决议内容和工作部署，并着手建立和发展湖北省党的组织，支持和推动各种革命斗争。不久，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武汉成立分部，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等风起云涌，武汉及湖北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李静）

浚新小学中成立共存社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开始在几个大城市建立，五四时期新知识界成立的社团开始分化。1921年7月1日至4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召开第二届年会，着重探讨了学会的宗旨和主义问题。作为会议的倡议人，恽代英在第一天的开幕式上率先发言。

恽代英说：“我希望求学、做事、结会、创造少年中国；每个同志不但有学问、有品格，而且能自觉地在共同目标下，分工互助，共同创造少年中国。这次，我为寻求共同目标而来。我希望我们的学会不但有许多有力的个人，而且成为有力的团体；不但有个人的事业，而且有团体的事业。希望这次年会能回答我的期望。”

恽代英本来真诚地渴望通过这次大会，汲取少年中国学会上先进人士的进步思想，寻求救国救民的良药。但令恽代英没有预料到的是：大会上，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等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青年竭力主张少年中国学会应走社会主义道路；左舜生、陈启天等右翼知识分子却强烈要求将学会发展为改良主义团体。他们就学会未来走向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双方争论不休。这场论战其实是当时社会上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之争在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反映，预示着少年中国学会出现分裂的趋势。

少年中国学会的分歧和分裂，在恽代英的内心激起了强烈的波澜。他忽然觉得把改造中国的责任寄托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希望完全破灭了，必须重新谋划未来的道路。会后，恽代英立即乘船返回了武昌。当他抵达利群书社街口时，面前的场景令他为之一惊；经过军阀兵变后的街巷，到处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利群书社也未能幸免，在军阀部队的烧杀抢掠下，变



得破败不堪，面目全非。这一幕使恽代英原本就焦急的内心更是深受刺激。

恽代英连夜寻找到利群书社的社员黄负生、冼百言、郑遵芳等人。当黄负生询问恽代英参会情况时，恽代英沮丧地回答说：“南京大会上，我曾想作调和人，不要伤感情，招致分裂。我错了。现在我认为，任何团体，该分裂的时候，只有分裂了才有好处，和旧我决裂，和旧世界决裂，人类才有进步。我们的团体要想前进，也面临着新的抉择了。”经过讨论，他们当即决定要在利群书社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像布尔什维克一样的社团，实现“真团体的联合”。

时值盛夏，恽代英、郑遵芳、冼百言三人来到致忠中学，在黄负生家里就成立团体事宜进行前期准备。由于天热，他们由室内转到室外，围坐在树下，喝着解暑的绿豆汤和清新的绿茶，顿感清凉。经过彻夜长谈激烈探讨，他们合议提出成立共存社。共存社应当以“积极的切实的准备，祈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人类共存之目的”为宗旨，标志着他们逐渐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黄冈林家大湾浚新小学，共存社成立之地

第二天一早，黄负生将恽代英、冼百言、郑遵芳三人送至江边。他们搭船来到黄冈县回龙山白羊山下浚新小学，积极筹备成立共存社。浚新小学原是五四运动后林育南等人在新村思想影响下创办的一所学校，希望“实

施理想的教育和农民地位的改造”。后因经济困难，中途废辍。1921年2月，恽代英和林育南、林育英、唐际盛等人又恢复了浚新小学。现在，这批社会改革家们不是为了实现昔日空幻的梦想，而是怀着开拓一个新天地的崇高理想来到了浚新小学。

1921年7月16日，骄阳似火。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林育英、李书渠、郑遵芳、冼百言、廖焕星、卢斌等23人从武昌、北京、安徽、河南、湖南等地赶来，在浚新小学召开联合大会。他们主要是受利群书社影响的各地青年，有青年学生，还有青年工人和农民。毛泽东主持的湖南文化书社也派代表易礼容出席了会议。

大会第一天，主要内容为探讨共存社的主义与宗旨问题。恽代英作为本次会议的主席和策划人之一首先发言，明确表示“主张成立一个布尔什维克性质的共存社，至于怎样达到人类共存的目的，欢迎大家从多方面发表意见”。当时各地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开展以后，马克思主义广为传播，各位代表对恽代英的发言表示认同。

林育南表示，大家都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家极为愤恨的，单单靠发展经济来达到压垮资本家的目的是很难实现的，我们现在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才能与之抗衡。恽代英对林育南的思想表示拥护，参会代表也非常赞成林育南的观点，

大会共召开了6天，议题众多，日程紧凑。最终决议将团体命名为“共存社”，宗旨表示赞同阶级斗争、拥护劳农政治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共存社设总务股、教育股、实业股和宣传股，经过民主选举，分别由李书渠、恽代英、郑遵芳、廖焕星担任委员。相比互助社、利群书社，共存社的组织更为严密，对社员要求更高，重视个人品格修养，已与现代政党类似。

共存社对社员个人品行和经济都做出具体规定，个人品格方面要求不嫖、不赌、不抽烟、不饮酒、不纳妾、不奢侈、不做有害社会事业或有害社会团体等的恶事。经济方面要求社员将可自由支配的钱财全部捐入，无法捐入的部分需写明情况，上报理由。没有自由支配钱财的成员，尽量每



年捐款不少于3元，共存社为所有社员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入社必须填写入社申请书，否则不予批准。此外，共存社还包含60余条章程，内容具体涉及社员、社友和各股委员等方方面面，由恽代英整理好后，一一进行说明讲解。

共存社的各项规定表明，它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具备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恽代英、林育南等先进青年通过革命的实践，已经走出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迷雾中，接受和信仰了科学社会主义，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共存社成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共湖北、湖南党组织负责人为了发展党组织，积极与共存社成员联络。一大代表包惠僧也在了解过共存社的具体主张后，对共存社李书渠等人说：“共存社的宗旨和我们共产党的目标是相同的。”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返回湖南后，便听说共存社成立的消息，在了解共存社的纲领后，给予了高度赞扬。在武汉党组织成员、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具体指导下，浚新小学成立了党组织，后来发展为党支部。浚新小学党支部属于党在农村较早的基层组织，在农村发展了一大批党员。

共存社成立后，也在积极发展组织，成员们迅速投入各种组织宣传活动。听闻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以后，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等人积极与党组织联系。1921年下半年，在四川工作的恽代英直接与上海党组织联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初，林育南、林育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共存社的大部分社员以及湖北各地的有志青年响应恽代英的号召，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成为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在安源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社员们入党前后，积极在学校、在农村、在工厂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授知识文化，灌输革命思想，批判封建礼教，不断发展党员，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

随着社员逐步加入中国共产党，共存社也宣告停止活动。

（李静）



富的知识分子没有工作，聘请他们做教员较为容易。教师问题解决了，董必武和张国恩等人便开始着手解决校址、办学资金、校董事会及校领导等问题。

为了筹集办学经费，各位创办人纷纷捐款，董必武甚至将他用来御寒的皮袍都拿到典当铺典当了。他们的办学倡议得到武汉教育界人士和社会名流的赞同，终于凑足了基金。在各方的努力下，校址选在湖北省教育会附近的涵三宫街。学校董事由学校创办人董必武、张国恩、刘鼎三、李毓三、刘质如、倪季端、江文波、雷大同和刘觉民9人担任，董必武主持校务。经大家共同商议，学校董事长则推举湖北省议员、著名教育家郭肇明担任，他也是创办人张国恩和刘鼎三等人的老师，在湖北教育界颇受敬仰。董事会后又增加崔琴辅等人为校董，人数增至11人。学校借助郭肇明的威望顺利通过立案。

经校董事会一致商议，学校定名为“私立武汉中学”，刘觉民为中学第一任校长。各位校董分别兼任教员，教授国文、修身、历史等课程，又聘用陈潭秋担任英文教员，曾雨村担任地理教员，熊连城负责教授绘画，其他课程另请他校教员教授。为了以革命精神培养训练师生，董必武提出以“朴诚勇毅”为学校校训。由于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为了传播革命思想，因此，武汉中学很快就成为武汉地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基地。

1920年3月，私立武汉中学正式开学，首次招收了2个班学生，并按学校校章开始授课。当时，武汉的各类中学有很多，但学生多来自富裕家庭，私立武汉中学的创办则为平民子弟提供了一条求学之路。学校采取男女同班上课的方式，学生可组织学生会针对学校办学章程对校领导提出意见。学校报考费和学费都比其他学校低很多，教职员工通常只有微不足道的薪资，甚至没有薪水，他们都是博学多识的知识分子，国文课采取白话文授课，开湖北省中学中用白话文授课之先河。黄负生、刘子通等进步知识分子也先后在学校任教，学校还邀请李大钊、恽代英等革命先驱者来校讲学。学校为学生订阅购买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湘江评论》和《武

汉星期评论》等书刊，帮助学生了解国内外时事，在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革命思想。

董必武、陈潭秋等人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后，逐渐意识到发展革命组织和团体的重要性。1920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8人率先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呼吁各省党组织开展建团工作。这就更加推动了湖北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诞生。

董必武、陈潭秋等武汉共产党组织成员商议，决定以私立武汉中学为根据地，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称S.Y）地方组织。为此，董必武先吸收了武汉中学中10名进步学生干部，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并以此作为基础，分别在湖北省第一师范、武昌高师、第一中学和女子师范等学校中呼吁先进学生加入团组织。

1920年11月7日，正逢俄国十月革命3周年纪念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8人，其中有11人是大学和中学的学生。董必武作为发起人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自从政治战争停止以来，科学领域里出现了许多重大变化。新思潮正在向我们扑面而来。我们该怎样对待呢？我们自然要投身到正在酝酿之中的新的运动中去。参加这场运动，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天职。我们应当去同现存旧社会的各种不合理现象进行斗争。”董必武的发言得到了参会代表的热烈掌声。

包惠僧在会上对团员提出了要求：“致力于社会主义……努力奔向光明和社会主义——苏维埃俄国。”郑凯卿也在会上发表讲话：“团的活动应当是面向中国社会，但也不应脱离全世界的运动。”大会最终决定，由包惠僧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秘密活动地——龙神庙



担任青年团书记，陈潭秋为负责人，李书渠处理青年团的具体工作。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报告明确表示：“我们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会议通过的青年团简章规定，青年团的宗旨为“研究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的思想”。至此，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私立武汉中学正式成立，成为继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后的又一个青年团组织。

11月14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共19人参加。会议上，刘伯垂全面系统地作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专题报告。董必武重点向青年团团员及参会代表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近期领导开展罢工的原因和具体情况以及工会活动的组织情况，使参会青年学生团员的革命知识储备更加丰富。

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以武汉中学为活动根据地，每周举行一次例行会议，汇报团员们的学习和组织活动情况。董必武和陈潭秋一边在武汉中学组织学生工作，一边积极向湖北省立女师、省立一师、国立武昌高师及其附属小学等大中小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吸收先进青年学生加入党组织和团组织，这使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人数不断增加，其中以武汉中学和湖北第一师范的学生居多，青年团规模不断扩大。

董必武、包惠僧、陈潭秋等人带领着青年团的青年学生，热情地在学校、工厂、农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同群众相结合，使青年团员深受磨炼，更加坚定了内心的革命信仰。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还积极与上海、北京、天津、

长沙等地青年团交流团组织的发展情况、组织活动经验等等。

武汉中学办校伊始，许多心怀革命抱负的先进青年参与其中，但也有部分人仅仅是从改变时局、改变现状出发来到武汉中学的，这使得私立武汉中



私立武汉中学校旧址纪念馆

学内部思想成分有些复杂。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团员之间信仰的社会主义也各不相同，难免政见不合，难以进行统一活动。1921年5月，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应上级要求解散。

11月，中共中央局发出通告，提出“改造青年团”的指示。11月底，武汉地方党组织根据中央精神，决定由包惠僧、陈潭秋、黄负生、李书渠等负责做好武汉青年团组织的恢复工作。12月4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重新建立，仍推举包惠僧担任书记，黄负生为秘书，并决定把团的机关和党的机关同设一处，后来定为武昌黄土坡27号。重新建立以后的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更加纯洁，力量更加增强。

1922年4月9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改名为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组织迅速向学校、工厂和农村发展，先后建立了武昌和徐家棚两个青年团地方委员会。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派代表参加了于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截至大会召开，武汉团组织成员已发展至200余人，团员遍布武汉各大、中、小学校。

武汉中学作为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源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党员和团员。后来，武汉中学走出了三位中共“一大”代表，武汉中学毕业生潘忠汝任黄麻起义总指挥，王志仁、汪奠川、王秀松等校友为黄麻起义的重要负责人。南昌起义、井冈山武装斗争，都有武汉中学的毕业生参加。这所新型学校成为培养武汉先进革命青年的摇篮之一，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李静）



黄土坡的岁月

1921年10月,《武汉星期评论》主编黄负生在武汉三镇到处寻找新的编辑部地址。他对外宣称《武汉星期评论》业务发展,致忠中学办公室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实际上,他是在为刚刚成立的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寻找机关地址。最后,他租下了武昌黄土坡27号(今武昌首义路)。于是,这里既是《武汉星期评论》新的编辑部地址,也见证了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最初几年的战斗岁月。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对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规定和要求:“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经当地委员会书记介绍,可转到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董必武和陈潭秋以武汉地方党组织代表的身份



武昌黄土坡27号

参加完中共一大后,于8月初返回武汉,向武汉党员传达了一大的会议情况和主要精神,并开始在武汉按全国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建立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组织机构。

由于董必武去鄂西开展工作,陈潭秋负责成立了工作委员会,作为武汉地区党组织的临时机关。10月,包惠僧受中共中央派遣回汉后,立即联系陈潭秋,正式

成立了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包惠僧任书记，主持中共武汉地委工作，后增加陈潭秋为组织委员、黄负生为宣传委员。中共武汉地委直属中共中央管辖，暂无下级组织，直接与党员联系，指导党团员开展工作。

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又通告各地党组织，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7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武汉地方党组织接到通知后，加快了发展的步伐。1922年初，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1922年初夏，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扩大为中共武汉地方执行委员会兼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由包惠僧担任，后因包惠僧奉命调往北方工作，委员长由陈潭秋担任，增补刘昌群为组织委员。1923年初春，中共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和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相继成立，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不再由地方执行委员会代行职权，而是由其独自行使自己的职权。

中共武汉地方执行委员会刚一成立，黄负生便开始焦急地寻找党委机关驻地。黄土坡27号本来是黄负生任教的湖北女师学生杨继濂家的房子。原来这里曾开办过报社，房内设置极为普通，3层楼，是一个三开间中式传统房屋，周围全是空旷的田野。房屋门口设有几节高门槛和台阶，还有1口天井，天井两侧分别有1间厢房。房前不远便是湖北女子师范学校和紫阳湖，房后便是一片菜地。在当时的情势下，该处房屋的配置非常符合需要，黄负生便马上以他妻子王纯素的名义租下了这间房子，为避免暴露，对外就宣称该地为《武汉星期评论》的编辑处。

黄土坡27号不仅仅是中共武汉地方（区）执行委员会的机关驻地，还是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妇女读书会等诸多党团组织的机关驻地。除了黄负生一家4口全部居住在这里，为方便办理党务，包惠僧、陈潭秋和陈荫林兄弟、李汉俊、刘子通等人也居住在这里。

武汉党组织成立初期，党员人数只有10余人，后来规模不断扩大，增至50余人之多，项德隆（项英）、施洋、陈荫林、李求实、李伯纲等人都是在这所极为普通的房屋内先后入党的，还有许多朝气蓬勃的学生也纷纷



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

当时，武汉党组织的活动经费非常有限，党员们的生活十分拮据。包惠僧后来回忆起黄土坡的这段岁月时曾说道：“因为当时我们的经济力有限，除了我已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以外，黄负生、陈潭秋、刘子通、陈荫林、李汉俊诸同志都是一面教书，一面为党工作，只有项德隆由党开支最低限度的生活费。”很多党员通常都是边教书边从事革命活动，不然难以维持生计。陈潭秋和黄负生等人都需要同时在中华大学、湖北女子师范、武汉中学等校授课，有的还是义务授课没有薪水，他们一拿到微薄工资便马上带到党组织来充当革命经费。

居住在黄土坡 27 号的党员同志们都由黄负生的妻子王纯素来照顾日常生活，管理家务。王纯素每天起早贪黑为同志们做饭、缝补和清洗衣物，不辞辛劳，为每个党员做好后勤保障。当时党组织的同志们都习惯称她为贤惠的嫂嫂，黄负生教过的许多进步学生如夏之栩和李文宜等人则亲切地称她为黄师母。

黄土坡 27 号十分简陋，连作为机关驻地的一些基本配置都没有，于是所有人一起凑钱简单布置了一下房屋，买了 2 张普通桌子和 1 张包含 3 个抽屉的长条桌子，还配置了几把藤椅。包惠僧和陈潭秋 2 人住在 1 楼，黄负生夫妻 2 人住在 2 楼。所有人一起拿钱吃饭。当时虽然有 1 位专门管做



黄负生（1891—1922）画像

饭的张师傅，但同志们和学生们总是更喜欢吃黄师母做的饭菜，王纯素也总是换着花样给大家做一些可口饭菜，这里的所有人在一起像极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这时正处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初期，委员会内每天都十分热闹。陈潭秋、黄负生和刘子通等人的行程最为

忙碌,常常要在1天出席好几场会议,并要准备会议发言。每逢周末,陈潭秋、黄负生、李汉俊和刘子通等人还会在这里组织教学,这里便又变成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马列著作的课堂,来自学校、工厂等武汉各地的进步青年经常前来拜访学习先进的革命思想。

机关内仅有一台油印机,党员们用它来印刷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的传单,分发给学校学生来进行思想宣传。陈荫林也要经常前往汉口的一所工人补习学校教授英文,黄负生则常常赶到汉口,去印刷厂校对和印刷《武汉星期评论》。党组织的同志们虽然辛苦,但总是乐此不疲地抓紧将手头上的工作完成,为的就是给革命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正当组织宣传活动有条不紊进行时,突然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黄负生主编的《武汉星期评论》上刊载了教育界相关人士举报黄负生任教的武昌中华大学学校领导徇私舞弊,私相贿赂的文章,触及了校长陈时等人的利益,陈时因此勾结军阀向黄负生施压,要求他交出撰文人的名单和原稿,否则便要他丢掉饭碗。黄负生为维护作者们的安全和隐私拒不上交,义愤填膺地说道:“我虽然穷,但宁愿失业,决不失节”。陈时见状,竟然教唆打手将黄负生连打带骂地赶了出去,并将其辞退。

黄负生怀着满腔的怒火,一路踉踉跄跄地回到黄土坡的家中。包惠僧和陈潭秋见黄负生面色铁青,连忙将他扶回房间休息。问起事情经过,黄负生顿时脸色发紫、呼吸困难、咳嗽不止,咳着咳着竟口吐鲜血。黄负生本就每天操劳过度,身体不好,患有肺病,从此更是一病不起。

听闻黄负生病重的消息,陈时心中泛起一丝惶恐,他假模假样地来到黄负生家里表示慰问。走到黄负生房间门口,看到房中的景象,他不由得为之一惊。黄负生家徒四壁,他本人正憔悴不堪地躺在破烂的床上,被褥和蚊帐上满是破旧的补丁,残破的痰盂里还



黄负生遗墨(给妻子王纯素镜底题诗,现存湖北省博物馆)



有黄负生咳出的血丝。陈时拿出准备好的银元放在桌上就想走，岂料黄负生拼尽所有力气一把将银元打落在地，愤怒地喊道：“走，离开这里，不要你的臭钱！我宁可贫病而死，也不要你的一文铜钱！”

1922年春，湖南长沙爆发黄庞惨案，党组织发动当地学生罢课，反抗黑暗势力。长沙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迫于反动势力的压迫，赶赴京沪地区，途经武汉，便来到武昌黄土坡27号党的机关驻地，进行考察和交流经验。毛泽东在这里与包惠僧同住了10余日。

毛泽东听闻黄负生病重，亲临病榻前，握着他的手，对他表示亲切慰问。黄负生对毛泽东的到来非常高兴，一再嘱咐妻子王纯素说：“这位是从湖南来的‘稀客’，一位‘好领导’，要好好招待，不能向外走漏一丁点儿风声。”王纯素得知毛泽东喜爱吃辣椒和鳊鱼，设法给这位湖南的贵客做了一顿美味的饭菜。毛泽东对王纯素的手艺赞不绝口，黄负生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毛泽东在黄土坡的日子里，还和包惠僧、陈潭秋和刘子通等人开了几次会，对武汉当时汹涌澎湃的罢工运动和党组织宣传活动进行了交流。在谈到武汉当地各行各业的工人已经联合起来，组织起工人俱乐部时，包惠僧等人请教毛泽东：如何可以使俱乐部摆脱帮会作风，从而减少冲突？毛泽东回答道：“帮会派别必须要消灭，只有消灭了帮会派别，工人阶级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经过与毛泽东几天短暂的交流，武汉党组织的同志们都深受启发，获得了更多更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加强了对武汉地区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妇女运动的领导。

在武昌黄土坡的岁月里，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先后组织和领导了1921年的汉口人力车工人罢工、1922年的粤汉铁路工人第二次罢工和英美烟厂工人罢工，并于1921年、1922年先后领导发动了两次湖北女师学潮。武汉地区党团组织迅速发展，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给予反动统治势力以沉重打击。

而在包惠僧、陈潭秋、黄负生和刘子通这些革命者眼中，黄土坡27号不仅仅是武汉党组织的机关单位，更是他们的家。他们在这里挥洒了无数汗水与眼泪，黄土坡的这段日子已成为他们革命生涯中最为难忘的一段光辉岁月。

（李静）



播火荆楚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赤旗怒涛



工友聚集汉冶萍

汉冶萍公司是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1908年，近代商人、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将汉阳铁厂（汉阳）、大冶铁矿（大冶）、萍乡煤矿（江西萍乡安源）合并，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1909年，汉冶萍轮驳处在汉阳成立。汉冶萍公司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工厂，工人众多，而工人的生活却很艰苦，工厂里充斥着剥削和压迫。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便决定派人深入工厂，组织和开展工人运动。

1921年秋，汉冶萍公司从汉阳铁厂抽调一批工人到大冶钢铁厂，武汉共产党组织便派林育英化名成李福生，作为翻砂工进入大冶钢铁厂。他住在同乡工人林家庆的家里，利用工作和休息机会接近工人，同工人们聊天。渐渐地，李福生与林家庆的邻居仇国升、刘敢生成为好友。仇国升、刘敢生都是苦大仇深的工人，对现实社会强烈不满，却也是性情中人，在工人中很有威信。

在李福生的动员和带领下，仇国升、刘敢生先找工人谈心，把认识的工人组织在一起，每个车间组织二至三个学习小组，进行宣传教育。很快便建立了两个秘密学习小组。一组以仇国升、徐世明、冷殿卿为骨干；另一组以刘敢生、张春山、符玉霞为骨干。他们经常到飞云洞开小会，在观音阁开大会。李福生向学习小组的工人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人民当家作主的幸福生活，讲解《劳动周刊》《新青年》等刊物上的文章，宣传马列主义。他对工人们说：“劳工神圣，劳工创造世界，矿是我们开的，铁是我们炼的，没有我们的辛勤劳动，压迫阶级就不能生活。我们要向俄国工人阶级学习，团结起来，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铲除不合理的剥削制度。”这些革命道理，通过学习小组的工人迅速传播开，于是小组

的人越来越多。

1922年3月12日，仇国升、刘敢生、林家庆三人在大冶钢铁厂仇国升的家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李福生代表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共大冶钢铁厂小组，仇国升被指定为党小组长，并负责组织发展工作，刘敢生负责宣传工作。通过仇国升等人的串联，李福生还与大冶铁矿运务股下陆机修厂的工人取得了联系。大冶铁矿历史悠久，工人苦大仇深，富有反抗精神，革命火种经李福生一点燃，便熊熊地燃烧起来。下陆机修厂最先与李福生取得联系的是赫惠林、邱庭芳、唐芳，他们很快被吸收为共产党员。1922年3、4月间，建立了中共下陆机修厂小组。

当时，汉阳铁厂正处于没落境地，资本家加紧对工人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虽然工人们有着斗争传统，但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斗争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张国焘派许白昊返回武汉，以加强武汉分部的组织领导。

许白昊是湖北应城人，早年就读于武汉私立工业学校，因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被驱逐离校。1919年秋，他结识了一批革命志士。192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5月，许白昊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满怀信心地来到汉阳。他在龟山脚下、汉水岸边考察了几天，希望能与工人交谈，却得不到回应。

这时，许白昊想到与他一同参加过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黄格谦。黄格谦与在汉阳工人中颇有影响力的向忠发从小相识，于是，组织了许白昊、向忠发及陈春和的四人聚会。许白昊说出自己的想法：汉阳铁厂有几千名工人，在武汉乃至全国举足轻重，希望把工人组织起来。他提出开展劳工教育、组建工人俱乐部、推行劳动组合，得到了其他人



许白昊（1899—1928）



的赞同。随即许白昊又讲道：“唤醒工人觉悟，首先要办劳工学校，让工人识字。我义务教学，请你们几位想想办法，找一间能容纳百人左右的房子，我想10天之内把工人识字班办起来！”陈春和说房子包在他身上，向忠发则负责喊人捧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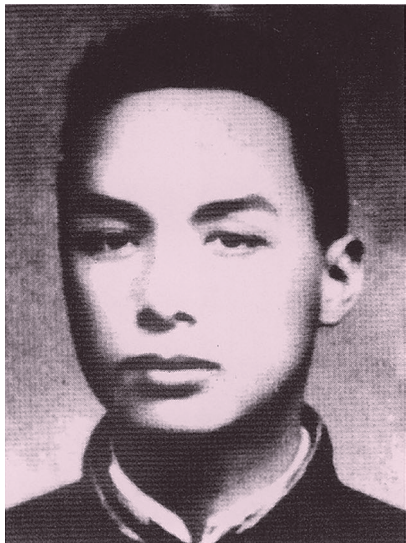
仅一个星期，工人识字班就在龟山脚下开课了。开课第一天就来了70多人。向忠发首先做了简短动员：“我们工人处在社会底层，没有文化。开办识字班，就是要让大伙识几个字，懂得世上的奥妙，明白做人的道理。今天请来的许先生，一肚子墨水，见过世面，能帮助我们脱离苦海。”许白昊先在黑板上写下“工人”，接着讲了起来。工人是顶天立地的人，敢于革命，敢于推翻旧世界，只有工人才能担负革命的重任。工人是天，劳工神圣，工人创造世界、主宰世界，工人团结在一起就是一片天空。工人们得到了启发，慢慢地人越来越多，很快扩大到300人。许白昊又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林育南请来，开设了一所分校。

许白昊、林育南晚上办校，白天走巷串户，和工人谈心，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工人们也乐意与他们交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动员考察，许白昊挑选了20多个积极分子，分成两个学习小组，一个由向忠发负责，

一个由陈春和负责。向忠发还租了一间房子给积极分子集会，许白昊、林育南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同时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指明工人的苦难和出路。

经过2个月的辛勤耕耘，汉阳铁厂的工人发动起来了，许白昊和向忠发决定成立工人俱乐部，并于7月16日正式举行成立大会。不料俱乐部成立第2天被军队镇压，工人们举行罢工抗议，最终在许白昊等人的领导下取得胜利。

1922年10月，许白昊再次来到汉阳铁厂，鼓励向忠发一如既往，大显身手。



林育南（1898—1931）

在汉阳铁厂罢工胜利的鼓舞下，大冶铁矿也正式成立工人俱乐部。

另外，同属汉冶萍公司的安源萍乡煤矿有矿工 13000 多人，工人们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困苦。1921 年冬，李立三从法国回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安源开辟工作，开展工人运动和发展党员。

李立三到安源后一直住在朱少连家里，在朱少连等工人积极分子的帮助下，在安源五福巷租到一所房子，挂上平民小学牌子，先招收了二三十个八九岁的工人子弟后就正式开学了。他在工人区里转来转去，热心劝工人学文化。在李立三的动员下，平民小学的人数很快猛增到五六十人，形成了安源工人运动的第一批积极分子。

李立三向工人提出开办工人补习所的倡议，得到他们的热烈赞同。于是工人们凑了些长短高低不齐的桌凳，最初只有 20 多个学员。他给工人上课，把文化课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比如，工人称他先生，他就教学员先认识一个“牛”字，然后在“牛”字下边画一横，告诉学员说，这就是先生的“生”字。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先生”也不过是牛坐板凳。那些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先生”，并不高明。他对工人说，以后你们就不要称我先生，就叫我“隆郅”吧。从此工人都亲切地称他“老李”或“能至”，他就是这样开始在安源工人中扎下根来。

1922 年春节过后，李立三开始在工人中发展党员，为创建安源党支部和安源工人俱乐部而斗争。他们在名义上使用的是当局规定的国民课本，而实际上使用的是自编的教材，还让工人阅读《向导》和《工人周刊》。李立三吸收 8 名先进的工人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成了安源第一个团支部。又经过一段教育和考验，从团员中发展了朱少连、周镜全、李涤生等 6 名党员，后又建立了安源党支部。

一天夜里，李立三给工人补习学校上课，带着把筷子走进课堂并放在课桌上。他用自己折断一双筷子和“大力士”工人折不断一把筷子的比喻，巧妙地向工人们提出建立工人组织的建议：我们工友单个人就会受人欺侮，我们组织起来力量大，坏人就再不能欺辱我们了。1922 年 5 月 1 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大字匾牌在牛角坡 52 号悬挂起来，正式成立安源路矿俱



乐部，选举李立三为俱乐部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

工人们在党的动员和组织下，建立一个个学习小组和工人俱乐部，思想觉悟迅速提高。许白昊、林育南、林育英等人到工厂中去、到工人中去，工友们聚集起来，武汉初期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丁佳佳）

工人识字班和妇女读书会

二十世纪初期，武汉工人生活困苦，每天工作时间长，休息时间少，终日劳累不得温饱，普通工人月薪只有 5 元左右，而高级职员则高达数百元之多，洋总管和洋总工程师更高达 1500 元之巨。除此之外，工人们还受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工头残酷的剥削，他们对工人肆意辱骂殴打，罚款开除。生活在困苦和压迫之下的工人艰难而又惶恐地度日，虽曾奋起反抗，罢工斗争，但是收效甚微，甚至毫无成效。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一直在为工人的权益而努力。1920 年春，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以及武汉先进知识分子的支持下，郑凯卿等人针对武汉各工厂工人的分布和工资、男工女工童工的状况作了一个初步的调查，写成《武昌织布、纺纱、铜币、银币、麻布五局工人状况》和《汉口苦力状况》2 篇调查报告。1920 年 8 月，武汉早期党组织成立，决定党组织以后要积极开展劳工运动，并决定由工人出身的郑凯卿负责劳工工作。后来，党组织经过多次讨论，拟定了一个武汉工人运动的计划，即先从调查入手。1920 年 12 月，包惠僧到汉口湛家矶扬子江机器厂等工厂调查研究，并完成《我对于武汉劳动界的调查和感想》一文。该文从“工厂与工人”、“工

武昌五局工人狀況

交華大學學生

織布局

時	工人名目	廠名	織布	紗	紗	紗	花	花	花	花	彈	拊	合	搖	收	紡	織	銅	修	打	批	共計
早六時至十二時	三十六千頭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中一時至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一六	一	一	三	六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夜六時至早六時	四十車																					

刊登在《新青年》上的《武昌五局工人状况》



作与工资”、“工人的嗜好”、“工人的道德”四个方面详尽地报告了武汉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实况。

通过这些调查，武汉党组织对武汉工厂和工人的状况有了更切实的了解，与工人的联系日趋密切。武汉党组织决定通过办工人识字班的方式与工人接触，深入工人群众，并计划在工人中组织工会和发展党员。1921年，林育南和李书渠被派到第一纱厂负责工作，项德隆到江岸京汉铁路，许白昊到汉阳铁厂，林育英到模范大工厂，施洋、郑凯卿到人力车工人中去。

林育南、李书渠、许白昊等人深入工人住宅区了解工人的工作生活情况和要求，联系工人的痛苦遭遇，用通俗的语言来教育工人。他们用开会、演讲等方式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和工人们聊天、谈心。向工人们演说：“资本家不劳动，生活却很阔气。可是我们工人呢？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劳动十二小时，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挨领班的打骂，比牛马都不如。他们任意欺凌我们，他们是可耻的。不要相信命运，要相信工人自己的力量。工友们！我们只有团结起来，与资本家作斗争，才能真正解放自己！”

经过早期共产党人的启发和教育，工人们逐步认识到自己力量的强大，他们团结起来，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以及洋资本家进行顽强的斗争。同时，林育南、许白昊等人还十分关心工人的疾苦，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救济贫苦工人，对工人们嘘寒问暖。通过宣传、教育以及成立学习小组的方式，各工厂的识字班逐步发展起来。

1922年前后，林育南、许白昊、林育英等人在武昌第一纱厂、汉阳铁厂、汉口英美香烟厂建立工人识字班，裕华纱厂、震寰纱厂、沙麻纱厂、南洋烟厂、汉口日本纱厂也相继办起识字班。

工人识字班成立后，林育南、许白昊等人亲自给工人上课。他们所运用的教学方法和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寓马克思主义教育于普及文化知识的过程中。比如，初学“工人”二字，继而扩充为“我是工人”，“我是汉口英美烟厂工人”。利用字、词、句讲解阶级斗争的道理。如说“工”

字，上边一横指的是天，下边一横指的是地，中间一竖是一个人站着，就是我们工人，这是个顶天立地的人。所以说，工人伟大，他们敢于革命，勇于推翻旧世界。他们还讲解阶级斗争学说，并结合读报讲解时事，对于粗识文字的工人，还发给《两个工人谈话》之类的小册子，进行文化教育和阶级教育。

林育南等人通过识字班，增强了与工人的交流、联系，在他们之中建立信任，鼓励他们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起来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斗争，提高工人群众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自觉性。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工人的顽强斗争下，工人们取得多次罢工的胜利，促进了武汉地区早期工人运动的发展。

武汉党组织在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之时，还积极组织妇女运动。党组织选择近代新式学校作为突破口，从破除封建习俗、提倡妇女解放入手，鼓励女学生进行斗争。1921年冬，陈潭秋、刘子通、董必武等一些党员入职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湖北女子师范学校，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积极从事学生运动。他们以学校为阵地，以学生为重点，在课堂上或课余时对封建礼教、“三从四德”进行强烈批判，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宣传妇女自由解放，并在进步学生中成立社团组织。

陈潭秋、刘子通分别担任湖北女子师范学校的英语和国文教员。陈潭秋常常给女师学生讲革命的道理，发动她们反对封建式的管教，主张剪发、读新书。陈潭秋还写下《妇女运动：赶快组织“女界联合会”》，指出女性需要特别注意自身人格的修养、社会化的修养，增强知识和能力的修养，同时女性的言论机关在妇女运动中也是必不可少的。

刘子通教戊班的国文，从《新青年》《觉悟》等刊物上选出文章来油印发给学生读，带头破除女师学生只习文言文的旧传统，鼓励学生写白话文。有一天上课，刘子通提问学生：“今年是公历多少年？”学生回答：“只知道今年是民国十年，不知道什么叫公历。”刘子通只是笑笑，并没有责怪这些被封闭的女学生，而是借此向学生讲起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陈潭秋、刘子通与众不同的上课方式，特别是他们新颖的知识和观点，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以至于他们讲课时，别班的学生也挤在窗口听讲。下课以后，学生们还常常将老师围住，问这问那，请求解答。受他们的影响，学生们的心胸和眼界大大拓宽，学生们的思想也更加活跃，逐渐在学生中涌现出一批思想活跃、求知欲强的积极分子。如夏之栩、徐全直、李文宜、袁溥之、陈碧兰、庄有义等人，她们大多于1918年进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后在陈潭秋和刘子通等共产党员的影响下，于1922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又相继入党，为湖北等地的妇女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潭秋、刘子通老师有时带领女学生们到黄土坡的黄负生、李汉俊家里，引导她们自己学习《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她们自由地讨论各种问题，与陈潭秋、刘子通、李汉俊、董必武等人交流心得。1921年冬，湖北省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妇女组织——武汉妇女读书会便在黄土坡应运而生了。

妇女读书会的初期成员都是湖北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只有二三十人，由高班生李学惠负责，主要成员有徐全直、杨子烈、夏之栩、庄有义、陈碧兰、陈慕兰、袁溥之、袁震之、王延成、叶家洪、王文宣、刘玉贞、宋炜、杜林、亢文惠、范明洁、李文宜、兰淑文、李兰英等。她们每周不定期地到黄土坡去一两次，听老师讲课，或者讨论一些问题，有时还到利群书社去借阅革命书刊。

在妇女读书会，同学们进一步接受革命的启蒙教育。老师们给她们讲解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讲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还给她们介绍一些革命领袖如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的事迹，组织她们阅读和讨论《娜拉》等进步文艺作品和《共产党宣言》、《武汉星期评论》、《新青年》、《共产党》等书刊。参加妇女读书会后，学生们的思想明显地发生变化，为以后发动学潮、进行抗争打下良好基础。

妇女读书会培养一批女党员，极大地推动了湖北的妇女运动。陈潭秋、刘子通把革命火种撒播到女子师范学校，向学生宣传苏俄十月革命和妇女

解放等革命道理，使青年女学生认清中国妇女遭受压迫、国家遭受外国列强欺侮的根源，促使她们站起来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之中。

武汉早期共产党员深入工人、学生、妇女之中，通过组织学生会、工会、读书会等各种各样的方式，使工人和妇女的思想觉悟提高，武汉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妇女运动逐步发展起来。武汉党组织也迅速发展起来。

（丁佳佳）



青春之光：从高师学潮到女师学潮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是北京政府以方言学堂为基础，于1913年建立的一所高等师范学校，是中国第二所高等师范学校，也是中国早期的六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之一。该校成立以来，聚集了大量仁人志士。武昌高师学生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积极吸收新思想，并在五四运动中得到了极大锻炼。五四运动后，武汉早期共产党人包惠僧、陈潭秋、黄负生等人通过宣传、演讲等方式，发动和组织武汉青年学生，推动武汉学生运动发展。

1921年，湖北督军王占元所属第2师在武昌发生兵变，烧杀奸抢，全城骚乱，湖北民众起而反对，组织了声势浩大的驱王自治运动。同时，湖南督军赵恒惕派兵援鄂驱王，讨伐王占元。王占元急电北京政府，请曹锟、吴佩孚发兵支援。曹、吴想乘机抓到湖北地盘，于是即派萧耀南率北洋陆军第25师进入武昌，但声言援鄂不援王，趁机取王而代之。王占元被迫辞职。1921年8月9日，北京政府任命萧耀南为湖北督军。萧耀南上任之后，并没有改变湖北政府的腐败状况，反而继续扣各学校经费，以支持吴佩孚“武力统一”之梦，这引起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多校学生的不满。

1921年9月21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及其附属中小学的全体学生举行罢课、游行、请愿等活动。他们要求湖北政府解释：为什么以湘鄂、川鄂战争为由，挪用学校经费充当军费，以致长期拖欠学校经费？然而，萧耀南敷衍了事，并不想解决问题，一心做其“军事梦”。武昌高师学生的不满情绪迅速蔓延。

在共产党人的支持和时任武昌高师校长谈锡恩的资助下，10月1日，高师200多名学生组成请愿团赴京，要求教育部提请国务会议处理此事。国务会议在学生的逼迫下，不得不将湖北烟酒税项下划为高师的学校经费，

3月至6月的欠费由财政部支付。然而，财政部并不同意这个做法，学生们又再次组织起来，准备游行示威。5日下午2时，全体赴京请愿团学生在教育部广场聚集，准备游行。学生们在刚刚抵达门口时，突然遭到警察的阻拦和毒打，12名学生受伤。

军阀政府暴行使请愿团的学生们十分愤怒，陈敬业、李浚、王丕承3名学生立即出发，来到教育部次长马邻翼的家里进行交涉。消息传到武汉后，武昌高师全体师生立即通电全国，表示“一息尚存，誓死抗争”。湖北教育界也大力支持高师学生，强烈要求给大众一个交代。北京社会教育协赞会、北京国立八校联席会议及北京私立中小学等团体也集体致电吴佩孚和萧耀南，并派遣代表与教育部和财政部交涉，要求尽快解决此事。

面对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北京政府吴佩孚、湖北督军萧耀南、湖北省长刘承恩等人被迫提出解决方案。最终，双方达成统一意见：自1922年1月起，在湖北烟酒税下按月照拨1.5万元，印花税0.3万元，作为武昌高师的经费；财政部拨印花税10万元交给请愿团，作为1921年的旧欠经费；北京警察总监殷鸿寿派人至教育部，向12名受伤学生及请愿团道歉慰问。11月14日，陈敬业、李浚等人带领全体请愿团学生返汉。至此，武昌高师学潮胜利结束。

武昌高师学潮之后，湖北女师学潮接着爆发。20世纪初的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是由守旧文人把持、用封建礼教禁锢学生思想的一所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女师校长王式玉迫于形势，邀请了陈潭秋、刘子通等人来校任教。陈潭秋、黄负生、刘子通为同封建势力争夺青年，先后到湖北女师任教，并秘密进行党的工作。

1921年初，陈潭秋、刘子通分别担任女师的英语和国文教员。他们积极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引导女师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反对封建束缚，解放自身。徐全直、夏之栩、李文宜等女师学生深受影响和鼓舞，思想和行动都变得格外活跃。1921年夏，陈潭秋发起，徐全直与夏之栩、杨子烈等人在武昌黄土坡成立妇女读书会，这是湖北省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妇女革命团体。



刘子通（1885—1924）

1922年初，刘子通在课堂上着重宣讲妇女命运、妇女应该自我解放等话题。有些女生受其影响，便要求父母解除自己的包办婚约。有些家长质问校方：为什么向学生灌输“解放”、“婚姻自主”等观点？王式玉便与湖北省教育厅串通，以刘子通曾于1921年11月在《武汉星期评论》上连续发表抨击封建教育制度的文章为借口，于1922年2月解聘了他。

这件事顿时激起女师学生的公愤。在徐全直、夏之栩、李文宜等人带领下，女师学生包围了校长办公室，坚决反对

解聘刘子通，为此不惜罢课。老练狡诈的王式玉表示，愿意罢课的学生必须签名。徐全直、李文宜等人一听，感觉情况不妙。因为事发突然，之前并未提前在同学之间做好联络工作。结果，全校仅有徐全直、夏之栩、李文宜等12名学生签字罢课。校方便以签名作为学生“自动转学”的论据，要求签字学生转学。

罢课失败后，女学生们陷入了困惑。这时，陈潭秋托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告诉她们：“斗争要有策略、有计划，行动还要有步骤。”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也联系了夏之栩、徐全直、李文宜等人，邀请她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其间，陈潭秋、董必武、李汉俊等人还为女师学生补课。《武汉星期评论》出版“妇女运动号”支持女师学潮。正是基于武汉共产党的支持，女学生们才能继续坚持斗争。

为了尽快平息学潮，女师校方极力要求夏之栩、徐全直、袁溥之、庄有义等人转学。最后除袁溥之、袁震之转学外，其余5位同学仍旧返回学校，还公布了“自动转学”的真相。王式玉却勾结军阀政府，诬蔑“女师教员刘子通言行乖谬，有妨教育”，应“驱逐出境”，还挂牌开除徐全直、夏之栩、杨子烈、庄有义、陈碧兰5名学生。

在陈潭秋和董必武等共产党人的支持下，徐全直、夏之栩等人组织同学，毅然发动第二次罢课。她们质问王式玉：“为什么开除我们？”在场的同学们也高呼：“她们没有错，为什么要开除她们？”并且列举王式玉排除异己、任用私人、迫害学生等行为。王式玉表示这是政府的命令，他也没有办法。学生们又拿出纸笔要他写辞呈，在一众学生的逼迫下王式玉画了个“辞”字就走了。学生们把牌子摔在地上，又踩又踢。

湖北省教育厅得知后，又挂出了开除这五个学生的牌子。徐全直等立刻集合学生到教育厅去交涉，坚决反对开除学生，并要求撤销王式玉校长的职务。教育厅却唱了一出“空城计”。学生们在教育厅静坐两天一夜，打开所有的电灯，以示她们的行为是光明正大的，要坚决斗争到底。

董必武积极引导女师学生，鼓励她们去发动男师的学生联合起来，很快湖北男师、武汉中学等校学生响应。各校学生联合起来游行示威，喊出“打倒王式玉、反对开除学生”的口号。社会各界人士带着水果、点心等食物慰问女师学生，各报连续登载女师学生坚持斗争的消息，武汉学联也号召武汉三镇中等以上学校全体罢课，支援女师学潮。一时间，武汉学潮风起云涌，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学生运动。



女师学潮七君子：杨子烈、陈碧兰、徐全直、夏之栩、袁震之、袁溥之、庄有义



1923年春，董必武、陈潭秋请李汉俊、李廉芳、陈时、袁达三、刘觉民五人出面和教育局交涉，为女师主持正义。在社会压力下，教育厅被迫撤销了王式玉的校长职务，并且保留徐全直、夏之栩等人的学籍。但徐全直、夏之栩等5人也以提前领取毕业证书的形式，被迫离开了湖北女师。

尽管湖北女师学潮并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但是此次学潮使武汉甚至整个湖北为之震惊，极大地鼓舞了湖北妇女反抗黑暗腐朽的军阀统治，谋求自身解放。尤其重要的是，它是武汉党团第一次直接领导的青年运动，锻炼了武汉党员，培养了一批女革命者，为以后的妇女解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丁佳佳）



播火荆楚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夜
路
明
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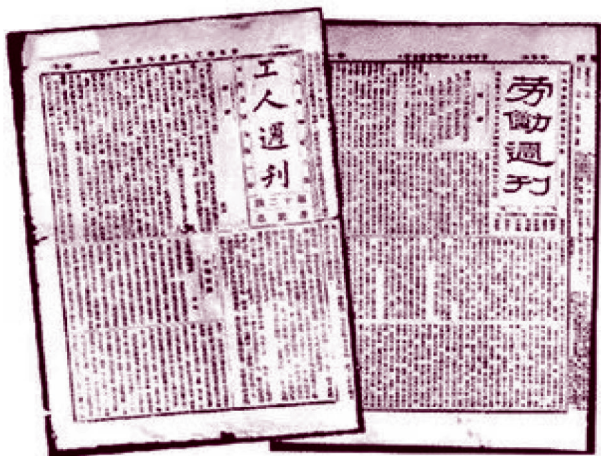
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

进入 20 世纪以后，武汉成为国内重要的工业、商业、文教中心，号称东方芝加哥。随着经济的发展，武汉产业工人的数量不断增长。据调查统计，武汉产业工人总数在 1894 年即达 23000 多人，占全国产业工人的 17%，仅次于上海。其后工人总数逐年递增，到 1919 年发展到近 20 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 10%，居全国城市第二位。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武汉工人逐步组织起来，开始了从自发到自觉的工人运动。1921 年 10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是武汉工人运动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武汉工人主要集中于铁路、机械、交通、纺织等企业，他们身受多重压迫，工作时间长，工资待遇低，工作条件恶劣。汉口湛家矶工厂的调查者这样形容工厂环境：“这不是人世间的三十六层地狱吗？”《武汉工厂纪略》则有相关记载：“汉冶萍公司包括矿工机匠等每天平均约有一人死于非命，去年一石跌下，压毙至九人之多。”《汉口苦力状况》统计，汉口共有苦力 1 万多人，仅从龙王庙到洋火厂，大约有苦力 4000 余人。他们“有力壮者终日背负，一日尚能得钱千文，余则数百文数十文不等”“饥冻相乘，死亡甚速。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夏则赤膊蓬头，冬以破袋一只覆其首，若富翁之戴风帽然。破草席一截围其身，奇形怪状，不一而足。河滩、街沿、货棚、船头，皆彼等卧室。上风露而下潮湿，一至来春，十有九病。”武汉工人的状况实在是令人同情和叹息。

面对恶劣的境遇，武汉工人渴望改变现状，因此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罢工斗争。早在 1895 年，汉阳铁政局工人就因遭受监工的鞭打举行罢工。十月革命后，武汉工人罢工斗争明显增加。1918 年 1 月至 1919 年 4 月，武汉共发生罢工斗争 13 次，几乎每月就有一次罢工斗争；不但罢工次数比以前

有明显增加，罢工规模也有明显扩大，而且罢工斗争涉及各个行业。虽然这些斗争多数以失败告终，但是武汉工人运动的序幕已经拉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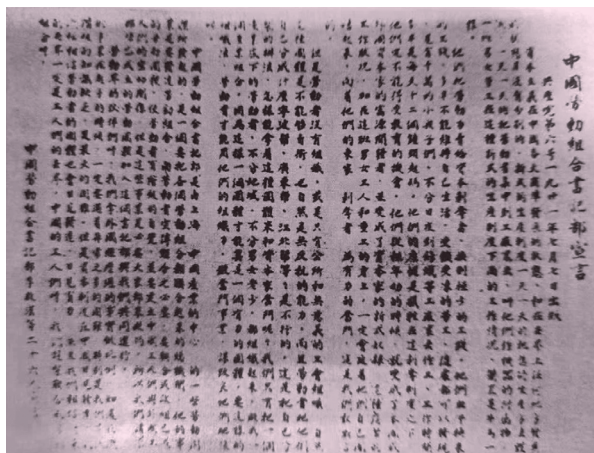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

1919年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武汉工人为了声援五四运动，普遍参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活动。5月20日，汉口各大工厂的工匠代表200多人召开会议，作出不用日货、不帮日本人做工、不用日本银行货币等五项决议。6月8日，各大工厂工人代表200多人开会决定：各行业至少组织一个十人团，负责讲解提倡国货的意义及监督不用日货。6月3日，上海工人大罢工后，武汉工人也积极酝酿举行同盟大罢工。由于武汉反动军警和厂方的严密控制，武汉工人同盟大罢工未能实现。但是，武汉工人参加的“三罢”斗争迫使政府当局释放被捕学生，并且处理制造六一惨案的凶手。

武汉工人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力量和热情，吸引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早期党组织成员的关注。他们逐步树立起“劳工神圣”的思想，主动与工人交朋友，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努力下，武汉工人的觉悟不断提高，也开始组织起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指出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提高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

人觉悟，建立产业工会组织，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工人运动开始由分散、自发的原始状态，进入一个有统一领导、有明确目标、真正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开展斗争的历史阶段。因为当时共产党不能公开进行合法的活动，开展

工作只能秘密进行，党决定成立领导开展全国工人运动的合法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成立宣言》发出了把产业工人组织起来的号召，指出：“劳动者把他们自己分成什么宁波帮、广东帮、江北帮等等是不行的。这是把自己分裂的办法，怎样能拿着这种团体和资本家奋斗呢？”“我们只有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要这样一个组织法，劳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呢。”9月，中共中央局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中央局扩大会议。会议之后，中央局下达《通告》要求各地联络工会，统计地区劳动状况。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和中央局《通告》的发布，给武汉党组织和武汉工人指明了方向。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它成立后不久，便在全国建立了党组织的城市率先筹建分部组织。如在北京建立北方分部，在武汉建立武汉分部，在长沙建立湖南分部，在广州建立广东分部，在济南建立济南分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创办了机关刊物《劳动周刊》，用以宣传指导全国的工人运动。

武汉党组织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

部。武汉党组织成员包惠僧参加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的筹备活动，许白昊作为武汉代表参加了中共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劳动周刊》在武汉设有发行处，地址就在武昌察院坡的时中书店。中共一大以后，武汉工人运动进入有组织有领导的阶段，迫切需要成立一个领导武汉工人运动的合法机关。10月，粤汉铁路武长段掀起了罢工运动，施洋、林育南同广大工人并肩作战。这场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极大增强了武汉工人的斗争信心。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条件成熟了。

1921年10月，包惠僧回到武汉。他立即和黄负生、陈潭秋等人周密筹划，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很快建立起来。机关设在武昌黄土坡27号中国共产党武汉区执行委员会机关院内，后该机关迁往武昌大堤口利群毛巾厂内。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包惠僧兼任武汉分部主任一职，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林育南继任主任。武汉党组织成立初期，党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领导工人运动。董必武、包惠僧、陈潭秋、黄负生等以及后来入党的林育南、许白昊、项德隆、林育英、李书渠、施洋等都参加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领导工人运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后，根据党的一大关于“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的决议，以及中共中央局“以全力组织全国铁路工会”，在一切部门成立工人学校的指示，先后向各行业各工厂派出党员，发展和领导工人运动。如派林育南、李书渠到徐家棚粤汉铁路，项德隆到江岸京汉铁路，许白昊到汉阳铁厂，林育英到模范大工厂，施洋、郑凯卿到人力车工人中去。他们到工厂和工人中，从办工人夜校入手，逐步发展劳动组合。由于他们的努力，武汉分部成为工人阶级作战的参谋部，深得工人的信赖。京汉铁路南端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上海）



的江岸总站是武汉分部初期的工作重点，项德隆、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等先后到这里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底，粤汉铁路机车处职工联合会、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相继成立，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挂牌。1922年初，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和徐家棚铁路工人俱乐部相继成立。其他工人俱乐部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这些为武汉工团联合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创立准备了条件。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还注重通过宣传来教育和发动工人。1922年12月，武汉分部创办了机关报《劳动周报》。《劳动周报》一方面报道国内外工人运动的消息，介绍工人斗争的经验；另一方面向工人宣传组织工会、团结斗争求解放的革命道理，以期提高工人阶级觉悟，鼓舞工人斗志。工人凌楚藩在同包惠僧对话时说：“《劳动周报》我看过几期，我也想到组织工人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做起。现在既然有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来发动组织工人，我们有了依靠了。”

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和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等在武汉有影响的工会组织都派代表出席大会。会议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工会组织原则案等议案，并决定1923年在汉口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个决定既是对武汉分部工作和武汉工人运动发展的充分肯定，也极大推动了武汉工会发展。

各厂工人的劳动组合，在团结组织工人进行斗争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后不久，李书渠就组织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进行反压迫斗争。1921年12月，汉口租界人力车夫举行罢工斗争。后来，武汉分部还组织和领导了汉阳铁厂工人罢工、汉口英美香烟厂工人和花厂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斗争。而且，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之前的罢工斗争基本都取得了胜利，武汉很快成为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中心。

（陈梦烨）

书生投身工运

五四运动中,武汉工人阶级表现出伟大的力量,他们在斗争中英勇无畏、团结奋斗,表现出反帝反封建的坚决性和彻底性,这使得武汉许多革命知识分子提高了对工人阶级的认识,走上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他们在五四运动以后,投身工人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工人斗争,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

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工人阶级的劳动生活状况,是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结合的最初形式。《新青年》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在这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1920年1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了一个社会调查表,提出向工农进行社会调查的详细项目和具体内容。2月,陈独秀来到武汉讲学,结识了文华大学校工郑凯卿等,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并要求他们深入工厂,搞工人状况的调查。

武汉的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学生积极响应《新青年》和陈独秀的号召。他们来到工人群众中,对武汉各工厂工人分布的情况和工资、工时、男女和童工的状况作了初步调查,写成了《武汉工厂调查》(梁空)、《武汉工厂纪略》(王崇植)、《汉口苦力状况》(刘云生)、《武昌五局工人状况》(文华大学学生)等调查报告,发表在《少年世界》、《新青年》等杂志上。这些报告深刻地揭露了武汉工人的苦难生活状



林育英(1897—1942)



况，激发了广大工人的觉悟。

与此同时，恽代英、唐际盛等利群书社成员，开始直接和工人接触联系。他们通过林育南结识了林育英（张浩）等一批工人骨干分子，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林育英在和他们接触中，逐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认识到工人是人类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不是什么“下等人”。1921年初，恽代英与林育英、林育南等在武昌太平试馆筹办了利群毛巾厂，由林育英担任工作委员。利群毛巾厂有工人20多人，多数是利群书社社员，实行半工半读，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文化知识，阅读进步书刊。由于利群毛巾厂的创办者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后来又成为武汉党组织成员，工人的政治觉悟高，革命性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机关后来由黄土坡27号迁到利群毛巾厂内。

武汉中共早期组织负责人包惠僧是武汉工人运动的先驱。陈独秀在武汉讲学时，要求包惠僧协助郑凯卿调查武汉工人状况。武汉中共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武汉工人运动开始进入有组织领导的阶段，革命知识分子也由分散、自发到工人群众中活动发展到组织统一领导安排。包惠僧要求武汉地区的党团员有组织地“到纱厂去，到铁路去，到码头上去”，根据统一安排，郑凯卿负责联络纱厂工人和人力车工人，赵子健联络铁路工人，包惠僧对汉口谌家矶扬子机器厂进行调查。包惠僧在通过自己的调查，结合上述调查报告，撰写了《我对于武汉劳动界的调查和感想》，后来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文章通过工厂与工人、工作与工资、工人的嗜好、工人的道德、革新的办法等几个方面的状况，说明武汉工人生活“有十二分的痛苦”。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劳动条件非常恶劣，“劳动界的死亡率，特别的高”；工人工作时间“每日增至十八个小时之多”；工资待遇低，“每月不过四元左右”；同时工人还存在着许多不良的习惯和不好的品德。他提出通过劳工教育、劳动组合、劳工俱乐部来提高工人觉悟，号召广大工人“快快团结起来，推翻资本制度，实现人类的幸福”。这些调查报告，表明革命知识分子到劳动场所接近工人群众获得的初步成绩。

1921年10月，包惠僧回到武汉。随后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武汉区委执行委员会，同时，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作为公开活动的合法组织。这两个组织，实际上是一套人马，包惠僧分别担任书记和主任。包惠僧与陈潭秋、黄负生商定，武汉区委的工作除发展党的组织以外，应将重点放在发动组织工人运动上。大家把主攻方向定在徐家棚，并决定从创办工人夜校入手。不久，徐家棚工人补习夜校开学，党组织在这里发起成立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包惠僧为此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一般隔天去一趟，至少也是一个星期去一次。

后来，包惠僧又领导了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同盟罢工，并取得了胜利。然后，他着手开辟京汉铁路工人工作。他首先促成江岸铁路工人的团结合作，成立了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他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席俱乐部成立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重点介绍了全国各地工人组织工会的情况。在包惠僧等人的努力下，武汉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起来，20多个工团相继成立。

包惠僧还注意与全国各地的党组织负责人和工人运动领导者保持联系。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后不久，中共湖南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沙分部主任毛泽东来到武汉。包惠僧给毛泽东介绍京汉铁路和武汉工人运动的情况，毛泽东也向他介绍湖南工人运动情况。毛泽东说，劳工运动要采取产业联合的方式，京汉铁路工人与粤汉铁路工人必须密切联合。

武汉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者、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陈潭秋也是武汉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和领导者。早在武汉党组织成立之前，陈潭秋就以记者身份经常深入工厂，调查



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长沙分部主任的毛泽东



工人疾苦，组织工人识字班，进行革命宣传。在创建武汉党组织时期，董必武和陈潭秋在武汉发起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组织读书会，要求读书会成员深入劳苦工人中去，了解工人，结合工人的生活状况理解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共一大后，陈潭秋担任中共武汉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积极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10月中旬领导了粤汉铁路徐家棚机车处工人的一次罢工，为后来党在武汉铁路工人中的活动打下良好的基础。包惠僧回武汉后，陈潭秋积极向他介绍武汉工人运动情况，提议将工作的重点放在铁路工人多且集中的江岸。由于陈潭秋的积极配合和支持，包惠僧很快在武汉工人中打开局面。

包惠僧和陈潭秋注意挑选和培养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培养工人骨干。项德隆、林祥谦都是他和陈潭秋等人发现和培养起来的工人领袖和带头人。项德隆原是武昌模范大成厂工人，因坚持学习，粗通文墨，受到《劳动周刊》等进步书刊影响，觉悟不断提高，被小学同学李书渠介绍，参加筹备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工作。在包惠僧的指导和培养下，项德隆迅速成长。1922年4月，经董必武、李书渠介绍，项德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武汉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林祥谦是江岸机器厂的青年工人，有正义感，



项德隆（1898—1941）

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当陈潭秋从项德隆的汇报中了解了林祥谦的情况后，便多次找林祥谦促膝谈心，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很快把他引导到革命道路上来。1922年1月，在林祥谦、项德隆等工人领袖的带动和组织下，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在刘家庙正式成立，林祥谦被选为俱乐部五干事之一，项德隆任秘书干事。同年秋，江岸京汉工人俱乐部改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林祥谦被选为分会委员长。

武汉工人运动的发展，除了武汉早

期党组织领导人包惠僧、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发动和努力之外，还有一批进步青年、革命知识分子也起了重要作用。林育南、施洋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五四运动以后，林育南和恽代英等人一起，先后创办共存社和利群毛巾厂，积极到工人、农民、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得知中共成立的消息后，共存社主动停止活动，林育南积极联系武汉党组织。武汉党组织派他参加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工作，协助包惠僧到徐家棚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人运动。林育南深入工人住区，了解工人状况，关心工人疾苦，宣传革命道理，很快得到工人信任。他和施洋、李书渠等人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夜校，提高工人觉悟，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很快组织起来。随后，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和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罢工，林育南都起到了发动和领导作用。林育南在工人运动中也不断成长，1922年初，林育南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林育南成为武汉和全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

由于出身、经历和职业的关系，施洋较早关注工农运动，林育南称施洋“在湖北做劳工运动，是开始的第一人”。施洋出身贫寒，了解民众疾苦，在担任律师以后，经常与劳动人民接触，对于工人凡是关于法律上的事务，他总是想方设法加以解决，不收取任何报酬。1920年，施洋创办平民教育社和平民教育学校后，与工人联系更多。他经常深入汉口租界人力车夫中，详细探问工人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情况，向工人宣讲“劳工神圣”、“劳工解放”，启发他们的觉悟。他很快与工人建立了感情，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后，施洋立即参加工作，开始投入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人运动。在随后爆发的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人罢工斗争中，施洋受工人代表的委托起草了《罢工宣言》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书》等传单，并一再深入工人当中，进行宣传、鼓动、指导，最后运动取得了胜利。在施洋、林育南指导下，武汉第一个工会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宣告成立，施洋被聘为工会的最高顾问和对外代表。后来，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人俱乐部和其他一些俱乐部、工会也都聘请施洋为法律顾问。施洋身兼多职，日理万机，但是工作任劳任怨，一丝不苟。凡是工会法律上的事务都由他负责，工会的文



告通电也由他起草。由于施洋与工人患难与共，呼吸相通，得到了工人广泛拥护与尊敬，工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劳工律师”。1922年6月，经许白昊、项德隆介绍，施洋加入中国共产党。施洋入党以后，“对于劳动运动，更为猛烈精进”。

（王俊茹）



播火荆楚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他山之石



包惠僧初识施洋

1921年10月，28岁的包惠僧受党的派遣回到了武汉。到汉后，包惠僧便投入到武汉地区的革命工作中。有一天，陈潭秋告诉他，不久前，工委领导了粤汉铁路徐家棚机车处工人进行了一次罢工，并取得了胜利。

陈潭秋的话，让包惠僧陷入了深深的回忆。3个月前的中共一大会议上，与会代表强调的不就是要加强党对工会的政治领导嘛！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因为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应逐渐地变为工人组织的中心，否则就失去意义”，“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各地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正纷纷成立工人补习学校。

鉴于党的工作方针和徐家棚车站有工作基础，陈潭秋和包惠僧两人商议把发展工人运动的主攻方向定在此处，并决定从办工人夜校入手。

徐家棚车站位于武昌武胜门外，是广州到武昌的粤汉铁路终点。早年，这里是一片菜园和河沟地，自清末武昌修筑大堤口至青山长江大堤后，这里才开始有人结庐居住，并形成了棚户区。1912年，随着粤汉铁路武昌到长沙段的勘测，这里才显现出一片繁忙的场面。在历经7年的修筑后，1918年9月，全长480余公里的铁路线实现通车，徐家棚车站也正式投入使用。

可筹备工人夜校需要场地啊！就在陈潭秋在车站附近四处寻找时，他发现了一栋空着的小楼。性急之中，他向附近的居民打听小楼的主人，才知道这是施洋2年前为办平民教育修建的，一直空着没有用。

听说房主是施洋，陈潭秋和包惠僧都有些意外。因为他们与这个湖北竹山人打过交道。施洋曾在武昌就读湖北警察学校。期满后，又考入湖北

私立法政学校学法律。1917年，以甲等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他赴京参加文官考试，本有机会步入仕途，但他却以律师的雄辩力，在试卷中批评时政，宣传革命思想，终为当局难容。多方求索的施洋，最后又回到律师行业。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他认为斗争不彻底，是“驱去一虎（王占元），又来二狼（吴佩孚、萧耀南）。他曾经对吴佩孚抱有很大的希望，后来才知道吴佩孚也是一丘之貉。因此，他总结了一个教训：没有民众的基础，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当武汉工人运动开始兴起，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播时，施洋的活动便由上层社会转向下层社会，从事劳工运动。而他的收入大都用来保障人权，伸张公理，广大平民都称他为“劳工律师”。

五四运动爆发后，武昌学生支持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举行示威游行和罢课，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施洋一面将被军阀惨杀的学生送法庭检验，一面向律师公会建议提起公诉，要求严惩凶手，并于6月12日组织商民罢市。在大智门外举行的追悼京汉两地捐躯学生的大会上，施洋代表武汉18团体宣读祭文，泪随声堕，引发全场痛哭。他还动员夫人郭秀兰和三弟施季高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投身斗争洪流。随后，又作为湖北各界联合会副会长与天津、上海、济南等地代表郭隆真、张静庐等30人一起赴京请愿，被捕入狱。出狱后，发起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被推为联合会评议部长，并主持全国各界联合会评议会。

1920年4月4日，施洋倡导并创建了“湖北平民教育社”，与恽代英、黄负生等人创办了“以改进湖北教育及社会为宗旨”的《武汉星期评论》、《平民教育》杂志等。他心系平民，主动联系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为他们奔走效力，仗义执言。遇有经济困难者求助，他不但不要丝毫报酬，反而会接济求助者。



施洋（1889—1923）



施洋虽是性情豪迈，才气纵横，但陈潭秋和包惠僧也晓得他的脾气，“好与人论是非曲直，侃侃而谈，有旁若无人之感。”

为了能租借到这栋小楼，包惠僧和陈潭秋过江来到了汉口施洋律师事务所。对于他们的到访，施洋并不感到意外。在两人说明来意后，他就爽快地答应把房子借给他们。紧接着，他又与包惠僧和陈潭秋一道过江到徐家棚，把管房子的人叫来，将房子点交清楚。他什么条件也没提，只说如果学校成立董事会算他一个董事。对于这样一个“挂虚名”的要求，包惠僧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

校舍问题解决了，徐家棚工人补习学校自然也在短时间内开学了。夜晚，学校开设的是工人补习班，白天，则开设工人子弟班。陈潭秋和他的八弟陈荫林轮流教英文，李书渠和孙瑞贤教国语和算术。他们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浅显易懂，在向工人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劳工神圣等革命道路，启发工人阶级觉悟，引导大家团结起来，投身到推动社会进步的滚滚洪流中去。

如同黑夜中出现的一点亮光，补习学校的开办吸引了徐家棚总段机务厂里的大部分铁路员工。他们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彼此之间的工友之情也在联络中不断加升。不久，这里便成为了党组织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重要阵地和联系工人的纽带。

徐家棚的工作据点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可包惠僧想，粤汉铁路目前只通车到长沙，车站规模很小，工人不多。一江之隔的京汉铁路线路长，工人多，规模宏大。作为全路三个枢纽总段之一的江岸段，还开设有机务厂，车务厂以及工务、电务等机构。武汉党组织应该把京汉铁路工人作为主要工作对象。

包惠僧把这个想法告诉陈潭秋、黄负生，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大家也认为京汉铁路是中国南北交通干线，与北方的京奉、京绥、津浦、正太、陇海各路有联运的关系。它不仅在经济上很重要，在政治和军事上也很重要。也正是这个原因，北京政府一贯是把京汉铁路视为自己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命脉，其所委任的历届主管交通大员也都对京汉铁路抓得很紧。

但自从 1920 年 9 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千里铁路线上北段的铁路工人过去忍受压迫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邓中夏的领导下，北京长辛店总段在 1921 年元旦成立了以“邮传部卢保铁路工厂”工人为主导的工人劳动补习学校，以唤醒工人大众，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向资本家及反动统治者进行斗争的工人运动在京汉铁路北段搞得有声有色。

可如何接近京汉铁路南段江岸站的工人呢？

（徐志刚）



郑州之行

正当包惠僧苦苦思索如何组织京汉铁路工人时，1921年11月下旬，他接到了中央的一封电报。电报上说是陇海铁路发生罢工，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和北京分部的同志迅速赶到开封，会同指导这次罢工。于是，他星夜启程北上。

陇海铁路是横贯中国东西的一条铁路，它最初修建的是开封至洛阳段，始称汴洛铁路。1913年，陇海铁路开始向东边的徐州、西边的陕县扩展。因修路时向比利时、法国借款，为了利用铁路运营的利润清偿，比利时、法国派了大量的行政、技术、财会等高级管理人员，控制着陇海铁路沿线的各大站和整个铁路的运营业务。同时，以北京政府的梁士诒、郑洪年、叶公绰为首的交通系政府官僚集团利用它们的特殊地位，将其爪牙遍布全路，伺机破坏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而坐镇河南洛阳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利用重兵，也对陇海路进行严密控制。尽管这三股势力都存在各自的利益，相互之间明争暗斗，矛盾重重，但在政治、经济上压榨、盘剥铁路工人方面，却是完全一致。经济上，陇海铁路是外国资本家和军阀当局掠夺财富的命脉，因而，他们千方百计地榨取工人的血汗。政治上，工人毫无民主权利和自由可言，组织工会和罢工都视为非法。外国资本家和军阀当局对铁路工人甚至实行残酷的军事高压管理，工人随时都有被驱使、禁锢、打骂、开除的可能，没有丝毫的人格保障。尤其是1921年2月，法国人若里任陇海路总管以后，对工人的虐待克扣尤甚。在其任职的半年时间里，就在全路开除75人，扣发68人工资，并要在全路裁人减薪。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这种残酷的压迫剥削，促使铁路工人心中蕴藏着极大的民族仇恨和阶级仇恨，反抗情绪十分强烈，最终因徐州八

号门事件而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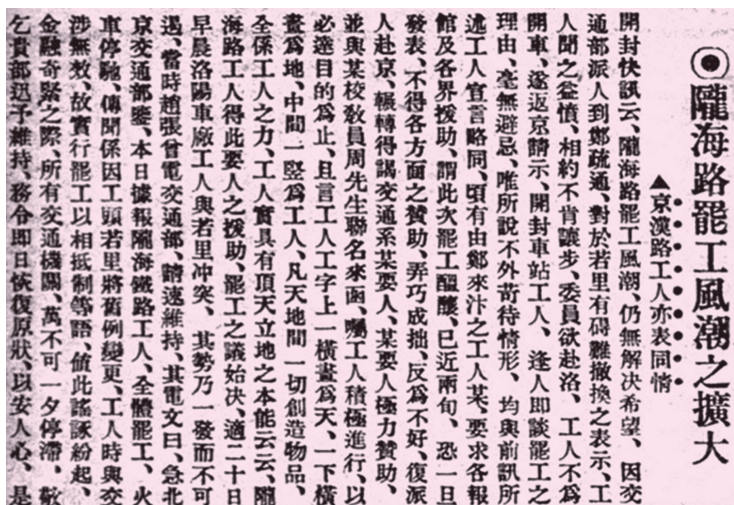
1921年11月8日下午，徐州铜山车站工人下班，八号门前门卫禁止工人出站，说票车到了，还以洋人的名义威胁要开门的工人。工人强行挤开八号门，外方借此诬称工团聚众闹事。工团随即联络开封、郑州、洛阳站组织工人进行斗争，要求赶走若里，要求增加工资。在先上书力争无效的情况下，11月20日下午3时，陇海铁路全线统一大罢工，从而陷入瘫痪。

陇海路工人罢工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共北京区委当晚在李大钊主持下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派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文虎（罗章龙）前去指导罢工运动。文虎拟定了“坚持罢工，争取胜利”的斗争方案。之后，文虎由罢工委员会成员王福顺陪同前往开封，动员老君会全力支持陇海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并获得成功。

中共北京区委会议后，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立即下达紧急动员令，号召京汉、粤汉、津浦、京绥、京奉、正太等铁路工人积极援助陇海路工人的罢工斗争。20至23日，京汉路长辛店工人连续召开秘密会议，讨论援助办法，作出三条决定：（1）写信给洛阳陇海路工人，要其坚持到底，并准备在经济等方面给予援助；（2）写信给陇海路驻京办事处，促其早日解决问题，否则京汉路工人将与陇海路工人一致行动，做他们的后援；（3）写信给郑州京汉路工人，坚决防止调遣路工到陇海路的阴谋。各地社团工会组织也声明表示支持罢工。

面对资本家和军阀的高压、威胁，陇海路工人威武不屈、众志成城，决心不达目的誓不上工。经过7天的艰苦斗争后，11月26日晚，工人代表用密码电报向沿线各厂发出复工命令，陇海路工人部分开始进厂上班。27日早晨，一顶书有“劳胜会”（劳动者同资本家斗争取得胜利）的旗帜从开封狂欢的人群中发出，罢工最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等包惠僧风尘仆仆地赶到开封的时候，这里已经复工一天了。看到罢工这种结局，他很高兴，心想：既然罢工结束了，我就算来庆祝罢工胜利的吧。



1921年11月30日,《新闻报》报道陇海路工人罢工风潮

位于豫东的开封，古称汴梁，是一座有着 2700 余年历史的古都。城中的大相国寺、繁塔、龙亭等名胜古迹，历来是外地人到汴的必游之地。但包惠僧并无心思赏景，他住进了开封城内的陇海铁路员工俱乐部里，打算做些工人运动的工作。

然而这个陇海铁路员工俱乐部并不是工人的组织，接待包惠僧的居然大部分是铁路各机器厂和机务段的工头。他们端出黄河鲤鱼、清汤东坡肉等开封名菜来招待，让包惠僧等颇感为难。可又一想既然到了这里，又得到热情招待，就见机行事吧。包惠僧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和任务向工头们作了一些宣传，当他谈到劳动组合的方式方法问题时，工头们很感兴趣，但一说到“工人集会结社自由”等问题和“劳工神圣”的说法时，工头们没有一个认同。在与这些人的交谈中，有一个姓金的工头引起了包惠僧的注意，这个人八面玲珑，能说会道，自称对全国各铁路的情况相当熟悉。

顺着他的答话，包惠僧同他谈起京汉铁路，问他有没有些关系。

他说京汉铁路各方面的人，他都认得。

包惠僧心里突然一亮，管他是真是假，试试何妨？于是，包惠僧便打着记者的旗号对他说：“我了解京汉铁路的情况，准备给《劳动周刊》

写点文章，请你介绍一两个在京汉铁路上工作的朋友好吗？最好是工人。我想研究铁路工人的生活情况。”

没想到此人却不推辞，一口答应下来。一会儿功夫，他就给包惠僧送来两封信：一封给郑州机务厂的工匠凌楚藩，一封给郑州车务处的一个公务员。

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面对这意外收获，包惠僧当即启程，西去距开封 70 余里的郑州。

黄河之滨的郑州，城市规模并不大，它最初只是一座名为“郑县”的小城。20 世纪初，由于平汉和陇海铁路在郑州交会，南来北往的车流、人流、物流使得它一跃成为了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算得上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

到达郑州的当天，包惠僧找到了在扶轮学校教书的赵子健。这扶轮学校是铁路局创办的，以中小学教育为主，专收铁路员工子弟，实行免费教育。26 岁的湖北红安人赵子健原是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之一，1921 年 3 月受武汉党组织的派遣来到郑州铁路职工学校任教。他以教书为名，从事工人运动，传播马列主义。这年 6 月，转到新成立的郑州扶轮学校任教的赵子健组建了郑州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在他的领导下，郑州的工人运动也是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铁路夜校的学员高斌、王宗培、凌楚藩、姜海士、张士汉等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一批先进分子。

金工头的介绍信通过赵子健转给了凌楚藩，并约定晚上 8 点左右来赵子健家见面。

寒夜里的郑州大街小巷，一片寂静。8 点刚过，赵子健的房门便响起了清脆的敲门声。开门一看，客人到了。包惠僧忙起身上前，紧紧握住凌楚藩的双手，双方都露出了激动的神情。

对凌楚藩来说，他一个普通的工人，受到一位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的专访，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看重，心中有着说不出的兴奋。

他们先谈了点陇海铁路罢工的情况。后来，包惠僧才问到京汉铁路工人的情形及他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凌楚藩说：“铁路工人工资很低，多数工人的日工资只有三四角钱，



最低者不过一角，而工作时间却大都在 10 至 12 小时，最长的达十六七个小时，大多数工人难以养家，而且还要时时遭受洋人及其走狗的无理克扣……”

从凌楚藩的谈话中，包惠僧对他个人的情况也掌握了个大概。中学肄业，18 岁当兵，20 岁当连长，那个姓金的工头就是他在军队里的同事。后脱离了军队，在汉口江岸机务厂当了 2 年练习生，被提升为工匠，而后调到郑州工作。

听了凌楚藩自我介绍，包惠僧就对他说：“工人是世界上最受压迫的人，也是创造世界的人。工人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可以改变人类的历史命运。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是工人搞起来的。现在世界各国的工人正在组织活动中，中国也不应该例外，所以我们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劳动周刊》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我们的任务：第一，调查各地各种各样工人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第二，宣传鼓动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普遍发动组织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补习学校。第三，把工人组织起来，由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补习学校发展到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工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团体，也就是保障工人权利的组织。世界各国的工人都是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我们这次来访问您的目的是想了解京汉铁路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二是想同您商量如何才能把京汉铁路工人组织起来，很想听听您的意见。”

或许是这掷地有声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凌楚藩，他越听越兴奋，不禁站了起来，激动地对包惠僧说：“先生，这对我是一件很新鲜的事，也是我们工人的一件大事，我同意您的意见。《劳动周刊》我看过几期，我也想到组织工人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做起，现在既然有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来发动组织工人，我们就有了依靠了。我想就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方式方法，把京汉铁路工人组织起来。我愿意在组织工人的活动中，贡献我的力量。你看我能干什么呢？”

“我们先把郑州这一段的工人组织起来，怎么样？”包惠僧见对方如此积极热情，说出了自己的设想。

“我们还可以把江岸总段的工人组织起来。”凌楚藩说道。

把江岸总段的工人组织起来，正是包惠僧日夜所思的难题。当听到凌楚藩这么说，于是他趁热打铁，向凌楚藩询问道：“江岸方面的工人，你认识的或有交往的有多少人？”

“我有个拜把子的兄弟在江岸做翻砂匠，还有不少的朋友。不管是福建帮、安徽帮、湖北帮，我同他们的关系都还不错。因为我是个湖南人，是一个超乎帮口以外的人，所以我在江岸方面的人缘很好，我对这方面还有些办法。”

两人相谈甚欢。时间也在一分一秒中悄然流逝。看看怀表，指针已指向了11点半。为了不影响凌楚藩次日上工，包惠僧和他商议明天夜晚再商谈一次。

第二天下午7点多钟，凌楚藩如约而至，并带来了他的同伴——同是京汉铁路工人的王宗培和刘文松。4人就京汉铁路工人组织促膝长谈。最后，他们达成一致，以郑州、江岸两个总段为工作据点，郑州方面由凌楚藩负责，江岸方面由包惠僧出面联系。

面对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收获，包惠僧很是愉快。事不宜迟，第三日上午10点，包惠僧乘车南下。凌楚藩和王宗培到车站送行，并带来了写给江岸几位朋友的信。

上车后，凌楚藩在车上找来一个加油工人。他告诉包惠僧，车到江岸是黄昏时分，刘家庙小巷多，又没路灯，夜晚找人很困难。他要那个加油工人把包惠僧送到目的地。

安顿好包惠僧后，凌楚藩和王宗培走下车厢，他俩站在车窗外，又反复叮嘱包惠僧到江岸后要注意的事。列车开动了，他俩同包惠僧在窗口紧紧握手道别，像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包惠僧感到一股暖流从双手流遍全身，眼圈都有点湿润了。

列车开出车站，那个加油工人来到车厢和包惠僧攀谈起来。他叫田福生，福建人，在京汉铁路工作了3年多，家就住在刘家庙。他讲了很多关于江岸各厂各处的情况，包惠僧感到特别新鲜。从田福生的谈话中，包惠僧又



了解到一些各帮不和睦的情况，他不禁生出几分担心。

包惠僧的担心并不多余。早在上海工作期间，他曾到过一些工厂调查，因为帮口的原因，感觉接近工人难。在实践工作中，他摸索着要解决这类问题，就要先找出各工厂的各帮会领袖人物，同他们交朋友，讲义气，先调和帮口与帮口的冲突，再进行“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阶级教育。

毕竟是工作时间，田福生没有同包惠僧多谈，几分钟后，他到车厢前头去干活了。而此时的包惠僧凝望着窗外迎面扑来的景物，若有所思，不晓得上海的那一套办法在江岸那边行不行得通？

（徐志刚）

这一炮算是打响了

当天下午6点多钟，列车到达江岸。江岸站是京汉铁路南段的一个车站，1897年7月，伴随着汉口玉带门至黄陂滠口段长23.5公里的京汉铁路开工，江岸站成为汉口历史上第一座火车站。

这座有500米长的站台和7股车道的车站建成不久，清政府因其紧邻长江岸边而命名为江岸车站，但居住于此的老百姓并不接受，他们喜欢将它叫作刘家庙车站。

关于这“刘家庙”之名，据说还颇有来头。相传此地清末时有王、黄、陈、刘四大姓家族，为了祭祀的需要，按家族人头集资修建了一座占地面积为200平方米的宗祠。庙成之后，为取祠名，四大家族颇多争议，一直无法定夺。然而刘姓以人多势大之威，将其称之为“刘家庙”，“刘家庙”从此叫开。

冬日的夜黑得早。包惠僧同田福生走出车站时，路上已是黑灯瞎火。借着微弱的月光，包惠僧在田福生的带领下，朝杨德甫家走去。路上，包惠僧朝车站附近的住宅望了望，简陋的板皮棚户房一溜排开，黑暗中看不出任何动静。只有几户正在烧饭的人家飘出呛人的炊烟，露出那么点细微的光亮，才给这寒冷的冬夜增添一丝



京汉铁路江岸机厂旧影



温暖。

杨德甫住在棚户区里，他是江岸机厂的翻砂匠，凌楚藩的把兄弟。他所在的江岸机厂也诞生于卢汉铁路的修建。1901年，获取卢汉铁路筑路权的比利时为供修理机车车辆之用，决定在卢汉铁路两端的长辛店和江岸各建一个工厂，而法国则获得了部分建厂和管理权。经过勘察，汉口刘家庙一段被选为厂址。2个月后，他们建成了一座总面积为500平方米的砖墙、瓦顶、泥巴地的简陋厂房，并挂出了“京汉铁路江岸机厂”的招牌。随着卢汉铁路的贯通并延伸成为京汉铁路，到1919年，江岸机厂已发展成为拥有工人500余名、大型厂房8个、设备100多台、总面积达11000余平方米、年修理机车36辆、客车300辆的大型铁路机车厂。

到了杨德甫家，田福生把双方作了介绍。包惠僧从怀里摸出凌楚藩的信，把它递给杨德甫，并说明了来意。杨德甫非常热情，执意要到得意楼酒家为他接风，并张罗着再去叫几个兄弟来作陪。

杨德甫的这般热情好客，自然叫包惠僧无法推辞，他只好客随主便，同杨德甫来到得意楼。

得意楼离杨德甫家不远，两层楼的店面虽不是十分奢华，但看上去还算有些档次。只因此地都是铁路工人居住，所以做的都是熟客生意。尽管酒楼的饭菜价格还算实惠，但杨德甫来此还是有回数的。一般有贵客或是好友来，他才做此安排。换作平常，他不敢有此奢望。

主客入座，点了几个下酒菜，随即畅谈起来。包惠僧谈他在开封、郑州的所见所闻，杨德甫则聊起他与凌楚藩的交往情况。

不到半个钟头，几位陪客来了。杨德甫先把包惠僧介绍给他们，然后把他们一一介绍给包惠僧。黄桂荣、姜绍基、曾玉良、张连光、黄子坚，他们都是与杨德甫拜把子的好兄弟，这几个人看上去都是30岁上下的年纪。

席间，他们举杯把盏，相互称兄道弟，但始终称杨德甫、曾玉良两人为师傅，而且对杨德甫更客气一点。这是为什么呢？事后，包惠僧了解到，杨德甫曾于1896年进汉阳兵工厂当学徒，并考入兵工学堂，半工半读。1903年公费选送日本留学，1905年9月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不久，因病回

国，回到汉阳兵工厂。后因带领工人抗议厂长刘庆恩克扣工人工资而被开除。1913年3月，杨得甫进入江岸机厂，因他工龄长，手艺好，徒弟多，又喜欢结交人，遂成为湖北帮的领头人物。他虽有点个人英雄主义，但在工人中颇有威信。

借着酒劲，杨德甫讲了包惠僧的来意，又把凌楚藩的信给大家看。

介绍信在几个人手中传了一道，大家露出了既高兴又惊讶的表情。末了，几个人都说：“好！我们应该组织起来。”

包惠僧把在郑州同凌楚藩讲的那些话又说了一遍。包惠僧的话，令大家的情绪更加高昂起来。

“是啊，咱们工人没有自由和人权。上工领牌、下工搜身，挨打受骂，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有人附和道，并随口说出了工人们中流传着的那首民谣：

成年累月做牛马，
吃喝如猪穿如柳，
军阀刀鞭沾满血，
工人何时能出头？

的确，虽然他们是铁路上小小的工人，但殊不知铁路都是他们流了许多血汗一手一足修成的。正如这年4月17日津浦铁路机务处工匠段长寿等17位工人写给《京汉、津浦、京绥、沪宁、京奉各铁路工人的信》中所说的：“要是没有咱们造的这五条铁路，中国什么事也办不了。”“要是咱们不给开车，政府还能有钱办选举么？军阀还能打仗么？商家还能运货做买卖么？北方灾民全靠有咱们的火车天天开着走，才能有点粮食接济。客人能够往来南北，也都靠咱们。所以，咱们替没良心的政府卖的力气，替大家谋的幸福，比什么人干出来都要大。”

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中，起先一直沉默的安徽帮首领黄桂荣开了腔：

“我同意把江岸的工人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我们才有力量！不过，今天到的人还不够齐全，我们要在各厂各处找出各帮负责的人商量一下。这是个大事，要大家同心协力，才搞得。”



姜绍基接着说：“要不，我们在这一两天内找几个各帮负责的人在杨师傅家里商量一下，定一个日子，然后，我们再到包先生府上去拜访，商量组织起来的办法，怎么样？”说到这里，他用目光扫视了一圈，然后对着包惠僧微笑。

他的细微举动，让包惠僧马上意识到，他们是想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是什么样的团体。于是，他爽快地答应道：“很好！下星期日我就在家里准备便饭，候诸位光临。”毕竟，这只是彼此的初次见面。

双方谈得很投机，不觉已到11点半，包惠僧要回武昌黄土坡机关，但已经不能过江了，杨德甫留客人到他家住。包惠僧怕其他帮口的兄弟不好想，就以找个旅馆随便住一宿，婉言谢绝。

听说包惠僧要去住旅馆，姜绍基死活不同意，他拉着包惠僧说：“到我宿舍去住，我和黄子坚住一间房，两人都是光杆。”

包惠僧略为考虑，想这也是一个同他们能个别谈谈的机会。于是，他接受了姜绍基的邀请。他思考着如何进一步了解他们各帮之间的矛盾，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

从得意楼下来，大家把包惠僧送到姜绍基的宿舍，又坐了一会儿，才握手道别。

送走众人以后，包惠僧又同姜绍基、黄子坚谈起各帮的情况和工人的生活工作情况，很晚才睡觉。

次日清晨6点，姜绍基和黄子坚进厂上班，包惠僧也动身过江。

不到8点，包惠僧已赶回了黄土坡27号。他的出现，令大家有些意外。众人迎上来，问长问短。

黄负生说：“你出门一星期多了，也没来信，我们还怕你在陇海路上出了危险咧！”

包惠僧便把这一星期的活动情况给大家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大家听了都很高兴。陈潭秋笑着说：“这一炮算轰开一条路了！”

3天后便是星期日。上午8点到10点，包惠僧主持了例行的区委和分

部工作汇报会。会议结束后，包惠僧和陈潭秋、黄负生、李汉俊没有离开，准备接待京汉铁路江岸总段来访的工人。

约摸 11 点的光景，他们盼望的客人来了。除了那天晚上陪包惠僧吃饭的几个外，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人。此人看上去 30 多岁，身材虽是不高，却显得很强壮，两眼凹陷却有光芒。

杨德甫给包惠僧介绍说：“这是林师傅，我们多年的老伙伴。他的名字叫林祥谦。”

此时的林祥谦只有 29 岁，福建闽侯人，1905 年在马尾船政局办的学堂读书，一年后遭遇停学。迫于生活的重压，林祥谦随父到马尾造船厂当童工。1912 年，林祥谦在福建乡亲的帮助下离开马尾，到汉口江岸机厂当了一名钳工。由于性格和善、乐于助人，他在江岸铁路工人中很有威信，被工友们推举为福建工人同乡组织的首领。

包惠僧同林祥谦握手后，便把客人们一一介绍给陈潭秋、黄负生和李汉俊，接着又把他们一一介绍给客人们。末了，大家坐下来，谈话便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开始了。

先是主人讲。包惠僧讲了一些工人运动的理论和方法，又介绍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和方针，李汉俊简单介绍了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陈潭秋和黄负生分别讲了组织京汉铁路工人工会的意义。

接着是客人谈。他们详细介绍了江岸总段各厂各处的情况和各帮口不和睦的历史原因。这时包惠僧才知道黄桂荣和林祥谦分别是江南帮和福建帮的领袖。

针对各帮口不和睦的问题，大家都发表了一些意见，表示回去进行调和解释，还就组织工人提出了几点办



林祥谦（1892—1923）



法：（一）由今天到场的人为发起人，组织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二）各帮负责人继续征求江岸工人俱乐部的发起人。（三）由劳动组合书记部介绍若干个适当的人担任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文书和联络工作。（四）俱乐部成立以后再筹备建立京汉铁路江岸工会，并以江岸为起点向北发展，待各段各站的工人俱乐部组织相当成熟时，再进行筹建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工作。

吃过午饭，包惠僧他们又给客人们谈了一些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才握手道别，临别时约定包惠僧下星期日到刘家庙听取工作汇报。

京汉铁路工人的组织就这样开始了。考虑到江岸的工人多，地方大，每人每天得按时上班，不可能脱产搞工会工作的实际困难，杨德甫提出派一个人到江岸担任文书和联络工作。包惠僧也觉得文书和联络工作实际上就是组织工作，十分重要，便召集同志们商量了好几次，可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正在包惠僧为这事发愁的时候，他收到了一位青年工人的来信。

（徐志刚）



播火荆楚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毛
遂
自
荐



黄土坡的约谈

1921年12月隆冬时节，武汉三镇阴雨连绵，寒气袭人，泥泞遍地。这月的一个星期天，武昌粮道街一栋普通民宅内，走出一位中等个儿的青年，他身着一件皂色棉袍，头戴一顶瓜皮帽，脚穿一双钉鞋，俨然一副乡下农民的装扮。他出了院门，撑开雨伞，快步向中共武汉地委机关所在地黄土坡走去。

这个年青人就是后来著名的工运领袖、皖南事变中遇难的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当时名叫项德隆。

项德隆祖籍湖北省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舒安乡项家村。1898年5月，项德隆出生于武昌粮道街一个普通的职员家庭。

少年时期的项德隆，“读书很聪明，外表文秀，内怀大志”。项德隆12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家境迅速恶化，靠母亲纺织刺绣维持学业。1913年，15岁的项德隆从武昌私立日新学校毕业，然而成绩优秀的他却因家贫而不能升学。懂事的项德隆人穷志坚，开始寻找工作为母亲分忧，考入了武昌模范大工厂当纺织学徒工。当学徒期间，他受尽了资本家和工头的剥削和欺凌，对黑暗社会强烈不满。三年出师，留厂成为一名正式的产业工人。

虽然只是个普通工人，但项德隆胸怀抱负，勤奋好学。纺织工人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年青的项德隆白天在工厂勤扒苦作，晚上回家还挤出宝贵的休息时间坚持读书，孜孜以求。在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工资很少，难以养家，甚至还要遭受资本家的歧视、剥削。生活的苦难磨砺出他求知自强的性格，社会的不公塑造了他蔑视权贵的精神，而国家的多难又激发了他救国救民的理想。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项德隆受其影响，革命意识逐渐在思想深处萌生。1919年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民主科学精神的五四运动，进一步坚定了他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执着信念。而之后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创办工人夜校，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更使项德隆开始懂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了解到工人受压迫剥削的根本原因，从而立下了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为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不懈奋斗的坚强决心。

也正是从那时起，项德隆便在自己工作的模范大工厂中，开始积极从事工人运动。1920年4月，模范大工厂的棉布行销于市场，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有增无减，一些工头也为虎作伥。愤怒的工人在项德隆的鼓动和领导下停产罢工，要求资本家开除作恶的工头，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这次罢工斗争首开武汉纺织工人反抗资本家剥削与压迫之先声，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工人的劳动条件得以改善，人格尊严得以捍卫，工头再不敢随意打骂工人了，广大工友们一吐胸中的郁结之气，反压迫、反剥削的热情如火山爆发，喷涌而出。项德隆趁势组织起全厂性的工会，维护了工人的权益。

项德隆第一次领导罢工斗争的胜利尝试，锤炼了他开展工运斗争的能力，增强了他同资本家抗争的信心与勇气，也初步展现了他发动、组织工人的才能。这时的项德隆还仅是个意气风发的弱冠青年，就已崭露头角，一显身手。年纪轻轻的他，前途可谓不可限量。然而，项德隆真正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还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

1921年的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确立“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并强调应特别注意中国工人运动问题。这就是说，建党初期以知识分子为主组成的中国共产党，要寻找和吸收中国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加入，马克思主义与产业工人相结合被正式作为党的中心任务。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10月，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武汉分部（简称武汉分部），由包惠僧兼任主任，这个组织便成为中共武汉党组织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随后，武汉分部即在武昌察院坡的时中书店建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周刊》武汉发行处。

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喉舌，《劳动周刊》站在劳动者立场，为劳动者说话，揭露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的本性，宣传劳动创造世界等马列主义原理，并指出“工人阶级要求得永久真正的幸福，唯一的出路只有不妥协，不调和，向资产阶级作战，建立我们工人阶级的国家”，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英勇战斗，因而受到广大工人的欢迎和喜爱。

《劳动周刊》把许多工人引上革命的道路，项德隆就是其中之一。对于酷爱学习、追求进步的项德隆来说，《劳动周刊》堪称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与指路明灯。一有闲暇，他就到时中书店阅读，或买回家学习，他成了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在《劳动周刊》等进步书刊的熏陶下，他的视野逐渐开阔，觉悟日益提高，他看到国弊民穷的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看到了中华民族走向光明与希望之所在。与此同时，他更深深感到作为一名青年身上所肩负的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使命。

这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罢工取得胜利。捷报传来，京汉铁路工人纷纷要求组织起来。江岸铁路工人还要求武汉分部派人领导他们。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也为了开创江岸铁路工运斗争的新局面，包惠僧和李汉俊、陈潭秋等人商议，决定尽快派人组织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俱乐部的组建需要一位堪当大任的人来承担，他不仅要有着果敢的品质、坚强的意志力、卓越的领导才干，更需拥有对革命斗争矢志不移的决心和热情。可是经过多方物色，符合要求的人选依然难以落实。

就在包惠僧苦苦寻觅之时，项德隆写来了一封信。这是由于不久前，包惠僧、施洋、林育南等人成功领导了汉口租界6000人力车工人大罢工。这次斗争唤起了工人阶级的觉醒，成为武汉第一次工运高潮的起点，“沉静的江汉，由此暴雨狂风，洪波怒涛，奔腾澎湃，激动全国，而且卷入世界的庞大的劳动巨潮之中，而与之合流并滚了”，罢工所迸发的威力使项

德隆深为之动，感触颇深。

一天，项德隆和他小时的同学李书渠谈起《劳动周刊》与汉口人力车工人的罢工运动。李书渠是中共党员，看到项德隆有志于革命，便向其介绍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包惠僧的相关情况。这对正在思考、寻求救国之路的项德隆而言，犹如久旱逢甘霖，一下子就开启了他那渴望革命的心扉。

项德隆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马上写了一封信，请李书渠转交包惠僧。信上谈及他从《劳动周刊》上获知有关工运的消息，很受启发，希望参加工会工作，并要求当面谈谈。包惠僧看了项德隆的来信，非常高兴，感到这位纺织工人“不平凡”，有着“充沛的热力和远大的抱负”，立即复信给项德隆，约请他于星期日下午到黄土坡 27 号寓所见面会谈。

因此，1921 年 12 月的这个星期日，虽然地冻天寒，冷雨嗖嗖，朔风凛冽，但项德隆依然心情欢畅，步履矫健，来到武昌黄土坡与包惠僧面谈。

项德隆来到黄土坡 27 号，这里原来是中共武汉地委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秘密机关。一位 30 来岁的妇女（黄负生夫人王纯素，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机关的生活主管）听说项德隆要找包惠僧，立即带他到楼上。等候多时的包惠僧迎出房门，项德隆拿出包惠僧的复信，略作自我介绍后，两人便一起进屋坐下。

虽说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但见到武汉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包惠僧，项德隆倒有点拘束不安起来。他告诉包惠僧：“我是湖北武昌人，我的父亲是个穷书生，死得很早，我和我妹妹是靠母亲纺织刺绣抚养长大的。我十五岁时在武昌私立日新学校毕业，因为穷，不能升学，所以考进了武昌模范大工厂当学徒，三年学徒生活中，受了不少的折磨，出师以后仍在该厂做工，……工厂的黑暗，工人的痛苦是太多了。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也有工人自己的团体，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我希望您指导我如何造就自己，如何参加工作。”

项德隆还谈到模范大工厂里的把头如何压榨工人，如何投机倒把、损人利己等事情。也许是因为内心的愁闷与惶惑长久得不到宣泄和慰藉，也许是因为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信任、可以倾诉的对象，项德隆异常激动，



说到最后连眼圈都红了。

面对眼前这个外表质朴，但神情坚毅的青年工人，包惠僧不仅刮目相看，甚至是十分赏识的。包惠僧把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任务向项德隆作了简要介绍，并请他为《劳动周刊》写稿，还送了新青年杂志社出版的《两个工人的谈话》、《苏俄的研究》、《劳动者》等书。两人这次的会谈长达两个半小时，大有意犹未尽之感，最后约定下星期日再次面谈。

到了约定时间，包惠僧刚吃完午饭，项德隆就来了。这一次，因为熟悉的缘故，项德隆一改初次见面时的拘谨，一见面就笑着对包惠僧说：“你给我的书都看完了，我每天夜晚读两个钟头的书，近两年来没有间断。”接着，项德隆详细介绍了模范大工厂工人的工作与生活情况。

包惠僧询问项德隆是否知道纱、布、丝、麻四局各厂和第一纺纱厂的情况，项德隆坦率地说：“我一直是被关在模范大工厂里，外面的情形知道得不多，不过因为自己是个工人，知道工人的心理和要求，《劳动周刊》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这都是工人的迫切要求。如何实现这个要求呢？我愿意跟着你们共同努力。”

经过第一次的谈话，项德隆已给包惠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当时包惠僧就想吸收他参加武汉分部的工作，让他去筹备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只是出于慎重起见，希望多些了解，所以一时未下决定。经过两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及认真考查，包惠僧确信项德隆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工人”，是一个可以托付重任的勇气可嘉的热血青年，便把想派他到江岸工作的计划告诉了他，请他考虑，还提出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负担他的生活费。

项德隆一听要他参加工会工作，欣喜不已，因为这正符合他一直追求的为工人争权益、谋福利的心愿。他当即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包惠僧考虑到项德隆是经过三年学徒的熟练工人，抛弃这个职业，家人可能心有不忍，于是提醒他回家与母亲商量再定。项德隆马上回答道：“选择职业，我完全有自由，我并没有把纺织工人作为终身事业来打算！”说话之间，豪迈之气溢于言表。

与包惠僧在黄土坡的两次约谈，可谓是项德隆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他由一个愤世嫉俗、向往社会变革的青年工人，逐步变成了一个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工人阶级求解放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毅然放弃了模范大工厂熟练的纺织工作，立刻前往江岸筹备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从此，项德隆全身心地投身于工人运动，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也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紧紧联系在一起。

（王钢）



项德隆安身刘家庙

江岸，顾名思义，长江之岸。从字义上看，确是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地方，江之岸边，江风习习，沙鸥翔集，杨柳依依，水天一色。中国疆域辽阔，江河众多，类似“江岸”这样的地方难以计数。可是，如果作为铁路站名及航运码头，并且因之沿用下来，成为一个固定的地域名称，还在中国近代工运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只有一个地方。

它位于汉口的东半部、长江北岸。本世纪初，卢汉（即京汉）铁路和长江航运在刘家庙长江北岸组织联运。铁路设有“江岸车站”，航运设有“江岸码头”，均取地处长江北岸之意。久而久之，“江岸”、“江岸地区”便衍变为刘家庙东部、长江北岸一带的地名。

江岸是京汉铁路南端的总站，有车站、机务段、修理厂、材料厂、车辆厂等单位。在京汉铁路中，它的地位与长辛店、郑州同等重要。因为水陆交通的便利，来这里做工的工人各省籍的都有，共计 3000 多人。这些铁



刘家庙江岸车站

路工人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政治地位之低下、遭受剥削之残酷、劳动条件之恶劣、生活境遇之悲惨都是罕见的，他们心中的怒火就只差一个火种去点燃了。

因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一开

始就把这里作为发动工人运动的重点。1921年10月，劳动组合书记部就派包惠僧到江岸开展工人运动。武汉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黄负生等都为江岸铁路工人培训过工会骨干，向他们讲解劳动组合的理论、组织工会的意义和开展工人运动的方法，以及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状况等，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对工会的认识，为筹建工人俱乐部作准备。

在军阀统治时期，工人没有结社自由，不能公开组织工会，以工人俱乐部的名义把工人组织起来是当时行之有效的办法，工人也易于接受。可以说，工人俱乐部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合法地位、避免当局干涉而采取的公开组织工人的一种策略和斗争形式。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及客观条件的成熟，武汉分部决定组建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以推动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

这天，包惠僧特别邀请江岸铁路各帮口的工人领袖杨德甫、林祥谦、黄桂荣等座谈，商议筹建工人俱乐部事宜，并且告知要派项德隆来此工作的决定，大家都表示欢迎。同时，包惠僧也找项德隆着重介绍了江岸铁路工人中的帮口关系。他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事出有因。

原来，在讲究地域和血缘关系的中国，同地同域的人们出门在外，为了联络乡谊，凝聚力量，互帮互助，大多结成行帮等组织。来自五湖四海的江岸铁路工人也不例外，产生了很多帮口，如福建帮、广东帮、安徽帮、山东帮、湖北帮等。这些为了维护各自利益而形成的帮口势力，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封闭性与排他性，容易造成地域矛盾，影响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

包惠僧将这些情况告诉项德隆，要他在今后工作中注意联系各帮的领袖人物，调和帮口的冲突，再逐渐解决帮与帮之间的矛盾。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项德隆对帮口情况也有着一定的体会与了解，他回答说：“这样的情况各工厂都有，我们在工作中注意这个问题，随时随地设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总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过了几天，包惠僧同项德隆一起来到刘家庙江岸车站，参加工人俱乐部的第二次筹备会议。包惠僧先介绍项德隆同大家见面，然后又分别向项



德隆简要介绍了杨德甫、林祥谦等各帮口的领袖。

林祥谦看到有着与之相同人生经历的项德隆立志革命时，他是满心欢喜的。他对项德隆微笑着，不等项德隆伸出手来，就抢前一步握住项德隆的手，说：“我叫林祥谦，以后你就叫我老林吧。”

接着，包惠僧又介绍了江南帮领袖黄桂荣、曾玉良等人。包惠僧说：“上次我和大家见面的时候，大家提出要劳动组合书记部介绍一个适当的人担任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文书和联络工作。我们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几个人研究了一下，认为大家的意见是对的。江岸各厂各处的工人 3000 多人，你们每天都要按时上工，没有一个专人去和大家联系，负责办理组织和登记工作是不行的。项德隆是李书渠小时候的同学，是模范大工厂的熟练纺织工人，他同意放弃自己的熟练工作，甘愿为铁路工人谋福利。”

包惠僧话音未落，大家就鼓起掌来，表示欢迎。这是项德隆从事革命工作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筹建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会议开始了，项德隆立即就位，担任会议记录。在热烈而融洽的气氛中，大家畅所欲言，献计献策，最后商定正式成立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筹备委员会，杨德甫、黄桂荣为筹备委员，林祥谦为财务干事，曾玉良为交际干事，项德隆为筹备处文书。筹备处设于江岸刘家庙。

这次会议以后不久，项德隆就离开模范大工厂，把工人俱乐部的筹备事务工作都承担起来了。从此，项德隆就安身于刘家庙，同京汉铁路的工人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王钢）

立志终身搞工运

一个血与火的年代，也必定是一个英杰辈出的年代。处于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大变革的历史时期，项德隆凭着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及对共产党的坚定信念，用一腔热血践行着他愿为工运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成为勇立时代潮头的弄潮者。

项德隆来到江岸，立即投入筹备工人俱乐部的紧张工作中。不到一个星期，项德隆就与杨德甫、林祥谦等租定江岸龙王庙作为俱乐部筹备处的办公地点，并迅速挂起了“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招牌，开始为京汉铁路工人发动、组织公开活动。

项德隆深知，只有将劳工大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形成一支强有力的队伍，才能促进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赢得自身的解放。为此，项德隆深入江岸铁路第一线，积极宣传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的《劳动法原则》，广泛讲解保障工人政治自由、提高工人工资福利、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减少工人劳动时间、保护女工和童工合法权益等主张，启发工人阶级觉悟。在江岸车站、机务段、车辆厂、修理厂、材料厂乃至工人家庭等处，都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串串的足迹。

经过项德隆的宣传工作，过着社会最低层的生活，干着最脏、最苦、最累的工作，拿着最微薄的收入，还经常挨打受气的工人们，懂得了许多平生从未听说过的革命道理，知道自己也应拥有合法的劳动权益，大家的心都被他说得滚烫滚烫的。为了表达对项德隆的感激与信任之情，工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项先生”。

在开展工运斗争期间，项德隆遇到的棘手问题之一就是帮口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深受封建行帮思想的毒害，江岸



段各个帮口之间，“因为利害冲突，常常发生矛盾，甚至械斗。被打死、打伤、打残的是工人，得利的是把持帮口的官吏、商人、资本家”。1921年8月发布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宣言》特别指出：“劳动者把你们自己分成什么宁波帮、广东帮、江北帮等等是不行的。这是把自己分裂的办法，怎样能拿着这种团体来和资本家奋斗呢？”“我们只有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因此，用阶级教育来消除帮口之间的隔阂，是开展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项德隆依照武汉分部的指示，深入各帮之间，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宣传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道理，以“消除乡土观念”，解决帮口矛盾，开展工人运动。他反复向工人群众阐明：压迫工人阶级的是资产阶级，在资本家掌握生产资料的时候，所有的工人都是处在被压迫的地位，所受的痛苦没有丝毫差别；劳动阶级要求得翻身，只有靠工人阶级精诚团结，同资产阶级斗争；把工友分成各帮各派，弄得七零八落，互相排挤，互相争斗，只能使资本家得大利，对工友是不利的。项德隆还在《劳动周刊》上发表题为《省帮与阶级》的文章，宣讲阶级团结。



《劳动周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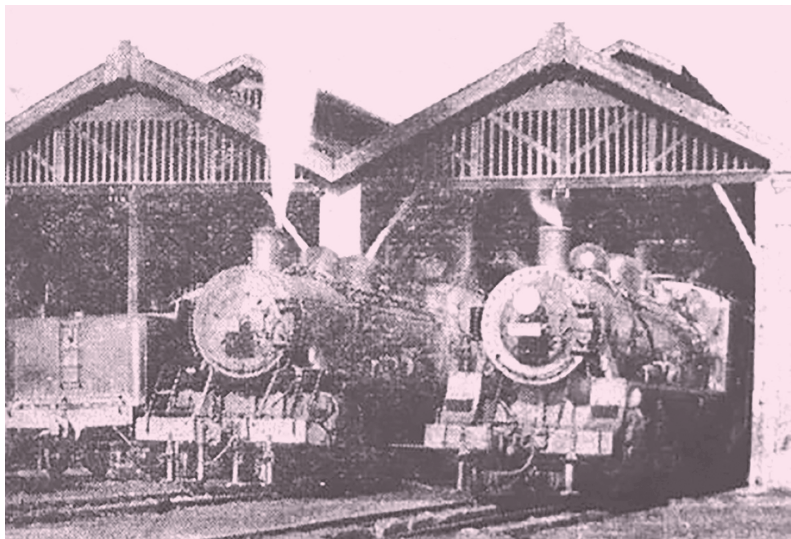
项德隆“天下工人是一家”的宣传，入情入理，如雨露春风，吹去了工人眼前的迷雾，滋润了他们的心田，大家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意见。林祥谦以前是福建帮的首领，一次他听说一位湖北籍的工人孩子有病，因交不起钱，被医院赶了出来，就把自己的棉被送给那位湖北籍的工人。那位工人不敢接，说道：“你不是福建帮的吗？”林祥谦马上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怎么还分福建人、湖北人哩。资本家、工头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从来不分什么福建人、湖北人啊。大家团结起来，捏成一个拳头，我们工人才有力量。”这说明，工人已从狭隘的帮口圈子里走出来，真正拧成了一股绳。帮与帮的矛盾得到消除，也为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项德隆与杨德甫、林祥谦、曾玉良等各帮口的工人领袖相处很好，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熟练的纺织工人，舍弃自己的职业来搞工运，“这样舍己为人的精神是很难得的”。而且因为项德隆出身工人，了解工人疾苦，工作勤恳，吃苦耐劳，能说会写，因此大家都很敬佩他，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一员。项德隆通过他们作骨干对工人进行组织和宣传，使工人们逐步了解到俱乐部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知道成立俱乐部的好处，因而要求参加工人俱乐部的人日益增多。这样，项德隆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也树立起一定的威信。

铁路工作既枯燥又劳累，如何能让工人们从乏味、繁重中走出来，寻找生活的激情，让自己在身体和心理上始终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是刚刚上任的项德隆面临的又一问题。他发挥善于创新与组织的特长，在工人俱乐部的活动上下功夫，打造出一个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的俱乐部：棋类有象棋、围棋、军棋，球类有篮球、羽毛球、乒乓球，还有戏曲演唱、演讲会……这些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寓教于乐，不仅活跃单调的工作生活，有益于身心健康，而且符合俱乐部“保证生活，增高人格，改良习惯”的宗旨，因而对工人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俱乐部成为广大工人晚上常去的场所。项德隆在开展俱乐部的活动中，还常和工人们一起下棋，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劳动状况、生活疾苦，进一步密切了同工人的关系。



知识改变工人阶级的命运，学习创造工人阶级的未来。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在那个社会大动荡的年代，项德隆能产生对社会变革的向往和追求，立下为工友谋福利的奋斗目标，多受惠于在当时董必武、陈潭秋等所创建的工人夜校的学习生活，因为他在那里学到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教育。从工人夜校中获益颇多的项德隆对工人俱乐部的夜校建设也倾注了大量热情。他白天为筹备俱乐部奔走忙碌，晚上还亲任工人夜校教员，给学员进行革命思想教育，讲工人的悲惨际遇、讲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是造成中国内忧外患和工人阶级饱受苦难的根源、讲工人斗争的历史、讲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斗争的意义。



武昌徐家棚火车站

经过项德隆等人颇有成效的工作，工人夜校不仅成为工人学习文化知识的场所、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组织工人参加工人运动的课堂，使广大工人提高了思想觉悟，懂得了被压迫的原因，从内心发出“要当家作主，不再当牛马”的呐喊，要求团结起来改变被压迫的命运的愿望更加迫切、强烈，而且起到了党组织联系工人的纽带作用，培养出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为俱乐部的正式组建储备了人才力量。

来到夜校读书的工人，尤以小工居多。在当时的产业工人中，翻砂匠、

打磨匠之类的工匠地位较高，被称为师傅，工资也较多。小工在铁路工人中人数最多、生活最苦、工时最长、地位最低，还要听候工头、工匠的差遣，稍有不慎就要挨打受骂甚至被开除，最为人所歧视，生活最无保障。工人俱乐部组织起来后，“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阶级教育在工人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小工也可以和工匠、工务员、工程师坐在一起开会、下棋、打球、唱戏，甚而称兄道弟，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工匠们对小工的团结友好及一视同仁，“是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所发生的阶级友爱”，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因而受剥削最重的小工对工人俱乐部最拥护、参加工人俱乐部最积极、办理登记手续和缴纳会费也最踊跃。工人夜校以阶级友爱的宣传教育，不遗余力地帮助小工，把小工团结在工人俱乐部的周围，组织起来成为京汉铁路工人斗争中最坚强的一支力量。

在工人俱乐部筹备处这个新的岗位上，胸怀救国救民壮志的项德隆充分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华、组织天赋与人格魅力，并以其忘我的工作精神、强烈的责任意识及对工友们的深厚情感，唤醒了无数的劳工大众、激发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促进了他们的广泛团结，同时也增强了俱乐部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不到一个月，报名参加俱乐部的人即达 1000 余众。越来越多的工人聚集到俱乐部的周围，汲取奋发前进的信心和力量。江岸工人俱乐部就像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点燃了工人阶级翻身求解放的希望。

包惠僧对项德隆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数十年后，他在《一个青年工人》一文中这样写道：“项德隆名义上担任工人俱乐部的文书，实际上是负责工人俱乐部的组织教育工作，他同工人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与工人水乳交融地团结在一起，树立了他在工作中的威信。”可以说，包惠僧平实而客观的追述，实际上代表了当时中共武汉党组织对项德隆在江岸办工人俱乐部工作的充分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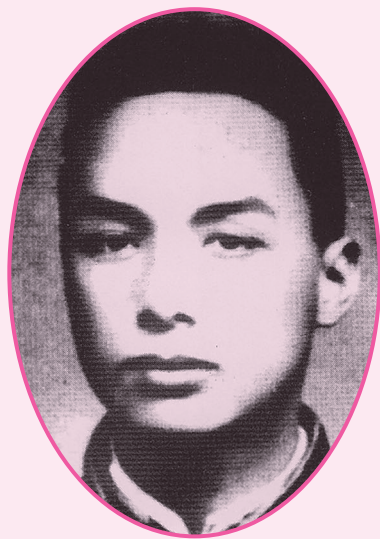
项德隆把全部的心血和汗水都洒在工人俱乐部的组建上，收获的则是广大工友的信任爱戴和武汉工运的蓬勃兴起。在之后的武汉历次工运洪流中，项德隆都留下了英勇战斗的身影和慷慨激昂的声音，很快成为深孚众望的革命者。1922 年 4 月，“接触到人生光明的一面”的项德隆，加入了



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国共产党。

这时，武汉地区的共产党员只有十多人，项德隆成为湖北省最早的产业工人出身的党员。来到京汉铁路工作后，项德隆常用“夏英”这个笔名为《劳动周刊》等报刊写稿、宣传工人运动、反映俱乐部活动情况。入党后，他将笔名中夏英的英字与自己的姓结合，正式改名为项英。从此，在近 20 年时间里，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成立以及新四军的组建等革命征程上，始终回荡着一个名字——项英。

（王钢）



播火荆楚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劳工神圣



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

1922年1月22日，经过月余筹备，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在刘家庙老君殿正式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成立大会。

这天细雨蒙蒙，冷风飕飕，道路泥泞，然而刘家庙这个人口不多的小镇却像过大年一样欢天喜地，热闹非常。江岸铁路总段各厂的工人除值班外，几乎都来了。京汉铁路郑州、信阳、驻马店、广水各站、厂的工人代表，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会，还有粤汉铁路徐家棚总站，汉口英美烟草公司等均派工人代表到会祝贺，共计900余人。包惠僧作为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代表，李汉俊作为武汉市政督办公署总工程师，也应邀出席大会。参会的还有厂长、工程师、技师、警察长及各界来宾数十人，济济一堂。

会场布置在堂皇富丽的老君殿正殿，显得气势不凡。庆祝会场正中高悬红底黑字的“劳工神圣”匾额，左右有“劳动创造世界，机器巧夺天工”的对联，格外引人注目。会场大门处扎有松柏枝的牌坊，牌坊上方挂着“庆



江岸京汉铁路工会会员证

祝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的横额。场内场外，人山人海。这样的热闹场面，可说是刘家庙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而从来为人歧视的产业工人今天则成了会场的主角，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地位与价值。

上午10时，会议主席杨德甫宣布大会开始，顿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掌声雷动。杨德甫阐述了江岸铁路工人俱

乐部筹备的经过和成立的重要意义，以及工人俱乐部的性质、任务。在台下一双双满怀期盼的眼神注视下，杨德甫高声地说：“今天是本俱乐部成立的日子。本俱乐部之成立，全是各工友努力的结果。……我们俱乐部的宗旨是：保证生活，增高人格，改良习惯。所以成立这个俱乐部，于我们大家是极有利益的。大家为大家利益计，为个人利益计，都应该好好地辅助这个团体，发展这个团体，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想必也是大家所希望的”。当他话音刚落，台下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久久未曾停歇。

在会上，包惠僧作了《新文化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报告，介绍了全国各地工人组织工会的情况；李汉俊作了《日本劳动组合的情况与中国工人组合的步骤》的报告，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争取工人的基本权利而斗争；林祥谦报告了收入会费和支出筹备费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以《谁是工人之友》为题发表演说，指出：“凡对工人运动具极大的热忱，肯为工人的利益牺牲地位，牺牲生命，不论经历什么痛苦都不退却，没有一点利用的心思，不骗工人，这种人才是工人之友”。

应邀出席大会的来宾也纷纷上台发言，有的说：“各位工友都在这里，我们有了这个团体，要好好地辅助辅助，一些不好的习惯也要改掉，我们的人格光明正大。盼望各位工友大家齐心努力，努力。”还有的说：“工人是世界上受压迫的人，也是创造世界的人，全世界工人都是一家，不应分帮分派。只有好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共同对付一切压迫我们的人。”这一声声诚挚的净言、热烈的渴望发自肺腑，实际上代表了广大工友的共同心声，表达的是对工人俱乐部的美好祝愿与殷殷期盼。

在会议过程中，杨德甫还特意邀请江岸车辆厂的法国厂长演说。这位厂长名叫杜拉克，身材不高，年约四十岁，翘胡子，红脸蛋，他满脸微笑，用不太熟练的中国话，有时还夹带着几句法语与英语，首先扼要介绍了欧洲各国的工人组合情况，其次谈到中国工人组织工会的必要性，最后对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成立表示祝贺。这些出自一厂之长的讲话，尽管并无太多新意，但在客观上表明了厂方支持俱乐部的态度，而且他提及的欧洲各国工人组织俱乐部的内容可以说对武汉工人运动的发展起到一定的



影响力。工务厂的厂长吴国梁原本是反对工人俱乐部的，但见洋厂长表态支持，也只能勉为其难，说了几句勉励的话。

黄桂荣宣读了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组织公约，他说：“俱乐部是全体工友的，大家都负有责任，盼大家都齐心协力来发展他，大家才有幸福。本部的章程，各位来宾，及新加入的部员，有许多还不知道的，现在来宣读一遍。”杨德甫提付表决，全场一致鼓掌通过，宣告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大会民主选出了俱乐部负责人：主任干事杨德甫，副主任干事黄桂荣，财务干事林祥谦，秘书干事项德隆，庶务干事周天元，交际干事曾玉良。聘请施洋任法律顾问。

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的胜利召开，使工人们欢欣鼓舞，倍感振奋，看到了工人运动的希望，对俱乐部的前景充满了信心。在热烈的气氛中，大会圆满结束，随后各界来宾进餐。吃饭时，工友们高兴地在一旁打起锣鼓、拉起胡琴、唱起京调，音调抑扬顿挫，极富感染力，简直同戏院名角差不多。《工人周报》在评述这次大会盛况时说：“今天这个会，真是叫人感佩，叫人高兴，叫人觉得有无穷的希望！各处的工友们！都赶快团结起来啊！”

是啊，谁说工人们只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只能当日复一日埋头苦干的苦力？他们缺乏的仅仅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他们与生俱来地同大多数人一样有血有肉、有情有感，而且这种因人格尊严及生存权利受到重视而生发的情感来得格外强烈、炽热而有力，它们昭示着劳工大众勇往直前的决心与众志成城的力量。

作为湖北地区第一个由产业工人组成的工会组织，成立后的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按照“保证生活、增高人格、改良习惯”的宗旨开展活动，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广大工人群众。很多工友不顾一天做工后的劳累，一下班就一头钻到俱乐部去。在这里，他们参加俱乐部组织的各项活动，聆听项德隆等人透辟入理的思想教育，交流学习革命道理的心得体会。他们的阶级意识提高了，原先一些工人沾染的赌博、酗酒和吸鸦片等不良习气得到了纠正，其家庭关系得以改善。工人家属都高兴地说：“俱乐部好，赌

钱鬼没有了，吃酒人少了！”

组织工人俱乐部，是江岸铁路工人在武汉分部领导下的一个创举。俱乐部经厂方同意，可以公开活动，能把工人组织起来，实际起到工会的作用，在关键时刻成为工人罢工斗争的指挥部。为了谋求正当的劳工权益，江岸工人俱乐部多次发动工人，坚决地同厂方进行交涉，取得了一定胜利：原来工人病假时不发工资，后来改为病假 14 天以内的仍发工资；原来工人上厕所受限制，后来赶走了厕所的看守，上厕所自由了；原来工人出厂要搜身，后来被废除了；原来工头随意罚工人的款，工人俱乐部派代表提出抗议，迫使厂方不得不取消一些罚款的规定。

这些胜利成果事关工人的切身利益，充分表明了江岸工人俱乐部是真心实意为广大工友服务的，是真正把工友们当成自己人看待的。俱乐部用真诚友善接纳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工人弟兄，有了组织的工人们也倍觉增添了与强权者抗争的力量与信心，感到俱乐部确实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是工人信得过的、能替工人说话办事的组织，都盛赞“俱乐部是工人的家”，以成为俱乐部的一员为荣。

京汉铁路郑州以南信阳、广水等站的工人运动，隶属武汉分部领导。随着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威信日隆，南段铁路工人也纷纷加入俱乐部。到 1922 年 4 月底，俱乐部部员已迅速增至 3000 多人，武汉工人组织的力量进一步壮大了。

5 月 1 日，武汉工人阶级在工运的热潮中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武昌举办了五一游艺大会，学生们涌上街头，游行演讲，散发传单。有的传单上写道：“亲爱的同胞们啊，你们不想自由吗？你们不想生活上的畅快吗？你们不想除去社会上的魔障吗？今天是五一节，看我们劳动的同胞快醒奋斗！”汉口的人力车夫则每人手持一面小旗，上面书写着：“五一劳动节，教育八点钟，工作八点钟，休息八点钟，这是我们世界工友们牺牲成功。”江岸铁路工人提前 3 小时下班，他们三三两两汇集起来，大声歌唱“劳工万岁”！这次的五一节，是武汉劳动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自由欢乐的气氛中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证明武汉的人们已经渐渐地觉悟了”。



在浓烈的节日气息里，工人俱乐部特别发布通告，改名为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南段总部。通告中大声疾呼：“我们工人的痛苦，只有自己解决的了，有几天的实力，才能得到几天的权利。我们还是大家联合起来啊！不然，我们每日作十几点钟的工作，几时得了啊！……难道我们中国工人，是生成的奴隶的根性吗？不是啊，还是我们工友受了欺骗，以为守规。工友们！大家速醒，大家联合起来，世界工人的势力扩大了，工人的世界要实现了，我们中国的工人务必也要自救，务必不要落人后啊！”整篇通告言辞切切，慷慨激昂，感染人心，喊出了中国工人阶级要求管理国家的声音，激励着工人群众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斗争意志。

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南段总部的成立，使之成为当时京汉铁路最大的工人团体，也是武汉最大的工人团体之一。工人俱乐部是由铁路产业工人组成的，在大工业的熏陶下，工人们组织纪律性好，战斗力特别强，最富于献身精神，在历次工人运动中，他们始终站在前列，充分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不畏强权、勇于斗争的优秀品质。再加上俱乐部负责人杨德甫、项德隆、林祥谦等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南段总部很快发展成为武汉最具影响力和战斗力的工人团体之一，在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工人运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王钢）

伸张正义

北京政府时期的交通系是清末民初伴随着铁路、航运、邮政、电报所谓交通四政的发展而崛起的政治派系集团，盘踞铁路多年，根深蒂固，爪牙遍布。他们对京汉铁路工人政治上的残酷压迫和经济上的野蛮掠夺，是京汉铁路阶级矛盾始终十分尖锐的重要原因。在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领导下，铁路工人精诚团结，奋起相抗，反剥削、反压迫、争人权、争自由的罢工斗争汹涌澎湃，走在了每一次全国工运高潮的前列，成为罢工斗争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1922年6月1日，江岸铁路工人黄宝成带着家属由玉带门搭空车回江岸，这时总查票程炎和护车三等巡长姜道生前来收票。黄宝成向他们解释道，自己是机厂工人，搭乘空车从来不用买票，并将厂中牌号相示，表示如果实在需要买票，可以按照旅客无票章程补票。

程炎是前京汉铁路车务处处长钱镛的干儿子，他仗着钱镛的淫威，在京汉铁路横行霸道多年，对工人欺辱凌虐习以为常。这次他不由分说，喝令警士将黄宝成用绳反捆，自己用脚猛踢黄宝成的后背，将其踢下车。警士等押着被捆绑的黄宝成，沿途拳打脚踢，将黄宝成打得遍体鳞伤，关进大智门车站警务段，又将黄宝成家属押解至江岸警所。黄宝成要同程炎去江岸工人俱乐部讲理，程炎置之不理，还嚣张地说：“什么俱乐部，我姓程的不吃那一套，老子打了，押了，看你俱乐部能把我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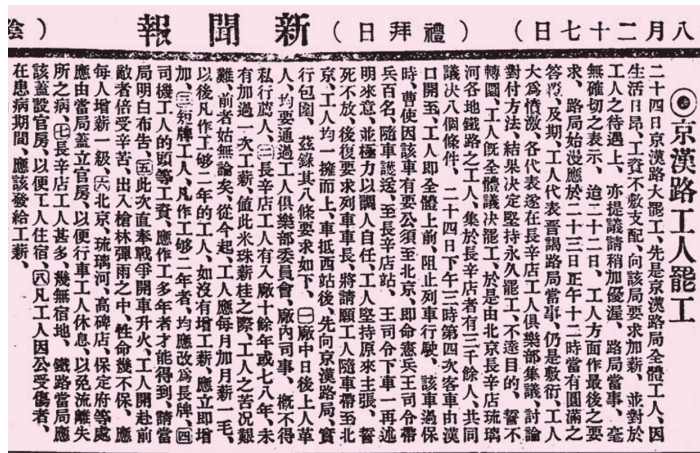
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得到这个消息，责令机厂厂长保人，实行释放。程炎、姜道生两人平日里在工人面前飞扬跋扈惯了，这次又蓄意挑起事端，激起工人们无比愤怒。项德隆也义愤填膺，认为这是资本家及其走狗向工人俱乐部的蓄意挑衅。他立即和林祥谦、曾玉良等干事商议应对办法。项



德隆认为程炎、姜道生殴打和关押工人黄宝成，是关系到工人和工人俱乐部能否存在下去的政治事件，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抗争。只有通过坚决斗争，才能打击资本家及其狗腿子的嚣张气焰，教训那些敌视、破坏工人俱乐部的坏家伙；同时，通过斗争也可以提升工人的阶级觉悟，锻炼工人的战斗力，使大家在斗争面前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凝聚、更加充满自信。项德隆的主张，得到了俱乐部骨干和广大工人的大力支持。

项德隆到黄宝成家慰问，并向黄宝成的妻子详细了解了黄宝成被打的经过。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愤，奋笔疾书，连夜起草了《京汉铁路南段工人俱乐部宣言》，揭露程炎、姜道生大打出手，惨绝人道的罪行，同时公布了两条解决办法：（1）上稟局长、处长，要求速将程姜二人革职；（2）已在夏口厅起诉，恳请依法惩办，倘或不能达这目的，我们誓不甘休，即令全体停止工作，牺牲一切，和程姜二人拼个他死我活，亦在所不惜。”宣言最后号召工友们团结一心，伸张正义，讨回公道，共驱贼子。

第二天，工人俱乐部将宣言在武汉三镇广为散发，并寄往各铁路工会，一时引起劳工大众对此事的关注。接着，项德隆又把程炎、姜道生殴打、押禁黄宝成的经过写成报道，在《汉口新闻报》上发表，用血写的事实、淋漓的真相来向社会各界揭露其暴行，争取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新闻报》报道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消息

16日，工人俱乐部见事情尚未解决，又为黄宝成受辱之事召集会议，商讨应对方法。有的工头发言说：程炎对我等如此野蛮，不仅对于工友，即使是乘客，也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会议最后决议，一面致电洛阳巡阅使吴佩孚和湖北督军、汉口镇守使萧耀南，告以利害，一面提出将程炎撤职查办；交通部另派稽查督坐客车，以便随时稽查收票员；将南段巡警一律取消；优待工人眷属，搭坐短程车免费；程炎向受辱工人及其眷属赔罪；俱乐部关于此事所用费用概由程炎赔偿等七项条件。

与此同时，江岸工人俱乐部积极进行罢工的准备。铁路工人们众志成城的力量、誓死抗争的决心，使江岸车辆厂法国厂长杜拉克大为恐慌，如坐针毡。铁路工人掌握着交通大动脉，如果举行罢工，京汉铁路运输必将瘫痪，后果不堪设想。慑于事态严重，也为了自身利益，杜拉克急忙打电话给京汉铁路南段局长冯云寻找帮助，要他答应工人俱乐部提出的全部条件。

斗争取得全面胜利。江岸工人俱乐部召开欢庆大会，有数百名工人参加。会上，南段车务处长汪奎龙秉承杜拉克和冯云的旨意，向工友们赔礼道歉，鞠躬作揖，表示答应工人俱乐部提出的全部要求。一向为非作歹、敲诈勒索的“活阎王”程炎和姜道生不得不低头哈腰，连声认罪。工人们看到这一场景，大感扬眉吐气，都欢呼起来。

京汉南段工务处段长比利时人陆登士到任以来，违背路章，虐待工人，靡耗路材，私制家具，私用厂工，窃卖路材，任意开除、处罚工人。厂长邵步云迎合洋人，趋炎附势，为虎作伥，极度仇视工人俱乐部。8月1日，邵步云竟以工人俱乐部未上锁为由，将首先加入俱乐部的三名工人开除。俱乐部得知后，即去函质问邵步云。邵步云恼羞成怒，将函件撕碎，还恶语交加，不承认俱乐部的存在，也不复函。俱乐部派代表与邵步云讲理，邵步云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恶语辱骂工人，并令厂警关闭厂门，胁迫200余工人停止工作。

为了维护工人权利，俱乐部召开紧急会议，发出通电，揭露陆登士、邵步云的罪行，提出恢复被开除工人及被迫停止工作的200余工人的工作，



给工人增加工资，驱逐陆登士、邵步云两人出境等条件。8月3日，京汉铁路江岸工务处修理厂1000余工人率先举行大罢工。5日，江岸工人俱乐部南段总部率全体工人发表宣言，要求当局三日内答应工人条件，否则全路一致行动，举行罢工。

郑州铁路工人也发来援电，痛斥“洋狗陆登士，路贼邵步云，藐视我们团体，侮辱我们人格，破坏我国路政”，号召工友们“为争我们工人人格计，我们来援助他们。尚恐力量单薄，盼望大家联合起来吧。以实力来援助，本着互助的精神，达到驱贼的目的。”

迫于铁路工人的压力，北京京汉铁路管理局急派工务处长王寿祺会同京汉铁路南段局长冯云出面调停，结果答应了工人所提的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

这次斗争不仅打击了帝国主义分子、资本家蛮横无理的嚣张气焰，也打击了厂长依仗外人势力欺压工人的威风，维护了工人的利益，大长了工人的志气，提高了工人俱乐部的号召力。面对胜利的成果，工人们深受鼓舞，都认识到了团结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感到俱乐部才是工人利益的真正保护者。工人们激动地说：“俱乐部是我们工人的家、我们工人的靠山，今后谁再敢欺负我们，就要像对‘活阎王’一样来对待他。”

事实教育了工人，只有实现全路工人的大团结，才能对敌人的威慑力更大，让工人的战斗力更强。不久，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正式改为江岸京汉铁路工会。

（王钢）

武汉工人俱乐部的发展

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正式建立，标志着武汉工人运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鼓舞了武汉乃至湖北地区的工人阶级，使他们从斗争中认识到组织工人团体的重要性。自此以后，武汉的工人对于成立自己的团体，“无不争先恐后，当作一件神圣不可稍缓的事”，工人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一时之间，武汉处处涌动着劳工大众气冲霄汉的豪情。

武昌徐家棚是武汉党组织最早从事工人运动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后，根据党的一大关于“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的决议，以及中共中央局“以全力组织全国铁路工会”，“在一切产业部门”成立工人学校的指示，于1921年10月先后派包惠僧、林育南、李书渠、施洋等在这里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对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劳工神圣等革命道理，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

在与铁路工人接触中，李书渠了解到工人工作时间长、待遇低、生活异常艰辛。1921年春，因物价上涨，所得工资无法维持生活，机车处职工与路局反复交涉，要求改善工资待遇，迫使英国总管答应每日增加2~4分钱。然而到10月，英总管竟然自食其言。在发动工人反对压迫、改善待遇而斗争时，李书渠领导成立了粤汉铁路机车处职工联合会，这也是湖北最早建立的工会组织。可惜好景不长，不久路局便利用同乡拉拢部分员工，另行组织机车研究所，达到分裂工人队伍、解散机车处职工联合会的目的。职工联合会虽然不存在了，但它为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后，影响所及，徐家棚铁路工人也要求



组建工人俱乐部。经过一段时间筹备，1922年2月26日，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举行了盛大的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会场“挂灯结彩，陈设辉煌”，极为热闹。孙叠芳主持大会，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原定的宗旨是联络感情，互相辅助，共谋幸福。大家总要抱定这个宗旨，打破从前帮口思想、自私自利的思想。我们弟兄原本是一家人，大家要相亲相爱，共谋大家的幸福，共谋这个团体的发展。”

应邀出席大会的来宾也纷纷发言，庆贺俱乐部的成立，并对工人运动的前景抱以殷切的希望。有的说：“全国的工人联合起来，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才有真正的幸福可谋。”大会最后选举李树金为主任（后由余友文担任），孙叠芳为副主任，王佐林、姚琪为干事，李书渠为秘书干事，聘请施洋担任法律顾问。尤其触动人心的是，“选举职员的时候，大家都很诚恳地推让，毫无争权的思想、地域的偏见，及至职员举出之后，各职员都有极负责的宣誓”。会后，工人们举行了游行示威，以示庆贺。

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宗旨是“联络感情，交换智识”。为了满足工人们学习、娱乐的需要，俱乐部还准备了丰富的游戏用品及书报杂志。在那个风雨激荡的岁月，受尽了生活磨难和社会歧视的铁路工人多么盼望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这在俱乐部成立之前犹如空中楼阁，难以实现。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建立后，无微不至地关心劳工大众，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劳动权益，使工友们感受到了俱乐部大家庭的关怀和温暖，增强了俱乐部的凝聚力、号召力。徐家棚各厂、站的工人纷纷加入俱乐部，使俱乐部部员迅速发展到500余人，成为武汉地区颇具规模、较有影响的工人团体之一。

江岸和徐家棚两处工人俱乐部，是在武汉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的，武汉分部自始至终参加了俱乐部的筹建，负责俱乐部日常工作的秘书干事项德隆、李书渠都是武汉分部的成员，他们分别常驻两地进行指导。

江岸铁路工人中原先存在许多帮口，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人中亦“同业人数甚众，而感情终无结合，甚至有彼疆此域之界，发生种种恶感，殊非同业乐群之道”，严重影响到工人内部的团结。在武汉党组织的组织宣传下，

在俱乐部“工人无祖国”的思想教育下，工人的帮口观念逐步淡化，认识到工人都是一家人，只有团结一心，打破分裂工人阶级的帮派组织，才有力量战胜敌人，从而使帮口问题渐渐得以消解。



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代表合影

武汉地区工人俱乐部的蓬勃发展，是工人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武汉党组织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动工人组建现代工会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和发展，表明工人中原先存在的以宗族、同乡、拜把兄弟等形式结成的封建帮派小团体现象消除殆尽。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大大提高，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大团结，迎来了武汉工人运动的新浪潮。

1922年5月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的盛会，其目的是为了总结党成立以来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进一步消除无政府主义、劳动合作主义对工人群众的影响，加强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迎接全国性的罢工高潮。出席大会的有来自12个城市的173名代表，他们代表着110多个工会和34万会员。武汉分部和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等工会都派代表出席大会。

武汉地区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引起了全国劳动界的关注，大会决定次



年五一节在汉口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一决定，给武汉工人阶级以极大鼓舞，促使武汉工人阶级的斗争浪潮更加高涨。从此，武汉地区工人罢工斗争波澜壮阔，迅速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可逼视的狂潮”。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等更在中国工运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钢）



播火荆楚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罢工潮起



小工罢工有底气

——粤汉铁路武株段工人罢工

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于 1918 年通车，并与长株段接轨通车，全长 1090 公里。由于清政府借外资修路，路权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工人倍受压迫。外国总管月薪高达 1500 元，普通工人仅 6 元左右。工人每天工作 10 小时以上，生活难得温饱。外国总管和中国监工对工人肆意辱骂、殴打、罚款、开除。特别是自英国人卡默克尔任总管后，裁减数百工人，留用的一人要做数人的工作，许多工人因过度劳累致疾甚至死亡。

林育南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人后，对铁路工人遭受的痛苦和压迫非常同情。经组织同意后，他决定在铁路系统组织一次工人



粤汉铁路起点——黄沙车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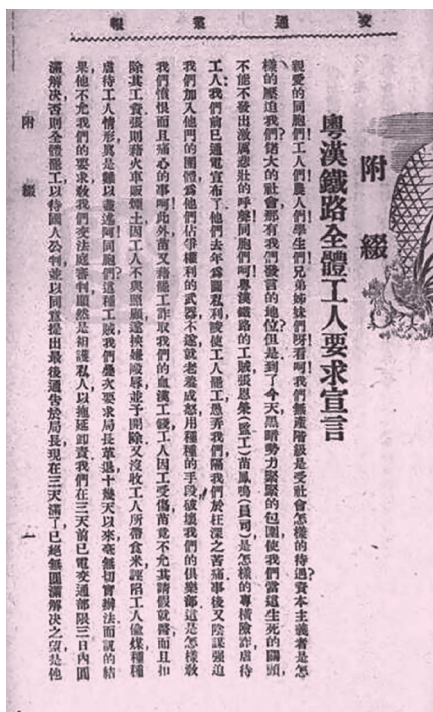
运动，为工人争取利益。他经常深入到粤汉铁路各站进行考察，还到工人家里去访问，帮助工人解决实际困难，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鼓励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与帝国主义、资本家进行坚决的斗争。

1921年9月，粤汉铁路当局与工人发生摩擦，林育南抓住这个机会，成功地组织了一次罢工运动。

事情的起因是铁路当局欺压小工。粤汉铁路武昌徐家棚机车处的小工约有390人，每日工作10个小时以上，工钱却只有2角4分。1921年4月间，工人因物价上涨，要求增加工价。洋总管卡默克尔起初并不肯答应，后来由于工人们极力要求，才允许工作6个月以上的每人每日加给工钱2分，若工作18个月以上的则每人每日加工钱4分。这是他们已经挂牌公布了，哪知道一直到9月份，工钱还是一文未加。于是各小工一同向铁路局上了一个说帖，请其照原议加钱，并在报纸上发一通告，说若不照原议加钱，宣布罢工。卡默克尔看到后大发雷霆，他心里想：这些罢工的人都是穷小子，他们不上班对铁路并无实际影响。如果不干，可以请别人。为恐吓震慑工人，他悍然宣布开除了81名小工。

粤汉铁路当局采取这一举措后，有的工人害怕了，大部分人觉得是因为自己闹事才导致这样的结果，他们说：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准备卷起铺盖，另谋生路。

林育南感觉到这些小工的想法非常不妥，组织上应该将他们组织起来与当局进行斗争，以保护他们的



《交通丛报》刊登的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宣言



合法权益。此时，徐家棚机车处的职工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已经于9月成立了粤汉铁路机车处职工联合会。林育南立即将职工联合会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开会，专门商讨如何组织小工起来斗争的问题。在会上，他对职工联合会的负责人说：“这些工人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的生活很是可怜，要求加工资也是合理的。当局给一些惩罚就消极下去，灰心丧气，这样下去，工人将永无出头之日。我们要鼓励这些小工挺起腰杆为自己的合理要求与铁路当局做斗争，但仅仅依靠他们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职工联合会应发动所有的工友们来支持、声援他们。”

经过林育南的耐心工作，全会的同仁都一致认定唯一的出路就是团结所有的工人与当局进行斗争。与会意见很快就付诸实施，他们兵分三路：一路组织工人印发传单《觉书》，并从武汉一路散发到长沙、株洲，揭露铁路当局残酷压迫、剥削工人的罪恶；一路到粤汉铁路工人当中宣传发动大家团结起来声援小工的罢工；另一路去劝说要走的小工留下来坚持斗争。

那些要走的小工见铁路工人已行动起来，便不走了。他们放下行李，投入到罢工的队伍当中去。10月11日上午，职工联合会代表全体工人向铁路当局致公函，强烈反对开除工人，提出恢复小工工作，增加小工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等15个条件，并限24小时内答复，否则机车处职工将一律罢工。

铁路当局在接到公函后，立马电告北京政府交通部。北京政府官员又恼怒又惊恐，叫嚣道：“粤汉铁路如让工人得胜，将来京汉、京奉、津浦、沪宁各路均而效尤，不是弄成全国大罢工吗？所以，宁可牺牲粤汉铁路的工人，决不可使他们做全国罢工的模范。”

林育南对北洋军阀的威吓不屑一顾。他在组织工人罢工的同时，还多次派代表找洋总管卡默克尔进行交涉，希望其满足工人的合理要求。但一向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又得到交通部及铁路当局支持的这位洋

总管完全听不进工人代表的话，不耐烦地说：“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在正当交涉无果之后，10月12日，粤汉铁路机车处全体职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领导下，愤然举行罢工，并向全国发出驱逐总管卡默克尔的檄电。檄电一出，很快得到武汉三镇各行各业工人及粤汉铁路全体员工的声援。随即，粤汉铁路武长段全线罢工，武长铁路瘫痪。

武长铁路工人罢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北京政府惊恐万分，他们害怕这股罢工浪潮会蔓延到其他省市，只得改变态度。军阀吴佩孚得知武长铁路停运，急电湖北军阀萧耀南，令其妥为处理此事，“切不可断了交通，影响军事”。10月16日，北京总局代表和湖北督军署代表边司令一同到职工联合会进行调停。工人代表在洋总管面前毫不示弱，再次向铁路局提出了《改善待遇的十五条件》，一条也不让步。16日下午，路局局长吴希曾向工人宣布：工人所提15条中，除三条有待进一步磋商外，其余均认可。职工代表又提出不得因罢工开除职工，不得扣留罢工期内工资等三条，也被一一接受。因罢工而被开除的81名小工一律恢复原职。历时5天的罢工获得胜利，全体职工于17日复工。

粤汉铁路大罢工是一次组织得极为成功的工人斗争。它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武汉地区的工人，打击了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增长了工人阶级的志气。许多报刊对这次罢工作出了高度的评价。1921年10月16日的《大汉报》说：粤汉铁路工人“此次抱坚忍不拔之志，为武汉劳工运动的初步，实际打破压迫制的先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1921年11月22日的《劳动周刊》上发表的《庆贺粤汉路工友们的胜利》一文中写道：“诸位能够自觉，能够立刻挺身跑到第一层战线上，和资本家做第一个交战者，得到胜利，这真是阶级斗争史上的光荣啊！”同年12月3日，《劳动周刊》发表《看谁打胜战》一文，高度赞扬了粤汉铁路的罢工斗争：“……粤汉铁路罢工更可钦佩，为的是数10个小工失业，



争的是人格问题。不几天，硬使那万恶的军阀都屈服，所要求的条件，条条都通过，件件都服从。这无非是他们的粤汉铁路职工联合会的力量。”

这次罢工的胜利，更为以后的工人运动积累了经验，揭开了武汉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序幕，对全国工人运动更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王耀）

人力车夫胜利了

——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大罢工

20 世纪 20 年代的武汉，城市虽然很大，但交通却很落后，市内的交通主要靠人力车。当时的汉口租界共有华、洋车行 18 家，拥有人力车 1500 余辆。最大的车行是法商利通车行，有车 490 辆。

当时，车行实行的是封建包工头制，由包工头向车行领租，再加价转租给车夫。在经济上，车夫受到车行资本家和包工头的双重剥削。包工头还规定车租必须当日结清，隔日交按高利贷处理。许多人力车工人因此背上高利贷的沉重负担，有的工人为偿还高利贷，被迫卖儿卖女。大的车行还设有黑牢，用种种酷刑折磨交不起车租或冒犯他们的工人。人力车夫成为武汉劳动群众中最穷困、最悲惨的人。

1918 年 9 月 4 日，《汉口新闻报》发表的《洋兵殴毙车夫》一文，详细报道了洋人在汉口大街上公开打死一名人力车夫的暴行。1921 年 12 月 17 日，《劳动周刊》这样描写车夫的悲惨境遇：“汉口租界人力车（华界在外）共有一千五百乘，十八家车行经营。其中有一家利通车行，竟有四百九十乘。而利通待遇车夫，尤为酷虐，凡车夫差了车费，便将他们私刑吊打，而巡捕更“助纣为虐”，动辄打罚，无所不至。譬如偶然把路线拖错



武汉人力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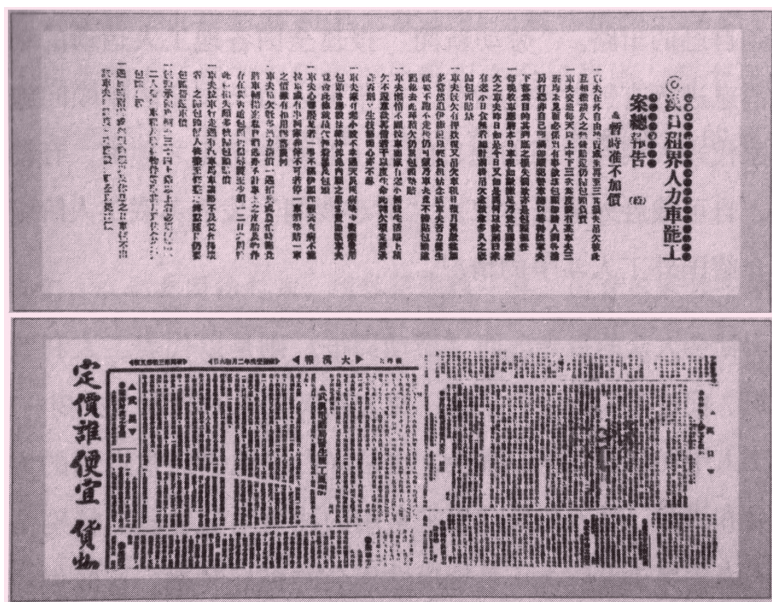
了，即踢几脚，罚半块钱，这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可是车夫就受不了了。车夫的生活是很可怜的。”

人力车夫为改变自己的命运，曾与资本家进行过斗争，也搞过罢工，但由于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斗争的成效不大。

中国劳动组织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后，派林育南、施洋和郑凯卿多次深入到车夫中去调查研究。

林育南、施洋和郑凯卿等人深入到车夫当中去，与车夫交朋友，促膝谈心，了解了很多情况，并与车夫们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在调查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鼓励工人们团结起来，同洋人和资本家进行斗争，争取各种合法权利。工人的觉悟提高了，林育南又与施洋一起，多次召集人力车夫中的积极分子开会，研究、制定罢工计划，并帮助他们成立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人联合会。

1921年12月1日，利通车行的法方老板梅林和中方老板刘子敬依仗有帝国主义治外法权和法国巡捕房的支持，宣布自即日起将车租由800文涨到1000文，同时逼迫其他华行一起涨价。一时群情汹汹，人力车夫异常



关于汉口租界人力车罢工的报道

愤怒，一场罢工在所难免。

林育南坚决支持工人们的决定，并鼓励他们斗争到底。应人力车夫会的要求，林育南还代他们起草了《罢工宣言》、《告各界父老乡亲姐妹书》，一面组织人员四处散发，一面发动各界积极行动起来，声援人力车夫的罢工斗争。

起初，梅林和刘子敬没怎么理会工人。热潮过了两天，工人们仍然没上班，刘子敬和梅林有点慌了。为了扑灭罢工运动，他们勾结英租界的巡捕抓走了几名罢工工人，想用恐吓的办法使工人尽快上班。有少数工人见车行老板与巡捕动了真格的，有些害怕，想停止罢工。关键时刻，林育南、施洋马上组织人力车夫会领导人开会，给他们壮胆撑腰，要求他们不要害怕，不要软弱，要咬牙坚持下去，并对他们说，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在林育南、施洋的鼓励下，车夫们坚定了信心，有人立即表态：“我们宁肯饿死，他不跌价，我不拉车子。”一连几天，无论工头如何花言巧语劝他们上班，他们都坐在利通车行门口一动也不动。

5日上午，夏口县知事与洋务公所委员、各团联合会会长出面调停，提出每辆车加租100文。这样一个实际为车行资本家帮忙的方案，利通车行的老板梅林也不能接受，他坚持加租200文，双方最后不欢而散。

7日，租界6000名人力车夫在汉口大智门外球场集合，用“乞丐团”的形式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举着林育南和施洋写的“租界人力车夫乞讨团”、“死中求生”、“敬求援助”等白旗和大标语，以10人或20人为一组，进行游行示威。车夫队伍沿市街行进，引起

◎漢口租界車夫罷工風潮
漢口租界人力車，共約一千五百乘，車夫共約六千人，忽於本月一日起，全體罷工，直至三日，尚未開工，風潮且愈擴大，查租界人力車行，向分華洋兩幫，每車一輛，日租錢八百文，由來已久，今華洋各行，提議加價，曾經罷工一次，經捕房調停，暫緩實行，風潮始息，此次洋商利通行又倡議漲價，每輛日加租錢二百文，洋商各行，首先附和，華商德記等行，頗不贊成，仍照常收價，嗣經巡捕干涉，始與一致，於是車夫遂全體罷工矣，罷工之後，分布各車行前後，遇有破壞團體私自領車者，即以武力對待，一日午後，大智門車行有一人領車出行，被巡捕攔截，經英捕房捕去六人，車夫愈憤，乃於二日集合二三千人，於大智門鐵路外空地集議，決定先發傳單，向各界呼籲，一面組合團體，以謀最後對待，風潮至是愈形擴大，租界商人，恐釀成意外事故，請託各團聯合會出任調停，但車行方面，堅執漲價，不肯讓步，並宣言再經一日，無人領車，即由各行出資雇人拉車，是則聯合會雖出任調停，恐亦無效，正不知其如何結果也。

《新闻报》报道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罢工斗争



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与同情。没想到处于社会最底层、平时被人看不起的车夫也直起了腰杆，而且做出如此大的举动。

游行队伍先到总商会要求救济，接着向租界进发。当走到法租界时，遭到法国巡捕的武力阻拦。工人们不服，与法国巡捕论理，法国巡捕不予理睬并鸣枪示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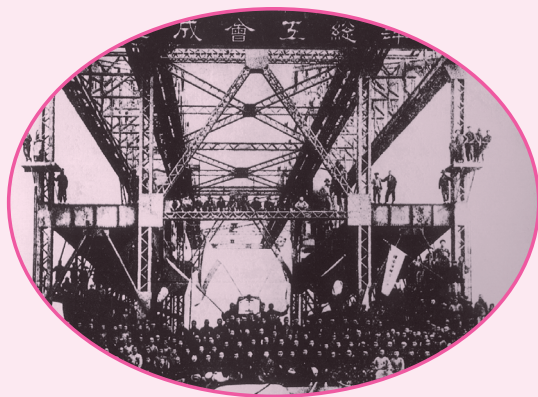
法国巡捕的蛮横无理，激起了车夫们的愤怒。车夫工会负责人一声令下，工人们一起动手，与法国巡捕扭打起来。车夫人多力量大，迅即夺得了手枪2支、刺刀1把，还冲进法租界，击碎了带头加租的利通车行老板梅林住宅的玻璃，并捣毁利通车行人力车30余辆。当工人们发现法国巡捕抓走了4名工人时，他们也扣押了2名法国巡捕，并包围了法国领事馆。

与此同时，林育南、施洋等人组织发动的各界声援人力车夫的罢工游行也在汉口各主要街道搞得热火朝天。

人力车夫的正义之举，震动了武汉三镇，显示了工人团结的力量，打击了资本家的威风。当天下午，法租界当局和车行老板慑于人力车工人的坚决反抗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法国领事向中国工人道歉，答应暂不增加车租（后于21日正式公布不增加车租），并决定三日罢工期间的车租费不交车行，用于赔偿罢工损失。

当牛做马的人力车夫终于扬眉吐气，获得胜利。

（王耀）



播火荆楚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组织
发展



汉阳铁厂成立工人俱乐部

1922年7月16日，武汉正值桑拿天，整个城市像被架在炉子上蒸。人们纷纷都躲到阴凉的地方或家里，尽量减少活动，可即便是这样汗珠还直往外冒。而汉阳铁厂的炉子却是一刻不歇，机器的轰鸣声依然像往日一样不断，高耸的烟囱向外接连吐着黑烟。

好不容易等到太阳下山，工人们从厂房里面三五成群地走出来，或光着膀子，或衣襟大开不住地扇着风，身上的汗珠还没有完全落下。从如同火窑的厂里出来，工人都长舒一口气，再加上今天又是正式召开钢铁厂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的日子，成立启事和11条规约章程早都已经刊登在了《汉口新闻报》上。中共武汉区委成立后，便派许白昊到汉阳铁厂筹建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人运动。经过耐心的开导，工人们的觉悟日渐提高，数日前召开的俱乐部筹备会议已推选出钟兆南为主任，马长年、杨桂林为副主任，交际、调查、会计、庶务等职的人选也都确定。工人们心里美滋滋的，一



汉阳铁厂

路上有说有笑，赶赴会场。

但也就在同一天，原本已经同意钢铁厂成立工会的汉口警员却突然变卦了。

会场内，许白昊、林育南正在主持会议。不知从哪里冒出了几百名军警把会场团团

围住，也不与工人讲道理，冲进来就把工人们往外赶，禁止工人开会。俱乐部内摆放的其他工团送来的礼品等物也全被没收。会所被封，大门上贴上“封”字样的白封条。

见他们来势汹汹，且全副武装，为了保护工人们安全，许白昊和林育南努力使愤怒的工人们保持克制，把工人都劝回去。两人立即决定，先同知情人联系打探工会被禁的原因，并约明日同分部的其他同志一起商量办法。

不料第二天，工人刚进厂，厂方便把工人们召集到一起，以未经允许、擅自组织、煽动工人为名，宣布成立工人俱乐部不合法，一并开除参与俱乐部筹办活动的72名工人。在全厂千余名工人的注视下，72名工友被军警推搡着赶出厂门，形势急转直下。

中午，骄阳似火，大地被晒得白花花的，十分刺眼，武昌大堤口利群毛巾厂内，许白昊、林育南、林育英等人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汉阳那边的消息。

结果汉阳方面来说：“72名工友被开除，都在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里等着哩！”

许白昊对林育南说：“走，还是我们两个亲自到江岸项德隆同志那里去看了再说吧。”

两人把衣服简单整理了一下，扮成工人和学生的样子，便出门过江，直奔江岸。

两人没走一会儿，江城就风雨大作，豆大的雨点下个不停，江面上波涛汹涌。留在毛巾厂的林育英直到深夜还没见两人回来，暗暗为两人担心，心情像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坐立不安，躺下怎么也睡不着，便索性不睡。脑海里不停地翻腾着，想着正在斗争的工友、被开除的工人领袖，更想着被狂风巨浪袭击的2个同志。

到了半夜，谈笑声、脚步声、拍门声从楼下由远及近传来，林育英赶紧起身开门。看到两人像落汤鸡，却生气勃勃地站在门口，林育英如释重负。一进门，林育南就笑嘻嘻地说：“今天我们两个危险极了，也好玩极了。刚上筏子不久，风就起来了，筏子只好随着浪跑。接着雨又来了，筏



子在狂风暴雨中随着巨浪钻来钻去，水又流得很快，把我们的筏子打到徐家棚下面去了。船夫划又划不动，靠岸又靠不了，我们只得冒险跳上岸来，帮他划船。白昊跳不远，险些儿淹死了呢！”

许白昊一边擦着身上的雨水，一边说：“会着了那些工人领袖，他们都很好。他们说，只要有办法，他们愿意坚持干下去。全厂的工人很齐心，很激愤。京汉铁路的工友们又表示愿意帮忙，厂方的生意还不坏，吴佩孚、萧耀南现在正想利用工人。我们认为这是开展今后职工运动的有利时机，仔细考虑了主客观条件后，我们决定坚持干下去。现在罢工委员会已经成立了。”

以许白昊为首的汉阳铁厂罢工委员会，一方面动员工人，另一方面召集江岸、徐家棚工人俱乐部和租界人力车夫工会，按照第一次全国劳工大会上通过的《罢工援助案》，准备发起成立武汉工团临时联合委员会，作为罢工的援助机构。经过5天的动员工作，工人们都认清了厂方的阴谋，也明白了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建立自己的组织、才能为自己说话的道理，一致决定以罢工求权益。

7月22日，全体工人集体罢工。同日，罢工委员会发表《罢工宣言》，揭露道：“有鬼心的厂内当局，怕我们有了团体，不能任意营私，虐待工人，所以诬陷我们是匪徒，运动警察禁止开会，抄查部所，收没一切物件，封闭房屋，并开来大批军警，严行弹压，按照部册，索拿工人，完全以强盗土匪相待。厂中更行残暴手段，将俱乐部公举之职员七十余人开除”。

工人们还提出六项复工要求：（一）解除军警压迫，恢复俱乐部及部内设备一切文件，并以后不得干涉工人的团体。（二）恢复被开除的工人原职，偿还其停工时工资。（三）赔偿俱乐部被解散及工人停工的损失。（四）厂内免除化铁股长陈次青的职务，并须登报声明，恢复工人名誉。（五）化铁炉长工每日工资增加为大洋四角。（六）工人因工受伤不能工作时，须照原数发给应得工资。如因工死亡，厂内发给安葬费一百元，并按工作年限，发给三分之一的工资作为抚恤金。如在厂内工作一年者发四月，工作三年者发给一年，余类推。如在工作期内病死，则照上数发给应得抚恤金。

负责工厂事务的陈次青看工人罢工的劲头不像以往，也慌了手脚，害怕自己的饭碗不保，连忙通过中间人向工人代表们表示：前三条完全承认，余下的可以坐在一起磋商。许白昊和众位工人代表们商量后，也做出一些让步，双方商议 23 日上午正式谈判。

远在大冶的厂长吴任之得知罢工的消息后，连夜赶回武汉，从头到脚把陈次青臭骂了一顿，对陈次青擅自答应工人们的三点罢工要求更是不满。吴任之的这种态度也决定了刚开始的谈判必然不会顺利。

果然，第二天的谈判一开始，吴任之派来谈判的几位领工就摆出威吓的姿态，企图强迫工人复工。一个姓朱的工头说：“你们的罢工宣言中说‘派遣军警，解散俱乐部’，本厂并没有这种事实，不与本厂相干。至于封闭俱乐部，是军警奉了上司的命令，亦与本厂无涉，你们为什么要无缘无故罢工哩？况且，你们罢工，本厂受了很大的损失，非要你们赔偿不可。如果再不上工，就要停办工厂，你们也丢了工作，这样，你们的生活岂不要没有着落？”

对他们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狡辩，连吓带骗的威胁，罢工委员会进行了正面回击：“我们的俱乐部，是我们工人联络感情的团体，与厂中丝毫不发生关系，为什么要封闭呢？你们口口声声说军警是保护兵工厂的，为什么他们这几天的食用都由厂里供给呢？又说封闭俱乐部是受了上司的命令，但上司的命令是怎么来的呢？开除七十二人，也是上司的命令么？我们罢工是因为受了陈次青无理的压迫，厂中的损失请厂主向陈次青要赔偿。要我们上工，除非厂主完全承认我们的要求，不然，我们死也不上工，如果厂主要停办工厂也好，我们好去改图别业，免得在这里受这种无理的压迫。”

厂方这种态度使得居间调停的人也看不下去：“我们因为你们厂里昨天承认了前面三个条件，以为有调和的诚意，所以出来负这个责任，希望大家平平和和地解决，免得双方伤了感情，大家不好看。哪晓得你们厂主这样没有诚意，昨天还承认三条，今天就反了齿，还要用这种威吓手段来欺压工人，这是什么道理？”



谈判最终不欢而散，但看起来工厂方面并不是很着急。因为即使罢工开始后生产全部都停下来了，可是厂里最大的化铁炉还在继续冒烟。这个化铁炉是全厂的经济命脉，只要它一星期不升火，里面就会板结成块，彻底报废。它不停下来，工人罢工对厂方就构不成大的威胁。罢工委员会急忙派林育英过江打探，走了好几个茶馆，终于把情况搞清楚了：工厂方面早准备了一手，用重金收买了负责这个化铁炉的工头韩老三。

怎么办？许白昊、林育南、林育英和其他几位工人代表在一起紧急商议办法，对如何处理化铁炉，工人代表间产生不同意见，有的工人主张不能让化铁炉熄火，搞罢工不能把工人的饭碗也搞没了；有的工人不同意，要求坚决毁掉化铁炉，和资本家拼到底。两方各执一词，争得面红耳赤。

对代表之间的分歧，全权负责这次罢工运动的共产党员许白昊说：“这2个办法都不好，现在最好的法子是停工不熄火，迫使厂方在这几天之内答应我们的条件。”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许白昊的意见。在讨论具体办法时，意见又不统一，有的主张硬斗，有的不同意用硬办法，只赞成写个告化铁炉工友书，劝他们自动停工。

这时，年轻的林育英显得相当老练，沉稳地说：“对工贼不要太文，对高化铁炉的工友不能太武。我们如对高化铁炉的工友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工人内部不和，影响现在和今后的工人运动。现在坏的是工贼韩老三，并不是化铁炉的全体工友。鼓要打在线上，笛要吹在眼上。我们要抓住要害，把主要矛头对准韩老三。所以我认为提出一个‘打倒韩老三’的口号就够了。这样一来，不独唤醒已罢工的工友去惩罚他，就是化铁炉的工友也会起来打死他。”

林育英的建议，大伙一致认可，立即散会，开始分头行动。

第二天，天刚亮，早起的人们就发现汉阳的大街小巷到处都贴满了“打死工贼韩老三”的标语，主要的岔道口上还贴有韩老三低头弯腰接受厂方给的黑心钱，答应去欺骗工人上工的漫画，甚至化铁炉上也有。

厂方知道后气急败坏，赶紧派人撕掉，可过了一夜贴得更多，一连几天都是如此。事情被揭穿后，韩老三吓得哪还敢进厂，天天躲在屋里。给

大化铁炉加火的工人也加入到了罢工队伍，高烟囱立刻不再往外冒烟了——大化铁炉停工了。这一下子，厂主可慌了神。

接下来几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力支持汉阳铁厂工人罢工。《工人周刊》印发《罢工特号专刊》，详细报道了罢工经过，并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人积极援助。要求：“（一）由各地工会通电湖北督军萧耀南，要求他惩办肇事的军警，并派人正式向工友道歉，恢复该厂工人俱乐部，以后不得侵犯；（二）由各地工会通电汉阳钢铁工厂经理，要求他完全接受工人要求的六个条件；（三）由各地工人捐款支持汉阳铁厂的罢工，直至他们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倘若仍然不能使资本家和军警屈服，各地工会应通告工人举行同情大罢工。”

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工会纷纷起来响应，声援汉阳铁厂罢工斗争。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长沙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丰台京奉机务处工余学校都先后发来电报表示：“各捐金钱以作该厂工友罢工时的日食费用，务使其能坚持到底。”“如该资本家于最近不能予该厂工友以圆满的答复和解决，则我们工界当大大地团结起来，作一致行动——罢工的援助，与恶魔作最后的决战。”同时发电警告钢铁厂当局：“速即悔改，允许我们亲爱工友要求的条件六则，以免酿出大祸，不然本部全体工友举行同情罢工以与援助，一切损失由贵厂担任赔偿。”

厂方面对这个阵势，也不敢怠慢，只能向工人屈服。25日，厂方请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南段总部、扬子机器厂工人俱乐部的工人领袖等原先的中间人到钢铁厂商谈，表示答应工人要求，最后达成协议：（一）承认工人组织工会；（二）照给停工期间之工资；（三）化铁炉长工工钱增加三角三分，并声明归还俱乐部一切原物，开除工人一律复职。

4天的罢工胜利了。当日，罢工委员会发表了上工宣言。26日，全厂复工。

汉阳铁厂工人罢工的胜利，一改往日只能挂工人俱乐部名称的情况，打出了工会的牌子，公开建立工会组织，会员迅速发展，仅月余就达1000多名。工会成立了执行委员会，相继建立了工人补习夜校、工友子弟学校、消费合作社、储金互济会，办起了演讲会、图书室、公共浴室等，工人活



动搞得有声有色。

更为重要的是，汉阳铁厂工人罢工极大地锻炼了武汉工人。罢工过程中，武汉各工厂俱乐部相互支援，改变了过去各厂工人孤军奋战的局面。在罢工过程中，由汉口租界人力车夫会、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南段总部、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扬子机器厂工人俱乐部等4个工团发起成立武汉工团临时联合会。三镇工人走到一起，开始有了统一的组织。

（张均）

武汉工团联合会到全省工团联合会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同时总结了建党一年来工人运动的状况，作出了《关于工会运动和共产党的决议案》，规定了工会的性质、任务、组织原则和基本方法，为全国的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

在党的二大精神指引下，武汉工团临时联合委员会在汉阳铁厂罢工胜利后，即改为武汉工团联合会，成为全国第一个地方性质的联合工会。此时包惠僧已调往上海工作，由林育南担任秘书长，总理一切事务。许白昊、项德隆、李书渠等都在联合会中担任重要职务。

武汉工团联合会成立后，所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怎样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做会所。在联合会成立后的第一次武汉区委会议上，林育南把这个问题提交大家讨论。林育南的话音刚落，施洋一脸神秘地笑着说：“我倒是有个主意。”

“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现正在建会所，工程已经进展了大半，但尚缺1800串钱才能完工，我们何不加入并建，作为车夫工会和联合会的共用会所？”

原来，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自去年成立以来一直没有会所。在工人罢工胜利后，工会即从赔偿费中提出5000元钱作为专门的建筑经费，施洋对此事一直非常关心，从筹款到选择地基无不参与，冲破从中作梗的基督教青年会设置的种种障碍，最终在汉口大智路品记里13号租得地基，动工已数月，现在却因费用浩大，独立难支，面临停工的窘境。而且现在官厅又明令要求人力车夫工会停办，这个会所能否顺利建成要打上一个大大的



问号。对此事知之甚详的施洋立即就把这个想法说出来。

“施大律师这个办法好啊，”林育南开着玩笑说，“1800串钱，我看我们现有的这4个工团应该能凑齐，可以把各工团负责人召集起来商量一下，看行也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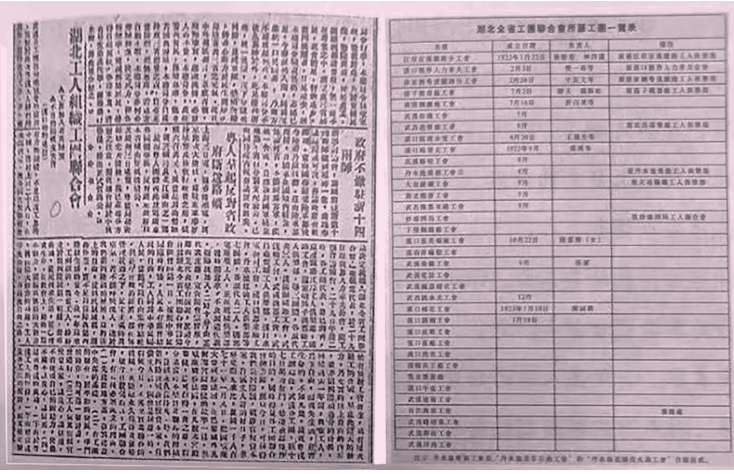
众人一致认为这样不仅能节省开支，又能迅速地建立会所，纷纷赞成。

9月3日，武汉工团联合会召开所属4个工团的联席会议，决定接受这个会所，资金缺口由各工团筹集付清，会所建成后与车夫工会共有共用。不出1月，会所即告落成。这个会所完全依靠武汉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建成，它的拔地而起是对武汉工人的极大鼓舞，武汉工人运动由此更加蓬勃开展起来。武昌造币厂、汉口水电公司、丹水池煤油栈、武汉轮船、武汉染织厂等纷纷建立起工会组织。

此时，全国的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从1917年开始，中国就出现了南北两个政权，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了北方的北京政府，南方的政权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在广州成立的护法军政府，与北京政权对立。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奉系军阀张作霖入关，北京政权易手，为直系军阀吴佩孚操控。1922年上半年，南北都发生战争，北方为直奉战争，南方为陈炯明叛变。两场战争的结果：北京政权被吴佩孚独揽；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陈炯明宣布取消南方护法军政府，国会不能在广东立足。吴佩孚趁机进行欺骗性宣传，宣布恢复民国初年的国会，于8月16日正式召开国会，酝酿制定宪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邓中夏的主持下，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按照刚刚在中共二大上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精神，向全国工会发出《关于开展劳动立法运动通告》。《通告》说：“惟吾等之自由屡受他人侵害，正式劳动工会始终未为法律所承认，同盟罢工屡为军警所干涉。凡此种种，均缘法律尚未承认劳动者有此权利之故也。倘能乘此制宪运动之机会，将劳动者应有之权利以宪法规定之，则将来万事均易进行矣。”8月17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劳动法大纲》，共计19条，并号召全国劳动团体行动起来，开展劳动立法运动。

武汉工团联合会迅速响应，召集所属工团负责人举行联合会议，传达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文件精神。林育南兴奋地说：“这是我们工人运动发展的一个机会，现在武汉工人运动的势头在全国看来也是排在前头的，我们武汉工团联合会又是全国第一个地方总工会，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建议一方面我们要把大纲各条款的意思向工友们讲清楚，让大家都能理解，调动起工友们的积极性。同时，以武汉工团联合会的名义，向北京国会提交请愿书。”



关于湖北工人组织工团联合会的报道

“好啊，要是能够通过立法保护工人，是再好不过了，我们举双手赞成，把这个情况给工友们讲，他们肯定乐开花，哪有不愿意的。可舞文弄墨的事情，还要育南你们来具体操作。我们可以署名。”各工团代表赞成立法提议，同时也明确了分工。

武汉工团联合会牵头起草的《劳动立法请愿书》在武汉的《大汉报》、上海《民国日报》上全文发表后，立刻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当然，指望封建军阀操控的国会通过立法案，无疑是不可能实现的，最终不了了之。但通过报纸的宣传，工人受到了教育，19项条款也为此后的工人斗争提供了方向。

经过9月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罢工的锻炼，工人们越发感觉到如没有强有力的团体和组织，是不能在今后的罢工过程中取得胜利的，也无法谋



求自身的权益。很快，在粤汉铁路工人罢工胜利的第3天，全省各工团代表在武汉东记酒楼开会决定，在武汉工团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29日，第1次筹备会议在大智路举行。全省工团联合会自筹备开始就投入到汹涌的工人运动中，当天会议上不仅安排了联合会成立的具体工作，而且通过了支持扬子机器厂、水电公司工人罢工的决议。

10月10日，正值辛亥革命十一周年纪念日，三镇近万名工人齐聚大智路，全省工团联合会在经过特意装饰的新会所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大会作出2项决议：一是统一工会名称，将工人俱乐部、职工联合会等一律改名为工会；二是恢复7月初被官厅解散的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组织。同时决定经过多方准备的省工团联机关报《真报》于同日在汉口笃安里创刊，社长郭祖，总编辑郭寄生，编辑林湘浦（林育南）、张子余、周无为。

随后开始举行庆祝活动，工人们手持写有“劳工神圣”、“承认苏维埃俄罗斯”、“劳动立法”、“集会结社完全自由”、“废止治安警察条例”等各种标语，从大智路出发进行示威游行。

时任湖北督军的萧耀南得知这个消息后，大为吃惊，急忙打电话给汉口镇守使杜锡均，要其立即制止。等杜锡均带领着百余名武装卫兵赶到，游行队伍已经行进到江汉路水塔前。

杜锡均跑到队伍前面，对领头的杨德甫说：“督军命令不准游行。”

“今天是国庆节，现在我们有数万人集合游行是庆祝国庆节，难道我们庆祝国庆节都要禁止吗？”杨传甫质问道。

杜锡均见硬来不行，又说：“假使你们游行发生了意外谁负责？”

杨德甫毫不迟疑地说：“由我负责，否则我即退出。”“如果你们不放心的话，请派两连步队，一连前导，一连押后，并通知警察岗位，在我们行到时禁止行人车辆通过。而且我们也有指挥队维持秩序。”

这样一来，杜锡均也没有办法干涉，看着杨德甫说：“只要你能负责就好。”然后，跑到附近商店打电话，调来2连步兵，并通知警察局加了岗位。

耽搁了半天，游行队伍再次出发，不同的是，队伍前有兵开道，后有兵断后，所过之处警察忙着维持秩序，队伍中又不时响起工人们高喊的“劳

工神圣”等口号。不明详情的路人看到这个情景惊奇万分，围观的人群中发出感叹：“当兵的给工人保驾护航，还真是稀奇啊。”队伍从后城马路直上硚口，转汉正街到前花楼，进入英租界，经俄、比、法、德、日本各租界，出分金炉到江岸车站，至江岸工会绕行一圈后折回到大智路工团联合会。工人们的心情是前所未有的舒畅，着实扬眉吐气一把，至下午4点多钟，游行队伍在一片笑声中解散。

10月28日，省工团联合会召开武汉三镇各工团特别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工联会的组织原则，规定省工联会最高决议机关是各工团全权代表会，复决机关是各工团代表会，执行机关是干事局。同时议定了各工团代表的产生办法：二百至三百人的工团选代表二人，四百至六百的工团选代表三人，七百至千人的选代表四人，千人以上的选代表五人。各工团所选代表总数即为省工联会代表会议的法定人数。并规定，代表会议作出的决案，须经各工团之全权代表会讨论通过后交由干事局执行。

在各工团按照以上办法选出代表后，省工联于11月26日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省工联会的领导机构：主席杨德甫、副主席王幼卿，干事局总干事陈天、副干事余友文，秘书科主任许白昊、副主任陈福，宣传科主任林育南、副主任潘筠，组织科主任项德隆、副主任孙叠芳，经济科内分司库、司账、庶务由王少贤、严南光、霍棠、马冬阳、杨梅松、刘章分管，并聘请施洋担任法律顾问。

这时的武汉工运情况是组织完善、英才荟萃。各工团工人也通过大游行活动看到了工人团结起来的力量，底气十足，斗志高昂。其他各厂的工人也备受欢迎鼓舞，随着省工团联的成立，三镇上下涌动着一股工运潮流，引导和推动着全国工人运动形势向高潮发展。

（张均）



汉冶萍总工会成立

汉阳铁厂工会成立后，同样隶属于汉冶萍公司的大冶钢铁厂、大冶下陆铁矿、安源路矿和汉冶萍轮驳处等也都在党组织的指导下分别建立了工人组织。

早在 1921 年秋，因汉阳铁厂停产，汉冶萍公司抽调一批工人到开工投产不久的大冶钢铁厂。此时，在林育南、恽代英的介绍下，刚刚入党不久的林育英接受中共武汉区委的安排，以翻砂工为掩护，随同这批工人一起来到黄石，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工人运动。林育英深入工人中开展建党工作，于 1922 年 3 月正式成立中共大冶钢铁厂小组。在林育英的发动下，华记湖北水泥厂、大冶铁矿、富源和富华煤矿等党小组先后诞生。到 5 月 1 日组建了中共港窑湖工矿区特别支部委员会。此后，林育英又回到武汉工作，但他在此已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工人运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到 10、11 月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先后派湖南分部特派员（粤汉铁路新河俱乐部主任）郭亮、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陈天和汉阳铁厂马冬阳来到港窑湖工矿区，在他们指导下，各厂工人组织相继建立起来。

同属汉冶萍公司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也是搞得风风火火。李立三自从法国回来，连家也没顾得回，就扎身安源，通过办平民学校、补习学校，启发工人觉悟，发展优秀分子，1922 年 2 月成立中共安源路矿支部。5 月 1 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7 月汉阳铁厂工人罢工胜利的消息传来，安源路矿工人大受鼓舞，在李立三和刘少奇的精心布置下，9 月 14 日发起大罢工，经过 4 天的艰苦斗争，挫败路矿当局对工人组织的破坏，最终取得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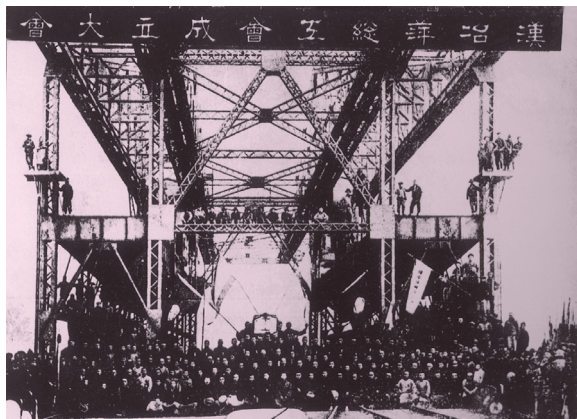
11 月 12 日，龟山脚下简陋的汉阳铁厂工会内，高朋满座，热闹异常，

汉冶萍工会筹备会议正式召开。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代表朱少连，朱锦堂，汉阳铁厂工会代表许显廷、马冬阳、余九皋、谢必超，汉冶萍轮驳工会代表向忠发、郭厚安、李燮堂、胡理臣、李兰生，大冶钢铁厂工人俱乐部代表胡少华等参加会议。

会议推定朱少连为筹备会主席，马冬阳为筹备会经济管理员。同时，制订了工会代表会议的生成方法，并决定由代表会议选正副总干事及干事若干人，组织干事会为总工会最高执行机关，其中正副主席各一人，由代表会议选举，干事会内分秘书、教育、经济三科，各科设正副科长各一人，干事若干人，由各工会提出预选人，用投票法选举产生。经费以各工会每月收入为标准，抽百分之五为总工会经费。会议决定汉冶萍工会所在地设在汉阳，总工会章程草案由汉阳铁厂工会许白昊起草，并拟定于12月10日开正式成立大会。

10日下午1时，在汉阳三码头老街，汉冶萍工会成立大会正式召开。会场布置极为壮丽，四周墙壁几乎被送来的匾额联语占满，琳琅满目，甚是耀眼，由长条桌组成的讲台蒙上鲜红的镶有金黄丝线须的绸缎布。讲台上方挂起“汉冶萍工会成立大会”的大横幅，两边分列一队工人举着各色旗帜，上绣“劳工神圣”“工人一家”等字样。除该会工人及代表外，武汉各团体皆有代表赴会庆贺，人数不下千人，本来特意挑选的大会所也被挤得水泄不通。

在一片音乐声、鞭炮声中，大会拉开序幕。任大会主席的著名工运领袖李立三特意换了一身新衣，佩戴着汉冶萍工会会徽，首先致词：“今天是汉冶萍这个大产业之下的三万余工人团结携手之日，我们无限欣慰。



汉冶萍总工会在汉阳成立，图为成立大会代表合影



我们汉冶萍三万多工友，所处的境况非常惨淡悲哀，大家感受了这深深的痛苦，是因为大家没有团结以图自救的缘故。因此，我们工友都有组织团体的急迫要求……”李立三慷慨激昂，从汉冶萍工会成立的缘由，讲到其成立的目的：求政治法律之保障，求经济的改善，求人格和地位增高。

紧接着，林育南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向汉冶萍总工会成立大会发表祝词：“汉冶萍是中国最新式、最进步的大产业，为中国中部工业制造的策源地，其一举一动足以影响全国，工友极其众多，亦最富于阶级觉悟。半年以来，举行两次阶级战争的大同盟罢工都取得了最后的完全胜利。现在三公司底下的五大工团联合起来，成立汉冶萍总工会，结成一条强固精密的阶级战争的广大战线，开中国劳动运动未有之创局，足以使资产阶级惊心丧胆。看哪，这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雄壮！我们的心跳跃了！我们的血沸腾了！雄鸡鸣了！晨钟响了！东方亮了！世界赤了！我们高呼：汉冶萍总工会万岁！工友们的联合万岁！劳动者的世界万岁！”



李立三（1899—1967）

此后，又有各团体代表及来宾、工友上台或表祝词，或发演讲，前后达30余人。会场内的气氛越发高涨，发言一次次被鼓舞起来的工友的热烈掌声打断。大会前后进行了3个多小时，在工人们欢呼的口号声中结束。

汉冶萍工会成立后，随即加入了湖北工团联合会。此后，武汉的工人运动形势突飞猛进，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建立，当年12月底即达到32个，其中20个加入省工团联合会，工团联会员人数猛增到4.8万余人。

（张均）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会旗



播火荆楚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粤
汉
工
潮



郭亮卧轨拦火车

1921年粤汉铁路武株段罢工胜利后，粤汉铁路湖北段局长王世埏见工人俱乐部的势力日趋壮大，甚为恐慌，千方百计进行破坏。他是天津人，就以同乡的名义，在徐家棚车站组织了一个“天津同乡会”，在湖南岳州（今岳阳）车站成立了一个“工人研究所”，与工人俱乐部对抗。

王世埏手下有两个最得力的打手，一个叫张恩荣，是行车监工；另一个叫苗凤鸣，是翻译。这两人利用手中的职权，狼狈为奸，贩运鸦片，毒害人民，工人对他们早就恨得咬牙切齿。“工人研究所”成立后，张恩荣、苗凤鸣就强迫工人参加，威胁工人说：“不加入的，送官府重办。”并用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处罚、殴打、开除工人。

1922年8月的一天，张恩荣叫工人阮康成给他装运鸦片烟。阮康成坚决拒绝，遭到张恩荣和苗凤鸣的毒打。阮康成被打急了，就指着苗凤鸣大骂：“你这个洋奴才，凭什么帮虎吃人！”

粤汉铁路美国总管卡默克尔、美国工程师威尔士当时正好在场。这2个洋人一听到阮康成骂苗凤鸣是“洋奴才”，也动起手来，4个人把阮康成打得是遍体鳞伤，满地打滚。这个时候，加油工吴青山买米回来准备回家煮饭，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就过去拉起凶手说理，问他们为什么要打人。

张恩荣和苗凤鸣蛮不讲理，反过来说吴青山多管闲事，又将吴青山打了一顿。还胡说吴青山的米是偷来的，叫路警没收了。

此事一经传出，立即引起工人的强烈愤慨，工人纷纷要求革除张恩荣和苗凤鸣的职务。谁知王世埏不仅不理睬工人俱乐部的要求，反而将无辜被挨打的工人阮康成和吴青山开除了。

此事一出，群情哗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与湖南分部根据

广大工人的要求，决定用罢工来反对压迫、维护工人权益。参与领导这次罢工的武汉分部有林育南、项德隆、施洋，湖南分部有毛泽东、郭亮、何叔衡。

郭亮是湖南省长沙县（今长沙市望城区）人，1901年12月3日出生于长沙县临湘都文家坝，原名郭靖筵，因仰慕诸葛亮而改名郭亮。1920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泽东过从甚密，参加了新民学会、湖南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冬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5月，中



郭亮（1901—1928）

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郭亮任委员，分管工人运动，到长沙新河、岳州车站开展铁路工人运动，建立粤汉铁路岳州工人俱乐部，发展党员，组建岳州站支部，成为此次罢工的重要领导者。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粤汉铁路武长段沿线的徐家棚、岳州、长沙新河等工人俱乐部共同组成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以下简称俱乐部联合会），作为罢工总指挥部。总指挥部设在武昌徐家棚，下设调查、留守、通讯、点名、检查、总务各委员会，具体组织领导罢工事宜。

1922年9月2日，俱乐部联合会给路局送去呈文，要求撤销张恩荣、苗凤鸣的职务，并限5日内答复，否则罢工。

王世埏收到呈文后，把张恩荣、苗凤鸣找来，问他们：“工人会不会罢工？”

张恩荣、苗凤鸣回答得蛮有把握：“罢不了。就算是罢工了，我们有天津同乡会、工人研究所，火车照样开。”

王世埏听后，觉得还是不放心，去请示总管卡默克尔。卡默克尔对“天津同乡会”和“工人研究所”的信心不足，就让王世埏和湖北督军萧耀南联系，以防万一。岳州附近驻扎有萧耀南的2个军队，必要时可以用军队镇压工人的罢工。



王世埏在得到卡默克尔的支持，萧耀南的允诺，张恩荣、苗凤鸣的保证后，以为稳操胜券，对俱乐部联合会提出的呈文不予理睬。

8日，在没有得到路局的任何答复后，俱乐部联合会立即发表了《罢工宣言》。《罢工宣言》说：“我们为解除压迫，维持团体，改良生活，增高人格，不能不与工贼奋斗，不能不有这最后一举。各界同胞呀！请你们秉正义公理的精神，给我们切实的援助。亲爱的工友们！无产阶级的兄弟姐妹们呀！我们为生存而奋斗，为人格而奋斗，不达到目的，誓死不止。”

9日，从徐家棚到长沙，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正式开始了。随之，俱乐部联合会向当局提出了撤销张恩荣、苗凤鸣的职务，恢复阮康成、吴青山的工作，增加火夫、小工工资，工人升职由老工人依次递补等7项条件。

铁路上的车辆停驶，工厂停工，王世埏慌了。为了破坏罢工斗争，他先是唆使所谓的“工人研究所”出面，用金钱收买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工人上车生火开火车，并用军警护车、开道。随后，他又勾结萧耀南请来警察七署保安队军警30人、陆军第25师第1团步兵1连到徐家棚镇压罢工工人。

由于王世埏的破坏，武昌至岳州的客货车照常行驶，罢工斗争面临夭折的危险。在此紧急情况下，林育南等人立即组织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成员深入到工人中进行宣传教育，揭露王世埏的阴谋。经过一番工作，上车的工人又下了车，王世埏的阴谋破产。

铁路停运一天，损失难以计数。王世埏的第1个办法失败了，便采取第2个措施——强行开车。10日晚，王世埏亲自携金去收买“工人研究所”的部分工人为他开车，然后去请萧耀南的军警押运列车。

晚上11点，王世埏下令“工人研究所”的一部分工人开动了列车。徐家棚的工人闻讯后，带着老婆孩子赶来，卧在铁轨上，阻止火车开出车站。

王世埏得知轨道上有妇女、儿童阻拦列车，暴跳如雷，对军警大叫道：“你们下去给我杀！”军警连忙冲下列车，对卧在铁轨上的妇女儿童横拖竖拉，又打又刺。一时间，铁路上妇啼幼哭，哀声遍野。这次被军警杀死、打伤、抓捕的妇女儿童有100多人，投水、失踪10余人。列车强行开出徐家棚车站。

消息传到岳州，郭亮率领工人纠察队，高举“驱逐二贼”“要求正

当权利”的旗帜，来到岳州站外的铁道上，通宵露宿，誓死阻止列车进入岳州车站。

11日上午，郭亮看见一列冒着黑烟的火车开足马力正朝岳州车站驶来，他第一个卧在铁轨上，工人们随即也卧在了铁轨上。火车司机见此情形，一个猛刹，列车停了下来。

王世埏跑下火车，装模作样地问卧轨的工人：“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岳州工人俱乐部主任张万云回答：“我们要求惩办打人凶手，增加工资，要求你答复我们提出的条件。”

王世埏冷笑道：“嘿！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你们的条件，兄弟我正与各方磋商。你们快回去上工吧！”

工人们完全不理睬这一套，齐声高呼：“朝允条件，夕即开工！”

“胡说！”王世埏吼叫起来：“现在是南北交战。罢工阻运，影响军用民食，触犯军法国威，误了战事，你们负得了责吗？”

郭亮站起来，对王世埏说道：“王局长，工人们拼着阳寿，流血流汗，挣下的工资，你扣着不发，拿去贩卖鸦片，获取暴利，毒害老百姓。工人们就是为了一条活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难道就犯了‘军法国威’了么？”

郭亮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报纸，继续对王世埏说：“王局长，吴大帅（指吴佩孚）‘保护劳工’的通电就刊登在这张报纸上，想必你是看过的。工人们一不抢劫偷盗，二不讹诈诈骗，只是根据吴大帅的通电，要求一点自己的正当利益，犯的是哪一条国法？”

郭亮说到这里，转身从人群中领着一个遍体鳞伤的工人走出来，站在王世埏面前，继续说：“王局长，他就是阮康成。因为不给你们装鸦片烟，就被张恩荣、苗凤鸣打成这个样子。你不秉公惩办凶手，反而把阮康成开除了。难道是阮康成犯了‘军法国威’吗？犯法的，不是别人，正是你王世埏。”

王世埏在这么多的工人面前被人这样数落，还是生平第1次。他指着郭亮问：“你是什么人？”



“要问我的身份，是岳州工人俱乐部秘书。要问我的姓名，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郭亮是也！”

“啊！郭亮先生，久闻大名。你既不是铁路工人，又不是铁路局职员，为何来过问我局的事务？”

张万云马上问王世埏：“俱乐部的秘书，是代表我们 3000 工人说话的，为什么不能过问？”

王世埏理屈词穷，命令身旁的苗凤鸣：“去，去叫司机开车。轧死他们，有我负责。”

列车向前开动了！

郭亮振臂高呼：“工友们！我们决不能让火车开过岳州站。条件不实现，我们还能活下去吗？反正饿死是死，轧死也是死，我们要誓死挡住火车！”说罢，他又卧在了铁轨上。

“我们要誓死挡住火车！”工人们齐声呐喊，一个挨一个地横卧在铁轨上。

火车离郭亮不远的地方停下来了。苗凤鸣命令司机：“开！往前开！”车轮滚滚，汽笛长鸣。火车又向前开动了。

阮康成看到车轮就要轧到郭亮身上了，他爬上前去，卧在郭亮前面，说：“郭秘书，你不能为我……”郭亮不等阮康成说完，迅速把他抱到身后，直起身来，顶住车头前面的排障器，沉着地喊道：“工友们，火车从铁路工人身上是开不过去的。”工人们横卧在铁轨上，没有一个躲开的。

郭亮朝车头大声喊道：“开车的工友，天下的工人都是阶级兄弟啊。你们能替官僚、军阀杀害自己的兄弟吗？”苗凤鸣在车头上，揪住司机的衣领，使劲地喊：“开呀，开过去！把这些穷王八蛋都轧死。”

“阶级兄弟”和“穷王八蛋”在司机的脑海中翻腾起来：我们做工的人，难道都是“穷王八蛋”吗？不，郭秘书说得对，是“阶级兄弟”。司机大喊一声：“不能再往前开！”火车向后退了。

苗凤鸣夺过军警的枪，对着司机说：“你敢违抗命令，老子毙了你！”司机回身，猛一拳打在苗凤鸣的鬓角上，苗凤鸣随即倒在了机车上。司机

从机车上跳下来，扑到郭亮跟前说：“郭秘书，我走错了路呀！”

郭亮抱住司机，仔细一瞧，是王忠！王忠原来参加了岳州工人俱乐部，后来受诱惑退出了工人俱乐部，参加了“工人研究所”。

郭亮紧紧抱着王忠，激动地说：“王忠大叔，现在你走对了！”王忠抬起头来，看见机车上还插着一面“工人研究所”的旗子，就把它拔下来，撕成两半，摔在王世埏跟前，大声喊：“你自己去开车吧！老子再不上你的当了。”

王世埏见势不妙，使出最后一招，让萧耀南驻在岳州附近的2连军队火速开到。士兵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迈步向前，工人排成队，怒目挺胸，顶住刺刀。

郭亮拨开顶住他胸膛的刺刀，对士兵说：“兄弟们！工人、农民和士兵，都是一家人啊！你们的父母，哪一个不是靠卖气力过日子的！我们是被他们逼得活不下去才罢工的。你们不要受这班老爷的骗杀害自己的兄弟啊！”

士兵觉得郭亮说的话很有道理，把枪慢慢放了下来。王世埏急了，对站在他右边的一个连长说：“李连长，下令开枪！”李连长犹豫不决。王世埏又对站在他左边的一个连长说：“王连长，下令开枪！”王连长望着李连长，李连长望着王连长，谁也不肯下令开枪。

见此情形，王世埏从军警手里夺过枪，向天上“啪！啪！”开了2枪。王忠一个箭步抢在郭亮前面，扒开衣服，露出胸膛，迎着枪口说：“王世埏，朝老子这里打！”王世埏被王忠的英雄气概吓呆了，自己不敢开枪，却叫士兵开枪。郭亮对士兵大声喊：“兄弟们，倒转枪口，对准王世埏！”

王世埏害怕了，他生怕士兵像王忠那样，真的倒转枪口，就对郭亮身边的士兵说：“把这个矮子抓起来！他就是煽动罢工的头子。”士兵猛扑过来，工人和士兵展开搏斗，枪声、打杀声、叫喊声，交织在一起。士兵用枪托猛击，用刺刀乱捅。顿时，刀光闪闪，血肉横飞。工人赤手空拳敌不过军队的快刀钢枪，近百人被打死打伤，郭亮、王忠、张万云等37人被捕。王世埏在岳州又一次制造了血案。

（王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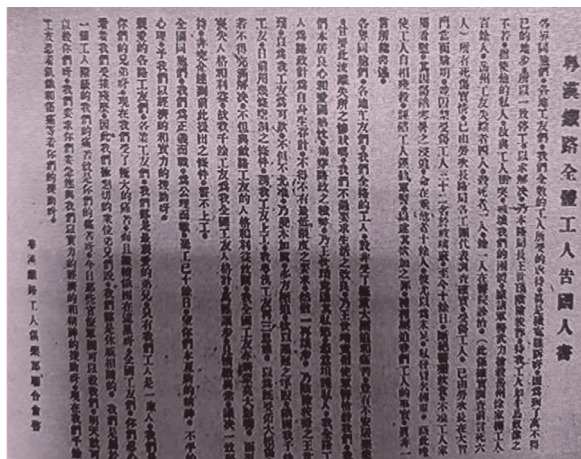
围堵劳之常

岳州血案后，粤汉铁路全线笼罩在恐怖气氛中。但是，路局勾结军警镇压工人的暴行不仅没有使工人屈服，反而激起了工人誓将罢工坚持到底的决心。粤汉铁路罢工指挥总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铁路当局提出释放被捕工人、撤退军队、惩办王世堉、抚恤死伤工人4条要求，并向全国各界发出快邮代电，请求援助。

9月11日，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向全国发表《粤汉铁路全体工人为军警杀伤工人泣告全国书》，控诉粤汉铁路当局罪行，呼吁全国同胞主持公道，大力援助。

9月12日，林育南组织武汉工团联合会在法租界召开会议，发动、组织全市工人声援粤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会后，武汉各界人士迅即行动起来，纷纷集会、捐款，声援粤汉铁路罢工工人的正义之举。

接着，全国各地的声援也迅即开展起来，京汉南段工人俱乐部、京汉



《粤汉铁路全体工人告国人书》

北段、上海、北京、广州各地的工人团体纷纷来电来函，京绥、京浦、陇海、正太、沪宁路、长辛店、郑州、信阳及洛阳站的铁路工人组织来电表示如3天不解决问题，他们也将罢工。上海还组织了“罢工经济后援会”，声援粤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远在湖南的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得知武汉铁路工人罢工斗争的消息后，特地派人到武汉与林育南商量营救被捕的人员，谋取争取斗争胜利的办法。

全国工人的大力声援和支持，极大地鼓舞了武汉罢工工人的斗争，也使得当时的北京政府惶惶不安。为平息罢工浪潮，北京政府决定派交通部长劳之常 14 日去武汉处理罢工问题。

在得到这一消息后，林育南、施洋等人商量决定，抓住劳之常到武汉之机，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请愿、申诉活动，使劳之常一进武汉就感觉到问题的严重。

9 月 14 日，由施洋等带领的京汉、粤汉铁路工人 2400 余人赶到汉口刘家庙火车站“欢迎”劳之常。工人们亮起两面白旗，一面白旗上写着：“请交通次长看粤汉路局长指挥军警杀伤工人之大惨剧：徐家棚伤 100 余人，重伤 30 余人，命在垂危者 8 人，投水失踪者 10 人，被捕解武昌者 9 人。哦，交通次长来了，救命呀，杀贼呀！”另一面上写着工人们的要求：“撤退军队，惩办行凶军警，惩办王世埏、张恩荣、苗凤鸣，抚恤死伤工人，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

车站上还有很多纸旗，上面写着“粤汉铁路未死工人请愿团”、“欢迎交通次长救命，惩办张苗王为民除害”、“交通次长呀，你看到我们的惨状也伤心么”、“请不要辜负我们欢迎你的诚意呀”。

劳之常乘坐的火车到达车站。他在车厢内站了起来，向站台上四处望，看站台上有什么人。不一会儿，一工人代表走到劳之常坐的车厢前，对着半开的窗口说：“我们未死的工人在此欢迎劳次长，请次长出见。”

劳之常当即推开窗户，露出头部，对工人代表说：“谢谢大家。”

工人代表给他请愿呈文，并对他说：“我们深受压迫和欺侮，请次长主持公道。”

“诸位如此辛苦。”劳之常点头道，“我心里实在难过。粤汉铁路的事，明天自有正当办法解决，大家今晚先回家，不要在此久站。”

工人代表说：“只要劳次长答应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马上回去。”



劳之常下了车。他见在场工人的情绪很激动，边走边对工人们说：“我对这件事很悲痛，很对不起大家。大家提的问题，我们一定解决。”

15日，劳之常在江岸镇守使署花园召集有关人士开会，询问罢工真相，商讨解决办法。王世埏拒不接受工人的要求，劳之常觉得问题非常棘手，决定第2天回北京，不管了。

施洋闻讯，于16日组织了更多的群众，在汉口大智门车站“欢送”劳之常。劳之常坐的小汽车徐徐开进车站。几千工人和死伤、被捕工人的家属一拥而上，拦住汽车。劳之常加大油门，开足马力，施洋大叫一声：“工友们！劳之常要跑，快拉住他理论。”工人们把汽车团团围住。

工人代表请劳之常去徐家棚车站亲眼看看工人被屠杀的惨状。劳之常没有办法，同意给受伤工人每人发20元“养伤费”，并答应把工人的要求带回北京“商量解决”。

（王耀）

对垒王世埏

可是，劳之常一走，便毫无音讯。面对此种情形，林育南和施洋等人判定这是当局的“拖刀计”，要抓住时机，迫使当局尽快解决问题。经过仔细商量后，他们指示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继续组织工人举行大示威。同时他们决定，带领罢工工人直接到粤汉铁路局去向王世埏请愿，迫使他答应工人所提的全部条件。

林育南率领各工团代表近百人来到粤汉铁路局。王世埏见工人来直接找他，心里颇为紧张。他怕挨工人的打，故意装出一副热情的样子，吩咐人给请愿者递烟，又叫人倒水。

双方坐定后，林育南开门见山地对王世埏说：“局长先生，不必客气。我们今天来，目的就只有一个——请愿。你今天当着这些工人代表的面表个态，到底解不解决工人们提出的问题？”

王世埏说：“诸位不要太急，我正在考虑这件事。”

林育南亲手将他起草的《最后警告书》交给王世埏。王世埏接过一看，发现警告书句句对着他，“务望贵局长从速省悟，克日完全承认，以平众怒，而复路政。否则敝工团等，定率武汉全体工友，以周旋于贵局长左右，前日大智门之包围，恐不难再见于徐家棚也。”

王世埏放下《最后警告书》，心里紧张害怕了。他心里想：这帮穷工人怎么变得这样厉害了呢？事到如今，只有自己让步，答应他们的所有要求。他正要开口说话，一工人代表突然向他大吼道：“王世埏，你答应不答应我们的要求？”

王世埏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说：“全……全部答……应……”过了一會兒，王世埏想到有些事情不是自己职权范围内能解决的，马上又说：



“对于大家先前提出的7个条件，我表示赞同，但此事重大，非要交通部核定才行，故暂不做回答。至于诸位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撤退镇压军队、抚恤死伤人员、赔偿损失等要求，我可以表态，并即日办到。”

“那你马上致电交通部核定嘛！”

“可以，我马上叫人去办。”

林育南见王世埏的态度有了大改变，觉得没有必要再纠缠，遂带领工人回到了驻地。谁知过了2天，王世埏又出尔反尔，其他条件全部同意，唯不同意撤换张恩荣和苗凤鸣。而撤换张、苗2人，恰恰是工人最强烈的要求。

根据这一情况，林育南决定再次召集武汉各工团代表开会商讨对付王世埏的新办法。9月24日，在林育南及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组织下，武汉各工团、京汉、陇海铁路14名工人代表在江岸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向直系军阀吴佩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25日8点以前答复粤汉铁路工人提出的要求，实现“保护劳工”的诺言，否则举行同盟罢工。

为平息一触即发的大罢工，北京政府交通部及军阀吴佩孚急电萧耀南及粤汉铁路湖北段铁路局长王世埏，限令他火速解决罢工问题。王世埏在罢工工人和上级的强大压力下，感到难以抵抗。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只有答应工人的条件。

25日上午9点，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派出代表与调停人冯云、易怀远一起来到粤汉铁路湖北段铁路局。气焰嚣张的王世埏此时一改高高在上的旧态，对工人代表分外热情。

双方坐下寒暄几句后，工人代表向王世埏递交了所提的各项条件，并告知王世埏，既考虑了工人的利益，也顾及了当局的面子，要条条照办，不得节外生枝，也不得拖延。

王世埏戴着眼镜仔细看了看各项条件，心里不满意，却又无可奈何。他硬着头皮，口愿心不愿地说：“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张恩荣、苗凤鸣二人停职查办，被捕工人一律释放。先前提出的7条，我也全部同意。其中第1条，要由路局布告。监工张恩荣、司事苗凤鸣呈议停职，听候查办。”

待批准后，合行布告。第2条，我马上告知武昌玻璃厂将被捕的37名工人释出，其中24名岳州工友用专车送回岳州，徐家棚的8名工友仍回原单位，吴青山、阮康成也予复职。”王世埏的态度及答复的条件，工人代表比较满意，当即决定罢工就此停止。

历时15天的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大罢工，在付出血的代价后，终于取得了胜利。

（王耀）



扬子机器厂援助罢工

扬子机器厂位于汉口谌家矶，全名扬子机器制造公司，1907年由湖北著名商人宋炜臣、顾润章等人联合各商集股35万两创办，1908年建成投产。扬子机器厂后来发展迅速，成为国内第二大机械厂，有工人1000多名。由于扬子机器厂规模较大，工人众多，因此，武汉党组织派项德隆去该厂发动组织工人运动。

1922年7月2日，在项德隆的领导下，扬子机器厂工人俱乐部举行成立大会，定有俱乐部章程7章计31条，陈天为主任，杨梅松为副主任。俱乐部“成立以来，成绩甚佳，既注意内部自省之教育，又努力于向外之发展”。俱乐部会员有七八百人，很快发展到千余人，成为武汉有影响的工人俱乐部之一。附近的丹水池亚细亚煤油厂工人积极要求建立自己的俱乐部，因条件不成熟，扬子机器厂工人俱乐部吸收他们为名誉部员，待筹备就绪后再单独成立工人俱乐部。其后，扬子机器厂工人俱乐部联合汉口租界人力车夫会、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南段总部、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一起成立了武汉工团临时联合委员会（后改名为武汉工团联合会）。



创办时期的扬子机器厂

作为武汉有实力有影响的大工团，扬子机器厂工人俱乐部积极支持武汉各厂的工人斗争。在支援汉阳铁厂工人罢工和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罢工的斗争中，扬子机器厂工人更是走在前列。

1922年9月9日，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因反对监工虐待举行罢工后，武汉工团联合会发出支援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的号召。9月12日，扬子机器厂工人俱乐部、京汉南段工人俱乐部等单位的代表30余人在汉口法租界永庆里召开联合会议，筹商一致援助粤汉工人的办法，决定由各俱乐部及工会组成武汉工团联合会；通电全国及海外华侨，控诉粤汉路局压迫工人的罪状，请求一致声讨；呈请当局撤退沿路之军队；要求惩办工蠹张恩荣、苗凤鸣二人；派人北上请愿国会通过劳动法案，以为工友之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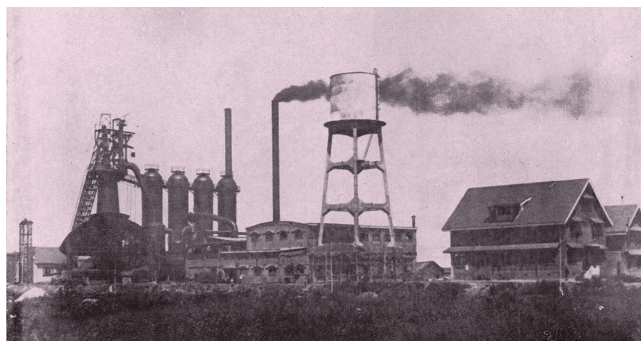
9月19日，武汉工团联合会、扬子机器厂工人俱乐部、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南段总部、汉阳钢铁工会、汉口既济水电工会、丹水池煤油工人俱乐部、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武汉轮船工会等8大工团代表向粤汉路局提出解决工潮四项条件：（一）以释放被捕工人，用专车送回原处为先决条件；（二）撤退弹压军队，严惩张恩荣、苗凤鸣；（三）从优抚恤死伤工人，并赔偿损失；（四）承认前次粤汉铁路工人所提出的七个条件。

武汉工团联合会向王世埏发出最后警告书。狡猾的王世埏当时答应，但到21日，又否认前言。因此激起各工团强烈愤怒。武汉工团联合会决定实行总罢工援助粤汉工人。

9月23日，扬子机器厂工人为声援粤汉铁路武长段罢工，率先举行了援助罢工，并提出了自身增加工资的要求。

9月25日，扬子机器厂工人俱乐部发表宣言，说明此次罢工的目的：“工人等鉴于人群之压迫，本互助之精神。故全体停止工作，藉表含冤难伸之情，惟望各界仁人君子工界同人共表同情，代鸣不平，援之助之，非达改良待遇不休。”但是，扬子机器厂当局对本厂工人的要求不但拒绝采纳，反倒步步紧逼。经理王光先是将厂门关闭上锁，企图“厄工友于困苦之境”，接着，又以另招工人相威胁，“无如各店家俱置之不理”，结果是“走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到一个人”。

为适应武汉三镇、汉冶萍公司所属大冶钢铁厂、下陆铁矿等工人运动大发展的需要，9月27日，武汉工团联合会开会决定，将名称改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并申明坚决支持扬子机器厂工人的罢工要求。9月30日，



1920 年的扬子机器厂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发出了《警告王光书》。警告书中写道：

“本会以为工界主持公道、拥护权利为天职，对于执事所为，认为欺侮工界全体，务望执事从速改悔，

承认工人条件，恢复工作，不然是怙恶不悛，甘为戎首，我全体工团，将以最后手段对付执事，愿执事为名誉计，为利害计，勿犯众怒致貽后悔也，并请于三日内答复。”

10月2日，扬子机器厂工人俱乐部号召工人学习“粤汉工友们勇敢和坚持的毅力”，将罢工进行到底。提出“要提起精神努力奋斗，挣回人格，宁死不辱，为扬子工人争口气，为天下工人争口气，莫惧威逼，莫被利诱，持我合理的条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恰在此时，有一艘正在该厂修理的美国军舰限期已到，美舰长分别与厂长王光和工人俱乐部主任陈天交涉，但均没有得到解决，一怒之下，提出若不及时把军舰修好，就要求中国政府出面帮忙解决。

吴佩孚闻及此事，既怕得罪美国人，又怕罢工继续扩大，遂于10月4日急电萧耀南，令他速速解决此事。萧耀南接到电报后，当即召见了厂长王光，训示其迅即解决罢工问题，尽快复工。

10月7日，在各方的压力下，经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出面调停，扬子机器厂厂长王光终于接受了工人所提的改良待遇等6项条件，罢工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扬子机器厂罢工的胜利，极大推动了武汉工人运动的发展。武汉此时的工会运动形势正如当时《晨报》一篇文章所描述的：“此时武汉劳动界的潮流真如长江夏季水涨，奔腾澎湃，排山倒海而来。”

（王耀）



播火荆楚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烟
厂
凯
歌



女工罢工不得法

1922年10月16日晚上，林育南还在笃安里的《真报》报馆写工人运动的报道，楼下突然想起阵阵急促的敲门声。林育南一阵纳闷：这么晚了，还有谁会来呢？

下楼开门一看，是许白昊和项德隆两人。两人一副神秘秘的表情，进门拉上林育南就往楼上走，搞得林育南一头雾水。到了楼上两人才把详情和盘托出：原来，汉口英美烟厂部分女工今天不能接受工厂变相克扣工资的新计酬方法，也不堪忍受虐待，摇班（罢工）出厂，但由于事先没有和全厂男女工人讲清楚原因，尤其是这次罢工是女工挑头，男工认为和自己不相干，所以也不支持。而且，许白昊从熟悉烟厂情况的钢铁工人口中得知，出厂女工准备明日在厂门口强行阻止其他工人进厂，就急忙拉上项德隆，来找林育南商量办法。

林育南听到这样的情况，说：“工人这样搞可不行，搞不好反而会被厂方抓住把柄，弄巧成拙，我们应该去把工人好好组织起来。”三人商定



英美烟草公司女工在工头的严密监视下工作

第二天一早到六合路看看情况，当晚三人就在报馆打了地铺歇息。

英美烟草公司于1911年在汉口鄱阳街合作路设立分公司，经营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5省业务，并在沙市、老河口、长沙、九江、郑州、重庆设有支公

司，其在武汉投资设厂的时间更早。

六合路烟厂始建于1906年，1907年正式投产，以土产烟叶制造纸烟，在当年就可每天生产1000万支香烟。此后规模不断扩大，1920年就有64家烟机，不久，又在汉口专门设立了一座烟叶厂。

烟厂男女工人加上童工有2000多人，其中又以女工和女童工居多，比男工的2倍还多。烟厂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工人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连工人上厕所的时间也有限制，超过了时间就要罚款甚至停工。而且，若是碰上阴雨天气，无论冬夏，都是四窗紧闭，使得烟气弥漫全厂，工人被熏得头昏脑涨。

但因生活艰难，很多人被逼无奈进厂做工，以谋生计，又不得不走工头的路子，给厂里的工头送礼。工人们经常要从仅够糊口的薪水中抽出一部分对工头进行“孝敬”，工头也时不时变相榨取工人，私下里工人怨声载道，又无可奈何。工头掌握着工人的生计，更加有恃无恐，稍有不满意就打骂，重者甚至收回工牌。

此时，工人运动在武汉三镇掀起一波波高潮，烟厂工人们每天也受着影响，湖北省工团联合会自办的宣传工运的《真报》在工人中间非常受欢迎，工人们也渐渐了解到劳工神圣思想和工人应该具有的权利。此时的烟厂工人中也涌动着创办工会，改变悲惨处境的暗流，但由于种种原因，工会一直没有组织起来。

第2天，天刚微微亮，林育南、许白昊、项德隆三人就来到烟厂。还未到烟厂的大门，借着路灯隐约看见烟厂门口围了一些人。走近才看到烟厂的大门被几张桌子堵着，几个女工站在桌子上，手里拿着扫把，阻止工人进厂上工。

来得早的工人都进不去，站在厂门口，对这些女工既同情其遭遇，又不赞同她们的这种做法，一旁的几个男工也连连摇头。

三人看到这个样子，说：“这样怎么行，只靠强迫不发动工人怎么能够得到全体工人的支持？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待会儿工头出来收工牌要是看见就更有口实，反而对这些工人不利。”



林育南说罢，三步并两步，跳上桌子，大声说：“各位工友们，外国资本家狠命压榨我们工人的种种情况，大家都有感受，近日又变相减少工资，以前的工钱还能勉强糊口，现在是辛苦一天也填不饱肚子。女工的待遇更加悲惨，稍有差错就要克扣掉几天的工资，这还不算，还要被工头们任意羞辱，那样的情形，大家应该是天天都会看到的吧！”

林育南突然提高了声音说：“谁家没有老婆、姐妹，要是她们也像这些女工一样，受到这样的待遇，你们能坐视不管吗？”

在桌子上的几个女工也声泪俱下，向工人们哭诉所遭受到的非人待遇。在场的男女工人回想起每天在厂里监工打、工头骂，一个个都激愤不已，像沉默太久的火山要在此刻爆发。人群中接连喊出“支持女工罢工”“提高工资”的声音。

林育南见工人都已经发动起来，随即说：“我是省工团联派来的代表，我叫林育南，我们省工团联就是支持工人合理斗争才成立的组织，大家不要担心罢工后的生活问题，有全省 20 多个工会的支持，不争回权益，我们一定罢工到底。”

林育南、许白昊、项德隆接着又向工人们宣传工人应有的权利，工人们罢工的信心越来越足。上工时间快要到了，工人三五成群地赶来上工，门口人数越聚越多，为了便于把工人们组织起来，许白昊和林育南、项德隆商量：在厂门口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不适宜，动员已经来的工人今天就摇班，然后在以后的几天再动员其他工人，最终使工人们团结在一起。向工人们说明后，获得一致赞成，男女工人都四散而去。

工厂工头看已到上工时间，可工人还没有来几个，即便是来的几个人也是因为来得稍晚一些而不知情。工头非常吃惊，经过再三打听才知道情况，急忙通知厂方，不想厂里的洋经理其林姆淡淡地说：“中国人这么多，招几个会干活的苦力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再说没有我们给他们发工资，看他们能闹到什么时候，到时还要乖乖地进厂，不用理会他们。”

工人在烟厂门口四周搭起台子，林育南等人组织起陈云卿、陈元芝、邓保师等男女工人向过往路人和依然要进厂的工人进行演讲，控诉外国资

本家和监工、工头虐待女工的种种恶行。女工们说到所受到的非人遭遇，不禁悲从中来，声泪俱下，一些原本打算还要去上工的工人听到宣讲，也跳上讲台痛斥既喝血又扒皮的监工、工头。

通过这一办法，赞同罢工的工人越来越多，也更加团结。

第3天，烟厂门口就贴出一则布告：凡不愿在本厂工作者，于19日下午交还牌照，结清欠薪，即可以离厂。

到19日下午，厂方本预料工人们会乖乖就范，谁知全厂3000多工人宁可失业，忍饥挨饿，也不惧洋经理的威胁，齐刷刷一起到厂交还工牌。

其林姆知道情况后大惊失色，心里又想出一个坏点子，既可以刁难工人，又能起到破坏罢工的作用。他把出纳叫来，说：“给工人们说无钱发薪，让他们暂且回去，发薪时间另行通知。”其林姆心想：不给工人发钱，工人没有钱，那他们罢工就坚持不了几天。

工人听出出纳说无钱可发，更是群情激愤。

“张贴布告，让我们今天来领欠薪，来了你们又说没钱可发，我看你们就是分明有钱不想给我们发，”女工陈云卿扭过头对工人说，“大伙儿说是不是？”

“你莫把我们工人当皮球样，踢来踢去。”

“今天必须发钱！”有工人在外面怒吼道。

工人们聚在厂里，坚决要求发给欠薪。过了不久，从厂门外冲进来一队巡捕警察，拿着皮鞭，不由分说向工人乱打。这些巡捕和烟厂关系一直不一般，烟厂给巡捕很多好处请他们来护厂，维持秩序，巡捕们也乐得挣这几个逍遥钱，所以一叫即到。

时值初秋，工人穿衣不多，皮鞭打到身上就起一道血痕。工人哪里抵挡得了这些凶狠的刽子手，只得先从烟厂中返回各自家中，但外国资本家的这种暴行不仅没有吓住工人，反而激起工人们更大的愤慨和斗争的决心。

22日，烟厂男女工人3000多人举着“严惩凶手”“工人再遭毒打”的横幅，高喊“罢工到底”的口号，一路示威游行到省工团联。原来，昨日，工人们在工厂四周开演讲会，其林姆知道工人这样宣讲对自己不利，恼羞



成怒下，他就派沈、常两个监工，趁一工人不备，从背后将其拖进厂门内。眼尖的工人见状，连忙叫上其他工人一起上前准备把人抢回来，不想晚了一步，到了跟前，厂门已经关了，只听见工人在里面一阵接一阵的惨叫声。毒打有半个小时的样子，才把人放出来，工人们要上前和他们理论，他们却直接把厂门关上。

在场的陈云卿和其他几个工人看到被打的工人一脸血污，十分痛心。陈云卿当下就说：“就靠我们的力量还是不够的，上次他们就明目张胆地毒打我们，今天有一个工人被打，明天还不知道有多少工人会受到毒打，要换个办法。”陈云卿迟疑了一下，接着说：“我看我们还得找省工团联帮忙。”其他工人也一致赞成。

在工人中素有威望的王春山说：“我看我们最好以游行示威的方式到省工团联，既可以壮大我们的声势，还能让更多的人同情我们，赢得支持。问题是很多工人现在没来，要分头通知。”

陈云卿直拍大腿，说：“这个主意太好了，问题好解决，我们就近分头通知大家就行了，能通知多少是多少，我们明日也可以等人到齐之后再开会。”办法商定后，工人们即分头行动，把受伤的工友抬去医治，陈云卿等人连夜赶制横幅、标语，并找到林育南说明准备到省工团联开会的事情。

烟厂工人早上8点即游行到省工团联，到下午2点左右，全厂工人到齐，大会开始。

省工团联内，人头攒动，大智路上也站了很多屋里挤不下的工人。陈天为大会临时主席，法律顾问施洋知道情况后，也专门抽出时间赶来与会。

疾恶如仇、快人快语的施洋用其特有的、慷慨激昂的语调首先发言：“烟厂的各位工友们，对烟厂虐工的事情，我早有耳闻。女工稍有不合，或关闭于木柜内，手足不能伸屈，饥渴竟日；或以红墨涂面，强令立于窄凳之上，故使跌倒，以为笑乐；或反缚两手，以墨令强染面，环行场内，恣人耻辱。试问在他们国内，对其工人岂会如此，更因他国内工人组织之完善而不能，吾人应妥善组织起来，为民族、为阶级死力抗争。”

言毕，全厂工人皆呼号痛哭，下定拼命奋斗之决心。

施洋宣讲完罢工宗旨后，即开始大会第2项议程，将拟出议案，交由全体工人表决。原来，因省工团联罢工斗争经验丰富，陈云卿将工人罢工之原因及所受非人待遇告知，林育南、许白昊等人连夜拟定复工条件数条。

举手表决后，复工条件定为八条：（一）取消虐待工人的常沈管厂二人，及第六、第八、第九、十四、十六、二十九、三十二等号女工头；（二）女工用往时工作法，每行加工资一角，用新法时加三角；（三）男工的工资以每工为标准，并增加工资十分之二；（四）以后不得站台戴枷打人种种野蛮的虐待，并不得乱罚工资；（五）所有工资一律照大洋计算；（六）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如工人自愿辞职或请假时，应得工资须照全数发给；（七）被拘的工人，须要赔偿名誉，及损失等项；（八）罢工期间的工资及损失费，一律按照应得数照给。

随后，按照大会议程，筹备成立烟厂工会。并以工人自荐方式，当场推定男工代表26人、女工代表36人，分负责任。其中，男部：干事长邓保师，副干事长胡义亭，文牍陈伯阶，庶务杨明顺，会计王春山，调查王明堂、杨天太、张忠相，交际宋修亭、康玉山、易人和；女部：干事长陈云卿，副干事长邓香云，庶务张大玉，会计陈元芝，调查胡九英、吴转运，交际刘云卿、张金玉、王英。上述八条复工条件由新成立的烟厂工会首先与工厂交涉。

3项议程过后，天色已晚，随即散会，并约定第2日再在省工团联召开全体烟厂工人大会。

23日下午1时，会议开始，还是由陈天为会议主席。主要讨论筹备烟厂工会的经费来源问题。陈天首先发言：“各位工友们，我们罢工已经7天了，工厂方面没有任何表示，其想法无外乎是不发欠薪，工人没饭吃必乖乖返厂。”

“我们能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陈天突然提高声音，大声地问工人们。

“不能！”工人异口同声地说。

陈天接着说：“我们自己的组织要发挥作用，还得要大家的相互扶持。



我们有些工人家里人口多，着实困难，工厂主们也是看到这点才故意不发欠薪，生活困难的工人们就更加难办，既要养家糊口又要罢工。难道我们忍心看着这些工友们因罢工而冻饿致死？因此首先要解决工会经费问题，大家每人拿出一部分钱用于工会活动开支，并帮扶困难工友共度难关，以取得罢工的最后胜利。至于会费多少由大家自己决定。”



1923年1月12日，《新闻报》刊发关于汉口英美烟厂工人罢工的报道

工人们纷纷赞成这一办法，已选出的男女工人代表分头组织工人商议，最终确定男工每名捐钱一百文，女工每名捐钱六十文，合计所捐总额三百余串。

接下来复议复工条件，应女工们的要求，经全体工人表决通过，要求烟厂将6种有辱女工之做法严行取缔，并加入复工条件。在省工团联的帮助下，烟厂工会初步建立，开始有步骤、有规划地开展罢工斗争。

（张均）

资本家出尔反尔

1922年10月25日，烟厂工会全体工人在省工团联开第四次会议，由临时主席郭葆卿报告昨日赴烟厂谈判的经过，以决定下一步的办法和对策。

郭葆卿说：“昨天，我与陈云卿和邓保师等其他几名代表正式与傅管厂提出大伙儿定下的开工条件，那傅管厂只一味说好，说你们的这些条件都好商量，只要工人们都上工，洋经理自然会给一个说法。”

郭葆卿的话刚说完，众人便开始议论起来。

“这是外人戏弄我们的鬼计，说得这么好听，给个说法，这么不左不右的，谁知道要是上工了会是什么样子？”

“条件不解决，万万不上工！”

“工厂因罢工停办了还好，那我们改行做其他事情，要是继续办下去，不先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就一直和他们干到底！”

在郭葆卿的主持下，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决议：坚持所提条件，不答应绝不复工。女工干事长陈云卿悲愤地说道：“工友们，我们此次罢工是给全体工人谋一条活路，因而我们必须一致团结，在条件没有解决之前，万万不能上工。如果受人愚弄，私自上工，则外人对待我们必将更加刻薄，与其过从前一样猪狗不如的生活，不如就此时机勇往直前，不达到目的，誓不开工！”

杨德甫最后发言：“听说烟厂那边放出话来，洋经理已经请了律师，要与我们工会打官司。这点大家也不用怕，他们要打官司就要他们打好了，工人做不做工，本来就是自由的，再说我们工人又没有损坏工厂的任何设备，所以我们不用怕他们。这完全是他们的一种恐吓，我们不用理他们。”

杨德甫的讲话引起工人哄堂大笑。工人们笑过后，杨德甫接着说：“烟



厂对待我们工人的残酷，要是拿到太阳底下，他们当然理亏，所以只要坚持，胜利终将是我们的！”

工人听后，极受鼓舞，因烟厂工会成立后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会所，大家议定烟厂代表先在省工团联办公。

第二天一早，烟厂工会代表和杨德甫等人正在工会里商议组织罢工游行的具体安排，从门口进来两人，女工王友娣定睛一看，这不正是烟厂鲍买办和王工头吗？王友娣急忙向周围人使眼色，待众人扭身转向门口，两人已经来到跟前。

看了看鲍买办递过来的信函，杨德甫明白原来是烟厂的洋经理邀工人赴厂谈判，当下和几位代表一起商量，决定还是要按照复工条件来谈，然后即由男工胡义亭、陈伯阶、王春山等4人，女代表陈云卿、邓青云、陈允芝、刘金伢、王有娣等5人，加上省工团联合会代表杨德甫等2人一起前往该厂。

与洋经理对坐后，男工代表胡义亭就提出复工的8项条件。

仔细听着条件，其林姆心里就一阵阵的不舒服，心想：这些往日只知道干活的苦力，现在讲起条件来也是有板有眼。但又一想罢工已经10来天了，短期内招新工人又不可能，要是任务完不成，不好向总厂交差。心里面绕了这么一大圈，打定了和工人谈判的主意。

胡义亭说完，其林姆说：“方才所言第一项，要求取消沈、常两管厂及女工头七人，所持理由乃是因他们有虐工行径，但我厂平日并不虐待工人，就算是有，可无人报告，我们也不能察觉。若取消管厂、工头，不等于我们承认有此行为吗？所以此条万不能准许。”

看其林姆有意袒护工头，几位代表凑在一起商议：第一条就遇到阻力，其他的更是不用谈了，决定不再谈下去。

其林姆见工人代表要走，忙起身挽留：“各位不急着想走啊，条件还可以再商量，只要工人们先行上工，条件我们可以慢慢谈嘛！不然我们明天继续商谈？”

女工代表陈云卿说：“先答应我们的条件才能复工，这是全体工人的

一致要求，否则我们即使冻饿致死也绝不复工！”

看女工代表的言语过于激烈，杨德甫说：“我们还是明日再谈吧！”

从烟厂出来，代表们径直回到工会开会。杨德甫向其他代表报告了谈判的情况后，众代表讨论决定：依然坚持先答应条件后上工。

杨德甫说：“看那洋经理的态度，是抱定要让工人先上工，看来我们也要做长期打算。罢工已近半月，上次捐出的帮助困难工人的钱都已经用完了，现在的生活又成问题，我看大家是不是把他们列一个名单，通过省工团联把他们安排到其他工厂先做工，以应付现在的困难。”

和其他几个工会的代表商议后，大家决定男工转送武汉各厂，女工则转送棉花厂，以作长时间罢工的打算。烟厂工人代表也都赞成这个办法。

接下来讨论罢工方法，决定明日一早就到汉口总商会请愿，要求停止虐工并增加工资，以对洋经理施加压力。与其林姆谈判时，其一口咬定没有人向他报告有虐工事件，代表决定在谈判时加上一条：如工人犯错，如须罚办必须通知工会，经工会同意后才可实施，以堵其林姆之口。

27日上午11时许，烟厂工会全体3000余工人在工团联集合完毕后，林育南说：“工友们，我们今天去总商会请愿，乃是欲向商会说明我工人之惨状，以维护我们的权益，因此，我们需保持秩序，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斗争，而不给人造成故意闹事之印象，希望大家都能听从安排。”

随后在陈云卿、邓保师等代表的组织下，工人队伍浩浩荡荡地向总商会进发。工人们刚到达总商会，警察厅派来的行政科科长徐惠庭带着一批警察赶到，原本是要防备工人闹事，可看到在代表们的组织下，工人们全都安静地席地坐在会所门前，一下子被工人们如此强的纪律性震惊了，也不好多说什么，便把上前说明情况的几位代表引入会所内，并留警察维持外面工人的秩序。

问毕代表们的姓名住址，徐惠庭说：“你们这么多人，齐聚总商会门前，是为的什么事情啊？”

吴怡廷、陈云卿就把早已拟好的2封请愿书递上去，并说：“我们是因为力争工人人格，不许洋资本家虐待2件事情而来，向总商会和省商联



会请愿，为我们解决此事。”

徐惠庭只是想工人别闹事便好，自己就可以交差，哪里会管工人的要求，心里面盘算好怎么把工人们打发回去后，打着官腔说：“英美烟草公司是外国人开办，有什么事情，须由你们工人办一份公函，交到警厅，再由警厅交由交涉署，为你们办理。现在你们到商会请愿，商会也不能为你们帮忙。况且商会当下正在提倡禁止吸纸烟，以反对者出面向烟厂调解，难以办到。”

顿了一下，徐惠庭接着说：“商会现在帮不了你们，你们好生吩咐工人们都回家。以后如果有其他事情，还可以再来找商会。”

代表们知道再要求下去也没什么意义，遂出门分头向工人说明交涉情形，工人散去后，代表们又回到工团联。

按照原计划，工人代表们与杨德甫等人碰面后，又带上翻译1人，到烟厂进行第2次谈判。

不料到工厂后，竟吃了闭门羹，其林姆拒不与工人代表见面。其林姆想撇开工人，直接与汉口政府交涉，以逼迫工人上工，这样就不用答应工人的复工条件。他搬出后台——英租界总领事葛福、副领事默恩。

工人代表极为愤怒，折回工团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办法。

项德隆首先发言：“现今，烟厂罢工之事，已经关系到整个武汉工人运动的发展，我建议要把整个武汉的工人组织都发动起来，支援烟厂的工友。”

项德隆说完，林育南站起来说：“我赞成项德隆的意见，明天即召开武昌阳夏三处劳工特别大会，商讨一致反对烟厂的办法。”

经各位代表的举手表决，最后通过决议：向三镇各工会发出邀请，于明日在省工团联开会。同时，印制传单，由烟厂工人向市民宣传烟厂虐待工人之惨状，声讨洋资本家，并引起舆论的关注。

第二天，天空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伴着阵阵寒风，武汉三镇的秋意越来越浓。“大家来看看，看看这些洋资本家都是怎么对我们工人的！”3000余烟厂工人依然穿着夏衣，不顾下雨路面湿滑，撑起雨伞，走上街头，向路人散发传单，一一列举工头虐待工人的种种非人手法。“这年头，

工人的命可是真凄惨啊！”看了传单，路人纷纷感叹。有的人愤恨地说道：“要是这样，你们就应该一直罢工下去。”

省工团联里，三镇 20 余个工会代表齐聚，临时主席杨德甫报告了烟厂罢工几日来的情形。杨德甫说：“昨日，本与烟厂的洋经理约定谈判，不想代表们到了，洋经理又避而不见，第一次谈判时还对虐工事实一概否认，想此次罢工必要面临极大阻力，英美烟厂家底厚实，现罢工已十来天，困难的工友现在都三餐不饱……”

未待杨德甫说完，项德隆兴冲冲地从外面跑进来，到杨德甫身边耳语几句，杨德甫听后，马上大声说：“各位代表，德隆刚刚打听到一个新消息，英美烟厂上海总厂的总经理娄斯今天同协调人程人杰刚刚抵达汉口，住进东方旅社五十六号，看样子是为工人罢工之事而来，现在是最为紧要的时候，我们要是挺过去了，一定能取得罢工的胜利！”

“他们这次来，还不知道谈判罢工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只要我们工人能够同心协力，抱成一团，他们就会畏惧，我们烟厂工人的命运才能改变。”项德隆补充说道。

各工会代表纷纷表示要向烟厂工人捐助，汉口车夫工会代表说：“我们还可以组织三镇总罢工，配合烟厂的工友们。”

最终决定，先同程人杰等人谈判，若依然不答应工人的合理要求，三镇工人一同举行总罢工。

原来，其林姆携英国领事到交涉署同陈交涉员商谈时，碰到了一个软钉子。刚一会面，说明来意后，陈交涉员首先诘问报纸上所载烟厂虐工事件是否属实，却也并不做深究，只是说无则甚好，若真如报纸上所说，则要改正。当要求交涉署解决工人罢工问题时，陈交涉员干脆推脱得一干二净，说烟厂虽属特别区管辖，但我警察之责任只是保护工厂房屋、机器不受破坏，工人罢工之事不在权限范围内。其林姆无奈，只得电告上海总厂，总厂即连夜派人到汉，解决延续将近半月的罢工事件。

上海总厂方面急需解决罢工事件，恢复生产，因此第二天即与省工团联交涉，约定在 30 日开始谈判。31 日，在商谈好最难的做新式卷烟怎么



计算工资后，12月1日晚上7点钟，双方代表在烟厂写字楼商谈工人们提出的其他条件，进展相当顺利，到8点即达成协议。不仅工人的8项要求全部得到满足，而且约定为保证不再虐待女工，由工团联派杨德甫为代表，每周进厂参观1次。

2日上午，烟厂工人怀着喜悦的心情进厂上工。但其林姆并不打算一一履行与工会达成的协议。

工头们虽不敢像以前一样明目张胆地凌辱女工，但为了赶年底工期，他们天天盯着工人干活，复工后也几乎天天加班。想着到月底肯定要有加班费，工人们还是没有什么怨言。

1月3日是发工资的时间。工人们一个个喜气洋洋，下了班，就排好队伍，往出纳那里领工资。

“你是不是给错了，怎么还这么少？不是应该按每日三角大洋算的吗？”头一个去领工资的陈元芝仔细把工资数了一遍，然后向出纳问道。

“就这么多，”出纳不耐烦地看了看陈元芝说，“想不想要，不要就放回来，别挡着后面的人。”

“对了，陈元芝，往后你都不用来了。”出纳又看了一下手边的名单，从窗口中探出头来喊道。

“凭什么开除陈元芝？”排在后面的女工们听到出纳这么说，大声地质问道。

工会男女干事长邓保师和陈云卿也从队伍后面跑过来询问情况，听陈元芝把事情原委说清楚后，陈云卿对邓保师说：“今天的工资不能领了，要他们把事情说清楚再说，你去向男工们说，我给女工讲。让工人们晚上到省工团联集合，确定办法。”

两人随即分头行动，全场工人得知这种情况后，也都拒领工资，全体出厂。

晚8时，烟厂工人正式开始开会，省工团联的杨德甫、张笃等人也应邀出席。

大会一开始，女工干事长陈云卿即向全体工人提出几个问题：为什么

我们的工资没按照约定的数额发放？为什么陈元芝被无故开除？为什么辛苦加班一个月也没有加班费？

听了陈云卿的提问，会场上立即响起工人們的议论声。

过了一会儿，陈云卿说：“因为陈元芝是工会代表之一，他们开除陈元芝就是想破坏我们刚成立的工会！这些没有一点良心的洋资本家从没有打算履行上次说好的复工条件。工友们，我们该怎么办？”

“继续罢工！”有工人喊道。

“对，我们就是要再罢工，罢工就是我们工人握在手中的重要武器。”杨德甫起身对工人们说，“洋资本家出尔反尔，就是认为我们工人没有斗争的决心，省工团联全力支持你们。”

陈云卿和杨德甫的话，激起工人们再次罢工的决心。经举手表决，全体工人一致赞成罢工，决定从4号开始举行第2次罢工。

（张均）



据理力争终维权

1923年1月4日，烟厂工人向全国发出《罢工宣言》，谴责英资本家不履行协议，反而变本加厉，开除工人代表，摧残工会的恶劣行径。通电一经发出，武汉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工人的二次罢工宣言。

7日，省工团联召集各工团会议，商量对烟厂的第2次罢工的策略。

“我们的罢工通电已经发向全国了，工人们现在也很团结，但就单靠我们，实力还是不够，还需要各个工团工友们的支持。”陈云卿说完，用期待的目光看着在座的各位代表。

许白昊首先表态：“我代表铁厂工会，要说两句。现在武汉的工人运动正处于大好的局面，到今天为止已近40个，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英美烟厂的出尔反尔无疑是给我们工会的一个打击，如若不同他们斗下去，我们工会在工人心目中的威信还怎么树立？其他资本家要是向英美烟厂学习闻风而起，我们的工会还怎么能存在下去？”

“所以，我们铁厂工会才完全支持英美烟厂工人的立场。”许白昊斩钉截铁地说。

“你说的就是我们想说的。”众工会代表对许白昊做的一番分析都持肯定态度。看代表们的立场达成一致，杨德甫说：“好，我们说干就干！现在大家就提一下具体的办法。我先提一个。”

“上次与烟厂达成谈判复工的协议，是由咱们省工团联和新成立的烟厂工会出面的，烟厂工会现在已经发出了二次罢工的宣言，因此我们省工团联也应向烟厂问罪。大家看这个想法怎么样？”

“这个提法好，我们向烟厂问罪，非常合理。”项德隆看了一下挂在墙上的匾额，接着说，“我提议去问罪的同时，把上次烟厂送来的那块匾

匾一道给他们送回去。”众人的目光也都聚焦在挂在屋里西墙上的那块匾额。这块匾是烟厂在上次复工谈判后送来的，说是以示对省工团联的感谢。前后不过1月，烟厂就变卦，怎能叫代表们不气愤。

“最好在这块匾上把烟厂违背了协议的哪一条哪一款都给它写上去，看他们还有什么脸面！”素来点子多的陈天把这个想法一说，立即引起代表们的一阵哄笑，这个提议，代表们也是一致赞成。

最后经过表决，大会达成3项决议，除向烟厂问罪，送还匾额外，还决定各工团也向烟厂发出警告书。

9日这一天，其林姆的心情特别不好。这两天来，所有武汉的报纸上都有武汉各工团发表的警告书，省工团联还在今天把匾额给退了回来。听着翻译念着匾额上的字，其林姆的脸青一阵红一阵，还没等翻译说完，即叫翻译不要念下去了。在中国，素以人上人自居的其林姆哪受过中国人的这番挖苦，不禁由羞转怒，并把怨气转到工人身上。

10日，武汉各大报纸纷纷刊登出烟厂因罢工停办，请原男女工人分别于12、13两日来厂领取欠薪的消息。不料数百名女工进厂后，即被早埋伏在厂里的英国巡捕横截痛打，一时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有20余位女工躲避不及，受到重伤。原来，登报说明工厂停办只是他们的一个幌子，真实意图是要把工人骗进厂后伺机报复。

外国资本家的淫威没有吓倒工人，反而使工人们斗争的决心更加坚定，他们这种卑劣的手法也为工人们所不齿。看到同一战壕的工友在病床上呻吟，工人们激愤异常，在全体工人大会上，都表示“决心与英资本家奋斗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0日，汉口又发生英国棉花打包厂勾结巡捕，肆意殴打工人和无辜华人的事件，武汉各界掀起反对英帝的风潮，而商会正在提倡禁止吸纸烟。乘此时机，17日，省工团联向英美烟厂资本家发出《最后警告书》，警告英美烟厂资本家：“不必再用欺诈手段，迅速允许工人之条件，否则决以敌对地位，号召我国人，断绝通商关系，禁绝贵烟厂纸烟之目的。”

收到省工团联的警告书后，烟厂方面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为不使事件



进一步升级，急忙派人与省工团联接洽谈复工问题。

19日，在中央旅社25号房内，烟厂与工会举行第一次谈判。公司方面代表为上海大班娄斯，汉口大班其林姆，仲裁人文昆山、程人杰；工会方面男代表王春山、丁海山、李占鳌、陈伯阶，女代表陈云卿、陈元芝；仲裁人施洋、陈天、许白昊，顾问张冠军、周天为；另外还有新闻记者、各工团代表等旁听者10余人。

下午3时，谈判开始。英美烟厂代表程人杰首先发言。他说：“今日开始谈判目的，在和平解决问题，希望双方平心静气，互相磋商。今天谈判未终结，明日可继续有效。”在谈判程序上，采纳施洋提出的方法：先由工人提出要求条件，再由厂方答复。

然工人提出第1项条件，要求恢复工会代表同厂方的直接交涉权时，就遭到厂方百般狡辩。

娄斯说：“前时忍受工联会代表制度，原期代表们能负起对工人的维持纠察之责，但不料上次协议签订以来，工人代表反生出种种违背厂规之事，这才发展到现在到这种地步。所以希望工会多加谅解。”

张冠军批驳娄斯的理由说：“女工方面被开除者，大部分是因为贵厂管理压迫所致。说明管理有失当处甚多。若工会可与厂方交涉，必能对其不良之点设法救济。”

工会仲裁人施洋说：“工人所以设立工会，对内在团结工人的精神，对外在代表工人之利益，沟通工人与工厂两方之意思。欲期意思易于沟通，全在直接；欲期意思不至凌乱，尤在团体表示；执行此项表示，则在工会代表。就此理论而言，工人固应有工会，工会固应有代表。也就是说，工会代表对于工厂及任何方面应有直接交涉权。再就历史而言，他国暂且不论，即如英国，在百年前，已有工会组织，在五十年前已有劳工保护法、工会组织法。近年来，而英之三角同盟，如运输工会、铁路工会、矿工会等，不独对工厂主有直接交涉权，即乔治首相亦时枉驾工会，与工人握手、与代表讨论工人生活问题。”

“再就拿贵烟厂而言，前次与工会订立条约时，已经承认工会代表与

贵厂有直接交涉权，”施洋从皮包里找出条约拿在手上说，“现在条约俱在，墨迹未干，但贵厂却违背条约，蔑视工人代表，素来以重信用闻名于世的英吉利人，而有此不信之疵污，实属遗憾。此工人要求恢复工会代表直接交涉权，贵厂也应该承认的理由。”

娄斯和其林姆没有想到施洋竟能直接拿出英国工会作为例证，且直接揭露其出尔反尔的丑态，哪里还有余地反驳，只好答应。而此时已到晚上7点。经烟厂仲裁程人杰与工会代表和其他仲裁人反复商量后，宣布当天谈判结束，20日早上仍在此地点继续谈判。

20日上午10时，在中央旅社开第2次谈判，与会代表与上次谈判人员相同。经过2个小时的磋商，厂方才答应工人代表提出的条件，恢复第1次罢工后被无故开除的工人的工作。

时近晌午，却也只达成1项协议——工会代表提出下午5时到7时进行第3次谈判。

下午5点半，谈判一开始即在赔偿工人罢工工资问题上陷入胶着状态。

娄斯首先发言：“对于工人提出的赔偿罢工工资一层，欧美各国无此例，只允许给米100石。”

娄斯动辄以国际成例为其撑腰，对此知之甚少的工人无从反驳，但工人代表均表示坚决不允，必要求以工资进行赔付。

施洋发言说：“欧美已有此例，而且在中国也有先例，如海员等亦是赔偿罢工工资。”

施洋一句话让工人代表明白娄斯又在使用欺瞒手法。6位代表凑在一起商议后，王春山说：“既已有成例，工人要求自然合理，必要以工资作为赔偿。”接着话音一转说：“至于具体数额，可看在各仲裁为此事颇费力气的分上，我们工人自愿让出三分之一，只得三分之二。”

见谎言又被揭穿，娄斯也不敢再说什么国际惯例，但依然坚持原议，并许诺可以再加25石。各仲裁及双方当事人谈判此事已2时余，工人方面为不致谈判无法继续，复决定再让步至十分之五，但娄斯还是不允，坚持以米给付，并自动退出谈判席。



第3次谈判因此破裂，工人代表从会上出来后，齐聚工联会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议对付外人的一切办法。

会议刚开有1刻钟的时候，首位发言的仲裁人陈天向大家建议，把厂方制造谈判决裂的情形通电全国。

公司仲裁人程人杰赶到工联会，请求进行第4次谈判。程人杰解释说：“公司方面已经委托我为全权代表，我来想恳请各位代表稍后继续谈判。对刚才发生的不愉快，我代表公司向各位致歉。”

工会方面经过商议，决定续开谈判。地点改在荟华旅社，时间为晚上9点钟。

程人杰首先发言，一改前次坚持的给米赔偿的法子，认赔偿损失费6000元。处处为工人着想的施洋算了一笔账：“以三千工人计，每工平均五角合洋二万七千元，折半亦须一万三千五百元。我来再替工人评判一下，以十分之四合算为一万零八百元。”

程人杰左右支吾，不同意施洋的说法，可又说不出恰当的理由。仲裁人文昆山见状说：“我的主张，直说一句就是9000元罢！”程人杰依然面露难色。文昆山复言：“我们当仲裁人作点主。”工会仲裁人施洋、陈天均赞成文昆山的主张。程人杰最终同意赔偿9000元。

其余各项条款，经过6小时据理力争，最终迫使资本家接受工人提出的13项合理要求。双方当事人、仲裁人、顾问签字，定于21日正午仍在中央旅社交换正式契约。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烟厂工人两次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工人于22日上午复工。

（张均）



播火荆楚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花厂反帝



英租界血案

英租界内的隆茂、平和、利华三家洋行打包厂工作的汉口棉花工人，在武汉工运发展的高潮中受到教育，于是工人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

隆茂打包厂买办杨景笙自打工会成立起，3个月来就一直睡不好觉，心里天天在盘算着怎样搞垮工会。工会刚一成立，杨景笙的顶头上司洋老板就对其授意，让他想办法。暗地里，杨景笙把工头程赞卿、田炳臣、陈寿山、鲁玉山、张天德、桂茂才等6人召集到一起，商量破坏工会的办法。

“这帮穷鬼，抱在一起成立个什么工会，分明是与我们为难嘛，一定不能让他们搞成气候了，是要想个法子。”几个人对杨景笙的意见一致赞成。

“我们是同驶一条船，荣辱与共，”杨景笙看他们几个人和自己的看



汉口英商隆茂打包厂（左）旧影

法一样，就把真实想法说出来，“兄弟是想让诸位也成立个组织，与他们的工会斗法，当然我们成立的组织，是不能与我们为难的，这样我们才能睡个安稳觉。你们看工会刚刚成立，就使得每工每天加

80文的工钱，如果要是让他们再继续做大，要再增加工资改善待遇，这样我们会很难办，哪还有好日子过。”

几个人好像倒苦水一样，你一言我一语商量着办法，最后决定由程赞卿等6个工头负责成立专门与工会作对的组织——同人会。当场，他们就筹划出1条破坏工会的毒计。

1923年1月9日早晨，工人们按照以前的惯例，早早地在厂门口排起长队领工作牌，要进厂上工，队伍中却出现一些以前没有见过的新人。刚排到王春喜，给工人发牌的熊监工看了一下他胸口别的工会会员章，说：

“你不用去了，我们又招了新人。”王春喜一下愣住了，站在队伍外面半天没有回过神来，自己在厂子里面少说也干了近5年了，怎么说辞退就辞退，而且招技术不熟练的新人来代替自己？马上到年关了，工作没了，这个年可怎么过？原来在前一天晚上，杨景笙等人就商议把一部分加入工会的工人开除，重新招募一批工人，然后以加入同人会的工人每月比工会工人多60文工钱，引诱他们入伙，以削弱工会的力量。

和王春喜一样遭遇的还有200~300人，也都是工会会员。工人们聚集在厂门口为被辞退的工友们愤愤不平，工会负责人陈试漠对大伙说：

“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讨个说法，不像以前，我们现在是一个组织，你们的事情就是我们组织的事情，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大家现在先安心上工，今晚大家都到工会开会。”陈试漠的一番话让工人们心里有了底，这才渐渐散去。

下了工，工会的几位负责人和被辞退的工人们聚在一起，商量着应对办法。

“这是他们别有用心使黑手，见我们工会成立，他们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对我们任意打骂，克扣工资，搞出来一个什么同人会，工资还比我们工会工人的工资每月多60文钱，说是以示优待，又招来新人打发走有经验的老工人，这一套都是他们计划好的！”工会交际林德全激动地站起来，把打听到的情况给大伙做了一个汇报。

陈试漠接着说：“情况就是这样，他们是有备而来，显而易见是要破



坏我们工会，想用 60 文钱就收买我们的工人，他们的用心我想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先要动员工友们在这 60 文面前不要动心，要知道他们的计谋要是得逞了，不仅这 60 文没了，说不定还要少拿 60 文工钱呢！”

“闹了半天，他们不是只针对我们这几个人，他们是要拿工会开刀，那他们要是再来这么一手，我们工会不就名存实亡了？”王春喜若有所思地说。

工会文牒杨鼎说：“要想个办法，让他们不能随意开除我们工人。”

陈试谟高兴地说：“我们的组织就是要为我们工人说话，这些买办资本家不能像以前一样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要起来和他们斗，现在工人们大都加入工会，再说背后还有省工团联给我们撑腰，我们这么多人不怕斗不赢他们，给他们提出以后辞不辞工人、进哪些新人也要通过我们工会。大家觉得这个意见怎么样？”

工人们都赞成这个办法，当即举手表决通过。接着又选出王善卿和杨松山 2 人作为工会代表，决定第 2 天就同工厂方面进行交涉。

10 日，按照计划，2 位工人代表首先来到王管厂的办公室，刚刚说明工会向工厂提出的要求，王管厂就一拍桌子，冲着他们 2 人喝道：“呸，什么棉花工会，老子不知道！我看你们都忘了自己是什么人了吧，也配和我商量这个问题，老子想招什么人就招什么人。”当即把外面的几个监工喊进来，把他们 2 人连推带打赶出办公室。

外面工人见状，冲上来护住他们。工会会员黄海卿已经猜到原因，对刚从办公室走出来的王管厂说：“你们凭什么打人？”

“你也配和我讲话！”王管厂对着黄海卿狂叫，“反了，反了，我看你们都不想干了！”他喊来工头鲁玉山、陈寿山和几个监工，不由分说把王善卿、杨松山和黄海卿 3 人按住，用绳子五花大绑，押往英租界巡捕房。

陈试谟把愤怒的工人稳住，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我们先去找杨买办，不行我们再想其他办法。”陈试谟、工会交际林德全、游松山、匡金阶、冯钟以及工会文书杨鼎 6 人作为工会代表，到公司客厅找隆茂花

行的买办杨景笙谈判。

杨景笙已经知道厂子里发生的事情，因而还未等代表们开口，就抢先说：“你们怎么能这样胡闹，干一行就要守一行的规矩。我杨某人待你们也不薄，刚给你们每月多加了 80 文，你们这么做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这件事情我看王管厂没错，你们要好好反省一下，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陈试谟义正词严地说：“刚加了工钱是不假，但立马开除了我们 200~300 名工会工人，招毫无经验的新人，还揽入你们的同人会，同会会会员的工钱又比我们多 60 文，如此厚此薄彼是为的什么？”

林德全接着说：“为什么不答应我们的合理要求？还任意殴打、刑拘我们工人？你们必须立刻通知巡捕房放人。”

杨景笙被这一问，顿时语塞，脸憋得通红，极为气恼，强词夺理地说：“我看你们都不想干了，他们 3 个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

6 位代表看杨景笙偏向王管厂说话，一个鼻孔出气，明白说再多也是白费口舌。回到厂房，把情况和工人们一说，群情激愤。人群中有人喊道：“到巡捕房要人！”大家群起相应，摇班出厂，直奔离花厂不远的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现鄱阳街南京路口西北角），把巡捕房团团围住，振臂高呼“释放无辜工人”，请愿要求放人。

租界俨然就是国中之国，在英租界的地盘上，巡捕房就是英国资本家用来欺压中国人的工具。隆茂花厂早和巡捕房通了气，几个英保带着全副武装的印籍巡捕从巡捕房中鱼贯而出，不听工人们说明情由，冲进人群就用警棍和枪托猛打，武力驱赶工人，并有印巡向人群开枪。这时平和洋行、利华洋行各花厂工人正好放工出厂，见状纷纷上前询问情况，和隆茂花厂工人一样，这 2 个洋行工人身上也粘有刚下工来不及清理的棉絮，凶横的巡捕哪里还分这是哪个厂子的工人，一起劈头盖脸地打过来。

王成头部受伤极重，血流不止。其余受棍伤的有 20 余人，其中有 9 人生命非常危险。就在这时，平日驻扎在长江英国兵舰上的英国义勇队和海军陆战队应招从码头登岸，加入巡捕的队伍对工人猛打。可怜工人们虽人多但手无寸铁，哪里是这些持枪军警的对手？工人们一个个被打倒在地，



巡捕、英兵们还不住手，还要再端上几脚，然后拖进巡捕房。

工人们只好往华界撤退，印巡、英兵视中国人的性命为草芥，一直追着工人猛打，冲进华界，竟对前后花楼和怡园新昌里口毫无瓜葛的行走华人，不分青红皂白，一见便殴。即便是平日里趾高气扬的几个体面商人也被打倒在地，叫苦连连。

工人们原本是来要求巡捕房释放无辜工友，结果遭到无端殴打，还又被捕去 30 多人，极为气愤，聚集在华界后城马路至大智路一带，以图再次围攻巡捕房。

英租界也拉响警笛，紧急戒严，通往英租界的几个铁门也关闭，由英义勇军和海军陆战队把守，架起机关枪对准华界。英租界的街道上罕见行人，只能看见武装汽车飞驰在马路中间。工人们和英租界的军警形成对峙。

自 1907 年汉口城垣拆除后，英租界当局即在租界两侧建铁栅围墙，除在今大智路开一较大通道与大智门火车站相通外，其余街口仅留 1 个小门，并在散生路派遣巡捕站岗，收取巡捕捐。在繁华的前、后花楼街口（今黄陂街、花楼街）筑有 3 道铁门。一遇到他们认为紧急的情况就把这些铁门关闭。

汉口警察厅厅长苏霁接到报告，心想：这帮工人又闹事，非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把事情向汉口镇守使杜锡钧和夏口知事侯小汀通报后，便急匆匆带人赶来。3 人带领着一帮军警到现场，看到有数千名工人与英国义勇军对峙，顿时傻眼。3 人原本有弹压工人的想法，这时马上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希望先把事件平息下去，免得事件再激化出更大的麻烦，他们站在怡园门口向工人喊话说：“各位工人兄弟们，今天下午的事情我们已经知晓了，但你们这样也不是办法，大家先回去，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秉公处理的，给大家一个交代，现在大家都回去吧！”

棉花工会主席陈试谟和几个工会负责人商议了一下，也决定暂且先撤回去，晚上再到省工团联商量下一步的办法，分头由各花行的负责人告知。工人们渐渐散去。

汉口镇守使杜锡钧等 3 人看工人们都散去，回到英租界换了一副嘴脸，

保证工人不再发生此类事情，恳请恢复租界交通，撤离义勇军和海军陆战队，释放被捕工人。经过交涉，到下午 5 时，中断了 1 小时的交通始得恢复，义勇军和海军陆战队也随后退回到兵舰上，但工人却一个也没有释放，准备在第 2 天开庭审理。此时在省工团联，工人们也在商议着办法。

（张均）



英租界会审公所的判决

入夜，品记里省工团联合会的屋里屋外站满了工人，站在屋外的工人不停向靠里边的人打听会场内的情况。棉花工会召集全体会员大会，商量下一步的办法。

陈试谟首先把从各花厂统计出来的受伤与被捕工人的情况向全体工人们做了汇报，他说：“今天下午发生在我们工友身上的血案，其起因也无非是隆茂花厂暗地里组织同人会、破坏工会、无端开除工人，工友为了维护棉花工会的利益，要求实行卖工，谁想竟遭到殴打并抓进巡捕房，工人们气愤不过，这才到巡捕房请愿放人。洋人自己的巡捕房和洋行又是一气，把我们工人不当人看，冲出来肆意殴打。刚放工的利华、平和2厂工友也遭无端殴打，今日的血案完全是由花厂和巡捕房一手造成的！”

陈试谟顿了一下大声说：“工友们！我们蒙此羞辱，该怎么办？”

站在人群中，先前被隆茂花厂无端开除的工人王春喜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跑到讲台说：“哪位工友和我的遭遇一样，马上就要到年关了，他们却把我无端开除，这可叫我一家老小这个年怎么过？工友们，他们开除工人、破坏工会只是第1步，其实是要拿我们全体工人开刀。要是我们对今天的事情就此作罢，我们以后天天都要过这样的日子。工友们联合起来，我们要和他们斗到底！”

在杨景笙密谋下，利华洋行工头程赞卿、徐金榜、田炳臣组织成立了同人会，张天德、陈寿山、曹好等工头也在平和洋行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对此，3厂工人们义愤填膺，屋里屋外的工人们高喊：“工会主持公道！”“和他们斗到底！”“偿还血债！”

刘伯勋说：“被巡捕房抓去的37个工人，明天就要在公堂审判，洋人

的法庭是不会为我们的工友鸣不平的！工人兄弟们团结起来救我们的兄弟啊！”

陈试漠高喊：“为了今天被打被抓的工人，为了我们工人的人格，为了我们的工会，为了维护我们工人的利益，我建议罢工！不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绝不复工！同意此项意见的工人们举手表决。”

会场工人们立马都伸出了胳膊，表示不上工，宁愿忍饥挨饿也决心要与平日里压迫工人的头佬、工头、洋买办和背后的英商们斗到底。

省工团联主席杨德甫说：“各位棉花工会的工友们，省工团联是你们的坚强后盾，我们的 21 个工会团体不会对这件事坐视不管，一定和你们站在一起。”

工人们信心大增，棉花工会的几位负责人随即宣布次日罢工。散会后，陈试漠等人又加紧撰写“花厂工会全体工人被杀痛告书”，交由省工团联自办报纸《真报》刊出。

1923 年 1 月 11 日，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三镇，偌大的江城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繁忙，大街上卖报的小童又开始高声喊出每天的热点新闻，吸引着行人购买，“棉花工会三千工人同盟大罢工”“英租界将于今天开庭审理被捕工人”的声音在大街上此起彼伏。英租界内的隆茂、利华、平和 3 厂不复往日机器轰鸣的情景，厂房里堆积着大量等待处理的棉花，但没有 1 个工人进厂做工。在英租界的另一角，却正在对无辜被捕工人进行着不公正的判决。

汉口英租界内，在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之下，由“大英工部局”负责行政性事务，从“纳税人会议”中选出市政委员 9 至 10 人，设总办 1 名，总办下设会计、工程、卫生、警察四科。警察



英国驻汉领事馆（英租界会审公堂设立在领事馆内）



科别称巡捕房，有检察权，无处理权，其所拘人犯必须于 24 小时内移交会审公堂（设英领事馆内，在今天津路）审理。经审结后，如须处以拘留者，即交洋务公所（今江汉路 31 号，内设拘留所）执行。英租界内的巡捕房、公堂、公所分别相当于检察处、法院和监狱，构成英租界内的司法系统。

会审公堂由华、英双方各派审判员 1 人组成。华方为洋务公所委员，多数情况下英方为领事馆“三领事”（即领事馆内的领事助理员）于每日上午 10 时至 12 时举行会审（礼拜、节日休息），出席人除 2 个审判员外，还有检察人（即巡捕房的大保正或洋保正）、见证人（即原获案人）与翻译等。会审公堂为领事裁判权的产物，对审判结果，英籍审判员有决定权，不用征求洋务公所委员的同意。

洋务公所直属汉口外交特派员公署（今一元路 7 号），设委员 1 人，帮办 1 人。除参加各租界的公堂会审外（英、俄、法、德、日 5 个租界，1 个租界 1 个公堂，各设领事馆内），也代表外交特派员与各租界巡捕房保持经常接触，负责办理关于巡捕房方面临时发生的一切外交事务。

上午 10 时，会审公堂准时开庭，华方审判员是杨培，一般由三领事充当的英方审判员今天却换成了副领事莫斯，英捕房大保正保罗作为检察方代表，隆茂花厂的专职洋律师倍雷也出席，同保罗一起坐在见证人的位置上。另外，在场的还有几名翻译，被捕的 34 名工人——有的头上还能看到被打的伤痕和血迹——都被一一解到。庭下在座的是武汉各报社的记者，想来听审判的工人们却都被拦在门外。在检察人将事先填好有姓名、年龄、犯由、预交保释金额、判词 5 项组成的“犯事报告单”送请审判员过目后，首先，由大保正保罗用英语进行指控。毕后，随堂翻译即进行翻译：“此 37 人，分系隆茂、利华、平和 3 厂工人，其中王善卿、黄海卿 2 人于 10 日上午因违反隆茂花厂规定，擅自闹事被捕进巡捕房。不期 3 厂工人竟合围警厅，扰乱公共秩序，巡捕房出面劝解却遭到攻击，工人涂春山竟殴辱巡长。为确保租界安全，恐事态扩大，无奈之下，方将涂春山和其他为首 34 人予以逮捕。请严加处理，以儆效尤。”

紧接着，隆茂花厂的律师倍雷站起来用英语说：“2 位大人，隆茂花

厂全权委托我为代理律师，王善卿、黄海卿2人确系我厂工人，且是工会头目。10日，2人为私利挑起事端，向工厂要挟由工会卖工，继而被扭送巡捕房，结果不明真相的工人受其蛊惑，摇班出厂包围巡捕房。不仅破坏租界秩序引发冲突，而且影响工厂正常生产。对2人及围攻巡捕房工人此等目无法纪的行为，只有加以严惩，才能防止再出现此类情况。”

按照程序，接下来由华方审判员杨培审问。杨培是个炉火纯青的老官场，在会审中从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往往是英审判员定罪后，在量刑上说些好话，若能求得英审判员同意，不仅显示出自己的官威，又能博得个“做好事”的名声。

杨培用汉语进行审问，翻译又把杨培的审问和工人的回话译为英文。这个过场之后，英租界副领事莫斯命公堂文书将填写完整，除姓名是用汉字外，其他都是英文的“犯事报告单”递交上来，就要按单下判。莫斯说：“经检方和见证人证实，王善卿、黄海卿2人违反工厂规章，提出不合理要求，致使工人包围巡捕房，是这起群体事件的主要肇事者。涂春山不听劝阻，目无法纪竟殴打巡长，情节十分恶劣。此37人在租界闹事，事实清楚，不容人犯狡辩，应按照租界管理章程处理，根据《工部局市政章程警察条例》中闹事拘罚条款，应给予重罚……”

莫斯正说到此处，洋务公所委员杨培附到其耳边，低声说：“领事先生，这些工人都是些只知做工的苦力，围攻巡捕房也是一时的鲁莽之举。昨日巡捕房前的流血事件，现在也引起全市市民关注，为防止事件扩大，只需给他们这些肇事者一点处罚，想必其不敢再做此类事情，也显示出工部局积极处理此事的态度，定能消弭此事。还恳请领事先生宽大为怀。”

莫斯对昨日之事当然很清楚，而且也知道有无辜市民受到巡警的殴打，想着能尽快平息此事，又看到杨培这样求情，不如顺水推舟。

因此，莫斯点头同意杨培的意见，接着说：“此37人，原本应予重罚，但念其初犯，为无知鲁莽之举，且为维护中英友谊，以宽大精神进行处理，希望工人悔过自新。”

接着即宣布判决结果：“肇事者”王善卿3个月监禁，黄海卿4个



月监禁；“殴辱”巡长的涂春山 5 个月监禁；其余 34 名工人，各处 2 月、1 月、3 月期监禁不等。

听到这个判决结果，在座武汉各报社记者皆哗然，英租界公堂对昨日残酷压迫的举动无半点道歉之词，反诬工人，将责任完全推在工人身上，且对判决结果自诩仁厚。在座记者愤怒，堂外工人愤怒，整个三镇愤怒，江城掀起一场反帝怒涛。

（张均）

棉花工人坚持不屈终获胜

工人们动员起来，2023年1月11日下午省工团联召集21个工团代表共200余人开会。花厂主席陈试谟首先将10日花厂工人遭遇向各代表作了汇报，发言时声泪俱下，代表极为悲愤，均表示要给予援助。

陈试谟继续发言说：“经我棉花工会全体代表决定罢工，拟提出以下7项条件：

- (1) 汉口花厂工会，有代表汉口花厂工人，向各花厂直接交涉权；
- (2) 汉口各花厂工人，应由花厂工会介绍；
- (3) 开除隆茂洋行王管厂，工头鲁玉山、陈寿山，利华公司工头程赞卿、徐金榜、田炳臣，平和洋行张天德、陈寿山、曹好等；
- (4) 隆茂洋行应赔工人伤害费及损失费，拘押西牢之工人应放鞭炮放出；
- (5) 隆茂洋行及英国巡捕房应向花厂工会及我国民赔礼认非，并保证永远不得使武装巡捕，辱打工人；
- (6) 上工时间为上午7时、下午1时，下工时间为上午11时、下午5时；
- (7) 所有伤害之工人，隆茂应负完全责任。望各工团援助棉花工会，为被打、被捕、被无端开除的工人们讨说法，为武汉工人自己的组织争活路！”

省工团联主席杨德甫说：“这七条要求非常合理，不答应决不复工。昨日晚，棉花工会全体工人发布‘花厂工会全体工人被杀痛告书’，但还没有发表罢工宣言，应该尽快起草发表，让全社会都清楚外国资本家对我们工人的残酷压迫，和我们坚决斗争的决心。自从我们工会组织红红火火地开展以来，外国资本家就开始蓄意破坏，几个月前的英美烟厂罢工，厂



方虽然当时答应工人复工条件，却阳奉阴违，现在突然宣布停工。租界人力车工友们要求自己的权益现又受阻。因此我们工会之间不仅须要更加密切地团结起来，同时要争取更多群众的支持。”

汉冶萍总工会和汉阳铁厂工会负责人许白昊说：“杨主席说得很对，我们的工会组织是一个整体，与强大的外国资本家斗争，要想获得胜利必须共同进退，非常情况下可组织同盟罢工。”

其他工会代表也纷纷表示要对这3个工会的工友们实施援助。扬子机器厂代表陈天建议：在上述3项罢工事件没有解决以前，各工团每日各派代表到联合会，以应对各种情况。最后表决通过4项决议：

- (1) 由工会发出紧急宣言，请全国各界与国际资本主义作战；
- (2) 各工团一致以实力抗争；
- (3) 在三事未解决以前，各工团每日各派代表到会，执行事务；
- (4) 定星期六（即13日）开第1次会，讨论第2步进行的办法。

汉口棉花工会男女3000工人发表的罢工宣言迅速见诸武汉各报纸头版，武汉各工团也纷纷发表声明与其呼应。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会表示“誓做诸君之后盾”，总部设在武汉的汉冶萍总工会和汉阳铁厂工会登报声明：3-5日内不释放关押工友，将全体罢工援助。

与此同时，三镇的其他团体也行动起来。12日晚，武汉新闻记者召开联欢会，发表郑重宣言，声讨英国资本家对工人的任意毒打、惨杀、拘禁，要替工人讨公道，要求英有关方面负责人道歉。14日，湖北自治促进会、省立宪讨论会、民生研究会等10余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声援棉花工会反帝罢工斗争，讨论通过6项雪耻办法：推选4位代表晋谒交涉员陈介与英领事严重交涉；英领事须向中国官厅道歉；此后英人不得擅自关闭后花楼及大智路铁门，致碍交通；将殴打华人之凶手交我国官厅惩罚；英领事及各花厂须认可工人之要求条件；英人此后不得荷枪实弹、在租界地界与华界毗连之街道行走及向华界架炮，不得摧残华工。

13日晚，省工团联再次召集所属工团代表开会，总干事项德隆把3日来花厂罢工的情况做了简单介绍。项德隆说：“棉花工会全体罢工以来，

已经引起三镇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不仅各工团进行经济和实力援助，而且也有数 10 团体表示声援，对罢工取得胜利是很好的帮助。”

棉花工会负责人陈试谟说：“虽然罢工后工人生活更加艰难，但承蒙各工团鼎力接济，送钱送粮，还得以维持生计，也让我们更加有了信心。即使还有更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坚持下去，不到罢工胜利决不复工。”

杨德甫面露喜色道：“现在的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进行声势更加浩大的罢工。洋资本家自恃财大气粗，不会轻易同意我们工会的要求，但是与打包厂有往来的各个行商是经受不住损失的，我们只要多坚持一天，就多一分罢工胜利的希望。”

会议最后决定于次日举行罢工游行示威。果不其然，第 2 天棉花工会的工人们正在省工团联门口集合准备出发，从队伍外面挤进来 2 个身穿长袍棉褂、头戴礼帽的人，向工人们打听谁是负责人，然后径直进入会所找到杨德甫。

一番寒暄后，此 2 人表明身份，他们正是汉口总商会会董郑慧吾和赵典文，前来为华人行商说项，出面调停花厂罢工，实际上也是为了尽快平息罢工事件，减少自己的损失。

郑惠吾满脸堆笑地说：“花厂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商会也是非常着急，正在想办法斡旋。说到底我们都是中国人，那些个洋老板们能够经受住损失，但不少华商们都把身家性命压在这些棉花上，要是不能按时交货，就要破产，这对我们工人们也没有益处。”

绕了一个大圈子，郑惠吾终于说到正题上。赵典文接过话茬说：“工会方面能不能先暂缓进行罢工游行，以免双方过于激烈反而更加难以调解，如果这样相持不下，华商、工人们都要吃亏。”

站在杨德甫身边的陈试谟激动地说：“我们的工友现在还被关在大牢里，你去问问站在外面的工人，看他们愿不愿意！”

杨德甫想了一下说：“今天的游行可以暂缓，我们也知道其中的利害，但不给我们被打、被关、被无端开除的工人们一个公道的说法，即便工人们食不果腹，也要坚持斗争下去。”



郑惠吾、赵典文二人又表示要妥善处理此事，然后告辞出来。路上，赵典文不无感伤地对郑惠吾说：“近两年来，工人组织越来越多，工人们也越来越团结，不再像以前那么好对付了。”

工会这边，杨德甫、陈试漠把刚才的情况同几个工会负责人说明，然后分头通知工人暂不举行游行。工人四散后，负责人留下来商讨办法。杨德甫说：“现在的情况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花行首先顶不住了，只要我们再施加压力，罢工一定能胜利。”

许白昊说：“我们还要讲一下策略，由棉花工会和省工团联分别出面才好。”

项德隆说：“既然他们怕我们游行，我们就再发表一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游行宣言，工团联方面也声明支持，双管齐下，一方面表示我们的决心，一方面还能起到施加压力的效果。”

项德隆的建议，几位负责人一致赞成。第2天武汉报纸上就登出了棉花工会的《拼命游行宣誓书》和省工团联发出的《呼吁书》。

一大早郑惠吾看到报纸，就急忙出门搭车找到赵典文，说：“今天的报纸你看到了吧，棉花工会又发出了示威书，省工团联也表示支持，写着什么我们挨饿冻死誓死奋斗，什么我等工人自当抱定宁死不辱之志



江汉关监督公署

与洋鬼奋争。看这样子，棉花工会的工人们是不会轻易复工的。这个事情要快点解决，迟一点又不知道要出什么茬子。花行里面也有我们的股本，晚一天我们就要多一天的损失。要把两方尽快拉到一起，让工人们尽快复工。”

赵典文连连称是，两人一合计，就先到汉口警察厅。一番交涉后，汉口警察厅也不能无视全市各界的呼声，放出了关押在此的5名工人。总商会借此以表达要解决此事的诚意，然后派人分别致函汉口各花行和棉花工会，约定16日午后2点在总商会举行谈判会。

工会以刘伯勋、陈试谟和杨德甫等人代表，花行则由洋行和花厂两方共同出席，赵典文和郑惠吾为总商会的斡旋人。工会代表陈试谟首先说明此次事件的责任完全在花行方面，只有答应工人所提7条要求，才有复工可能。花行代表则表示，除认可改定上工时间外，其余条件均不答应。两方第1次谈判草草收场，无果而散。会后约定第2天继续商谈。当晚棉花工会又进行磋商，依然决定按照先前议好的办法，向华商施压。

17日上午，两方继续在总商会谈判，由于工会方面的坚持，谈判依然是围绕着工会所提出的7项条件进行协商。

工会代表陈试谟首先表明态度：“棉花工会成立至今已3月有余，却一直不能得到应有的承认，我工会成立之宗旨即在维护工人之根本权益，为工人同工厂方面交涉之机构，若早些时候承认工会，想此次事件必不至于如此地步，此条乃此次谈判必须解决的第1个问题。为工人之权益、幸福计，按照通行办法，工人每日上工时间不得超过8个小时，新人进厂需先经过工会介绍。”

陈试谟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另外，各花行以监督工人做工聘用之工头，凶蛮成性，动辄打骂工人，以欺压工人为乐，隆茂工头王管厂更是激成此变之元凶，因而各花行必须取消工头制。”

刘统勋接着陈试谟的话说：“上述4条乃棉花工人所应具有之最根本权益，而对此事件的解决必须首先释放关押在巡捕房的工人，对被打工人也应由花厂方面给予赔偿。释放工人是最先要解决的问题。”



看到工人说得这样有理有据，仲裁人赵典文和郑惠吾也找不到替华商花行说话的理由。但是洋行方面的意见并不统一，其中隆茂花厂的态度最为强硬。隆茂花厂代表倍雷坚持认为责任全在工人一方，对工会代表提出的先将被捕工人释放后再复工的条件更是不能接受。第2次谈判，双方再次没能达成统一。

当晚10点，赵典文复请双方代表及其他仲裁人到皮业公所商讨复工事宜。此时赵典文心急如焚：上海那边天天在催货，自己堆放在花厂中的棉花现在因工人罢工，花厂关闭，无法打包出厂，要是不能按期交货就要按合同赔款。他现在是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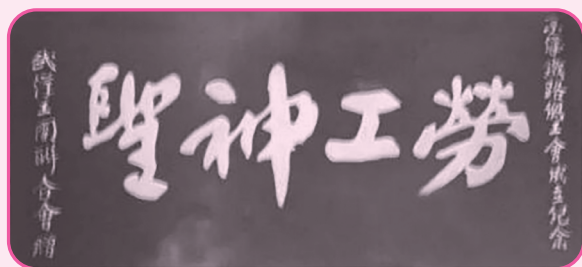
工人代表知晓情况后，为保护华商资本和顾虑工人罢工后的生活，转移战略，先撇开隆茂花厂，主动提出如利华、平和等行承认工人条件，可单独复工，赵典文等仲裁人也极力赞同，但这2个洋行方面还是无全权负责代表出面，商谈依然没有取得进展。

几位仲裁人也知道现在的问题不是在工人这边，而是几大花行倚仗垄断汉口轧花业，采取拖延的方法，以逼使工人就范。但工人们的态度更加坚决，现在的让步已经是最大限度。几个华商在一起商议，最后决定花行华商同工人谈妥条件后，再由其出面与花厂方面进行协商。方案确定后，当晚即通知工会于18日午后，在大同旅社进行最后谈判。

第2天的谈判进行得相当顺利，唯工会要求赔偿被打工人医药费和罢工损失一条，以赔偿1750串做抵，并约定先交1000串，余750串变作米票俟年终交由工会，工会提出的其余6项条件全部答应。晚8时，双方在皮业公所签字。19日上午，被关押的32名工人全部释放，并交付赔偿款项。同日下午，工人复工。

历时8天的棉花工人反帝罢工，最终取得了完全胜利。

（张均）



播火荆楚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潮起江岸



江岸密会

黄昏下，江岸机车厂简陋的铁路工人村里，已经是户户升起了炊烟，不远处传来一阵阵火车汽笛声。离江岸车站不远的一个低湿地方，老远就能听到从屋子里传出来热烈的讨论声。这天，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迎来了贵客，京汉铁路上已经成立的各工团分会，现正在召开第三次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

随着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192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把建立全国性的铁路工会提上了工作议程，计划先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继而各城市成立各业工会，再联合成立各城市工团联合会，并准备于1923年5月1日在武汉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谋求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但全国各铁路工会发展情况极不平衡，其中纵贯直隶（河北）、河南、湖北三省的京汉铁路发展最为健全。自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与郑州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相继成立后，江岸以北的广水、信阳、驻马店、郾城、许昌各站的工人俱乐部也陆续成立。长辛店的工人俱乐部于1922年4月间成立，其余郑州以北、长辛店以南的各站，如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现邢台）、彰德（现安阳）、新乡各站也发动起来了。中共中央做出先期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决定。事关重大，中央派出长期负责工运工作的张国焘前来指导。

4月上旬，在长辛店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后，15个站点工团代表于8月10日到12日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筹备大会，决定总工会筹备会的负责人如下：江岸的杨德甫为委员长，郑州的凌楚潘、长辛店的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德隆为总干事，吴汝明为副总干事，来参加会议的每站代表自为每站的筹备委员。同时，大会以项德隆和凌楚潘共同起草的章程为基础，

开展讨论，与会代表又对工会和工人生活提出 60 余条提案，闭会时将经过讨论的总工会章程草案交由各筹备委员带回各厂站，征求全路工人的意见，并议定在 9 月 12 日之前在郑州再次举行筹备会，商议成立大会等事。但因各种原因一再迁延，直到 12 月底，各路代表才改而齐聚江岸。

尽管外面寒风呼号，屋内气氛却温暖热烈。长辛店代表史文彬、王俊，正定代表马德山，彰德代表戴清屏，许昌代表柳胜友，郑州代表凌楚潘、高斌，郾城代表杨志清，信阳代表王复生和江岸的杨德甫、项德隆，以及此时化名为张特立的张国焘、林祥谦和包惠僧等人围坐在炭火旁，热烈地讨论着总工会章程和其他事情。

作为东道主和筹备会的委员长，杨德甫首先发言，欢迎各个厂站的代表来到江岸，然后向大家说明议事日程，首先是讨论总工会章程草案。

杨德甫接着说：“数月前在郑州召开的第二次筹备会议上，我们拟定了一个章程草案，各位代表回去后，工友们若对草案有异议，我们可以再完善。”

正定代表马德山说：“我们工人对这个草案是完全赞成的，只是其中对工会经费的处理上没有说明白，保管和征收的组织也不明确啊，工人们本身就工资微薄，那几个钱肯拿出来，都是为了自己工会的发展，要是被有些居心不良的人利用，就太寒工人们的心了，所以这个要好好计划一下。

“还有上次郑州会议上说的组织方法，也有待改进的地方，车站人数满百人须组织分会，但有些小站工人人数少于百人，却没有相应的说明，无法保护他们的利益，这样我们的总工会也就有些名实不符啊，要好好考虑到他们。

“上次会议只制订了总工会章程草案，下面的分工会怎么组织，缺少具体的大纲。总工会里的执行委员会和干事



史文彬（1887—1942）



局细则也没有，工作任务就不明确，这个要抓紧制定。”

“分会组织大纲、执行委员会和干事局细则是要抓紧制定，但上次长辛店罢工引发的五路联合大罢工的胜利，说明时机完全成熟，现在最紧要的还是先把我们的总工会给成立了，这样才能名正言顺。”从长辛店来的史文彬一开口就脱离了此次会议中心议题。

这一跑题可不要紧，一语引得代表们全都转移话题，“对，对，凌委员长说得很对，总工会章程大体上没有什么问题，还是先要把我们的组织正式建立起来。”

杨德甫看了一下表，时间已经不早了，同坐在身边的张国焘耳语了几句，就站起来向各位代表宣布今晚讨论结束并将各位代表的意见归纳，请各代表到汉口已安排好的旅店休息，明日会议地点就近安排在汉口大智门品记里十三号的省工团联合会。为期5天的第三次筹备会和余下的4次会议也都在这里举行。

5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最终，第三次会议将代表们的意见纳入总工会章程草案中，规定总工会经费由执行委员会征收，正副委员长共同保管，其使用必须在罢工或者其他特别重大事件在经过执行委员会通过后，才可以开支。人数不满百人的厂站可举出代表，加入邻近的车站分会，设立执行委员会。在章程草案中还规定，执行委员会细则、干事局细则、各分会组织大纲都以另列细则的形式说明。最终确定总工会章程草案为7章31条。

在确定成立大会的时间和地点时，参加会议的15个厂站的代表进行最为热烈的讨论，最终决定成立大会的地点安排在全路中心站郑州，时间就定在农历春节前，阳历的1923年2月1日。

在代表们回去后，江岸的铁路工人们发现刘家庙江岸工人俱乐部门前挂的“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招牌已经换成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原来，按照总工会的章程，全路上各个原名为工人俱乐部的工团组织在总工会成立后都应改名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某站分会”。

此时在分会内，也正在进行着选举，原分会负责人杨德甫被选为总工会委员长后，因工作需要就辞掉分会的职务。竞选者以毛遂自荐的方式先

发言，林祥谦、黄桂荣、周天元、曾玉良都纷纷上台演讲。最后，杨德甫提议由林祥谦继任分会负责人，大多数工友都同意，并决定若遇有重大不能决断的事情可转交总工会办理。

林祥谦一上任就开始按照总工会要求，制定工会会员证。经过上次会议讨论，全路工会会员证基本是一样的，为铁质小圆盘，中间绘制有插上一对翅膀的火车车轮图案。杨德甫也在1月10日就启程前往郑州，与当地分会负责人商议开成立大会的事宜。

郑州花地岗玉庆里第4号郑州分会的所在地，门前已经挂起了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牌子。郑州分会委员长凌楚潘、副委员长李焕章、扶轮小学校长赵子健和前来做成立大会筹备工作的张特立、杨德甫和史文彬开始商量会议准备工作的具体事项。

张特立首先对与会人员提了建议，他说：“除了我们全路上各个分工会的代表参加外，我们还应该邀请其他方面的工会参与，同时遍发请帖给各省市的各个团体、工会、名流人士，以壮大我们的声势，把会议开成一个小劳动大会。”

“这个建议好，我们可以在报纸上发通知，或者发通电”，大家对此一致赞成。

杨德甫接着说：“2月1日不是休息日，各站工人代表往来不方便，不如申请本该是星期天休息的1月27日照常上工，改在2月1日放假一天。同时，我们还要向路局申请，发放一部分来往车票，专门用来欢迎前来参加大会的各方来宾。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先设立2个接待点，然后统一坐车到郑州，北段就设立在北京前门车站，南段设立在江岸车站。”

史文彬笑道：“呵呵，老杨的这个主意好啊，可是全申请往返车票也不行啊，人数多，路局肯定不批啊，我看还是你把那车票都给我们好了，南段申请加挂客车，怎么样？”

“呵呵，史师傅可是把好事都让给我们南段了，那你们就要比我们辛苦一些了。”杨德甫冲着史文彬开起了玩笑。

凌楚潘说：“另外，我们还要向有关主管及地方官厅呈送开会的文件。”



前不久唐山开滦煤矿罢工失败，导致铁路、纱厂、洋灰等工会被封，工人被禁止集会，罢工领袖遭到通缉的惨痛教训，让他时刻保持着小心。

杨德甫紧接着说：“要和郑州地方官厅打交道的事情，就交给郑州分工会凌师傅他们来打理，接待各位代表需要的车票和加挂客车，以京汉铁路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向路局递交申请。”

任务明确后，各个委员按照分工，于1月15日呈请调改放假日期、填发免费往返车票和加挂客车车厢。总局在21日将填好的100张二等车票交给长辛店分会，南局同意加挂二三等客车5节，小车头1个，路局批准了放假时间的调整，郑州警察厅方面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以京汉铁路筹备委员会名义发出的开会启事，见诸京、沪、津、汉各地报端。

为迎接各界代表，前门车站专门在离车站不远的一家招待所，进行接待，并且包下了附近的“福昌”、“五洲”、“第一宾馆”等旅社，安排代表休息。甚至在郑州有名气的万年春饭店订下了饭菜，作为会议召开后庆贺之用。全路16个分会和其他团体的代表陆续到达郑州，怀揣着激动的心情，焦急地期盼着2月1日早日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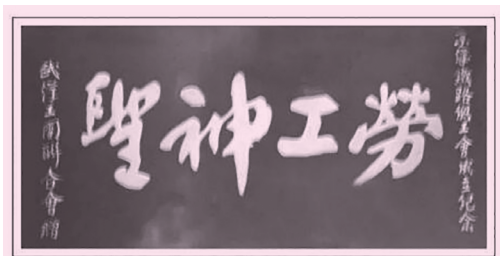
（张均）

风云突变

1923年元月底的江岸，与往常相比显得更加热闹，洋溢着一种过节的欢乐气氛，武汉先期成立的各个工会得知京汉铁路总工会要在2月1日成立的消息，特别踊跃，共有30余个团体130余人准备出席总工会成立大会。

1月30日，武汉各地的代表齐集在大智门车站上车，抵达刘家庙江岸车站时，停车招待入会休息，然后统一赴郑。为迎接各个工会的代表，林祥谦和项德隆特地打扮一番，头戴一顶大礼帽，身穿蓝色长衫，在江岸分会那个低矮的办公点进进出出，虽然忙碌但心情喜悦，把前来坐车的代表们暂且安置好，招待吃了一顿晚饭，就安排坐上加挂的客车，于当晚启程。

陈潭秋、施洋、恽代英、张特立和李汉俊同坐在一个车厢里，加上其他各个工团代表，共占据了加挂车厢中的两个半车厢，而在专门腾出来半个客车车厢的空间摆放各工会为庆祝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准备的礼物：有京汉铁路工人范进臣等多人送的书有“劳工神圣”的木制金面大匾额，有湖北省工团联合会送的书有“健者先进”的玻璃镜匾13个，有谏家矶扬子机器厂工会送的书有“赤焰辉煌”的匾额，有粤汉铁路总工会送的书有“劳工万岁”的匾额，有武汉电话局工会送的书有“咸钦精神”的匾额，有汉口机器厂缝纫



“劳工神圣” “劳工万岁”的贺匾



工会送的书有“众志成城”的匾额,有汉口西式皮鞋工会送的书有“辕辙一途”的匾额,有武汉洗衣局送的书有“云卷电驰”的匾额,有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会送的书有“前途胜利”的匾额,有武汉轮驳工会送的书有“履险如夷”的匾额,有汉口花厂工会送的书有“屏藩锁钥”的匾额,有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送的书有“大辂椎轮”的红绶一条。

车行半夜,到清晨来到广水车站,工会筹备会早已用电话通知该站铁路工人按时到站台上列队迎候。车一到站,在广水分会代表上车的同时,施洋也下车到月台上,对着迎接的工人热情地进行演讲:“工友们,世界是我们工人创造的,可是我们工人却受到最不平等的压迫和剥削,吃不饱、穿不暖,而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任意打骂我们工人,这哪里还有什么道理?我们要反抗要争回权益,可是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有人有枪,我们要抗争获胜就必须紧密团结起来。这次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是我们工人大团结的开始,我们拥护总工会就是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听了施洋的演讲,工人们极为振奋,响起一片鼓掌欢呼声。

10分钟后,火车的汽笛声又响起来,施洋和广水铁路工人握别后,列车继续北上。一路上到信阳、驻马店、漯河、许昌,都安排有这样的演讲。火车里坐的代表和车站的铁路工人都沉浸在节日般的喜悦中,直到天黑火车才到达目的地,然而他们不知道此时郑州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1月27日晚8点多钟,在郑州总工会筹备会,杨德甫、凌楚潘等人正在为接待各地代表的事情忙碌,突然屋外响起匆匆的脚步声,然后就听见有人用力敲门,门外传来粗俗的骂声:“没死绝吧,快点开门!开门!”

屋里人被这突然的叫门声吓了一跳,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杨德甫对着凌楚潘说:“去看看,怎么回事?”

门一打开,一队全副武装的军警就纷纷冲进屋子,一个身材不高、穿着黑色大衣的当官模样的人踱着方步进来。凌楚潘一看:这不是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吗,他怎么跑来了?难道发生了什么变故?

凌楚潘正在琢磨,黄殿辰开口说:“呈吴巡帅来电说,你们竟敢在军事地区擅自召开会议,实属胆大妄为,现在已经电令靳总司令、张司令严

加取缔，否则以武力对待。我是来通知你们，希望你们能识时务，按照吴巡帅的命令，好生从事。”

黄殿辰的一番话无异于晴天霹雳，来得太突然了！正在工会内为筹备开会事情忙碌的代表听到这个消息，一个个都气愤异常。杨德甫控制住激动的情绪，走到黄殿辰身边说：“这位长官，我们哪有擅自开会，开会的事情已经呈报路局批准，而且改休息日、填发免费车票、拨挂车辆均已照办。并且我们早在半个月前就在京津沪汉各报登有广告，遍请全国各界代表莅临参观典礼，也已经接到多处函电知会。现在突然禁止，我们如何交代？若是要禁止开会，为何事先对要求并不拒绝？”

黄殿辰一时被杨德甫问得语塞，即将吴佩孚致靳云鄂的电报拿出来，用威胁的口吻厉声说道：“这是吴巡帅致靳总司令制止你们开会的电令，你们若不服从，我也只好按照巡帅的命令从事。”说罢悻悻而去。杨德甫拿起电报，看到上面赫然写着：“郑州靳总司令鉴：顷接京汉铁路局长径电云：据报2月1日本路全体工人，将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各路与会者甚多。以未经地方官厅许可集会，竟敢明目张胆、聚众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荒谬绝伦，将来群起效尤，愈演愈烈，蚩蚩愚氓，必将误陷法网而不自知，瞻顾前途，杞忧无极。务祈麾下迅飭预为防范，切实监视……设法制止……”

原来，南段局长冯云一方面假装同意工人们的要求，加挂客车，同时又跑到北京，向局长赵继贤恶意挑拨、捏造事实，还到洛阳向吴佩孚告状。赵继贤听信冯云的谗言，于25日向吴佩孚电请干涉制止，再加上冯云的恶语中伤，到27日晚，吴佩孚即电驻郑州第十四师靳云鄂、张福生制止工人开会。

工会内的工人代表闻讯后十分气愤。杨德甫让凌楚潘把全体代表们召集到一起开紧急会议。

“我们完全是被戏弄了，不能就这样草草收场，不然怎么和全路的工人交代！怎么和邀请前来参加会议的全国各界代表交代！不要理他们，坚决开会！”正在气头上的代表们对这样蛮横地要求停止开会，表示强烈不满。



李震瀛说：“吴佩孚以前是通电保护劳工的，而现在命令我们不准开会也是他，我看我们可以抓住他的这句话，和他进行协商。”在直奉战争中，直系获胜后，吴佩孚、曹錕控制了北京政权，为了扩大执政基础，同时也为了从原皖系一手操控的交通部门手中夺取铁路实权、掌握财政命脉，他借助当时保护劳工的口号，欺骗群众。

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德甫一直对吴佩孚心存幻想，所以十分赞成李震瀛的意见，当即决定派代表去洛阳面见吴佩孚，寄希望于通过解释，希望得到他的谅解。大家推选出杨德甫、凌楚藩、史文彬、李焕章、谢德清及书记李震瀛等6位代表。会后当晚，6人就怀揣复杂的心情坐上火车直赴洛阳。

（张均）

凶相毕露

清晨，火车方才到达洛阳。一下车，6人就急匆匆赶到西宫吴佩孚的行辕求见。门房通报后，在门口等了半天工夫，才由副官徐焕文出来询问，6人把自己的身份、求见的事由大致讲了一下，又说了一番好话，结果换来一句“等着”。过了又有2刻钟的样子，徐焕文回来告知说，巡帅现在公务繁忙，没有时间见你们，由政务厅长白坚武代见，即做前导引以与之相见。

见面客套一番后，白坚武说：“巡帅的电令你们知道了吗？你们的赵局长来电报说你们未经许可擅自开会。”

杨德甫用婉转的语气说：“电报我们是看到了，不过这中间肯定有误会，所以才来劳烦巡帅。我们早在1月15日就已经呈请路局，将27号星期日照常工作，改在2月1日放假1天，请总局填发二等往返乘车免费票100张，请南局加挂二三等客车5辆、小车头1个，这些都经批准照办，路局是知道我们开会的。并且现在各处已经有很多代表到郑州观礼，既要禁止我们开会，事前应该阻止，拒绝我们的请求。现在突然禁止开会，这不显然是破坏国家的约法吗？这叫我们怎么交代？请求吴巡帅收回成命吧。”

凌楚潘、李焕章也补充说，会议启事也都已经早在各大城市主要报纸上登出，开会场地、安排代表的旅馆也都已经租下，现在说停就停，没法向全路工人和各界代表交代。

白坚武无言以答，只好说这件事情要向吴佩孚请示才能答复，出门半天回来后说：“巡帅现在很忙，无暇与你们谈，令你们留下地址，晚上8点钟电话通知你们再谈。”



杨德甫等人无奈，只有在洛阳旅社等候。吴佩孚又拖延到 29 日上午，才勉强接见了 5 位代表。一见面，吴佩孚皱着眉头对代表们说：“现在民气太嚣张，真不是好现象，北京学生竟敢把教育部打毁了，曹三爷（曹锟）想做大总统，还有人想杀黎宋卿（黎元洪），你们工人还要跟着起哄开什么会，你们的局长来电报，请我设法阻止，我已电令靳总司令，你们最好不要开会吧！”

杨德甫连忙解释：“大帅，我们成立工会不是要起来闹哄，我们成立工会的宗旨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提高技术，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待遇。我们的这些宗旨与国家是有害呢？还是有益呢？假使没有工会组织，就没法联络感情，也无从交换知识，技术就不能提高，也就不能增加生产，更不能改善我们的生活待遇，请大帅想想这是好，还是害？并且政府约法规定人民有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全国有商会、学会、农会，为什么工人就不能成立工会呢？”

吴佩孚没有正面回答，看了看杨德甫说：“你是工会委员长杨德甫？”



位于洛阳的吴佩孚司令部旧址，后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是的。”杨德甫应声答道。

吴佩孚看了看同杨德甫坐在一起的其他几个人，接着说：“你们的事，哪一件我没有赞成？但郑州是军事地区，岂能任意集会？我还想同你们商量，预备给你几个人一个副官的名义，每月给200元的津贴，往后有事先同我商量再干，这样你们办的工会可以不受人的干涉，你们也可以名利双收，两全其美。”

“大帅这个美意，我们十分感激，不过我们都是工人，只知道做工，恐怕将来误了公事，那还了得。”杨德甫当即说。

吴佩孚听完杨德甫的话，很不乐意地说：“这一次不开会不行吗？或是在一起聚聚餐，谈一谈也就可以了，如果你们一定要开会，同我伤和气，那我可就没办法了。”

听到吴佩孚的威胁语气，史文彬又说：“大帅，我们邀请的各界代表，现在已陆续到达郑州，报纸上也登出了消息，现在如果我们食言，没法向代表们交代，也没法向全路的3万工人兄弟们交代啊，他们可都在盼着这个大会呢！”

吴佩孚勃然大怒道：“难道我的命令就是可以随意更改的吗？你们知道我是高级军官，带领着几十万军队，已下过的命令怎么可能收回呢？”紧接着，他又补充一句：“好吧，你们几个人考虑考虑再说吧。”说罢，就站起身来送客。5人见状，只好退出。

5人一路直奔旅店，李震瀛此时正在屋里来回转圈，急切地等待5个人的消息，生怕发生意外。突然，门一开，5人回来，李震瀛心里一喜，连忙上前，问同吴佩孚面谈的情况。看见5个人进门后一脸忧心忡忡的样子，连忙给他们倒了些水。喝完水后，几个人坐在一起，把情况向李震瀛仔仔细细地讲了一遍。

“他是想用威胁利诱的手段收买你们！”听完他们的描述，李震瀛恼怒地说，“我们还真信了他保护劳工的鬼话，对他心存幻想，认为只是冯云、赵继贤在背后捣鬼，现在看来他们都是一样货色，想和他商议准许我们开会，真是与虎谋皮！”



谢德清说：“我看我们要赶紧回去，把这里的情况和代表们说清楚，再商量下一步的办法。”

大家一致同意。第2天一早，6人连早饭都没吃，急匆匆赶到火车站，正好坐上一辆开往郑州的客货车。平日里感觉风驰电掣般的火车，现在在焦急的6人心里，却觉得跑得像蜗牛爬一样慢。同他们一样焦急的是正在郑州等待消息的各地代表们。

（张均）



播火荆楚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风
雨
前
夜



紧急会议

杨德甫一行抵达郑州已是下午4点多钟。此时，武汉各界和工团的代表尚在北上的火车上，不知道这一突发的变故。晚7时许，武汉方面的代表抵达并安置好住处后，突然得知这一变化，众皆愕然，转而愤怒。

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旋即通知各地代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杨德甫、李振瀛等6人汇报了与吴佩孚谈判的情况。众代表听后，都认为吴佩孚是背信弃义的小人，用威逼利诱的手段阻挠工人开会。对他的阴险狡诈均非

常愤慨。

接下来，各地代表纷纷发表意见，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但因在如何看待吴佩孚提出的“保护劳工”口号上存在分歧，代表们的意见起初并不统一。

会议上，代表们围绕吴佩孚的态度，意见明显分成了三类。

杨德甫发言说：“会还是要开的，但怎么开，这个需要斟酌一下。在洛阳我看吴佩孚的态度非常坚决，说我们要是非开会不可，是同他伤和气。所以我建议稍微改变一下会议的方式。场面尽可能小一些，减少会议议程，时间短一些，早开早散，不留下口实，尽量避免麻烦。”

京漢鐵路總工會特別緊要啟事

本會於二月一日在鄭州開成立大會，橫被軍閥爪牙鄭州警務局長賈殿辰、京漢路管理局長趙繼賢、南局長馮漢津等捏造謠言，聲言洛吳亂命，飭鄭州軍警，荷槍實彈，如臨大敵，全埠戒嚴，強止送禮走路說話食宿開會，並佔領會所，所有一切什物，盡被擄掠。本會已臨危急。高壓之下，萬難活動，業經本路各分會全體代表會議議決，自二月三日起，本會移至漢口江岸分會辦公。四日下午，下全體罷工令。一面向當局提出最低限度的條件：（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漢局長趙繼賢和南段處長馮漢津，要求吳、靳及豫省當局撤革查辦賈殿辰。（二）要求路局賠償開成立大會之損失費六千元。（三）所有當日在鄭被軍警扣留之一切牌額禮物，要求鄭州地方長官，用軍隊奏樂送還總工會鄭州會所。所有佔領鄭州分會內之軍隊立即撤退。鄭分會願額重複掛起。一切會中損失，由鄭分會開單索償，並由鄭州地方官道歉。（四）要求每星期休息，並照發工資。（五）要求陰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發工資。以上要求，若不達到圓滿目的，小路全體工人，誓死決不上工。特此露布，即希各界鑒察！

京漢鐵路總工會啟

京汉铁路总工会特别紧要启事

他的这一意见，得到一些代表的赞同。

郑州凌楚藩等人主张：同吴佩孚的交涉还没有最终的结果，现在不能贸然行事，不如先将会议延期，各地代表回去向工人解释原委。同时，登报告知全国，再派代表同吴佩孚商议，或者组织工人代表团前去洛阳请愿，迫使其同意后再召开成立大会。

这个提议一出，代表们皆是发出一片否定之声。一直没有说话的项德隆站起来，质问道：“吴佩孚叫我们不开会，我们就不开会。害怕同他斗争，那我们还组织工会干什么？我们工人组织工会，就是要武装自己，求得解放。不能因为看到危险，要付出代价就退缩。吴佩孚这些人都是压迫我们的军阀，是我们解放事业的障碍，如果我们成立工会都要得到他的批准，那只有不开了。因此，我们要坚持斗争，如期开会。”

项德隆越说越激动，搬过来一条板凳，站在上面，大声疾呼：“谁说一个‘不’字，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同他干。”

经过这一声疾呼，原本就已对军阀背信弃义阻挠开会十分愤慨的工人，更是群情激昂。

林祥谦赞同项德隆的意见，说：“总工会的牌子已经挂出来有一段时间了，总工会事实上也都已经成立了。既然已经箭在弦上，开个成立大会，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呢？难道吴佩孚丧心病狂到连这也要阻挠吗？那他都是自己打自己‘保护劳工’的嘴巴子。”

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秘书林育南、汉冶萍总工会代表许白昊等均发言，支持项德隆的意见，认为举行一个总工会的成立仪式，应该是不会受到干涉的。

最后表决，代表们多数赞成项德隆的意见，决定：不换地点，不改日期，不变程序，会议按照原定计划正常举行。

（张均）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

1923年2月1日，郑州街头寒风凛冽。上午10时在全城戒严，士兵荷枪实弹沿街排列的恶劣形势下，各地工会代表和来宾300多人在五洲大旅馆门前集合，整队出发。杨德甫、史文彬、林祥谦、施洋、康景星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军乐队紧跟其后，奏响慷慨激昂的《国际歌》开道，各地工团所赠送的礼品摆在一个个大小不等的方桌上，形成壮观的一字礼品队。书有“劳工神圣”四个遒劲大字的金面木质匾额排在最前，接着是13个玻璃镜匾，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甚为耀眼。其余代表挥舞着红色小旗排在队伍的最后面。

郑州工会的工友亦从会所出发，2支队伍在德化街汇合，形成上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前进发。到德化街南口，队伍向右转到钱塘里，直奔数百米开外的普乐园会场。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成立。图为总工会成立大会代表合影

专门在此坐镇的黄殿辰远远地看到黑压压一片，穿着粗布棉衣的工人，顿时紧张起来，忙指挥军警列成梯形队形，横枪阻拦，并令街两边的军警

将队伍包围。

身材矮胖，蓄着八字胡，身穿黑色大衣的黄殿辰冲着队伍满脸怒气地说：“吴大帅不准你们开会，为何有令不从，赶快回去！”

杨德甫、项德隆、李振瀛、康景星立即与之交涉，可时间过去将近1个小时，黄殿辰一会儿搬出“吴大帅电”，一会说“司令有令”，百般阻挠，没有任何结果。杨德甫辩解说：“我们并非开全体大会，只是前来送匾庆贺，这是商家百姓常有的事，怎么到我们工人这儿，就犯了法了吗？”

黄殿辰拍着别在腰间的手枪盒子，一脸轻蔑地说：“吴大帅有令，今天戒严，禁止开会，别说的不准送匾庆贺，连路也不准你们走。”

看黄殿辰如此蛮横，又要起威胁手段，项德隆厉声怒斥：“你们这些军阀，对洋鬼子奴颜婢膝，转过头来就只知道争权夺利，弄得连年战乱不休，民不聊生，现在工人要成立工会，也要横加阻拦，你们还有点正义良心吗？”

这句话一下子刺中痛处，黄殿辰恼羞成怒，一个手势，“哗”一声，军警们齐举枪直指工人们胸口，一一挑翻工人所抬的方桌，玻璃匾额碎了一地。早已愤怒难耐的康景星解开棉衣，一拍宽厚的胸膛，挺胸大声呵斥道：“怕死鬼不闯阎罗殿，谁要开枪，就朝这打！”军警还从没见过这样“不怕死”的架势，一时愣住，不敢动作。见状，杨德甫一把将身边的黄殿辰扭在怀里，还未待他反应过来，项德隆马上振臂高呼：“工友们，咱们向前冲啊！冲啊！”

在2月寒风中，受辱、受冻站立1个多小时的工人们听到有人喊“冲呀、冲呀”，心中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大家不顾生死，冲开阻拦，直奔会场，一拥而上，撕下封条，撞开被锁的大门，涌进会场，随即用长凳、石条把门顶住，正式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待各地代表、来宾坐定，筹备会主席高斌马上宣布奏乐开会，接下来首先报告开会宗旨：“今天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话正往下说，被冲散的军警尾随而来，又把会场团团围住，黄殿辰带着1个卫兵，从后面冲进会场，跳上讲台大叫：“不准开会，反抗者以军法从事。”门外顿时响起威胁的排枪。高斌没有被吓倒，不理睬他，再次宣布开会，黄殿辰



仍是打断，狂叫“不准开会”，台上又成僵持局面。台下群情激愤，连呼：“打倒军阀！”“有集会结社自由！”眼看没法念完报告全文，高斌灵机一动，想出一个简单的办法，把右手向上一举，喊道：“京汉铁路总工会今天成立了！”台下代表、工友也跟着齐声喊道：“京汉铁路总工会今天成立了！”

黄殿辰生怕上司因此怪罪，情急之下，也顾不得许多，慌忙用一只手把高斌的右手扯下来按着，边向台下左右摆手边说：“你们的工会未成立，未成立。”高斌又用左手向上一举高喊：“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黄殿辰如法炮制，又将其左手按住，但他的声音已经被淹没在工友们雷鸣般的口号声中。黄殿辰还要再去阻挠，康景星赶快过来把他拦住：“这不是你讲话的地方！”说完话就顺手将他推到台下，和他理论，防他再跑到台上。

隔窗看会场外，军警们架起机枪，戏院内的工人、来宾、代表毫无惧色，抓紧时间开会。按照议程，杨德甫报告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的经过及吴佩孚谈话的情况，并致谢词。继由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各位来宾、工友，根据现政府的约法，国人享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行动自由的权利，我们铁路工人适应社会潮流，组织工会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应该的，律师是依照法律，保障约法的尊严及国人的权利。京汉铁路工友成立工会早已事先经过路局批准，所有手续完备。可现在却横加干涉，这是什么？这是军阀恃武力公然破坏政府约法的行为。这种倒行逆施，我们不能屈服……”

会场内的气氛再次达到高潮，“打倒军阀”的口号此起彼伏，声震屋瓦。台下的黄殿辰看工人的气势，也像个蔫黄瓜一样，呆呆站在一旁不敢耍什么威风了。随后，李汉俊、赵子健、张特立和各地工团代表、各界来宾都做了激昂的演说。会议坚持了3个多小时，虽早已过午饭时间，与会者也是饥肠辘辘，但仍一个个精神饱满，希望会议就这样一直开下去。会场外，形势却越来越严峻，第十四师参谋长徐寿春带着一营部队来到普乐园，要强行闯场。

黄殿辰此时又耀武扬威起来，嚣张地又一次发出威胁：“限5分钟散会，否则有流血事件发生！”

张特立看情势紧急，立即向总工会负责人建议：为避免流血事件发生，应立即散会，总工会的成立仪式和全体大会可以改时改地举行，现在不必坚持。杨德甫起来响应，一起向众多代表解释，但众怒难平，大家一时不能接受，不肯退场。此刻已是下午4点钟。

就在这时，“轰”一声，顶门用的石条、长凳被撞开倒在一边，外面的军警、士兵鱼贯而入。眼看两方冲突在所难免，场面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血气方刚的共产党员、总工会秘书长李震瀛愤慨之下，腾地站起来，振臂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万岁！”一呼百应，在震天口号声中，全体代表、工人和来宾冲开包围，以示威的姿态离开会场。

队伍直奔总工会，却发现已被军警占领，门前的匾牌不见踪影，室内什物遭劫掠一空，总工会被封。回先前住宿的旅店，已布满岗哨，不准自由出入和互相谈话。去订好的万年春饭庄就餐，被告知禁止售食物给工人，转赴其他饭店亦称受令不准接待。气愤不过的代表和来宾找黄殿辰说理，索要被抢去的总工会内各种礼品。黄殿辰猖狂地说：“我在郑州一天，就一天不准工人开会。你们要是能耐，我一步一磕头，亲自把匾额送给工会。现在，限你们明天正午前，统统离开郑州，快些滚蛋。”

受此凌辱，工人们的怒火再也无法遏止。

（张均）



转战江岸

1923年2月1日晚，在离车站不远的花岗里凌楚潘家中，京汉铁路总工会秘密召开执行委员会议，连夜商量对策。原本就不大的房间坐了十几个人就更加显得狭小拥挤，代表们紧紧地挤在一起。在这次会议前，此次来参加成立大会的各地工会已先期分组举行了会议，人数最多、占到一大半的武汉各工团代表对会议的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简短的讨论，大家一致要求立即罢工，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总机构移往汉口。

前来参会的各铁路、各地区代表同样纷纷表示：“各工团必为实力的后盾。”

随后，执行委员会议迅速做出罢工的决议：京汉铁路先行罢工，其他各路和各地工会再进行罢工响应。京汉铁路总工会迁移到汉口江岸车站，会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成此次罢工总枢纽。在总工会的迁移问题上，



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

当时看来，最有可能的是长辛店和武汉这2个地方。长辛店铁路工人几个月前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的领导下，挫败京汉路局长赵继贤的武装破坏，胜利罢工，为全路工人谋得了权益，有斗争经验，也掀起了北方铁路的罢工潮。武

汉的工人运动形势则在全国处于前列，已成立数 10 个健全的工会组织，并且还有一个全省工团联合会，在工人中极具声望，很有社会影响力。最后，在武汉方面工会代表的强力要求下，总工会决定转至汉口江岸分工会办公。

执行委员会议还提出京汉铁路罢工的 5 项条件：要求交通部撤换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云，并查办黄殿辰；路局赔偿损失 6000 元；撤退郑州分工会内的驻军，送还总工会匾额并道歉；工作 8 小时，每星期有休息日并照发工资；阴历年放假一星期，工资照发。

第 2 天一早，在军警的“照顾”下，京汉路总工会执行委员和南段代表、来宾在车站与其他代表作别，即又坐上来时的专车离郑直奔江岸。车厢内，各地代表相继演说，一股团结就能打倒军阀的士气在大家中间逐渐浓厚起来。司机开足马力连夜行驶，到 3 日早 8 点，列车驶进大智门车站，除各分会代表在各站下车向工友报告情况外，其余来宾齐聚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即通知武汉各工团前来集会。

在听取军阀破坏工人运动，捣毁总工会，驱逐各地代表的罪行后，全场工人沸腾了！整个江城随即沉浸在怒火之中。会后，汉口 18 工团联名致电京汉总工会及各分会，表示：“誓以全力为诸君后援，必争回集会结社之自由，即赴汤蹈火，拼一死命，亦所不惜！”。武汉工人实现了总动员！同时，北京中共方面和其他各路赞成罢工的消息也先后传到了汉口。中共武汉区委、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员陈潭秋、林育南、许白昊、项德隆、施洋、杨德甫、陈天、林祥谦等组成总工会的领导核心，以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名义，统一指挥武汉和京汉铁路全路工人行动。当天向全国发表《京汉铁路总工会紧急启事》通电后，总工会正式迁移到汉口江岸分工会内。旋即以全路工人的名义发出《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要求军阀当局对所提 5 项要求限于 48 小时内圆满答复，否则全路一致罢工，并由汉口真报馆代印宣传。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军阀当局对工人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总工会加紧进行罢工准备，一方面，起草《敬告旅客书》说明“工人罢工由军阀官僚之逼成。罢工后，旅客当然受其痛苦，但此等痛苦并非由工人所赐，实



由军阀官僚所赐”，张贴各站以使旅客明了其中内情。同时，发表《紧急通告》明确罢工时期的秩序：（一）罢工期内，须遵从工会一切的命令，不得自由行动。（二）须遵守秩序，不得扰乱地方安宁。（三）罢工期内，须静居家中或工会，不得三五成群在外闲游。（四）罢工期内，一切事务均由委员会办理，私人不得接洽或交涉。（五）罢工期内，遇紧急事时，不得退缩或躲避。全路各分工会全部建立工人纠察团，负责维持罢工期间的治安秩序，巡逻放哨，探听消息。工会会员 10 人编为一组，选出 1 名组长，方便迅速召集，统一步调。

到 4 日上午 9 时，军阀当局仍无任何表态。总工会做出罢工开始决定！京汉铁路中段郑州首先行动，罢工委员会负责人高斌下达命令，机厂 10 多台机车同时拉响汽笛，所有工人放下手中活计，一齐拥向机厂煤台前，召开罢工誓师大会。

京汉铁路南段江岸站是此次罢工的重点。10 时，南段罢工负责人林祥谦接到总工会传来的一张纸条，展开一看，上面写着：“耳聋眼瞎，无食可求。急！急！”这是总工会事先规定的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的暗语！林祥谦立即下达了罢工命令。锅炉工黄正兴早已把炉火烧得通红，把三管汽笛调到最大音量，当接到林祥谦的罢工命令后，他紧紧握住汽笛拉杆，奋力拉响

了江岸罢工的汽笛。汽笛声冲天长啸，整整响了 15 分钟。工人们听到信号，马上熄炉灭火，关闸刹车，拆埋机件，停电放水，中断通讯。

11 时，北段长辛店罢工。

到正午 12 时，其余 13 个分工会也都先后举行了罢工，全路所有军车、货车、客车一律停驶，车站、火车房和工厂都停止了工作。共 1200 多公里长的京汉铁路全部陷于瘫痪，像一条死蛇一动也不动。其他各路方面，道



1923 年 2 月 4 日，林祥谦用这支怀表计时，下令拉响京汉铁路大罢工的第一声汽笛

清铁路在4日与京汉铁路同时罢工，以示声援。粤汉、京奉、津浦、正太等铁路工会一方面通电支持，同时加紧筹备，计划于3日后发动同盟罢工。

3个小时内，在总工会的组织下，铁路工人能够有条不紊地实现全路总罢工，震惊了在华攫取了铁路筑路权和行车管理权的帝国主义各国，更震惊了北洋直系军阀。于是，帝国主义国家驻华公使团立即在北京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北京政府采取严厉措施解决工潮。很快，一份份颠倒是非、混淆视听的“大总统令”从北京发出，谋求自由的大罢工被指为“扰乱治安”的“越轨行为”。

原本就对工人运动不满，蓄意破坏成立大会的吴佩孚有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更加无所忌惮。他一方面指使京汉铁路局发出威胁工人的布告，要求“限十二小时内，立即照旧上工，恢复交通”，否则即认为各段工人“跟本路脱离关系”，路局只有“另行找人做事”；另一方面他打算威逼不成，即采取武力镇压。

总工会所在地江岸是此次斗争的中心，轮番上演反动军阀的把戏，围绕着坚持罢工和破坏罢工，赤手空拳的工人与持枪拿炮的军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4日下午，南段段长冯云派出代表来到江岸和工人谈判。他们避重就轻，允诺只要工会命令复工，罢工条件中属于路局职权范围内的都可以同意，职权外的，可以专程请交通部和巡阅使署核办。即除前2项要求关于撤办赵、冯、黄的问题外，皆可答应，但对禁止工人成立总工会和封闭郑州工会的问题，以不明白情况为由，推脱得一干二净。意图转移视线，把争自由争人权的政治罢工引向单纯的为改善经济状况的罢工。

负责谈判的工会代表林祥谦识破他们的阴谋，说：“只要将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启封，准许工会择期另行举行成立大会，答应赔偿损失，其余的条件可以在复工后商量。”没在谈判中讨得便宜的路局代表悻悻而走，双方不欢而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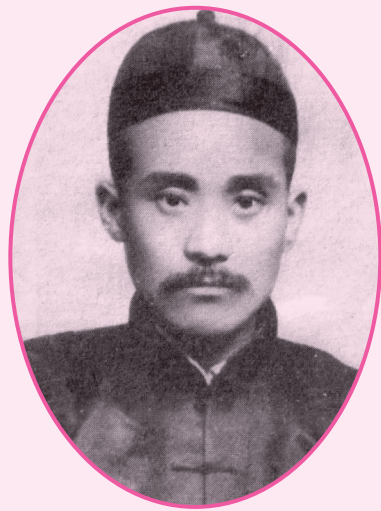
诱骗工人复工不成，吴佩孚5日电令湖北督军萧耀南，称：“日来各路工人受人煽惑，动以罢工要挟，此等嚣风若不严加取缔，势将貽害无穷，



除电沿线各军外，希予查明严紧，如果不服劝导，立即武力制止。”萧耀南立即命令汉口警察厅通知江岸警察所执行，并令汉口镇守使派军警驻守江岸。同日，任命督军署参谋长张厚生为汉口刘家庙铁路警备司令。

就在同一天，郑州靳云鄂也收到相似命令。长辛店亦被曹锟所部王怀庆一个旅包围。反动军阀伸出黑手要开始武力镇压工人罢工了！全路罢工的局势变得日益严峻，而由于通讯不畅，不能统一指挥，此时负责领导罢工的党内负责同志和工人领袖对这一情况还不了解。

（张均）



播火荆楚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二七惨案



张厚生奸计频施

1923年2月5日，张厚生率领一队人马，径直来到江岸工会。江岸工会正好在京汉路南段车辆修理厂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中间。会所前有一大块低洼的干池塘，自然地形成一个大广场，广场中搭建了一个讲台，为工人举行大会的地点。

张厚生派军警分所所长率领多名警察冲进工会，向工会提出2个条件：（一）工人无条件复工。（二）交出总工会负责人杨德甫等5人，其余被胁迫的工人一概不究。如果这2个条件不答应，将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看到张厚生如此嚣张的气焰，在场工人一个个对张厚生派来的代表怒目而视。项德隆强压住心中的怒火，气愤地说：“如果有曹吴和交通部派来的正当负责人来，总工会自当有全权代表与之交涉，否则，恕不接待。”其他工人也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答应我们的条件就复工。”这位所长受到一番羞辱，但看到工人这般阵势也不敢发作，只能灰溜溜地跑回张厚生的临时驻地扶轮学校报告去了。

张厚生看威逼不成，又想了一个更加恶毒的主意。大约过了3刻钟的样子，又有一营的士兵开到江岸，进驻扶轮学校。不一会儿，张厚生连同军警分所所长指挥所带的几百名士兵、军警分三路从扶轮学校鱼贯而出，张厚生站在校门口，对着队伍大声地喊：弟兄们，都把眼睛给我放亮了。

不一会儿，罢工委员会安排专门打探情况、负责侦查的调查队员一个个慌慌张张地跑进分工会，向分会负责人林祥谦汇报。调查队员白吉亭匆匆跑进来，还没坐好就说：“村子已经被他们给翻了个遍，进门就问你是干什么的，要听见说是火车头司机就给抓走，我刚看见总司机陈兴发和教导司机郑永贵被抓去车头厂了，看样子是要他们开火车。”

“大智门火车站也让他们占去了，现在已经贴出了开始卖票的公告”，不等白吉亭说完，另一名刚刚进来的调查队员张福狗也说了一个新的情况。

原来，张厚生把他的队伍一分为三，一队占领了机车厂，一队任村子里挨家挨户搜查，同时还有一队占领了大智门火车站，强迫车站开始卖票。

听他们说完，纠察团组长陈年伯自言自语道：“张厚生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站在一旁的林祥谦拍了一下陈年伯的肩膀，说：“陈大哥，别慌。我看这位张参谋长是要强行让我们复工，他抓了我们两个工友去开火车，又张榜卖票，要破坏我们京汉铁路工人统一罢工的计划。不过不要紧，他兵分两路，我们也分头行动。”看了看站在周围的曾玉良等人，林祥谦说：

“玉良，你负责召集纠察团团员和工友，到机车厂夺车要人。我和白吉亭、张福狗他们到大智门车站去，劝人们不要听信这些军阀们的谣言。”原来，江岸工人在成立工人俱乐部时期，就已开始组织工人纠察队，在京汉铁路总工会各分会成立时，才正式编制起来，最初的任务是调查登记会员，征收会费，排解工人与工人间的纠纷。总罢工的命令下达后，工人纠察队重新进行了编组，改名为工人纠察团，它的任务就是维持秩序，防止任何人对罢工运动的破坏活动，执行罢工纪律，实际上是罢工委员会的警卫部队。各纠察团设团长1人，副团长1至2人。江岸工会和总工会是一体，纠察团组织比较健全，团长是罗海澄，副团长是曾玉良和姜绍基。

“好，就这么办，”曾玉良说完就走到工会前的广场台子上，大声说，“工友们！他们抓了我们两名司机要开动火车，不答应我们的条件还要强迫我们复工，我们该怎么办？走！我们一起去把他们抢回来！”

台下聚集了有2000多人，曾玉良的话音刚落，人们就呼喊“抢回来，抢回来”，蜂拥着跑向机车厂，把偌大1个机车厂围得水泄不通。看到工人们人多势众，军警也不敢动武开枪，工人们一副不要命的劲头和军警厮打在一起，一下子就把两人抢了回来。曾玉良看两名工人已经成功抢回来了，就大声冲工人们说：“纠察队员断后，其他人一起撤回去！”

“喔……”工人们爆发出阵阵欢呼声，曾玉良带着工人们像潮水般从



机车厂退回到分工会前的广场上。

刚回到分工会，曾玉良看到林祥谦已经回来了。林祥谦喜形于色地给曾玉良说：“车站的通告已经被我们给撕了，经过我们耐心地解释，人们都很同情我们铁路工人，就是卖票也没人去买，听说可以买票来坐车准备回家过年的人们都已经回去了。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呵呵，被他们抢走的陈兴发和郑永贵，又被我们给抢回来了。”曾玉良的话音刚落，最后退回来的纠察团团员涂云山等人进到屋子里说，“我们又被抢去了5名纠察团团员，他们说要用陈兴发和郑永贵来换，人已经被他们带到扶轮学校了。”

“人一定要救回来，我们再去把他们抢回来！”曾玉良激动地说。

林祥谦迟疑了一下，问在场的总工会负责人杨德甫：“老杨，你说该怎么办？”

杨德甫说：“扶轮学校现在是张厚生的老窝，那里的兵多枪多，硬来不是办法，我们选代表去和他说理，大伙说怎么样？”

项德隆说：“就这样办。”

分工会即决定派朱兰田、张濂光、姜绍基、项德隆4人去与张厚生谈判放人。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打起火把、提着油灯随他们4人一起到扶轮学校，看他们进去，都等在学校门外，紧张地注视着从里面传来的任何动向。

守卫远远看到一大片火光向学校方向而来，早就给张厚生做了汇报。4位代表一进入屋子，就看见门两边各站两列荷枪实弹的士兵，张厚生已经摆好了阵势，正一脸得意地看着他们。还没等张厚生开口，项德隆就先发制人，对张厚生说：“请问长官，我们的工人兄弟犯了什么罪，要被抓来？”

看到他们没有被这阵势吓到，张厚生已经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又被项德隆这样质问一句，又惊又恼，说：“犯了什么罪？你们私自罢工，老子要把你们统统抓起来枪毙。”说罢，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拍。

项德隆正义凛然地说：“我们工人罢工是为了我们京汉铁路上3万工

人兄弟保人格、争权利，你枪毙得了我们这几个人，你枪毙得了3万工人兄弟吗？”

一扭头看见窗外火把映在窗上的点点火光，张厚生一惊，心想：工人团结的力量这么大，不是能够马马虎虎威胁得了的，我就是捉去两个司机，也不可能叫全路复工，扣留几个工人也不能解决问题。想到这里，张厚生眼珠子一转，马上和颜悦色地说：“兄弟我也是奉命行事，可是你们这样也不是办法，马上就要过年了，京汉铁路是一天也停不得啊。这样吧，你们先带回去，我回去向上峰报告，明天你们推选出几个实际负责的代表，咱们会商一下复工的办法。”

张厚生向卫兵一挥手，被抓去的五名纠察团团员被带进屋内。张厚生讪笑对他们说：“兄弟得罪了，现在诸位请回吧。”

看到5名纠察团团员身上伤痕累累，项德隆他们赶紧跑去搀住他们，几个人一起从房间里走出来。外面的工人一下子炸开了锅，“出来了！”“出来了！”工人们冲开卫兵把守的大门，背起受伤的纠察团团员，匆匆回到工会。

张厚生看着远去的工人，掏出怀表看了一下时间，把他的警卫排长叫到身边耳语几句，又骑上马带着卫队离开了江岸。

深夜，京汉铁路江岸分会内依然亮着灯，杨德甫、林祥谦、罗海澄、曾玉良围坐在一起。“我看我们的纠察团团员数量还要增加，照今天的形势看，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向我们动武啊，我们要多防范一下。”林祥谦冲着大伙说。罗海澄愤怒地说：“张厚生是走了，但他还留下不少人在工厂和车站里，随时都还有可能发生像今天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纠察团只有140个人，必须要再增加一些，以防不测。”

林祥谦说：“再选一些精壮的汉子，组成一支400人的队伍，我看好些。”

“这样好，我赞同祥谦的意见，”一直不做声的杨德甫说，“大伙认为怎么样？”

“好，海澄咱们俩现在就去合计一下吧！”曾玉良对罗海澄说。

正在这时，门吱的一声开了，项德隆和着一阵寒风进入屋内。



“德隆，工团联那边的情况怎么样？”看见项德隆回来，杨德甫关切地问。

项德隆坐下后说：“照原计划不变，总干事陈天已经和各工会代表开过会了，决定明天上午在江岸召开慰问大会。”

“太好了！”杨德甫一拍桌子，高兴地说：“我们就趁机再举行一个示威游行大会，压一压这些军阀们的嚣张气焰。”

天很快就亮了，到上午9时多，江岸分工会门前的广场上早已是人山人海，人们手里举着写有“斗争到底”、“维护权利”、“打倒军阀”的小旗，四周也张贴着无数的标语口号，人群中高高竖起的一面写有“支援京汉铁路工人兄弟”的旗帜特别引人瞩目。会场的讲台上站着杨德甫、陈天、施洋、林育南、林祥谦和其他工会派来的代表。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德甫首先致欢迎词，并报告了京汉铁路罢工的经过。接着，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执行委员长陈天代表工团联合会及湖北地区全体工友向京汉铁路工人致以恳切的慰问。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林育南，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汉冶萍总工会代表许白昊，汉口英美烟厂工会代表陈云卿，烟厂工会书记兼内务、外交顾问周无为以及工团联合会顾问、新闻记者张子余等十余人在大会上先后发表演说，痛斥反动军阀的罪行，赞颂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坚决支持京汉铁路工友，誓为大罢工的后盾。

最后，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长李震瀛致答谢词，他说：“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阶级命运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我们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保卫者。工友们，要晓得我们京汉路工人的责任是如何的重大，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渲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做先锋，只有前进啊，勿退却！”

全场激情沸腾，振臂高呼：“打倒军阀！”“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万岁！”口号震天动地，响彻江岸，慰问大会变成了动员誓师大会。

中午12时10分，大会结束，参加大会的万余名工人群众结队游行，先在江岸绕行一周。张厚生留驻在此监视工人活动的部队一下子被工人的力量给震慑住了，哪里还敢阻拦。游行队伍穿过日、法、俄、英租界，工人群众手执写着各种标语的白旗，工人纠察团团员手执红旗，旗上写着“维持秩序”、“执行罢工的纪律”，沿途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工人阶级胜利万岁！”游行到大智路省工团联的会所前，队伍方才渐次散去。

下午3时许，张厚生全副武装，率领着数十名士兵，第二次来到江岸分工会处。一到门口，数十名士兵就把分工会团团围住，张厚生从马上下来，挥舞着手中的马鞭，在一名副官的陪同下，进入屋内。

张厚生扫了一眼屋里的人，把马鞭往上一扬，说：“快让你们的杨委员长出来见我，我奉萧督军命令，来与你们商谈复工的事情。”

当时，只有总工会秘书长李震瀛和几个工人在分工会，杨德甫随工人前去游行尚未回来。李震瀛见张厚生趾高气扬、一脸傲慢的样子，而且又带着一群兵，没有一点谈判的诚意，就故意岔开张厚生的话，佯装作不知道他的身份，问：“请问这位长官有没有委任状啊？”

张厚生气恼地说：“我是参谋长，奉督军命令，还要什么委任状！”

李震瀛朗声说道：“既然你没有委任状，当然不能负责解决问题，就没有谈判的必要。”

张厚生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李震瀛，转身出门，骑上马扬长而去。

天刚刚擦黑，江岸分工会又进来一个身穿着厚棉长衫，脚穿皮靴，头戴翻毛皮帽的陌生人。往门口一站，他就摘下皮帽，笑呵呵地对会所里面的人说：“鄙人是省长公署的参议，代表萧省长向各位问好，萧省长已经同意和工会举行谈判，来解决这次罢工的事件，谈判时间定在明日下午五时，地点就在咱们江岸工会，希望你们现在提出代表名单，明日齐聚这里，省长公署将以调解人的地位，协同交通部方面的代表，到这里来正式举行谈判。”

当时正在工会的陈年伯看此人一脸诚恳的样子，马上高兴地说：“我们欢迎谈判啊，希望通过这次谈判能早日结束罢工。”说到这里，陈年伯



顿了一下：“但是至于参加谈判的工人代表的名单，须由总工会决定，明日开会时自然可以交出。”

“好，好，那我回去向萧省长报告，现下就告辞了。”这名参议身子欠了一下，就匆匆走了。

时间虽然很晚了，但听到这个消息，总工会立即开会讨论。在离分会不远间隔有二三十户人家的样子，有一座坐东朝西砖木结构的房子，就是总工会的所在地，堂屋左边房内就是秘密的办公处。

“我看这是个好消息，我们这次罢工组织得很完善，他们无法破坏。”

“武汉市各业工人也都骚动起来了。”

“北边的消息虽然还不知道，但可能其他各路工人都在候令行动，只要我们坚持到底，政府不得不让步，愿意举行谈判。”

会上几名代表激动地讨论着这次谈判。这时张特立突然说：“我对明天的谈判还有点担心，现在大批军警集结在江岸，谣言四起，人心不稳，另外为何把谈判地点选在江岸？我们要预防有非常情况发生，对他们的任何举动都要小心应对。”

坐在一旁抽着旱烟的林祥谦说：“我们是要有所提防，我看我们一方面选举出谈判代表，同时也选一些接待代表。看政府方面的代表果真来了，没有什么诡计，再由谈判代表和他们谈，怎么样？”

大家就按照林祥谦的意见，选举杨德甫、张特立等五人为谈判代表，项德隆、林祥谦、张濂光、朱兰田4人为接待代表。正要散会时，张特立突然说：“为安全起见，谈判代表和工会负责人明日都先隐藏在总工会，情势明朗后再做行动。”大家采纳了他的意见，即分头行动。虽然出于对局势的担心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大家深信一点，即吴佩孚不会对工人动武，还都保持乐观的态度，并没有研究制定对付武力压迫的相应办法。

7日清晨6点多钟，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还在家中睡觉，突然听见有急促的敲门声，杨德甫披上一件外衣就急忙把门打开，看见调查员李元成立在屋外。还没进屋，他就气喘吁吁地说：“江岸的码头上停靠了四艘军队的大驳船，运来了三团士兵，并带有机枪三挺，已登岸分驻三路，一

团在机厂后面，一团在扶轮学校，一团在车站，并带着很多绳索。”听完李元成所说的情况后，杨德甫眉头一皱，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沉思片刻后，拍着李元成的肩膀说：“这样，麻烦你再跑一趟，找到罗海澄和曾玉良，让他们立刻去总工会开会。”

很快，京汉铁路总工会屋里的灯就亮起来了，李元成又把情况向罗海澄和曾玉良说了一下，杨德甫即令罗海澄把纠察团集合在分工会门前广场，加强防范，让李元成和曾玉良通知工友无事不要外出，在家等候。

一上午过去了，江岸和前三天相比没有什么异样，罢工依然是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武汉各界到江岸慰问罢工的团体和个人络绎于路，随处可见各报馆派来采访罢工运动的专访记者。到下午二三点钟，张厚生第三次来到江岸，带着随从十余人，临时仍驻在扶轮学校的楼上。过了没多久，一个军官在纠察团团员的带领下来到分工会，那军官一进就站在门口说：“张参谋长已经取得代表委任状前来和你们谈判，如果你们愿意商谈的话，请工会派几个负责人到扶轮学校和张参谋长谈判复工。”说罢，也不等工人回应，即出门而去。

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还是由张厚生来谈，但张厚生既已获全权委托，工会若是不派代表去，即在情理上先输一招陷入被动，总工会的几个负责人一商议，即决定按原计划先由林祥谦等四人同张厚生会见。四位代表正要出门，杨德甫把他们叫住叮嘱道：江岸又新驻扎了这么多兵是对我们的威胁，他们必须先撤兵才能谈判。

再过几天就是年关了，虽说马上就要立春，但呼呼的西北风吹在脸上仍然像刀割一样生疼。四位代表身上穿的打满补丁的破单棉袄也不时被风撩起，宽大的棉裤也被风吹得紧紧地裹在腿上。憧憬着罢工胜利过个好年，四位代表凝望了一下不远处的扶轮学校，顶着风大踏步地向前走去。

（张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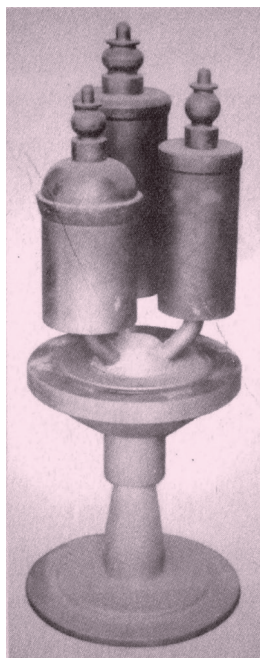


“头可断，工不可上的”

扶轮学校楼上，4位工会代表和张厚生正在进行着谈判。同样是在这个位置，但这一次，张厚生就不像上次对项德隆等人那么友善了。今早刚刚开往江岸新增的军队，给张厚生增添了戾气。

工会代表首先提出先撤退军队再谈判复工。

张厚生说：“国家的军队驻在国土上，哪里要驻军队，哪里不要驻军队，这是军事长官的职权，也许复工了这里还驻军队，这是另外一件事，与罢工无关，还是先谈复工的问题。”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一声拉响的汽笛

工会代表说：“不能无条件复工！”

张厚生说：“你们的要求条件已经送到北京，也转到了吴大帅那里。你们要求的范围太广，涉及的主管部门太多，一时不能决定，现在只能答应你们已在各主管长官考虑中。京汉铁路是国家南北交通要道，与国家政治、军事、治安息息相关，必须马上复工，越快越好。不然的话，如果出了什么事，那只有由你们负责！”

不等他说完，林祥谦说道：“复工是全路工人的事，既然这样，我们拿什么叫全路工人复工呢？”

听见林祥谦这样说，张厚生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看着林祥谦，问：“你叫什么名字？”

林祥谦正色答曰：“林祥谦。”

“呵呵”，张厚生冷笑两声说，“你的责任很重，我还给你一个机会，迅速召集全体工人，叫他们马

上复工。”

林祥谦看张厚生一副威胁命令的口气，就知道没有继续协商的可能，大声说道：“没有那样简单容易。”

张厚生立马变了脸色，阴沉着脸说：“我下命令恢复交通，你下令复工，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

项德隆立刻意识到问题不好，因为林祥谦是罢工委员会江岸分会的委员长，这个职务对外是秘密的，听张厚生这样说，说明他知道林祥谦是罢工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从他同林祥谦对话的冷笑中，项德隆感到其中暗藏着无限的恶意。项德隆灵机一动，想到一个脱身之计，就很委婉地说：“我们马上召集大家开一个会，商量一下，再来回报如何？”

张厚生一边说好，一边向立在林祥谦身后的一个军官递了一个眼色。这军官立马心领神会，紧紧跟在两人后面。

路上，项德隆小声地对林祥谦说：“你去通知各厂处的代表，我去通知纠察团到工会集合。”示意林祥谦不要回工会。

林祥谦还在迟疑，没有说话，后面的军官说：“你们几位去通知大家到工会开会，我陪林会长到工会去等你们。”

林祥谦看这个军官这样直呼自己为“林会长”，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也猜到几分他们的用意，愤慨地说：“光天化日之下，堂堂正正的集会结社，我们有罢工的自由。我只知道执行总工会的命令，服从群众的意见，其他一切，我都不管。”然后，径直向分工会方向走去，那名军官和几十名士兵紧紧跟在他后面，此时他已经失去自由。

项德隆等人还未赶到总工会汇报一切，身后就响起子弹划破空气的刺耳枪声。出事了！项德隆立马意识到情况不妙，不顾危险，转身折回，奔向分工会。

从江岸分工会方向传来的清脆枪声，同样也使总工会里的人都吃了一惊，还未待大家反应过来，2位负责探听消息的工人跑来报告情况：“张厚生派兵在江岸动武，看样子是要包围整个村子，现在已经开始抓人了！”枪声越来越密了，隐约能听见喊杀声、妇孺哭泣声，混成一团。这太出乎



大家的意料了！张特立立即下达命令：“为了避免牺牲，现在总工会的人化整为零分散开，大家赶紧撤出村子，主要负责人撤出去后，在汉口法租界茶楼集合开会。”

原来，张厚生在林祥谦离开扶轮学校到工会的这段时间里，打电话到南局问冯云。这时吴佩孚已给各地下达严办令，是冯云秘书张坦接的电话。张厚生在电话中说：“现在工人不服调解，是不是可以武力解决？”张坦连说两个“可以”，给了张厚生一个肯定的答复。

张厚生从扶轮学校出来，走到福建街口，即向天上放了两枪，这是他事先定好的行动信号。顿时，江岸工会四周枪声大作，原本已经驻在江岸的张厚生部队和警察从三个方向对江岸工会进行包围：从车站攻福建街，从扶轮学校攻三道街，从机厂转车楼包围江岸。

昨天万人慰问队集会的分工会门前广场顿时成了屠杀场，枪声、哭喊声响成一片。

张厚生立于福建街指挥，警察分所所长则手持军刀，站于工会对面指挥。面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张厚生下令开枪，总工会纠察团派出维持秩序的工人王先瑞见工人死伤不少，痛不欲生，站在弹雨中高声喊道：“工友们，他们打死我们这么多弟兄，我们都去死罢！”

未死伤的工人听到喊声，不顾生死地去抢救倒在地上的伤员。

这时，一军警举枪向王先瑞射击，王中弹并随着枪声倒了下去。他死时，“维护秩序”的标语牌还竖在身旁。

工人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率领纠察团团员 20 余人前往福建街施救。眼瞅着这么多工人被枪杀，曾玉良悲愤异常，看见身边不远的张厚生又举起枪，一下把张厚生的手扭住，把枪夺在手中，2 个人扭住倒在地上。曾玉良的口中不停喊着：“你不要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你不要打我们的工人兄弟……”

2 个卫兵赶紧就上前拉起张厚生，曾玉良又趁机扭倒其中 1 名卫兵。张厚生起来后气急败坏地从另 1 名卫兵手中拿过枪来，对着曾玉良就放了数枪，也不管和曾玉良正扭打在一起的卫兵，结果曾玉良饮弹而亡，卫兵

也当场毙命。

军队和警察还冲进工人家中逐户搜索工人。这些兵匪趁机洗劫工人家里的财物，还将已死工人身上的皮袄也剥去。工人周依海见无处可逃，就趴在地上装死。一个兵从他身边经过，就用刺刀挑开他的板带，看了看没钱，悻悻而去。林祥谦之弟林元成刚从家中逃出来，就被一个兵看见，指着他大喊：“这是林祥谦的兄弟。”话音未落，枪就响了，林元成应声倒地。有 20 余名工人被士兵追赶得走投无路，跳入江中溺亡了。

江岸分工会这边，张厚生在福建街口鸣信号枪的时候，林祥谦刚刚回到了工会，看到里面的工友，正待说话，听到枪响的那个军官和几十名士兵就立即冲进工会逮捕工人。很快，张厚生的部队已经从 3 面合围住了分工会，把在场的林祥谦、李开元等人和几个火车司机押到江岸火车站，林祥谦等 13 人被绑到车站的电线杆上。

项德隆率领工人纠察团赶到江岸分工会时，听说林祥谦和其他 10 余人已经被押到车站，就赶紧往车站方向跑去。这时已经是晚上 7 时，天完全黑下来了。快冲到林祥谦等人身边时，张厚生一声令下，把守车站的士兵立即开枪射击，顿时弹如雨下，前来营救的工人应声倒下一片。项德隆为了避免更大伤亡，不得不带领大家抬着伤者，暂时从车站退了出来。



武汉二七纪念馆

张厚生得意洋洋地召集警察分所所长和车站厂长、段长到车站内，然后亲自提着马灯在被绑在电线杆上的 13 个人中找林祥谦。当马灯照在林祥



谦脸上时，他扭头问江岸车站工段长吴成禧：“此人是否林祥谦？”吴连忙称是。

张厚生听后，立即让刽子手割去绳索，假惺惺地说：“林会长，受委屈了！你现在马上下令复工，我保证有你的好处。”张厚生故意看了看林祥谦身边的刽子手，顿了一下说：“否则，你性命难保。”

林祥谦瞪了一眼这个两手沾满工友鲜血的刽子手一眼，没有理睬他。张厚生立刻凶相毕露，恶狠狠地说：“你还不下复工的命令吗？”

林祥谦从容地说：“我下命令给谁？”

张厚生指着火车司机说：“下命令给他们和纠察团。”

林祥谦高声说：“要杀就杀，老子无话可说。”

张厚生气得把手一挥，命令刽子手向林祥谦左臂上砍了一刀，顿时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棉絮，从林祥谦的破蓝土布薄棉袄中渗出来。

张厚生再问道：“上不上工？”

林祥谦抗声说：“不上！”

张厚生又令刽子手朝林祥谦右臂砍了一刀，狂叫道：“到底下不下上工命令？”

“上工要总工会下令的，但今天既是这样，我的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上的！”林祥谦忍痛大喊道。



位于江岸车站的林祥谦烈士就义处

张厚生气急败坏地令再砍一刀，林祥谦因失血过多晕过去了。过了一会儿醒来，张厚生还抱着一线希望，狞笑着问道：“现在怎样？”

林祥谦操着福建口音，咬牙切齿地对着张厚生大骂：“现在还有什么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

送在你们这班混账王八蛋的军阀走狗手里！”

张厚生听了大怒，立即命刽子手向林祥谦连砍四刀，并将首级割下来，悬在车站示众。与反动军阀进行不屈斗争，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林祥谦壮烈牺牲了。

林祥谦的老父林瑞和妻子陈桂贞听闻噩耗，悲泣着来到车站，却被拦在外面，林瑞老泪纵横，呜咽道：“长官行行好，我是林祥谦的父亲，你就让我进去，难道收尸也不准吗？”

张厚生说：“你儿子林祥谦，私自组织工人罢工，现在已被正法，这是他应得的下场。还有谁要继续罢工就和他一样，任何人不得去收尸，否则按同案犯论处。”

林瑞忍无可忍，回家拿了一把斧头，连同工友数十人再回到车站对张厚生说：“如果再不准收尸，我豁出去老命和你拼了！”张厚生仍是不答应。工人们奋不顾身向前冲去抢林祥谦的头颅，张厚生又令开枪，顿时又扑倒数名工人。

直到夜半军警撤走，工人家属们才强忍住悲痛，收敛亲人的遗体，将伤者抬到车站医院和天主堂医院救治，当时遇难者共计有 39 人之多，受伤百余人。

反动军阀在江岸对手无寸铁的工人们进行疯狂的大屠杀，威逼工人们复工的同时，也把黑手伸向了支持铁路工人罢工的其他工会组织和社会人士。

（张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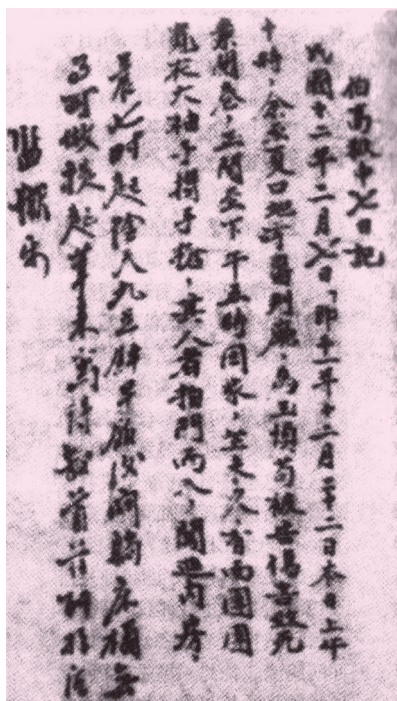
青山埋英烈

在张厚生血洗江岸的同时，萧耀南也对位于大智路上的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下手了，时间就在江岸惨剧发生一刻钟后。1923年2月7日下午6时许，一队警察不由分说，冲进工团联合会，宣布禁止工团联合会的活动，要封闭会所。会所内吃惊的10余名工人代表上前与之理论，却惨遭毒打，并被拘捕到警察局，从门前经过不明就里向里面窥视的人也被抓去。工会里面的桌椅板凳、匾额锦旗全被破坏抢劫一空，还有警察20余名驻守会所。

同一天，京汉铁路的法律顾问、中共优秀党员、“劳工律师”施洋在

家中被捕了。6日，施洋在江岸慰问大会上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后，随工人群众们一起游行示威，回家后，受总会委托，就又马不停蹄地赶写《京汉铁路总工会致全国各铁路工友书》，恳请其他铁路工会给予经济支援与实力支援，文稿交于工人代表，当天晚上就发出了。

7日一早起来，施洋就赶赴夏口地方审判厅，为王慎苟被告伤害致死案调阅卷宗，到下午5时方才回到家中。刚刚坐下片刻，就听到猛烈的拍门声，施洋夫人郭秀兰急忙开门，只见一胖如面团、面相凶狠、穿着宽衣大袖、手持手枪的人立在门口，背后跟着的10余个人也是着便衣持手枪。郭秀兰大吃一惊，还未



施洋撰写的《伯高狱中七日记》

开口，那人就径直冲进内房，对坐在书桌前的施洋说：“敝厅长请先生有几句话要谈，请跟我走一趟。”施洋冷静地说：“贵厅长是谁？”“敝厅长就是汉口警察所长，奉督军命令来请的，你还不明白吗？不要多说，赶紧跟我走一趟”，这个胖如面团的人显得极不耐烦地说。

施洋感到可能是出事了，就说：“既是贵厅长奉督军令来请我，我当然同你们走了，请不必用武，我走就是了。”说着就起身离座准备和他走。这时，施洋夫人跑过来，一把抓住施洋说：“往哪里去？我也去。”施洋安慰她：“你去做什么，我没有犯法，无论到哪里都不怕的，不用担心，你好生在家。”那个“胖面团”不容施洋说太多话，招呼过来1名便衣警察，把施洋的两条胳膊架着就要往外走。施洋看这阵势感觉情况不妙，就大呼：“我无论犯什么法，我愿到夏口地方审判厅受合法的裁决，不愿到警察厅受非法的蹂躏。”“胖面团”说：“是啊，可这是上司的命令，怪不着我们。”

施洋一路高喊：“要受合法的裁决，不愿受非法的蹂躏！”虽然天已经黑了还是引来很多人围观。就这样在大声申诉和路人围观下，施洋来到汉口警察厅，刚进到二门口，那“胖面团”对施洋吼道：“站着！”随之来了一队服装整齐的20余名警察将施洋围住。

施洋说：“无论如何，也应该许我陈述完理由，这样即使枪毙我，我也心甘啊！”那“胖面团”没有理睬施洋，径直走了，又来了一人，把施洋请到一小房间内去坐。施洋刚坐下就以探听的口气说：“我犯了什么法，把我捕到这里？”那看守施洋的人说：“大约是为罢工的事，特请你来商量一个解决的办法。”

施洋说：“官厅真把我看得起。好一个罢工潮流，遍传全球，我何人也，敢说解决吗？”

随后，施洋就把罢工风潮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一一给这个看守分析了一下，看守也连连称是，就这样过了一个半钟头的样子。施洋请警厅茶房代自己买份晚饭，2位便衣警官进来说：“请阁下现在过江。”房内另外2名差官于心不忍，说：“等他吃点饭再过江呢。”那便衣警官说：“这么多人等着，怎么能吃饭？”



施洋已经预感到危险临近，起身很坦然地说：“既云过江，死期到来，还吃什么饭？”说罢就随2名警官出来，一到二门，就看见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约200人，排成2列，2名便衣警官架着施洋的胳膊，站在2列中间，喊了一声开步走，队伍出大门向右转，经张美之巷过河街，到招商轮船码头，还由这2名便衣警官连同6名警察，将其押上一艘平日里都由大人老爷们坐的小火轮。施洋很清楚，给他这么好的“待遇”，其实是要把他看得紧紧的，怕他跑了不好交差。

小火轮一鸣再鸣，船就抵达武昌文昌门外了，趸船外早站了约60名武装警察，那2个便衣警官和6名警察将施洋夹在中间，弃舟登岸进文昌门，一路来到湖北陆军审判处。刚进入二堂，又来了几位军官，8名警察与军官做一交接，施洋即被押送陆军看守所。看守所内每道门和拐角都有2名武装士兵把守，施洋被押着一直走到有字号监房，上完脚镣手铐后，推入有字第一号监房。

借助监狱内昏暗的灯光，施洋看时间已经是深夜11点，看狱室内还有其他人，一询问才知与己同榻的是已坐了5年监狱的丁钱元，另还有2人是谢云青和吴成雄。虽承3人热心照顾，怎奈身带脚镣手铐，施洋终是一夜未眠。

8日下午4时，陆军审判处才开始提讯。戴着三四十斤重的脚镣，20多斤重的铁链，大大的1副手铐，尽管行走艰难，但施洋不改常态，仍是从容自若，在2名便衣差官牵引下至法庭，见正中坐孙处长，左右2名执法陪审，供案前左录事2位对坐，录事前左右各武装军队1排，共16人，审判长后又分立服装整齐的军官3名。

审判长首先问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职业，施洋一一作答后，孙处长问：“你既当律师，应安心执行律师职务，为何参加什么各界联合会呢？”

施洋说：“这各界联合会，缘系爱国运动而起，吴佩孚、萧督军驻衡阳时，也曾通电主张发表意见。我为国民一分子，爱国是国民天职，为何不应参加呢？况我之参加，系由武夏律师公会所公推，与以个人资格参加者，尤不可同日而语。”

孙处长又问：“律师代工人或工会撰拟诉状或书状，本为适法行为，而武汉律师多矣，为何都请你撰拟呢？”

施洋答道：“工人或工会请律师代撰诉状，原不仅我1人。武汉轮工会，系请段焕奎律师代充文牍兼顾问。扬子厂工人俱乐部，请范镐律师充法律顾问。汉口英国香烟厂工会，请张冠军律师充法律顾问。”

“据你供，律师代工人或工会撰拟诉状，不只你1人，尚有某某等，为何武汉各机关，不注意他们，而独注意你呢！”孙处长穷追不舍地问道。

施洋沉着地道：“武汉各机关所以独注意我者，因我自民国八年以来，无论爱国活动、驱王运动，皆由我参加，露面太多，发牢骚太多，现在武汉各机关人员，又多系王子春（王占元）旧僚，他们恨我最深久，欲得而甘心之，他们所以注意我者，谅在此也。”

孙处长听完后说：“你所供之话，还有几多我弄不清，你可具个亲供上来，俟调查明确后再说。但是本案既是武汉各机关所经委的，你又很负有名望，社会上一定都很重视的，何况我也是法政学校出身，你我是同道人，你尽管放心，我必平情判断，决不致冤枉你。不过这是军法机关，只重命令，与普通法院不同。你在亲供上不必发牢骚语，这是应有的过程，请你冤屈几天，静候解决。”

施洋当即抗辩道：“我既来此，当然受此地法律制裁，不过像脚镣手铐这类刑具，文明国已废除不用，即会用之，绝不宜用之于我书生身上。书生本身最重气节，即划地为狱，我亦遵守，何况外有石墙铁网，内有军队林立，绝无脱逃之虞。”

见施洋有理有据，孙处长只得说：“这是看守所的惯例，只要你安心守法，我可命他们斟酌把你的刑具去下。”随即宣布退庭。

施洋下了公堂，回到监狱，刚刚坐下，即有一身着长衣的人来吩咐道：“施洋下刑具。”施洋明白刚才孙处长给他说明“这里是军法机关，只重命令”的意思，但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抗争到底才是施洋的本性。

9日早上一起床，施洋便草拟了一个供状，约3000言，仍是据理力争。仅隔1晚到10号，施洋即又给陆军审判处递交了1份稟帖，为有字号全体



犯人挣年关3天放风和设公共火炉。到12日，又为有字号犯人石玉贵撰写假释诉状。

这天下午，监狱看守来传所长的口谕：昨天你们递一禀帖，不知是谁人起草，要求毋乃太过殊，不是守法犯人所应提出的，尚若不是正逢过年，我定要严办起草人。暂且准你们所请，于三十夜不收封一天，初一准每大号出1名犯人到厨房做菜，所请3天不收封及要设火炉或自备炭火于号内各条，决不照准。

面对如此恶劣的斗争条件，施洋依然保持着昂扬的斗争精神，13日以“监狱乐”为题作打油诗1首：人人都说监狱苦，我坐监狱反觉乐；不要钱的饭，给我吃个肚儿圆，不要钱的衣，给我穿个鼓堆堆。

15日拂晓，正好是除夕日，有字第一号监牢突然被打开，进来几个当兵的叫起施洋。施洋揉揉睡眼，很冷静地问道：“你们做什么？”其中1人说：“你的时候到了。”

说着，就把施洋从床上拉起来，推搡着往刑场去，施洋一甩身，硬声说：“推什么？我自己会走！”依然用自己从容的步态迈向刑场。行刑前狱吏问施洋有何遗嘱，施洋笑答：

“我的遗嘱就是：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百个施洋。”执法官大为恼火，连声说：“开枪！



开枪！”施洋振臂高呼：“劳工万岁！”为工人罢工斗争，为中国革命事业，施洋光荣牺牲了，年仅34岁。铁路工人和人力车工人冒死将他的遗体收敛，出资安葬在武昌宾阳门外洪山脚下。墓前碑上刻着6个大字：施洋先生之墓。

倒下的施洋永远屹立在人民心中

（张均）



播火荆楚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复工再战



危急时乔装脱险

1923年2月7日夜，江岸车站边，枪声越来越密越来越近，总工会内的工作人员都已分途转移，屋内只剩下张特立和杨德甫。两人用炭火把一些秘密文件赶紧处理掉，即把房门掩好准备离开。

“你穿这身怎么行？”走出大门，匆忙间，杨德甫一看张特立的衣服，顿时觉得不对。普通老百姓哪有平时穿长袍的！这样出去太显眼了，怎么能通过张厚生的包围圈！

“等一下。”杨德甫返身回到屋内，拿了一件打有不少补丁的短夹袄和一双破棉鞋出来。

换好衣服，杨德甫又对张特立说：“你把这个挎上。”给他一个盖有一块花布的小竹篮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些炒好的花生。已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的张特立顿时明白他的用意。

“两个人一块走目标大，我们一前一后，你跟着我，我对这块儿很熟。”说着话，杨德甫就在前面带路，张特立在后面远远地跟着，两人尽量绕小路躲开军警。

可偏不凑巧，刚转弯到大路，就见路口被几名武装士兵把守着，几个人挎着枪在抽烟。张特立在后面看见当兵的挡住杨德甫的去路，盘问了老半天才放行，心里顿时打鼓，可想再折回更是不可能，反而容易弄巧成拙，引起他们的猜疑，看来这关是必须要闯了！待张特立走到跟前，两名士兵拦住去路，用上了刺刀的步枪指着他的胸口呵道：“站住！干什么的？”

“卖花生的。”张特立揭开盖在竹篮上的花布说道。

“怎么听你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啊？”当兵的满脸狐疑，上下打量着张特立，对他的话将信将疑。

张特立立刻机敏地又加重了他的萍乡口音，满脸堆笑：“家是江西的，这年头没有活路，来武汉讨碗饭吃，做点小生意，这两天这边人多就过来赚两个小钱。两位官爷，这还有点花生，你们没事抓些去，也好解闷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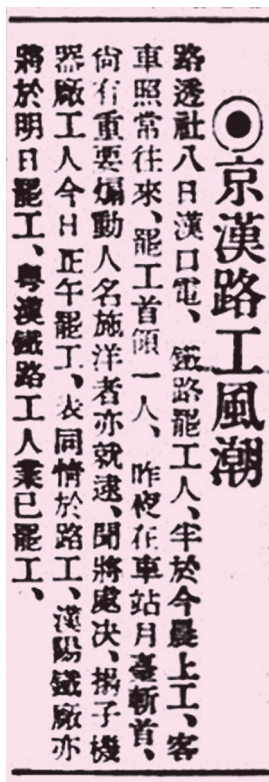
这番表演果然骗过了当兵的眼睛，两人毫不客气地抓了两大把花生，呵斥道：“挣钱不要命了，跑这来凑热闹，不晓得现在正捕人呢，把你当铁路工人抓了，看你还挣个鬼钱，还不赶紧滚。”

张特立继续演戏，连忙称谢，诺诺地应承着，算是涉险通过。走出老远，心绪才渐渐平稳下来，紧走几步赶上在前面等着的杨德甫，又走了约10里地，到天完全黑了才到达汉口大智门法租界。

茶楼前，林育南、陈天等人都已经先到了，众人在焦急地徘徊着，心里万分着急，虽对江岸的情况不是十分清楚，但从密集的枪声判断一定会有工人死伤，江岸既是如此，全路其他工会又是怎样？下一步怎么走？这一切都急需组织进行安排。

众人碰头后，简单地通报了一下各自了解到的情况，知道萧耀南已命军队断绝交通，正在四处搜捕罢工领袖。最后赶来满身泥污的项德隆，怀着沉痛的心情向大家告知了林祥谦和众多工人遇害的消息。原来，项德隆和纠察团团员在营救林祥谦时被军警乱枪击散后，就潜伏在江边的草丛里，目睹了江岸工人被杀的惨象，恨得咬牙切齿。待到天黑，趁军警不注意，才搭上一艘小划子，来到开会地点。

划子手已撒下大网。张特立立即判断茶楼现在已不是安全地点，根据自己的经验，帝国主义控制的租界和反动军阀在压迫人民方面是沆瀣一气，要不了多久，巡捕定会来挨户盘查，要赶快更换开会地点。可是到什么地方去才安全呢？



1923年2月10日，《新
闻报》关于二七惨案的报
道



最后，他们决定就近转移到法租界长兴里 103 号。原来这里就是在辛亥革命时首先发难，向楚望台军火库开第一枪的新军工程营熊秉坤寄居的寓所。身为革命元勋，即便是租界巡捕房也多少有所忌惮，又因他为人仗义好客，有革命正义感，这就成为一般革命流亡者熟识的去处，党内同志廖乾五此时也住在此处。

仆人通报后，出来一位豹头环眼、面色红润、身材魁梧的约 40 岁左右的中年男子，此人正是熊秉坤。同他把深夜突然造访的缘由讲明后，大家起先还担心他不肯接纳，因为他同多数人并不相识，对工人运动的情况也知之甚少。不料熊秉坤非常爽快地说：“怕么事，你们只管进来。”

从其决绝的态度中，众人仿佛能看出他当年武昌首义时的那股果敢。熊秉坤非但没有害怕惹祸上身，反而急忙把众人迎进客厅，又对仆人叮嘱道：“无论何人来找，都说不在。”就在这间小客厅，工会领导人连夜定下罢工失败后的行动方案。

（张均）

争论中忍痛复工

客厅紧邻着马路，而墙体实际上只是一层薄薄的木板，并不隔音，屋外的各种动静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大家刚坐定不久，就传来阵阵刺耳的警笛声，随后即是警察来回巡逻清晰可闻的脚步声。可事关紧急，大家也管不了什么安全不安全了，一心一意地认真讨论下一步如何应对反动军阀的血腥屠杀。

“怎么能复工？”

“不能就这样算了，怎么和工人交代？要是这样，往后工人运动还要不要开展下去？”

多数人极力反对张特立一开始就做出的要求工人立即复工的提议。湖北工团联合会总干事、共产党员陈天激动地说：“数日前，武汉各工团都已动员起来，要以实际行动援助京汉铁路方面，已发布罢工总动员令，计划在8日实行总罢工，6日开始部分工会已经处于半罢工状态，正在为总罢工做着准备。现在看来，我们不应当讨论复工的问题，而是要考虑怎么再把工人组织起来，实现好这次罢工，才能给反动军阀震慑，为死去的工友们讨还血债。”

几位与会者强烈赞同他的意见，表示铁路工人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是要顽强坚持下来，再继之以全市总同盟罢工，不将杀人者送交法办、不挣回自由权利，绝不回头，直到胜利方可罢休。不可一遇挫折就表示屈服。

张特立对他的提议解释道：“斗争应当退却时，就应迅速退却。现在我们这种和平式的赤手空拳罢工，怎么能对抗吴佩孚这些反动军阀的钢枪钢炮的武力镇压。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大家只要细想一下在江岸分会内张厚生用诡计屠杀工人的经过，就可以预料到接下来他们还会采取什么样



残酷的手段，继续罢工或者是全市总同盟罢工必然会遭受到更大规模的屠杀和镇压。为避免工人再作牺牲，保存实力以图再举起见，现在只有忍痛复工。”

话刚说完，项德隆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慨，立马起来反驳，指斥张特立领导不当：“既然说和平式罢工不能抵抗武力压迫，那又为何当时轻率做出发动罢工的决定？当时就应当制定出应对镇压的办法。既然并未做出这种计划，如今，在武力压迫之下，又怎能就这样屈服？”

争执越来越激烈，张特立连珠炮式地向要求罢工的与会者提出很多问题。“现在消息隔绝，我们对其他各站的情况还不了解，但可以猜想，江岸既然发生大规模屠杀，各站是否也是同样的情形？如果我们不立即复工，吴佩孚的屠杀是否仍将会继续？如果继续下去，各地工人是否能够承受得起？各地工人在罢工后，如果遭到更加严重的牺牲后，工人组织是否会陷入崩溃的状态，工人最终乃至被逼迫上工？”

张特立一连串说的这么多“如果”，是对继续罢工和发动更大规模罢工后，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的估计。对他提的这些问题，持继续坚持罢工意见的项德隆也提不出具体的解决办法。没有武器的工人怎么能阻止疯狂的屠刀！

与项德隆持一样观点的与会者和张特立展开长久的辩论，两方谁也说服不了谁。

在一边热心旁听的熊秉坤对情况有了大致了解后，从自己的革命经历出发，有感而发地插话说：“革命就是要硬拼，没有所谓的暂时退却，宁可最后溃败，也不能屈服。”这位老资格的革命家在辛亥革命后并没有盼来国富民强，革命果实早早被袁世凯篡夺，即又投入到反袁的二次革命中，几经危险，而国家局势却日益糜烂，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在张特立看来，他的这番话无疑于火上浇油。客厅大座钟的指针标明现在已是凌晨3点，会议还陷入争论中，多数人不赞成张的提法，而今晚必须要对下一步的行动做出明确指示。时间非常紧迫！已经不能通过正常讨论的办法来获得结果了。张特立拿出最后的手段，要求停止讨论，以中

共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全权代表的名义下令立即复工，要在场者一致遵行。

他对复工命令做了说明：“我们这次力争工会组织自由的京汉罢工本身是正确与必要的，但也犯了对情况估计不清的错误。没有完全估计到吴佩孚的残暴本质和他所受中外反动势力影响之大，对情况过于乐观，因而事先没有详细研究对付武力压迫的办法。现在各工会都应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骤，通告所有罢工工人，明日起一律复工。大家根据这个命令，不折不扣地去执行，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如果有反对意见，可以保留，将来再向上级控告我。”

虽然项德隆等多数人并不满意这个结果，但也只好表示服从，讨论转入到具体的执行方法上来。熊秉坤看到这一幕甚是吃惊，纪律严格的共产党与松散的国民党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大家随即草拟了一个复工命令，表示“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等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誓死必打倒。惟其如此，所以我们要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

可要下达这个命令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与各工会、各工厂的联系已经隔绝，能够确定的是湖北工团联合会已被封闭，会所也受到监视，而其他各工会的详情就不得而知了。只能分别到各工会查明情况，一一传达。杨德甫、项德隆等人负责向京汉铁路工会下达复工命令；陈天等负责武汉各工会，通知取消原定的罢工计划，要求工人们一律照常上工；工团联合会秘书林育南在秘密办事处居中策应，并以最迅速的方法，将复工命令通知北方各地和各铁路工会；张特立前往汉阳，去查明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的情况，并与那一带的工会取得联络。众人冒着被捕的危险，出门分途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清晨，汉阳还沉睡在梦境中，一切都看不出任何异样。在龟山下共用一个会场的铁厂和兵工厂工会人员紧急停下正在进行的罢工准备，刚执行完张特立下达的紧急命令，安排专人分途通知汉阳的工会和各厂工人照常



上工、烧掉会员名单和职员名单、撤出会所，在山上把风的工人即跑来报告：军队从武昌渡过了江，正向工会这边包围前进，快要围拢了。原来，萧耀南已电令第二旅旅长寇英杰派兵前来镇压。

从后门出去后，转入一条窄巷，张特立走到一片高地上向后观望，只见一连的武装部队拿着绳索和大刀，由一个举着戒严令牌的士兵前导，正包围会所，工会的牌子被摘下扔在地上，工会被占领。幸亏人员都已安全撤离，他们扑了一个空，否则不知又有多少工人会惨遭毒手。在消息未通知到的谏家矶扬子机器厂、汉冶萍轮驳工会，支援江岸工人的罢工刚举行，即被赶来的军警武力勒令上工。

晨曦中的江岸还没有从痛苦中复苏，时不时就能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号之声。到7时上工时间，驻扎在车站和工会内的军警大批出动，拿着绳索铁链，声言：“如有再不上工或逃跑者，就地正法。”而此时，复工的消息已经在工人中传开，工人们抹干泪痕，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拖着沉重的脚步，踏着血迹斑斑的土路，遵照总工会的复工命令，走进厂房，开始了工作。

升火上水，火车缓缓发动，在有节奏的阵阵轰鸣声中，复工命令沿着铁轨向北挨站传达过去，同时也传来军阀在各站镇压的惨闻。

就在江岸二七惨案的同一天，反动军阀向京汉铁路各个工会都动手了！在长辛店，3000多名工人聚集在旅部示威，要求释放前一天晚上被捕去的史文彬等11名工人和工人领袖，突然枪声大作，大批军警从旅部涌出，朝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工会纠察团团长葛树贵等5人当场牺牲，受重伤者28人，30余人被逮捕押解到保定，工会被封。其他各工会情况无不如是。保定分会委员长何立泉及500余名工会会员被捕。信阳分会执行委员长胡传道坚持复工要有总工会命令，拒绝开车，被军警砍断一只手臂，仍不屈服，终晕死过去，鲜血淋漓，场面极为惨烈。军警复捉工人强迫上工开车，为防其逃脱，再用铁索系住双脚。广水、驻马店等站亦在7日下午被包围，因拒不上工，工人多被军警毒打、逮捕。虽施加种种办法强迫工人上工，但各地工人仍顽强坚持，直到接到总工会劝告工人忍痛复工命令后，才开

始恢复工作。在这次斗争中，全路壮烈牺牲的烈士共 52 人，其中江岸 39 人，此外受伤者 300 余人，被捕者 60 人，另有 1000 余人被开除出厂。

数日内，武汉各工会相继被封，所办的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一律勒令停办。萧耀南紧接着宣布特别戒严令九条，三镇各街道军警密布，同时开始向同情工人的学生、新闻记者也下手。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武昌高师学生赵春珊等 4 人只能须臾不离开校园半步，以避暗探的搜捕。

8 日晨，为工人的合理要求摇旗呐喊的《真报》突遭查抄，军警们以在报馆内搜出烟厂工会所赠送的“劳工福音”匾额一个，及“顺应潮流，维持正义；不畏强暴，力挽狂澜”对联一副，和关于劳工的各种文稿作为凭据，就冠之以“鼓励罢工扰乱秩序”的罪名，封闭报馆，社内财物抢劫殆尽。馆内人员郭聘伯、周无为、郭寄生与工会领导人杨德甫、项德隆等 17 人一同受到通缉。武昌的《大公报》也因不附和萧耀南，被迫停刊。

三镇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但反对军阀的斗争却没有停止。杀人凶手为掩盖事实真相，把责任推到工人身上，发布布告，诬蔑工人为“匪”，捏造事实，称惨案皆因工人领袖林祥谦率先开枪而起，并谓“发枪格斗，当场互有伤亡”。但这只能是欲盖弥彰，在秘密联络处，项德隆等人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名义，发表紧急通知，向全国揭露军阀的罪恶。

（张均）



斗争没有停止

二七惨案消息传出，举世震惊。

北京、上海、湖南等地纷纷成立后援组织。国内各学生、工人组织，国外侨工和爱国同胞，日本和朝鲜的工人团体，全俄铁路工会和共产国际等先后发出通电、拍回电报、发表宣言、送来慰问信，声援工人，痛斥军阀暴行。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谴责之声。中共中央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开展政治宣传，由包惠僧、刘子通、范鸿吉3人专门负责。一方面，联络胡鄂公、吴昆等湖北籍议员，发出工潮质问案和弹劾吴、萧案，并提出劳动立法案，争取工人的集会结社罢工自由。胡鄂公是北京《今日》杂志派的首领，曾派部下彭泽湘等赴莫斯科请求加入第三国际遭到拒绝，转而争取加入中共组织，所以一经联系，完全服从党的领导。另一方面，组织京汉铁路工人赴京到参众两院请愿，要求政府不得干涉集会结社自由，释放被捕工人，撤退各站军警，严惩肇事官员和军警，抚恤死伤工人及其

家属。

但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掌控下的北京政府，国会只不过是标榜民主、装点门面的花瓶，根本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弹劾案自然不能通过。没有实权的大总统黎元洪秉承曹、吴的意旨，于2月22日发布《大总统令》，大打官腔，



位于江岸车站站台上的林祥谦烈士塑像

称“此次肇事情由，著由内务交通两部会同查明，呈候核办”，如此办法又怎能把事情彻查清楚，给杀人者以严惩？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尽管为应付全国舆论，也有“著主管部妥拟工会法案，咨送国会议决，俾资遵守”之语，却也都是表面文章。此后，北京政府和一些省的军阀政府也确实都颁布了劳工法律，但军阀对工人运动的镇压自2月7日以后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工会组织被破坏殆尽的京汉路上，军阀对工人活动控制得更加严密。在长辛店，工人要保证不再组织工会，上班不交谈，不救济受难工人，否则即遭逮捕。悲愤的铁路工人只能用歌声来表达心声：自北京来到郑州，郑州过去是汉口。从北到南两千多里，步步都是咱们工人修。京汉路工人像牛马，日夜血汗不住流。工人哪个能穿暖？谁能喝饱两碗粥！京汉路啊，变成了饥寒路，失业的工人流落在街头……

在北京，高压政策下，学生同情工人的活动遭“严加取缔”，同时大批逮捕工会负责人员和革命分子，查封了援助铁路工人后援会，并发出包括李大钊、陈独秀在内11人的逮捕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至此也不能公开存在和活动，组织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不久，中央机构又秘密转入上海。

在上海，吴佩孚在致新任交通总长吴毓麟的电报中，不仅要求“乘此时机，通令各路工会一律取消”，还希望其“转请内外两部，将上海所有之工团，一律设法禁止”，并派副官黄殿甲等前往协助。此举正中一贯对工人运动采取镇压政策的上海军阀卢永祥、何丰林和租界当局下怀，他们随即宣布戒严，严密监视各团体的集会结社活动。早在1922年6月，任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秘书职务的李启汉被便衣诱捕，书记部及《劳动周刊》均被封闭，不得不转移到北京。结果在高压下，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领导，以各工团与商界、学界联合的争自由、争人权、反抗军阀的运动，最终胎死腹中。由党建立或在党的影响下成立的革命工会几乎全被封闭。

在武汉，白色恐怖还在继续，且日甚一日，大批工会领导人不得不逃往上海租界避祸，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也迁往上海办公，



工人通过斗争取得的一些权利都被取消，劳动时间延长，工资减少，汉阳铁厂厂长吴任之也趁机报复，开除 200 多名往日斗争精神强的工人。紧接着而来的经济凋敝，又使得数万名工人失业，生活更加穷苦。

白色恐怖面前，一些不坚定分子经受不住考验，有的声明退出工会，有的则由动摇转而脱离组织。杨德甫、郭聘伯等人到上海后，开始鼓吹无政府主义，最终转变为工贼，在他们的拉拢下，陈天等也先后叛变。全国工人运动形势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中。

但是，斗争并未停止。在通缉令贴满全城，军警、暗探、巡捕大肆搜捕的情况下，项英、林育南和许白昊等在汉口秘密联络处按照中央的指示，冒着危险坚持开展工作。一次，党组织鉴于武汉形势过于严峻，找许白昊谈话，准备安排他到上海工作。许白昊委婉地拒绝说：“正是因为现在情况异常困难，才越发不能离开。”

中共武汉区委的工作，一个是救济此次惨案中受难的江岸铁路工人。安葬被杀工人，抚恤其家属，营救被关押在狱中的工友，并照料数百名被开除而失业的工人。当时我党在全路失业工人当中组织了一个济难委员会，



京汉工人流血记

经费来源主要是国内各工人组织的经济援助和在共产国际号召下由各国共产党和赤色工会募捐来的 3 万卢布。另一个工作是秘密恢复工会组织。通过派工人骨干深入工人群众中，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首先在江岸铁路工人中建立了 10 人小组。汉口染织厂工人以 10 人小组为基础，恢复了工会委员会，加入工会的有 20 多人。人力车工人召集了管段地区 10 个码头的工人代表会议，改组了车夫工会委员会，展开秘密工作。经过中共武汉区委的努力，工人小组在江岸、徐家棚、汉阳等地区的工人中基本都建立

起来，汉阳铁厂的规模最为突出，有 300 多人加入工会小组。

在惨案发生的 4 个月后，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项英、林育南、陈潭秋等出席，会议的中心议题即是总结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经验教训，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出合适的革命发展道路。

党自一大以来，就以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作为核心工作。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是党成立后所遭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挫折。痛定思痛，会上，陈潭秋作了京汉铁路二七惨案的报告，孙云鹏作了二七被捕工人救济工作的报告，张特立作了关于铁路工会情况的报告。

失败的原因，从客观方面看，是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联合力量大大超过了工人革命力量，在毫无民权权利保障的情况下，依靠和平式的罢工是无法抵挡凶残敌人的。

另一方面，在罢工过程中，对情况做了过于乐观的估计。1922 年，直奉战争后攫取了北洋政权的吴佩孚为了收买人心，高唱支持爱国学生运动、保护劳工等口号，但当他发现其统治区域内蓬勃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触及他的根本利益时，帝国主义和军阀同工人运动的矛盾就日益尖锐起来。开滦煤矿罢工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中央当时虽然曾经开会研究，但没能注意到形势的变化，未采取相应的对策。1



关于《纪念二七的意义》的新闻报道



月30日，京汉铁路工人代表面见吴佩孚时，吴佩孚已经露出真面目，但随后总工会与代表们商讨办法时，却依然对他持有幻想。

而在前期的工人运动发展过程中，过分强调阶级性，工会中不要穿长袍马褂的，不要工头，铁路上的下级司员、电报员和站长都没能吸收过来，结果在2月4日总罢工之后，总工会与各分工会间失去联系，统一指挥变成了单打独斗。

面对这种种的教训，大家一致认为，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斗，是不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必须联合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帝反封建要求的民族资产阶级，结成民族民主统一战线，通过国民革命运动的办法取得革命的胜利。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马林早先提出的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受到重视。



矗立于江岸的二七烈士纪念碑

因此，会议主要围绕国共两党的合作问题做了激烈的讨论，最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在保持组织独立性的情况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大会形成《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劳动运动决议案》等一系列文件，为新形势下的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党的工作中心实现转移，从发动组织工人、开展工人运动，转变为开展以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在这一方针

的指引下，武汉工人运动开始向新的高潮迈进。

（张均）

后 记

100年前，当中华民族处于苦难深重、山河破碎的黑暗深渊中，包括武汉在内的全国六个城市和旅日的中共早期组织代表，在上海石库门内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上完成了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一开天辟地的伟业，点燃了中国革命星火，开启了民族复兴之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之时，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隆重推出“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第三辑《播火荆楚》，生动、系统、真实地反映中共武汉早期组织创建、发展及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工人运动的历史，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鲜活的本土教材，并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武汉是拥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武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阵地之一，是全国继上海之后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城市；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就有5人来自湖北，并与武汉早期党组织相关；武汉早期党组织党员人数位居全国第三，涌现了一批党的早期领导和工人运动骨干。武汉早期党组织成立前后，积极开展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工人党员即出自武汉党组织，全国第一个地方性联合工会是武汉工团联合会，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会是汉冶萍总工会，这充分体现了武汉人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中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回首历史，不忘初心。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精兵强将，广泛收集史料，深入开展研究，历时半年



多完成了全书编撰。本书由江汉大学邓正兵教授主撰。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刘桂芳，武汉图书馆王钢，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张均，汉口里控股有限公司徐志刚，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王耀，以及江汉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谢忱、李静、丁佳佳、王俊茹、陈梦烨、王兵强、刘佳欣等同志共同参与编撰工作。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何利平负责全书编撰的组织工作，在选题发起、材料提供、进度掌控、出版联络等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一级调研员宋健负责全书的审核把关，提出宝贵修改意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郑水平领导本书编撰出版工作，并对全书进行了审定。

在此，对所有参与和支持本书编撰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书中引用的图片，来自多年来有关方面出版的各种图册，在此向原编者一并致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编 者

2021年5月9日